

目录

第二部分 中古教会时期

1 中古前期

- 1.1 中古时代教会发展演变的情形
- 1.2 日尔曼民族的情形
- 1.3 匈奴入侵与罗马灭亡
- 1.4 蛮族入侵时的教会
- 1.5 蛮族的归化过程
 - 1.5.1 法兰克人的归化
 - 1.5.2 西哥德人的归化
 - 1.5.3 爱尔兰的归化
 - 1.5.4 英吉利的归化
 - 1.5.5 日尔曼的归化
- 1.6 教会对于欧洲文明的影响
 - 1.6.1 教会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 1.6.2 隐修士的卓越贡献
 - 1.6.3 教会对于蛮族的影响
- 1.7 中古前期的教会知识生活
 - 1.7.1 中古前期的主要作品
 - 1.7.2 中古前期的历史作品
 - 1.7.3 中古前期的教育
- 1.8 教宗权威的形成
- 1.9 教皇国的诞生
 - 1.9.1 教皇国概述
 - 1.9.2 梅罗文加王朝
 - 1.9.3 教宗权利的演变
 - 1.9.4 “矮子丕平”时期
 - 1.9.5 查理曼时期
- 1.10 回教的兴起

2 封建时代

- 2.1 封建时代教会的衰颓时期
 - 2.1.1 封建时代的概述
 - 2.1.2 封建时代的社会关系
 - 2.1.3 封建时代教会内的阶级
 - 2.1.4 内忧外患的教会
- 2.2 封建时代教会的改革时期
 - 2.2.1 修道院的革新
 - 2.2.2 教会制度的革新
 - 2.2.3 教宗与日耳曼国王的关系

- 2.2.4 “神权”与“俗权”之争
- 2.3 与东方教会的分裂
 - 2.3.1 分裂的大致总结
 - 2.3.2 查士丁尼时的情形
 - 2.3.3 东西方教会的神学分歧
 - 2.3.4 非法祝圣事件
 - 2.3.5 东西教会的正式破裂
- 2.4 教会在北欧与东欧的发展
 - 2.4.1 北欧的归化
 - 2.4.2 斯拉夫民族的归化
 - 2.4.3 波西米亚与波兰的归化
 - 2.4.4 俄罗斯的归化
- 3 中古全盛时期**
 - 3.1 中古全盛时期的教会
 - 3.1.1 中古时期教会的生活情形
 - 3.1.2 咏礼司铎
 - 3.1.3 新型隐修会
 - 3.1.4 熙笃会与圣伯尔纳多
 - 3.1.5 军旅修会
 - 3.1.6 方济会与道明会
 - 3.1.7 其他新修会
 - 3.2 中古全盛时期的文明
 - 3.2.1 士林学派
 - 3.2.2 教会的礼仪与法律
 - 3.2.3 中古全盛时期的文艺
 - 3.3 十字军东征
 - 3.3.1 十字军东征的背景
 - 3.3.2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 3.3.3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
 - 3.3.4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
 - 3.3.5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
 - 3.3.6 十字军东征的影响
 - 3.4 十三、十四世纪的传教事业
 - 3.4.1 方济会的传教
 - 3.4.2 蒙古的崛起
 - 3.4.3 柏朗嘉宾出使蒙古
 - 3.4.4 欧洲与蒙古的交流
 - 3.4.5 元朝时中国的传教历程
 - 3.4.6 中古全盛时期传教总结
 - 3.5 十二、三世纪的地方教会和教友生活
- 4 教皇国的政治**
 - 4.1 十二至十五世纪教宗与世俗政权的关系
 - 4.1.1 双教宗分裂事件
 - 4.1.2 教宗与腓特烈

- 4.1.3 雄才大略的依诺森三世
- 4.1.4 西西里王腓特烈二世
- 4.1.5 教廷与王权的发展
- 4.1.6 鲍尼法斯八世
- 4.2 中古罗马教廷的组织和制度

第二部分 中古教会时期

1 中古前期

1.1 中古时代教会发展演变的情形

上一部分的内容已经为各位把古代的教会历史，简略的讲述完了。从下面开始将引导各位进入中古时代的教会历史。下面就先将中古时代的欧洲历史先做个概略的介绍，然后再配合时间的先后的顺序来说明中古时代教会发展演变的情形。

咱们天主教，自从耶稣基督升天时，亲自向门徒们颁下了“往训万民”的命令以后，门徒们也就遵奉师傅的训令，在五旬节，也就是圣神降临以后，各自前往不同的地方，开始了他们传教的使命。而在罗马帝国境内，与政府的迫害和教难，奋斗了两个多世纪，殉道圣人的鲜血所浇灌的教会，终于获得了胜利，成为合法的、受政府保护的宗教，皇帝本身也皈依了圣教会，最后狄奥多西更宣布天主教为帝国的国家。

但到了第四、第五世纪以后，欧洲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都发生了严重的变化，西罗马帝国步上了衰亡之途，在这之前呢，是罗马帝国把地中海周围的地区统一起来，形成了一个西方的文明世界，国力强盛如日中天，帝国盛极一时的时候，也正是种下衰亡的种子。社会秩序，风俗习惯也就随着日趋败坏，国力日衰无法遏阻日尔曼蛮族的入侵，导致西罗马帝国败亡。就从这时候开始，天主教负起了维护文化、教化蛮族的责任，成了近代欧洲各国在形成期间的孕育者，教会的精神和礼教思想，深入民间和一切制度之中，成为欧洲一致的精神，一直到欧洲各国成长起来，才逐渐的脱离了教会的扶持和监护，而这种进展，也直到十五世纪的末叶才告完成。西方的历史学家就称这段漫长的历史为中古时代。

有些人把欧洲的中古时代和所谓的“黑暗时代”混为一谈，这种方看法，未免太简单了。欧洲中古时代延绵一千多年，相当于咱中国的南朝刘宋到明朝的初年，在这段时期中的东西双方历史都相当的错综复杂。我们可以把中古时代再分成前期、中期、晚期三个时期。中古前期，大概从第五世纪到第十世纪，无政府的战争，导致了蛮族的入侵和文化的衰退，伦理道德，理性生活也随之低落，而后不久，蛮族纷纷归化，因而也奠定了中古时代后期历史的基础。圣教会不计任何千辛万苦，耐心地教化蛮族，教会不是只把宗教的信仰传给他们，而且，还把拯救出来的文化遗产传授给蛮族，蛮族也以热烈的心情接受各种新奇的事物。同时呢，各蛮族也以其本身的特性予以融合和适应。到查理曼在位的时候，他把罗马人和日尔曼人联合在一起，再度统一起来，疆域包括了古代罗马帝国的大部份版图。公元八百年，教宗良三世亲自为他加冕而称帝。在历史学家看来，查理曼的帝国是，教会领域和文化领域复兴

的标记。可惜查理曼死后，他的帝国只是昙花一现。公元 814 年，帝国再度分裂，欧洲又陷于无政府的状况，封建制度也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形成。好在是，教会仍然继续的发展着，并且影响之所及，还深入各国的各种制度，而传教运动呢，也进入了欧洲的东部和北部，这是古代罗马帝国从未征服过的地区。

中古时代的前期，东方的教会并没有遭到日尔曼蛮族的入侵，所以能够继续保持着已有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到第七世纪的时候，却遭受到阿拉伯回教徒的严重侵扰，教会的内部又有因敬礼圣像所引起的纷争，以及过分的保守，教会的力量也跟着衰微了，那些由于误解而长久以来，反对西罗马拉丁礼教会的人，更加的无法相容，终于造成了东西教会的分裂，而且，这样的分裂还一直持续到现在。

中古时代的中期，历史学家称它为中古文明的极盛时期。这一段光明的时期，确实是在 11 世纪的末叶方才开始。大概维持了有一百五十年。圣教会在这段时期，面对着政治的权力，更赢得了自主的权力，教宗的权威也超出在帝国之上，教宗在教会内的影响，以及他与各国政府之间来往的权力，都达到了空前未有的地位。教会统治着公共的和私人的生活，意思是说，无论团体或个人的生活，无不以教会所制定的伦理精神作为规范，并且在属于文化的一切层次上，教会也成了无与伦比的领导者。神职班的革新，使宗教生活在日新又新的方式下，奋发前进。十字军东征与回教徒之间，发展了一场接一场的战争，重要的传教事业、神学杰作、罗马式、哥德式宏伟教堂的兴建等等，这些都是西欧民族的充沛活力，在教宗的领导之下，综合起来的表现。虽然，理想和事实之间的对比，往往很严重，有着很大的距离，但是呢，教友们的精神，却成了百姓们的共同精神，这种精神贯穿渗透了当时的一切事物，而且，还使教会更为丰富。

中古时代的第三个时期，就是中古文明的衰落期。14 和 15 世纪，欧洲又开始了一场重大的变化，民族主义兴起、各国争相独立、互争领土，逐渐的冲破了教会的规范。教会呢，也因着西方的分裂而发生了危机，教会越来越须要去面对新思潮的挑战，而且，也可以感受到，日后的宗教改革运动已露出了端倪。经过了对中古时代的概略说明之后，下面更深入介绍中古时代，各个时期的教会情况。

1.2 日尔曼民族的情形

上一节的重点是历史学家们所谓的中古时代，并且将中古时代划分成前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也概略的、简明的述说了这三个时期，教会的情形。下面对所提到的中古前期，入侵罗马帝国的北欧蛮族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解。重点介绍日尔曼民族在政治、社会上所形成的政风、民俗习惯，以及他们的一些思想和观念，如何影响了中古欧洲的历史。

先介绍中古前期，在北方蛮族入侵时的情形。公元四世纪，罗马帝国的界线，并没有明显的划出“纯罗马世界”和“纯蛮族”世界两大地区。而早在公元前第一世纪，也就是我国西汉武帝的时候，罗马人和蛮族之间就已经发生了关系，双方的文化也已相互影响。到了第四世纪，在罗马的军队里边儿，就已经雇佣了不少的日尔曼佣兵，有的还甚至达到大元帅的职位。在罗马元老的农庄里，也有很多日尔曼奴隶和佃农。罗马的商人呢，他们经常的往来于帝国和蛮族地区；而蛮族的子弟呢，有以人质的身份，接受罗马教育的人，也不在少数。再者，高卢和不列颠两省的文化，从一开始，就是罗马和塞尔特文化的混合。因此，罗马的文化必然的也传到帝国政治界线以外的地区。帝国以外的蛮族，则以他们所在的地区和帝国之间，距离的远近，受罗马文化影响的深浅而有程度上的不同，如果罗马人真有意并有计划的传播自己的文化，那么，蛮族所受的影响自然也就更大，但是，罗马人太短视，只以政治为重，对自己不能有效统治的地区就不感兴趣，第一个负起传播罗马文化的，竟然是天主

教的传教士，但是，这个时候的蛮族，则已经深入帝国内部，分疆划地、建立起所谓的“蛮族列国”了。

就历史学家的记载，我们知道，日尔曼人最早的老家是波罗的海西部沿岸的地区，也就是斯堪地那维亚半岛南部、日德兰半岛以及现今德国北部沿海地带，东边呢，到达奥德河，就从这个范围，蛮族逐渐向南延伸到中欧。耶稣基督诞生的公元初年，他们已经占据了现今的德国，又从这儿向西和向南伸展，却受阻于罗马，但是，向东南的发展却丝毫没有受到阻力，因此呢，东翼的日尔曼部落，经过今天的波兰和乌克兰，定居于黑海以北的大草原。公元第四世纪的时候，日尔曼人，西起莱茵河，东到顿河，面向罗马虎视眈眈，等待机会向南发展；莱茵河的下游有法兰克人，上游则有阿雷曼人；而马可曼人占据着今天的波希米亚一带；汪达尔人、日比代人则是居住在今天的匈牙利平原；由匈牙利平原以东直到顿河之间的是哥德人；居住在法兰克人北方，也就是今天的德国西北地区的，有萨克逊；而盎格鲁人和日德人则是居住在日德兰半岛；萨克逊的东方，住的是苏汇维人；再东就是伦巴人居住的地区。上面这些个人，并非指的是一些不同的民族，而是指同一民族，只不过由于语言和风俗习惯不同而产生的部落，他们同属于一个日尔曼民族。那么，根据学者们的猜测是这样的：在民族大迁移以前，日尔曼人在语言和风俗习惯上，并没有太多的区别，可是，在迁移的过程中，各部落之间失去了联系，因为孤立，逐渐形成语言和风俗习惯的差异。而且，每一个部落为了适应各地不同的环境，必须改变生活方式，也就逐渐造成了文化上的差异，出现了许多日尔曼民的支派。最值得注意的，不是各部落间的差异，而是东西日尔曼人的差异。西部的萨克逊人、苏汇维人、法兰克和阿雷曼人，他们仅仅只是南迁到和原居地的地理环境大致相同的地区，而且，还与居留在原地的盎格鲁人和日德人保持着不少的接触。可是呢，东部的伦巴人、汪达尔人和哥德人，则迁移到地理环境完全不同的地区。匈牙利平原和黑海以北的草原比较适合游牧生活，所以迁到这地区的日尔曼人，成为卓越的骑士而以畜牧为生。而且邻近的俄罗斯草原，早已成为斯拉夫农民、希腊殖民和亚洲游牧民族争逐的地区，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不同的民族先后占据了 this 地区，而也先后又被更强的民族所驱逐，哥德人征服了先前的民族，他们用武力统治了一个含有许多不同民族的混合地区。

我们根据考古学家的发掘，像使用的器具和武器等等，约略可以指出日尔曼人的日常生活和文化发展的路线，又根据实际历史的记载，像凯撒所撰的高卢记、泰西塔斯所写的日尔曼这些书，在在提醒罗马人对强邻压境的警觉，但是从泰西塔斯以后的蛮族入侵的三百年历史，仍然是空白无知的。当日尔曼定居帝国以后，他们的法律，大多都是根据古代习惯编辑而成的。盎格鲁人、萨克逊人和斯堪地那维亚等民族文学作品，它们的内容大多属于大迁移时代，从这些残缺的资料，我们可以约略窥见到早期日尔曼人的文物制度。

根据泰西塔斯的记载，日尔曼人的社会，有贵族、自由民、由奴隶而获得自由者，以及奴隶等四个阶级。在早期一般的日尔曼群众究竟享有多少自由？近代的历史学家们，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我们可以猜测到的是，因为文化的进步，自由民和贵族之间的距离也随之增加，社会和政治的权力逐渐的集中操纵于贵族们的手中，日尔曼人的家庭是社会的基础，许多的家庭合而为宗族，他们也和其他政治组织还没有健全的原始民族一样，日尔曼人的社会和政治活动中心也是宗族，在族长的领导之下，为全族人的安全负责，即使以武力去对付敌人亦在所不惜。除了对宗族的忠贞之外，还有所谓的“扈从”的习惯。一些好勇的青年人自愿的，隶属于一位富有战争经验和享有声誉的老壮士，他们之间树立了一种强烈的伙友关系，也就是个人的忠贞。这些青年人，一方面可以学习战争的技术，另一方面呢，又可以得到老壮士的保护，并且还可以分享战利品。而这些青年人呢，他们都属于贵族阶级，所以“扈从”并不会降低他们原来的身份，而且这种关系，在双方同意之下，可以随时解除。中古封建社会里的“领主”和“附庸”的关系，就正是由这种日尔曼社会关系所演变而来的。

农耕和战争是日尔曼人生活的两大资源，农耕的单位是农村，而战争的单位则是老壮士

们的“扈从”。因此呢，近代的历史学家认为，日尔曼人有两种不同的农村制度。一种是由奴隶操作，老壮士可以坐享其成；而另一种呢，则是由自由民所耕种的，他们本人是地主。耕地呢，大致都划分成两区，轮流耕作或休耕，以保持土地的生产力。自由民的农地也分为两区，每家各分得一块，此外，像牧场、森林这就是属于全村人民所公用的了。

战争，是另一种谋生之道，抢劫邻近的部落或罗马帝国的边疆，不仅可以获得战争的经验，而且，可以获得生活的必需品。尤其值得注意和重视的是，成为罗马帝国的佣兵，服务于罗马军队，可以享受到帝国文明的生活。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不劳而获，是第四世纪日尔曼人进侵帝国的重要动机之一，他们自己的生活十分艰苦，而且不断有被邻近的大部落征服的危机，然而呢，边境的那边，土地肥沃，生活安定，最能引起这班蛮族的垂涎。日尔曼人的南侵，他们的目的并不在消灭罗马帝国，而是在分享它的文明。日尔曼人政治制度的最低层是农村。每一个农村都享受到相当程度的自治，在早期的时候，农村之上有部落。根据泰西塔斯的记载，由族长组成的会议，操纵了部落式的政府，但是，重要的事件，就得由全体的自由民所组成的会议来决定。在迁移的过程中，许多部落又组成更大的团体，自由民也就从此丧失了独立和政治权力，因为在迁移的过程中，不断的受到许多危机，逼使他们走向更有组织的中央政府。到了入侵罗马帝国之前，所有的日尔曼各民族，几乎都由国王所统治，而以族长组成的会议来辅助国王，但是各民族王权的演变并不完全一致，而国王的职权呢，也没有明确的规定，因此国王个人的强弱，以及环境好坏往往是决定王权大或小的因素。不过，我们应该说，日尔曼人所谓的国王，实际上不过是酋长，他主要的任务，是领导人民作战。

早期日尔曼人的社会和政治观念，完全是基于个人关系，所谓地域国家的观念并不存在。这种个人关系的观念，最明显表现是在他们的法律方面。日尔曼人的法律和罗马人的法律不同，罗马法律，是由政府制定和法官们处理事物的先例所造成的结果；而日尔曼人的法律呢，则是代代相传的民俗惯例。一个犯罪行为，并不被视为违反国家的行为，而只是违反个人的行为，法律只是为受害者追捕所受损害的方法，因此诉讼，只是个人的私事，法庭不过只是调停人而已，处理的方法也不是根据人证和物证，而是根据一方的宣誓或接受神断法。犯罪行为，包括杀人罪，全都可以用罚款来抵消，依照被杀者地位的高低来决定罚款的多少，由此可见，日尔曼人尊重个人权利的观念。

接下来，要告诉各位的呢，就是有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日尔曼人是一个崇尚民主的民族。这种说法，一方面由于日尔曼社会含有某些民主的因素，另一方面呢，也是将两种不同的观念混为一谈，那就是说，民主政府和个人天赋权利不能被政府所剥夺的观念。因为一个民主政府，也能够像专制政府一样，限制个人自由；而一个非民主的政府，也能相信自己对个人的权力是有限的。日尔曼人的法庭制度，无疑的，是很民主的，可是，因人的身份而有差异的法律，则又是十分的不民主。自由人有权从贵族家庭中推选酋长，可是，如何以民主方式来控制当选的酋长，则又不太明确了，因此呢，我们不能毫无保留地认定，日尔曼社会是一个民主的社会。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日尔曼政府的职权则又十分有限，除了领导战争和处理民间诉讼外，就毫无其他的任务，人民可以自由的经营自己的一切。所以，我们可以说，日尔曼人确实有一种强烈的个人自由的传统，这种传统对西方文化的演变，有极深刻的影响。

日尔曼人，很早就想在帝国境内定居，除了他们先天的好战性和标掠的嗜好以外，帝国土地的肥沃、水土的温和、城镇的富庶，样样都对他们有吸引力。罗马皇帝不断地和试图越过莱茵河和多瑙河的部队交战。当帝国强盛时，对入侵的蛮族固然不难击退，但是，从第三世纪以来，罗马人的爱国心和尚武精神都已日渐衰退，加以连年内战，精力日渐萎靡，政治腐败的城市，对战争已经不再感到兴趣了。乡村中的居民也日趋少，帝国既然日渐衰弱，军队中也招募雇用了不少的蛮族，连以前只操在罗马人手中的指挥权，也逐渐转移到蛮族手中了，同时，许多日尔曼的移民便定居在罗马境内了，这种渗透运动到第四世纪，更形的尖锐

化，连皇帝也不得不明令准许蛮族的整个部落，占领那些人烟稀少的省份了。

在国境的另一面，大批的入侵者也逐渐的增长，这是东进不成，转而西进的反应。原来，在公元初期，中亚和东欧以及北欧的半游牧民族，开始了有史以来的民族大迁移，这场民族大迁移，说来，还和中国历史上的两汉讨伐匈奴大有关系。匈奴民族被汉朝挾伐分裂为二，南匈奴逐渐被中国汉民族所同化，而北匈奴在汉朝军队不断追赶之后，远走中亚，转而西向，于是呢，形成了后浪推前浪，造成连锁反应，他们便把当前的民族向西驱逐，而被驱逐的民族，又被迫往西推进，迫使日尔曼民族加强了他们向帝国的入侵。

公元 406 年，有如大提溃决一般，防守莱茵河及多瑙河的罗马军队全面的退却，蛮族大举涌进。公元 410 年，哥德人的一支军队，在阿拉利克的率领之下，侵入了义大利，攻陷了罗马城，洗劫了罗马长达六天之久。这真是一件震撼罗马世界的大事，这时正值我国东晋的末年，刘裕掌权之际。

法兰克人、布根地人、西哥德人，侵入高卢，西哥德人就定居在罗亚尔河与比里牛斯山之间。不久，罗马皇帝只得承认西哥德人为盟友。西哥德人和汪达尔人，又越过比里牛斯山，向西班牙推进。汪达尔人，更由西班牙渡过直布罗陀海峡而入侵北非。他们围攻了当时有名的圣奥斯定主教所驻在的希波城，当时奥斯定主教已是病重垂危之际，罗马皇帝竟束手无策，不得已，在奥斯定主教死后的 435 年，承认汪达尔人为盟友。汪达尔人在北非建立王国以后，以迦太基港为基础，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海军，从事海盗的活动。公元 455 年，攻陷罗马半个月之内，罗马城被洗劫一空，古迹文物的被毁，可谓空前。直到现在，我们仍然称那无知、恶意破坏艺术和文化的行为称为“汪达尔人的暴行”。这一年，正是我国北魏的太武帝在位期间。罗马军队，也在这段时间，从大不列颠撤了回来。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就乘这个机会占领了大不列颠岛。

圣热罗尼莫曾这样感叹的话：“我一想起我们这时代的灾难，我的心便觉得悲伤，在君士坦丁堡和亚平宁山之间，罗马人的血倾流了 20 年之久，各省都遭到了蹂躏和洗劫，不知道，有多少贵妇贞女，没有遭到那些野兽们的戏弄！主教被掳了、司铎及各级神职人员被杀了、圣堂被毁了、战马系在祭台旁，就好像在马厩一样、殉道者的遗骸，被弃置在地上；各处都在举丧、各处都在悲叹、各处也都呈现出死亡的气象，罗马的世界倾颓了！”圣热罗尼莫的这种痛苦的呼声，使我们明白，人心对罗马毁灭的悲哀，眼看着罗马帝国所代表的秩序、稳定、文明、人道以及美好的生活，都在蛮族所燃起的战火中覆没了。

所见所闻，尽是日尔曼蛮族，由于羡慕帝国境内富庶的生活，就从他们的原居地向东南、西南以及南方取得肥沃的土地，烧杀劫掠，殃及了圣教会和教友们。主教被掳、司铎及神职人被杀、圣堂被毁、多少高贵纤弱的贵妇贞女、纯朴善良的百姓、被奸淫蹂躏杀害。前面提到汪达尔人在北非建立“汪达尔王国”，由于族人中大多数是“亚略异端”的狂热信徒，仇视罗马所有的一切，对天主教徒迫害最烈，还成就了好多殉教致命的圣人。第五世纪初叶，实在有不少的日尔曼民族信奉基督宗教，不过，却都是“亚略异端”。信奉“亚略异端”的汪达尔人，对天主教的迫害最为惨烈。我们一路走来，真是一场大灾难，各处都在举丧、悲叹，各处所呈现的尽是死亡的气象，我们仿佛听到了那个时代，人们痛苦的呼声，也让我们明白了，当时的人心对罗马毁灭的悲哀，也看到了第五世纪初叶，有不少的日尔曼民族信奉了“亚略”派异端，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有一个外叫武斐拉的哥德人，他来到了罗马帝国的东半部，在那里受到了很好的教育，而且还被祝圣成神父，更在公元 351 年被祝圣为君士坦丁堡的主教，很不幸的呢，“亚略异端”当时在东方正占着上风，武斐拉也受到感染和影响，而当时的哥德人，还没有发明自己的文字，武斐拉发明了一种便于书写的文字，他就用这种文字把圣经的大部份都翻译成哥德文，为了将福音传给他的同胞，在他的圣经翻译本中，加上了亚略派的解释，哥德人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接受了亚略派异端。又由于他们的迁移，也就在其他的

日尔曼民族中，助长了亚略派异端的传播。

1.3 匈奴入侵与罗马灭亡

当北非逐渐被汪达尔人征服之际，西方帝国实际上只剩下了义大利半岛和高卢的一部份，罗马皇帝奥诺利乌斯死后，发生皇位继承的问题，西方的实际统治者是大将军埃契乌斯，他的政治是放弃北非，保全义大利，维持高卢的现状，因此呢，他致力于阻止西哥德向北发展，击退了法兰克人的南侵，同时又粉碎了勃根地人的野心，使他们处于高卢东南地区，在隆河与阿尔卑斯山之间，于公元 443 年成立一个散漫的邦联。

西方帝国在埃契乌斯的武力统治下，似乎还可维持小康之局，可是，早期征服东哥德人和迫使西哥德人，逃入罗马帝国的匈奴人，在黑海以北和多瑙河以东，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对罗马帝国虎视眈眈，一直有着渡多瑙河入侵的野心，东方帝国的狄奥多西二世呢，似乎除了纳贡贿赂之外，就没有更好的计策了。公元 433 年左右，匈奴人在号称“天主之鞭”的新王阿提拉的统治下，不时的侵扰帝国的边境。狄奥多西二世以增加贡税来维持暂时的和平。到了公元 450 年，阿提拉决定西侵，他之所以决定西侵是基于下面的三个理，第一是，继承狄奥多西二世的乌西安，他拒绝向匈奴纳贡苟延的政策。第二是，西方帝国的宫廷起了内讧。据说是公主奥诺利亚给阿提拉写了一封信，邀请阿提拉率领军队去攻打她的胞弟法伦第尼安三世。信中还附有戒指一枚作为信物。阿提拉认为戒指有求婚结亲的意思。第三个理由，则是北非的盖撒利克也有意要利用阿提拉去攻击西班牙和西哥德人。由于这些因素的配，于是阿提拉决定要西侵，给西方再度带来恐惧。

欧洲人对匈奴人视之如蛇蝎一般，感到非常的恐怖，既使是在今天，当西方的学生读到这段历史，都还心有余悸。一位拉丁历史学家曾在他的书里边儿，有着这样的描述：“他们的野蛮残虐，实在是出人意料之外，他们身体短小精悍，上肢特别宽大，具大无比，他们看起来真不知道是人还是野兽！他们在马上生活、在马上开会、在马上买卖吃喝，连睡觉也是伏在马的颈子上，他们没有农具，没有农业生活，妻子儿女也都生活在他们到处游牧或出征的马车上。他们不起火煮饭，只是把捕猎或畜养的动物放在马鞍上，以臀蹂躏，然后带血吸食，他们能以无比熟练的技巧，向极远距离的目标射箭，箭头是用兽骨制成，如同铁制的那样坚硬，也有着同样的杀伤力。他们神出鬼没，疾驰如飞，简直无法捕捉到他们。他们好像生来只为扰乱和破坏，他们还夸口，自己的马蹄所经过的地方，是草木不生呢。”

说真的，在第五世纪的中叶，匈奴人也早已和文明世界接触了。阿提拉这位听明绝顶的领袖，可说是把原始的野蛮和东方最奢侈的细腻，熔于一炉了，他幼年的时候曾经在朝廷里当人质。公元 435 年做了匈奴王以后，他时而用恐吓，时而用诡计，竟然把所有生活在莱茵河和里海之间的各个民族，团结在他的麾下，他梦想要攻下罗马帝国，并且要取而代之，作为他征服世界的第一步。

公元 451 年，他率领一支庞大的军队，势如破竹，渡过莱茵河，进入高卢，到处焚烧掳掠，他自称是“天主之鞭”。一路所向披靡、无人敢当，来到了巴黎的东北部，巴黎的居民，也同样为恐怖所震慑，正想弃城而逃，但是，一个名叫热诺维扶的少女，反对逃亡，她说：“谁愿意逃亡，谁没有作战的勇气，就任由他们逃亡吧！至于我们，却要热心的、恳切的祈求天主，祂必要俯听我们的恳求。”结果，阿提拉没有进攻巴黎，却去围攻奥尔良。奥尔良的城门要被攻陷的时候，远远的看见来了一支援军，这支援军正是埃契乌斯率领的，由罗马人、哥德人、勃根地人以及其他的盟友所组成的联军，因为共同的敌人当前，发挥了敌忾同仇的精神，在特尔瓦附近经过一番血战，阿提拉居然被阻，被迫后退，在沙廊附近的香榭大平原上，展开了决定性的大战，战况异常剧烈，死伤无数，阿提拉大败，退回到莱茵河彼岸

的匈牙利。

无论如何，“沙廊之役”并没有消除阿提拉侵略的野心。次年，他又卷土重来，侵入意大利的北部，向着罗马前进，如入无人之境。大军所到之处，片瓦不存，皇帝和元老院除了派人去求和之外，真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这个求和的使命很难，而且极为危险，就去请求教宗圣利奥一世也就是良一世担任，教宗欣然答应了这个艰巨的任务，他依恃天主的助佑，有几位德高望重的人陪着他去，与阿提拉在意大利北部的曼都亚相遇。阿提拉竟然肯答应教宗的请求，罗马城呢，也就幸免于难，到底教宗用了那些话折服了这位充满野心的“天主之鞭”呢？因于史料欠缺，我们不得而知，倒是阿提拉，他放弃了原先的计划，返回了匈牙利，隔了一年，在公元 453 年，突然去逝，他的儿子们为了争夺疆土，阿提拉的帝国也就四分五裂。匈奴人有如龙卷风一般，扫荡了西欧，除了留下一片残骸之外，在历史上并没有留下其他的痕迹。一般历史学家认为，是欧洲历史的转折点，因为，如果匈奴胜利的话，往后欧洲历史的演变，或许会是完全的不同，您说，是吗？

匈奴王阿提拉死后的公元 454 年，汪达尔人再度侵入意大利，向罗马推进。公元 455 年又是教宗圣利奥一世前去说服，却没能阻止他们的抢掠，只答应不杀人放火而已。汪达尔人在盖赛里克的领导之下，彻底的洗劫了罗马城。

阿提拉的入侵，有如一阵龙卷风，所过之处，皆成废墟，相反的，日尔曼的入侵，却在西罗马帝国各省，建立了许多王国，只剩下意大利，在表面上还保持着独立，但不久也终归消灭。狄奥多西的继承者，从 456 年起，先后都是些软弱无能的公侯，只不过是日尔曼人，里西梅尔督军任意加封或罢黜的傀儡。直到公元 476 年，一个名叫欧道阿格的日尔曼人，迫使最后一位年龄只有 15 岁的罗慕路斯退位，把皇帝的衣冠文物送到东罗马帝国的皇帝那儿，表示西方已不需要皇帝了，西部罗马世系的皇帝遂告终止，西方的史学家，就以公元 476 年，作为西罗马帝国灭亡的年代。不久以后，东哥德王国的国王狄奥多里代替欧道阿格，在意大利组织了一个昌盛的国家。

第五世纪末叶，西方的面目已和前一世纪完全不同了，罗马帝国，已经如同一棵被蛀虫蛀空的大树，一场蛮族入侵的龙卷风，终于使它倾颓了，帝国的政府，官吏都已不复存在，罗马人的身旁已经住进了新的民族。取得胜利的蛮族，人数固然没有拉丁民族多，但却已经是喧宾夺主，罗马大一统的局面已不存在。现在地图上所看到的是王国分立的五色图案。意大利是东哥德人的王国，北非是汪达尔人的王国，西班牙和高卢的南部是西哥德人的王国，今天的法国北部和比利时，是法兰克人的王国，盎格鲁和撒克逊人占据了大不列颠，他们彼此间的交通越来越困难，大道已经不能保存。罗马的文化，本来是属于一种城市文化，这段时期，多数人已经由城市的废墟中迁出，逃避到乡下去了，学校大都已经关闭，教育和文化的水平，也大大的降低，可以说是进入了“黑暗时代”。

1.4 蛮族入侵时的教会

天主教虽然与帝国从获得宗教自由以后，彼此紧密的联合，不过呢，却有它特别的组织，因此在这场大浩劫中，仍能继续的存在。各地的主教们，仍然管理着他们的教友，虽然在极为混乱的时期，但是，一有喘息的机会，他们便召集会议，共同商讨、制定纪律和敬礼的规则。

在蛮族入侵的时候，主教们常协助或领导保卫城池，不只一次，他们同罗马军官共同组织起来抵抗蛮族。因此减轻了不少民众的损失，圣奥斯定在非洲、圣阿尼盎在奥尔良、圣利奥在罗马都曾这样做过。但当蛮族逐渐在各个地方定居，罗马帝国已不存在的时候，只有主教们仍然保持着他们以往的权力，他们多数出身望族，所以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因此很快的，

赢得了蛮族的佩服，我们不免要问：怎么在如此的大浩劫中，圣教会不但没有凋零解散，反而能继续生存？

下面就来探讨日尔曼蛮族入侵时期的圣教会。上面提到过在蛮族入侵的时候，圣教会在各地的领袖是主教，当时的主教们，常协助罗马军队保卫城池，他们号召教友们同罗马的军官，共同组织起来抵抗蛮族。但是，当蛮族已经在各地定居下来后，由于罗马帝国已经不存在了，只有主教们仍然保持了他们以往的权力，而主教们大多数都出身望族，而且，又受过良好的教育，因此很快的，便获得了蛮族的钦佩和信赖。在史无前例的浩劫中，圣教会仍然继续的生存着，圣教会不但生存了下来，而且，还建造了许多新的圣堂呢，也正是在这段时期，主教们赢得了“城市的保护者”的美名，而他们，的确也真的当之无愧。

主教们最大的功劳，无疑的是，他们总不败兴、总不失望，但是教友们却遭受了失望的绝大诱惑。他们对爱国，决不落于外教人之后，对祖国的灾难感到更强烈的痛心，他们和其他同时代的人一样，都相信罗马帝国能永垂而不朽，他们深爱而且仰靠着帝国的统一，还有着更深一层的理由，也就是说：“帝国的统一局面”是更有助于把基督的教会传扬到世界各地，他们也本曾想到罗马的秩序和文明之外，还有着其他的文化，他们眼看着侵略者一天比一天多起来，而又都是些粗暴的、赭色头发的巨人、衣衫褴褛、胡须丛生、满身的腥膻味、粗俗又无知，连拉丁话都不会说，只会说生硬的土话，罗马人民看着他们到处乱闯、喧宾夺主、对罗马的文明毫不关心，只知道寻求粗野卑鄙的享受，这就是日尔曼人的生活。

有不少的主教，继承着圣奥斯定的思想，而且，还去把伟大的圣师的教训，付诸实践。他们提醒，把圣奥斯定的教训，付诸实践力行。他们提醒百姓，把那些灾难视为天主的惩罚，训勉他们不必为过去而悲伤，应该是举起头来瞻视未来，罗马的毁灭并不是世界的末日，仍是一场浩劫，正如历史上其他的许多灾难一样，文化能够衰败或消灭，但是，建立在磐石上的教会却不会消灭。最后还更向百姓说明，并且强调，蛮族也是基督的宝血所救赎的人类，蛮族也应该可以领受福音，因此，教会便决心去归化那些新的民族，尽心尽力的施以教育。圣教会在第五世纪，蛮族侵入西罗马的大浩劫中，仍旧屹立茁壮。圣教会以前面对着希腊罗马的文明世界作了什么，而今面对着蛮族，照样去做，也就是向他们宣讲福音，使他们归化于耶稣基督。当然，圣教会也遭遇许多重大的困难。大部份的日尔曼人，已经受洗成了亚略派异端的信徒，对这些人而言，天主教是战败者的宗教，从心理上怀有轻视的情节。只有定居在帝国境内的法兰克人，还仍然是教外人，他们居住在现今的比利时和法国的北部，具有倔强不驯的性格，但都是他们最早归化成为天主教徒。现在就讲述法兰克人归化天主教的经过。

1.5 蛮族的归化过程

1.5.1 法兰克人的归化

公元第五世纪的末期，在法兰克人中出现了一位青年领袖，他好胜、聪明、而且骁勇善战，名字叫克洛维。他不多几年就征服了整个高卢的北部。公元 481 年，也就是我国北朝魏献文帝、南朝齐高帝萧道成在位的时候，克洛维建立了西方历史上著名的“法兰克王国”。他所建立的王朝称为“梅罗文加王朝”。“梅罗文加”也正是他祖父的名字，当时的克洛维，年纪只有 15 岁。克洛维年纪虽轻，却是一个既粗暴阴险，而且，具有野心和才干的人，不满于自己狭小的领土。公元 486 年，击败罗马将军夏克利乌斯，并吞莱茵河以南与罗亚河以北的地方。10 年后，他又侵占了阿雷曼人的土地，就在这次的战役之后，克洛维和他的部属皈依了天主教。相传他归化的经过是这样的：公元 493 年，克洛维娶了一位信奉天主教的公主，他名叫克劳蒂德。公主劝他信奉天主教，开始时，克洛维并不肯接受信仰，克洛维还反问公主说：“谁能给我证明您的天主是唯一的真神呢？”公元 496 年，他正和阿雷曼人交

战，战争的情况对克洛维相当不利，这场战争正关系着他民族存亡的危机，他的军队渐渐无力支持了，克洛维这时候忽然想起了皇后的话，于是就举目向天，高声的叫喊着：“克劳蒂德的天主啊！如果您助我战胜，我便信服你而领受洗礼。”果然，战况有了改观，克洛维击败了阿雷曼人。克洛维既然获得了胜利，便决定实践自己向天主所承诺的，于是就在公元498年的圣诞节，领受洗礼。在这一天，还有三千名战士同他一齐受了洗。从此，他不仅获得天主教的支持，而且还借着天主教的名义，打击信奉异端的其他民族。公元507年，克洛维就以天主教会的名义，攻击西哥德人，将他们驱逐到比里牛斯山麓。被征服的百姓，也都已信了天主教，亚略派异端因而也遭受到重大的打击，从莱茵河直到比里牛斯山之间，所有的土地都在法兰克人的统治之下，当然也都是天主教的地区，因此，在教会历史上，法国被誉称为“教会的长女”。

从克洛维开始，“梅洛文加王朝”和教会之间，维持着密切的关系，双方都利用对方来增进自己的利益。教区的主教，和修道院的院长，是国王最得力的助手。由于国王的慷慨，主教遂都成了大地主，而修道院的财富也不断的增加，罗马帝国时代，教会所享有的特权，不但没有取消，而且还逐渐的扩展。教会享有司法的独立，教士若犯法违纪，唯有教会才有权力处理，教会有自己的法律和法庭，教会为了保护自己土地的完整，免受横行霸道军人的干扰，教会又从国王那儿，享受豁免权，教会的土地成为特别区，俨然有如国中之国，这对封建制度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还有很多事件，由于国王不能预先见到它的重要性，也逐渐落入教会手中，比如，日尔曼人没有控制遗嘱的规定，不动产的继承和分配，一向依惯例来决定。而教会呢，则对遗嘱相当的重视，因为教会的财富大多由此而来，所以在“梅洛文加王朝”时，逐渐发展出一种妥协的方式，所有不动产的转移，应该依照日尔曼人的习惯法，但也可以借遗嘱而转让，而教会则有控制遗嘱的权力，婚姻和子女的合法与否，也逐渐属于教会的权限。国王和战士们，虽然早已是教友了，但教会的伦理道德对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三妻四妾，是司空见惯的事，而所生的子女，也没有嫡庶之分，教会所能做的，只是诱导他们在法律上，承认一个正式的妻子而已。可是，国王并不反对教会将婚姻的法律加在一般人民的头上，因此婚姻和子女的合法与否，也就成为教会的问题，由教会法庭来处理。此外，照顾贫病、寡妇、孤儿等慈善事业，也都由教会来经营，总而言之呢，过去罗马政府所负责的许多社会工作，现在都成为教会的责任了。

“梅罗文加王朝”对教会虽然是恩惠有加，但是，对教区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任命，却是十分的注意和关切，甚至还加以控制。理姆斯的总主教瑞米，一再的要求克洛维停止干涉主教的选举，但都遭到克洛维的拒绝。而克洛维的继承人，也坚持自己在这方面的权力，唯独国王所同意的教士，才能被选为主教。教务会议也受到国王的牵制，惟有由国王所召集的教务会议，才算是合法的，而会议中所议决的事情，必须经过国王的批准，才能生效。如此一来，法兰克的教会，在人事与立法两方面，都受到政府的控制。这种政权干涉教权的情况，日子一长，自然就产生了严重的后果。法兰克的教会，随着克洛维的去逝，国土分裂而分裂。每个国王任命自己疆土内的主教，而教务会议呢，也仅仅只是自己辖区范围内的主教，而不是整个法兰克的主教一齐出席会议。三个交界的地区，由于疆域的不断变更，教区的主教也就随着疆土的改变而更换。高卢被征服之初，主教们都由罗马化的高卢人来担当，他们去逝之后，国王任命自己的亲友、臣仆为主教，他们既未受高深的教育，生活上又缺乏为民表率修养。总之呢，教会变成了王国的一部份，主教也和其他的官吏没有差别。“梅罗文加王朝”的衰败，虽然有着很复杂的原因，而教会领导人物质素质的降低，这是其中最明显的原因之一。

1.5.2 西哥德人的归化

接下来，我们要对西班牙境内，西哥德人归化为天主教的经过做一番介绍。西班牙境内的居民，在蛮族入侵以前原本就已经信奉了天主教，但新来的主人，却是亚略派异端的信徒。

公元六世纪中叶，良维基德国王企图统一全国的信仰，想要强迫天主教徒接受亚略派异端，但是太子赫买乃基德，已经和一位天主教的公主结婚，这位公主说服了丈夫皈依天主教，父王呢，软硬兼施，希图使太子信奉亚略派异端，但是，太子坚持不肯听从，认为自己真是三生有幸，能够认识天主教，决不会中途背弃。父王一怒之下，将他废为庶人，而且，还剥夺了他所有的财产，他仍然不动摇，父王便把他押在监狱中，在他的颈子上还加上铁链。然而这位太子，摒弃世界荣华富贵，一心希望天国，热切祈求天主赐给他忍受世间痛苦的勇气。复活节时，在深夜的静寂中，父王派了一位亚略派异端的主教给他送圣体，这位忠于天主的青年毅然拒绝他的诡计，声言自己虽然在监狱中，心灵却平和地仰望上天，父王大怒，立刻就派人在监狱中结束了自己儿子的生命。各位还记得“殉道者的血，是新生教友的种子。”这句话吧？这句话又获得了一次事实的证验。一年以后，父亲去逝，由老二黎佳来德承继了王位，新王一反老王的暴行，效法了殉道的大哥。公元 589 年，正是我国隋文帝在位时，黎佳来德在多勒托召开大会，会中新的国王、王后以及八位亚略派异端的主教，连同多位贵族，放弃亚略派，重新回到天主教的怀抱，于是西哥德人也就集体归化进教了。

1.5.3 爱尔兰的归化

紧接着再介绍的是爱尔兰的归化经过，以及英吉利、日尔曼的归化过程。正当蛮族入侵的狂涛，在西方各奉教国继续肆虐骚扰的时候，一个新的地区爱尔兰接受了福音。爱尔兰是北大西洋上孤悬的岛屿，距离罗马相当的遥远，当然也从来没有受到罗马的影响，也未曾受到蛮族的侵略。对爱尔兰的归化，圣巴特立爵这位圣人，当居首功。他生长在一个大不列颠的教友家庭，在他 16 岁的那年，被海盗掳了去，过了 6 年的奴隶生活，终于逃回故乡，再由故乡去了欧洲大陆，在那里入了隐修院修道。但是，他始终觉得天主教在召叫他，去曾经被虏的地方宣传福音，他曾这样说：“我听见还没出生的婴儿的声音，从爱尔兰呼唤我。”他在公元 432 年被祝圣为主教后，就到爱尔兰去开教，他差不多 30 年之久，完全致力于传教的工作，除了讲道理之外，他还以奇迹来证明他的道理，他给人授洗、他祝圣司铎和主教，他还在好些地方建立隐修院。在当时的爱尔兰，根本没有城市，隐修院的院长同时也是周围地区的主教。每座隐修院，都在自己的周围地区保持着虔敬的热心，自然的这地区也成了传教的中心。在公元 461 年圣巴特立爵去逝的时候，爱尔兰已经赢得了“圣人之岛”的美称。

在爱尔兰的教会历史中，最值得大家注意的一点是，爱尔兰刚归化不久，便成了一个热烈的传教中心。他们领了洗后，就愿意去做隐修士，当了隐修士后，就去感化别人受洗，这些新领洗的，也要去当隐修士，因此，在圣巴特立爵所建立的隐修院中，隐修士的数目不断的增加，而且，他们还渡海到大不列颠去传福音，这些渡海传教的修士中，最最有名的是圣高隆邦。圣高隆邦生于公元 540 年，死于公元 615 年，他走遍了高卢、瑞士和义大利，有如古圣人厄里亚再世。他到每个国王面前去指责他们的罪行，凡是他经过的地方，隐修院也就跟着建立起来，大批的门徒投入严厉的会规下修行，75 岁时，死于义大利北部著名的保比约隐修院里。

1.5.4 英吉利的归化

大不列颠，早在蛮族入侵以前，福音就已经传入了，入侵大不列颠的蛮族，是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他们对天主教不但没有好感，还有着恨意，因此，对教友兴起了歼灭性的战争，只有逃到西部去的，才能幸免于死。同时也不敢对入侵者宣传福音。一直到了第六世纪的末叶，法兰克人归化后的一百年，盎格鲁和撒克逊人，才接受了福音，皈依圣教会。

直到第六世纪的末叶，向蛮族传教的人，不是主教嘛，就是修士，但对大不列颠的宣传福音，却是由罗马的教宗发动的。公元 590 年，教宗圣额我略一世登上伯多禄的宝座，便派遣了 40 位传教士，由奥斯定修士率领，前往大不列颠的英吉利，为什么圣额我略一世教宗会有这样的计划，一登上教宗宝座后，就有这种惊人之举呢？根据史书的记载，事情是这样的。相传呢，教宗圣额我略一世在被选以前，原是罗马的一位隐修士，有一天在路途上，看

到了一群被掳的奴隶，其中有三名美少年，褐发碧眼，被当作货品般的要被拍卖，他就问拍卖的商人说，他们属于什么民族？商人告诉他说：“他们是盎格鲁人。”额我略却说：“我看他们不是盎格鲁，简直是盎杰利。”原来在拉丁文中，这两个字十分的相近，而“盎杰利”呢，在拉丁文中的意思是指“天主的天使”。产生了怜爱之心，于是呢，就把这三位天使一般的美少年赎了回来，在自己的隐修院中亲自教育他们，从此呢，他立下心愿，要去归化盎格鲁人。

当他被选为教宗以后，就积极展开往英吉利传福音的计划。公元 596 年，40 位修士出发了，但在半途上，有些修士失去勇气，不想去英吉利，因为他们听说英吉利人会挖敌人的眼睛来吃，而且，他们的语言非常难懂，他们听得越多，越是丧了胆。教宗亲自鼓励他们，命令他们，他们才决定前往英吉利。当他们到达英吉利后，情况比他们所希望的还要好，他们在泰晤士河河口下船登陆。国王肯特，已经和一位天主教的公主伯尔达结了婚，这位伯尔达公主不是别人，她是法兰克王的女儿，肯特王因此答应要接待传教士。

肯特王被大臣们护卫着，坐在一棵树下，看着 40 位从罗马来的修士，唱着圣咏，向他走来，在他面前开始讲道，国王听了他们的演讲，然后他说：“你们的言词固然美丽动人，但是你们所说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而且还有许多的疑点，我不能马上相信你们，你们既然是远道而来，为了把你们所信，而且视为无上幸福的真理传给我们，我呢，也决不难为你们，反而会供给你们住的地方，你们去归化你们所能归化的人吧！”

事实上呢，肯特王也已经被修士们的圣善生活所感动，不久以后，就要求领洗加入圣教会，跟着肯特王领洗的还真不在少数。奥斯定在 597 年的圣诞节，竟然为一万个人付洗，肯特王还把他在堪特伯里的宫殿赐给了奥斯定，这便是英国的第一座主教座堂。

教宗额我略一世，从他罗马的病榻上，还远远的关怀着那批传教士，经常寄信给他们，在信中所写的，都是对传教方法的训示，他说：“如果外教的庙宇建筑得很好，与其把它拆毁，倒不如把它祝圣，再把祭台安放上去，改为敬礼天主的圣堂，要在民众习惯敬拜外教神祇的地方和日子，准许他们以另外的方式，来庆祝天主的瞻礼日。如果外教人有以筵席庆祝节日的习俗，便可在殉道圣人的节日举行公宴，准许他们举行外表的欢乐，心灵的欢乐也就容易获得了。对那些粗野的人，决不可把他们的一切旧有习俗一笔抹杀，人不能一跃而登上山顶，须要一步一步的爬上去。”这样的训示，的确是合情合理，稳当易行，一直到现在，仍然不失为对外教民族传教所应当遵循的方式。

传教事业在英吉利虽然是如此顺利的展开了，但往后仍然遇到许多困难。瓜分英吉利的七个王子，并不是每一个对天主教都怀有好感，彼此之间也经常交战，不过呢，自从圣奥斯定修士，率 40 位修士到英吉利开教后的一个世纪，也就是百年之后，英吉利的归化事业已经有了相当的进展，许多兴起而又繁盛的修道院，成了教育的中心，也因此培养了中古时代，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也陶冶了日后往日尔曼去的传教士。

1.5.5 日尔曼的归化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在莱茵河、易北河之间，包括现在的荷兰、西德和奥地利的广阔土地上的日尔曼蛮族，他们是蛮族中最不容易归化的一支，还保持着很粗暴的个性，异教的思想相当的盛行，他们的尚武精神也使他们很不容易了解，天主教教义的良善谦和、宽恕博爱的精神。不过日尔曼人，已经听说过有人向他们传布天主教，前面我曾介绍过的爱尔兰的修士，圣高隆邦和他的门徒们，已经在瑞士宣传过福音。一位英吉利的修士已经归化了荷兰的北部，但这一些努力，都还是东麟西瓜，没有什么秩序和整体的计划，真正在日尔曼建立教会，并且把教友正式组织起来的，乃是一位名叫文弗理的英吉利人。他还有一个为人所熟悉的拉丁文名字，叫做玻尼法爵。他是一位本笃会的修士，早年入会修道时，就已经获得了广泛的修养。30 岁以后呢，他一直感觉到有一股，到祖先的故乡去宣传福音的召叫和吸引力。他在荷兰北部第一次的尝试，并没有多大的收获，他觉得，单独一位传教士不能担负这样的工

作，必须请求教宗的支持。他便在那年，公元 719 年，起身到罗马觐见教宗额我略二世，教宗额我略二世，亲自热诚的接待他，并正式委任他做日尔曼的开教宗徒。三年后，教宗召回玻尼法爵，祝圣他为主教，并且委以宗座的直接代表。他经常的同几位和他一样热诚的修士，一起巡行各地，开始时，是几位英吉利修士，后来，也有了日尔曼修士，他们的生活很贫苦，还得冒着各种危险，他们花三十年的工夫，到处讲道。他就按照各地进步的情形，把已经化归化的教友组织起来，复兴了以前的隐修院，也创建了新的修院，有了这样有计划、有组织的扎根坚实的工作，他所建立的传教事业，终于能够不断的牢固而持久下来。

在玻尼法爵的传教事业上，最为动人的就是，他常和他的祖国保持着连击，不断的给在英吉利的朋友们写信，向他们说明自己的困难和不安，他依恃他们的祈祷，也从他们那儿接受道义和物质的援助，最重要的是，在这个，刚从异教敬拜的情况中转向天主教真理的日尔曼国度中，他有意让英吉利的修女们前来日尔曼，想要以修女们的善表来光照他们，用修女们的祈祷，求天主降福帮助他的传教事业。他请来了，日后也被册封为圣品的圣女理奥巴和她的同伴们，给了圣玻尼法爵精神上和工作上很大的帮助。圣玻尼法爵，是教会历史上开创传教修女会的第一人，可惜以后没有人追随他这种作风，一直要到 17 世纪，才有人重新呼吁妇女们去外方传教。

圣玻尼法爵在 75 岁的那一年，偕同 50 位修士，重新又回到荷兰的北部去传教，有一天，他正同修士们停留在一个村庄，给一群教友付竖振，忽然窜出一群狂热的异教徒，向他们攻来，在毫无防备之下，一个个都被杀了。圣玻尼法爵被攻击时，本能的，拿起手中的经本去抵挡，这本经本儿，到现在还保存着，书上面还留下了被剑砍过的痕迹，他死后，葬在德国的福达，一直受到德国教友的敬礼。玻尼法爵在德国教会的建树，无论是修院或是主教公署，都成了中古时代协助德国文化发展的中心。德国正式归化，我们该归功于圣玻尼法爵主教。

1.6 教会对于欧洲文明的影响

1.6.1 教会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前面我们看到了爱尔兰、英吉利、日尔曼、荷兰的归化，由异教改奉天主教的经过。现在要介绍的是，蛮族入侵，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圣教会对于欧洲文化的影响。

自从法兰克王国的国王克洛维受洗奉教，到圣玻尼法爵的去逝，这之间有 250 年之久，这一段时间，以历史的眼光去看，虽然不很长，但却获得了相当广泛、可观的成绩。我们只须把第五世纪末叶西方的情形，和第八世纪中叶的情形，拿来比较一下，便可以了解。公元 490 年之间，在纷杂的蛮族国家中，大部份都还是亚略派异教的天下，天主教在许多地方还时常的受到迫害，帝国的四周，还都是异教徒，而到了公元 750 左右，西欧的国家全部都信奉了天主教，教会呢，也到处受到尊敬，这些都是当时的主教们和修士们英勇奋斗的城绩，在已奉教的国家中，土著的民族日尔曼民族，开始了民族和民族之间的融合，中世纪的欧洲居民也由此而形成了。

对圣教会而言，这些成绩弥补了，她在东方所受的巨大损失，因为正在东方修院到处林立的极盛时代，叙利亚、波斯和埃及却沦陷在回教徒的手中。当教宗额我略二世派遣玻尼法爵去日尔曼森林中树立十字架时，北非和西班牙，也遭受到同样的命运，这样一来，天主教世界的重心，从原本围绕在地中海的四周，现在则转移到北方去了。

蛮族入侵以后，教会所面临的是西方杂处的民族，一方面是旧有习惯仍然根深蒂固的帝国遗民，另一方面，是新归化的日尔曼人，他们虽然已经受洗，但决不能马上都成为完美的教友，还无法在短期之内，一改那暴烈的性格和迷信的习尚。因为他们的教育水平太低，教友的信德固然是诚恳而活泼，但程度很浅，总是精华太少，大部份都还掺杂着迷信，这些粗俗的心

灵，须要的是具体，可触摸到的超性事物，才能使他们体悟和了解。他们分不清楚恭敬天主和耶稣基督，和敬礼圣人圣女有什么不同。对于敬礼圣人，本身是正当合理的，但是，他们所举行的方式，却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当时对“圣髑”的敬礼，真是热烈得令现代的人难以置信。那些“圣髑”不全是圣人们的遗骸，凡同圣人或他们的坟墓接触过的东西，他们都奉为至宝，教友们往往对圣人的衣服、头发，甚到像指甲的杂屑而引起争辩，有人以为把任何东西在圣人们的坟墓上放一下，经过这样的接触，就会染上他们的圣德。为了把这些民族组成真正基督化的社会，应该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要教导他们做事公平，重视工作，推行精神的修养，不过教会并不败兴，教会以她那择善固执的坚忍，从事这种须延长好几个世纪的艰苦工作，特别是主教和隐修士们，他们毅然的担负起这份责任，他们对培养新社会所费的心血，还真是一言难尽呢，他们确是中古文明社会的创造者，欧洲国家之所以能有今天，他们的功劳最为伟大。

自从君士坦丁大帝归化天主教以来，主教在社会上所占的崇高地位，已经得到法律上的承认。从第四世纪末叶，他们便有权以政府的名义，审判有神职人员牵涉在里头的几种案件。后来蛮族出现的时候，主教们往往协力保卫民众。在新的社会中，他们常是归化教外人的有效原动力。蛮族归化以后，主教们常保持着自己的威望和优越的地位，尤其是因为主教们，大部份都是出身于名门望族。他们的威望，连官吏和国王也都要敬畏三分，莫可奈何，只有主教敢反抗他们。当一位税吏压迫百姓时，主教常出面保护；当一个国王公然的破坏了教会道德的法律时，常有主教指责他们的罪行。也有不少的主教，是因为仗义执言而丧失了性命，在城市内，主教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那么他的职权范围有多大呢？主教几乎是什么都管，主教们有牧灵的职务，宣道布教、巡视各堂区，在当时呢，乡间的堂区很多，主教也是孤寡孤独和弱小民众的保护者。当政府的权柄无能为力的时候，主教便以德高望重的特殊身份，出面指导并支配公益工程的费用，建造城垣、构筑堤岸、沟渠，主教也开设来往行旅的住处，为病人开放医院，特别是痲疯病院，他有穷人的名单，监督分配教友们大量捐献的救济品给这些穷人。

按照大公会议的规章，主教是由神职班和民众来选举，然后，由首席主教，也就是总主教来祝圣。然而实际上呢，国王们往往干涉选举，硬派自己所要的人，这也就难怪，为什么有时候会产生不能称职的主教了，好在呢，在历史上，这一类不足为人师表的主教还不多，而大多数的主教，都是生活纯洁、爱德出众、具有强烈反抗权的勇气，现在欧洲的一些地方，还保存着不少这些圣德出众的主教们的宅院，教会都以古迹来保护管理。下面就开始介绍隐修院的修士们，对中古文化的贡献。

1.6.2 隐修士的卓越贡献

在中古前期，蛮族入侵后所造成的混乱时期，隐修士也协助主教们担任了重要的职务。本书介绍过圣盎博罗削、圣奥斯定、圣玛尔定等人，如何在西方创办了隐修生活。公元第五世纪，在高卢南部隐修的生活很盛。公元 410 年，圣贺诺拉在地中海上的莱兰岛上，建造了一座隐修院，有不少的修士在那儿度着半隐修、半独修的严厉生活。由这座隐修院出过许多圣善的主教，公元 415 年，若望·嘉西亚诺在长途旅行，访问了东方和埃及的隐修士之后，在马赛建立了两座隐修院，男、女各一座。因着他的著作，我们才得以认识东方隐修士们的生活、习惯和他们所遵守的规矩。不过，西方隐修生活的真正鼻祖，还是圣本笃。圣本笃出生于公元 480 年，诞生在义大利中部，诺尔西亚的一个显贵的家庭。早年，他到罗马去读书，但是不久自己觉得为旷野所吸引，就到荒凉的苏比亚高山的山谷，去度隐修的生活。他的生活非常严厉，有时为抑制肉欲的诱惑，竟在荆棘中翻滚。他这样的圣德，很快的便传扬开来，有不少的人就请求他收为弟子，于是他建了一座隐修院。以后，接二连三的，在罗马附近竟建造了十二座。到他的晚年，就定居在罗马和那不勒斯之间的卡西诺山上。圣本笃就在卡西诺山上的隐修院中，写下了隐修院的规条以后，便在公元 547 年安然去逝。这些规条呢，一

直到现在，仍然被全本笃会的会士们奉为圭臬。

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些规条中所包含的都是明智，而且宽猛相济的节制要求。圣本笃的最大功劳，是使隐修的理想同西方民族的体质、需要和习惯相配合，并没有特别严厉的苦工，使祈祷和读书、唱经和静观、工作和阅读、睡眠和守夜，都保持着适当的平衡。在一般的神贫和服从的圣愿之外，圣本笃又加上一个恒心的誓愿，修士虽然是以自己自由意愿进了修院，并且以誓愿来自行约束，但是，一经选定了这种生活方式之后，也应该立志永远留在修院里边儿。修道院，就同是一个大家庭，院长也以慈父的心肠对待修士，圣本笃给了各个不同的会院以极大的自由，务使会规的规条能适应各地的环境。

这一套会规，西方隐修院一致都采用，就如同公元第四世纪，圣巴西略的会规风行于东方一样，并且，圣本笃逐渐代替了其他不适用的规矩，例如呢，圣高隆邦的会规就偏于太过严厉。西欧各地，像法国、西班牙、英国、德国都有本笃会的会院，就连我们中国，过去也有不少本笃会的修士在好些地方，建立过男、女本笃会的会院。

让我们现在，闭上眼睛，去设想一下，进入一个被沼泽遮断的树林子。在蛮族入侵时，欧洲的大部领土都还是遍地寸草沼泽。到了公元六、七世纪的时候，您便可以看到，在一片荒凉的中央，有一块耕耘的土地，附盖着绿油油的庄稼，中间有片宽大的隐修院，最惹人注意的是，带有钟楼的圣堂，修士们聚集在那儿，一天有七次念经、唱圣咏来赞美天主，然后，您所见到的，便是旅舍。因为在本笃会院中，无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常是免费招待来往的客人，如同是招待基督自己一样，特别是对待穷人和朝圣的人，他们更喜欢照顾。修士们的房间，是一所围绕天井四周的方形建筑，四面绕以走廊，建筑物内有饭厅、卧室和图书室。在图书室内，存放着古拉丁文作家的手抄本，以及教父们的著作，还有写作室，供修士们在那儿抄写古代著作的珍本。另外呢，修院内还设有各种作坊，像砖瓦作坊啦、木工、铁工、纺织、金银细工的作坊，几乎是生活上各种必需品，都能制造，因为他们过的是自给自足的生活。至于田园、仓房和畜养家畜的木造棚子，那更是不能少了。此外，还有附设的学校，修士们也是教师，教授村庄内的孩子们。隐修院的周围呢，有着结实叠叠的果园，有专为酿制弥撒酒的葡萄园，有供给蜂蜜和蜡烛的蜂房，山谷和池塘也养殖着鱼类，溪流上架着水车推动水磨的转动，修士们也不断的继续向周围地方更远的荒地去开垦，年年可以增加新的耕地。我想您所看到的这一幅图像，正可以看出圣本笃所创立的修院，对西方文化的贡献，是属于多元化的，他们不只拯救了古抄本，及其他学术思想方面著作，还保存并改进了建筑和农耕的技术、各种工艺技术，以及对植物和制药的知识，他们还不断的开垦了许多的荒地。隐修院所在的地方，吸引了民众，在他们周围定居下来，不但满足了他们宗教上的需要，在患病或遭遇困难时，又能获得修士们的友爱和扶助、儿女们的教育、文明生活的一切资源。所以欧洲有许多农村和城市，

都导源于隐修院。修士们的善表，比言语更能说服蛮族，学习到虔诚教友应有的德性，像谦逊、友爱、贞洁、良善等等，修士们也教导他们重视劳动，这些传教士所创始的工作，由隐修士们把它完成了，教友们的信德也因此得以根深蒂固。

1.6.3 教会对蛮族的影响

西欧中古时代的前期，天主教会对于蛮族的潜移默化的贡献，不过我们所探讨的重点，摆在移风易俗的教化方面。下面重点介绍这个时期的教会是如何影响蛮族的。

蛮族粗野的习俗，因着主教们的推动和修士们的以身作则而逐渐进化，圣教会对蛮族的许多风俗习惯，既然一时之间无法改除，就给了相当程度的容忍，而没有加以斥责。比如说，为认清一个人是否有罪，蛮族的习俗是强迫受到嫌疑的人，把手放进滚开的水里，如果三天以后，他的烫伤慢慢好起来，便可声明他无罪。我再举个例子，像当两个人为某事争执不下的时候，为了明白两人之中谁更有理，便请他们决斗，他们认为有理的一方必能得天助，诸如这一类的不良风尚，还有很多，圣教会一时无法全面的取缔，又不能禁止私下报仇，就只

有努力的使之减少或减轻了。例如清楚规定“圣堂是法定的避难所”，凡是罪犯或是负了债务的人，一逃进圣堂，另一方就不可以用武力将他从圣堂里拖出来。这一点呢，我要解释一下，圣教会并不是要袒护罪犯或负债的人，目的在使报仇的怒气由于拖延而逐渐消除，或是为给神职人员一段可以出面周旋的时间，以便使他们就范。除了追缉的人先手按圣经发誓，保证不使罪犯受到刑处或造成伤残，甚至惨遭杀害，修士们便不轻易的把逃犯交出来。但是，在历史上，这种避难所的权利却给教会带来了不少的麻烦。有权势者或是国王眼看自己的仇敌逃脱，势必想尽办法要把他拖出圣堂之外，天主固然能显奇迹直接干涉，例如，对破坏避难者的权利的人，以奇迹来加以明显的征罚，但是这样的奇迹，历史上并不常见。教会对遭难的人，也善尽保护的责任，在当时，把战俘列为奴隶，然后把他们任意的拍卖，教会虽无法一时取缔这种可诅咒的恶俗，只有尽力的出钱收买战俘，给了妥善的安排以减低它所造成的恶果。为了赎回战俘，教会牺牲了大量的金钱，主教们没钱去赎的时候，就拍卖教会的圣器，因此有不少的战俘获得了自由，同时，教会也鼓励已经皈依奉教的教友们解放自家的奴隶，教会认为解放奴隶是一种神圣的善举，因为，吾主耶稣以圣洗所解放的人，不当以铁链拘之，因为在天主眼中，人人平等，没有任何身份的区别。教会还为此规定了特别的礼节，引经据典的举行解放奴隶的隆重典礼。无法一时脱离奴隶羁绊的奴隶，教会便制定了许多法律，以减轻身为奴隶者的痛苦，像教会声明奴隶的婚姻同样有效而不能解除，以便他们有合法的家庭，也禁上把奴隶卖给外国人，以保存他们的祖国，使他们在主日那天可以得到休息，以恢复他们教友的身份。奴隶的身份因此而提高了，不再像以往那样被当作是货品一样的买来卖去，或任意的被虐待了。奴隶制度便这样的在教会的努力和熏陶之下，逐渐的被取消了，代之以农奴，已算是一大进步了。而农奴呢，不得离开他所耕种的土地，如同是分种田地的人一样，得按时向主人交付所规定的粮食或年金，不过，农奴们各有自己的家庭，能享有相当的自由，他所尽的义务，则是由习惯法厘订的，主人呢，是不能任意摆布他们的。

圣教会也致力于尊重妇女们的权利，不能让这批弱小者毫无保障，在皈依教会的社会上，不能再像以往那样的慢待妇女同胞。而当时呢，就创建了不少的妇女隐修院，便足以表示女子的贞洁，是如何的被受到敬重。在那野蛮粗暴的中古前期，所谓的“黑暗时代”，而能有那么多纯洁温良的圣女、圣妇，不能不说是一种令人吃惊的特殊现象。我就为各位举几个圣女、圣妇事迹。

圣女珍妮维夫，生于公元 425 年，死于 512 年，她被敕封为“巴黎城的主保”。她在生时，曾经拯救了巴黎，保护巴黎城未曾受到匈奴王阿提拉的蹂躏，她又是当时的王后圣克劳蒂德和国王克洛维的顾问。第二位就是，圣妇克劳蒂德，正是法兰克王国的国王克洛维的王后，她在丈夫死后，进了隐修院，在隐修院里度了 20 年的苦修生活。第三位是圣本笃的胞妹，圣女斯高拉斯蒂加，此外，还有圣妇拉德公德，只知她死于公元 587 年，也是法兰克王国的王后，在波亚叠地方曾以自己的财力建立了一座隐修院。圣女雷欧巴、属于较晚期的，死于公元 782 年，是日尔曼的开教者和主保圣玻尼法爵的亲戚，她被圣玻尼法爵召到日尔曼地方去做隐修院的院长。他们都受到敬重，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1.7 中古前期的教会知识生活

1.7.1 中古前期的主要作品

下面要探讨的是中古前期圣教会内知识份子的生活情形，和当时研究学术的概况。圣教会在道德和伦理方面，所施的教化工作，在知识方面呢，也照样的做了，不过应该承认，在蛮族入侵以后的几个世纪内，知识生活的水平，已经显著的降低了，连所剩余的一些，也是拜教会保存之功。教育工作之所以没有完全在民间绝迹，就是靠了神职人员在本堂区，以及

修士们在修院的一角还不停的开办学校的缘故，我们所以能将古代拉丁文学的宝藏保存下来，也是因为修士们坚苦地抄写了那些古文。这些古文大都被抄写在羊皮上，划上彩色美丽的花纹，直到现在，我们还能够在欧洲的一些著名的图书馆中欣赏得到。而那时候的历史，也是靠主教们或修士们，以拉丁文写在年鉴上面，使得后来的人，能够知道当的历史。

蛮族入侵以来，西方文化逐渐衰退，教育水平也降低，一般人民既没有读书的闲情，也没有读书的必要。因此，在知识生活上应运而生的是一些摘要、菁华、或大纲之类的简畅读物。它们将古人的书籍，以集锦的方式，浓缩成一些片段的，没有系统的常识手册，包括史地、科学、哲学和文法等知识，以教科书的形态出现。早期的中古时代，最盛行的一本教科书，是第五世纪非洲的一位名叫喀贝拉的学者，他所写的一本名叫《麦克瑞和裴洛洛季的结婚典礼》的小册子。这本书，包括当时作者认为最基本的知识，奠定了西方文艺教育的基础，书的名字，正说明了当时教育圈子里读书兴趣的低落，必须利用传奇性的幌子来吸引学子的注意。作者借麦克瑞和裴洛洛季结婚场面引出三文和四艺的介绍。新郎给新娘的七件礼物是，文、修辞、辩证，这三项称为“三文”，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称为“四艺”。内容是摘取古人文章杂乱搜集而成。古人的片断思想和知识也就借此在学校里一代代保存下来。中古时代的学校既为教会所包办，这本书也就成了训练神职人员和修士的教材，喀贝拉的书是教士专业训练的教科书，数百年来是最受欢迎的著作。此外，比较严谨的著作，像第四世纪“纳多斯和第五世纪普利先的文法书，也是中古学校所习用的教科书。第五世纪末和第六世纪初，西方最重要的学者是波其武。他出身罗马贵族，在东哥德王狄奥多理时，曾任执政官，后来因为卷入一场宫廷政变，被捕入狱，在拘禁期间，波其武完成了他的不朽名作《哲学的慰藉》。虽然带着哲学的书名，却不是讨论哲学的东西，他以待死于囹圄中的人，想到世态炎凉，祸福不测，不禁有无限的感慨，因此，他将自己对人生的看法写成了《哲学的慰藉》。一则用以自我安慰，二则也可以安慰他人。他的思想是外教与基督教义的融合，因此在中古时代极有影响力，还被翻译成盎格鲁撒克逊语。13、14 世纪的但丁、乔塞等学者，都曾受到他这本书很深的影响。波其武的这本书写成于公元 524 年，许多学者认为是古典哲学最后一本重要作品。波其武又翻译了希腊哲学，他虽然没有留下创作性作品，但他的译作在中古学术界极受欢迎，而在传递古典知识上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有人说他融贯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计划，启发了 12 世纪“士林哲学”的兴起，同时他又企图贯通亚里斯多德和圣经，更可以说，他是第一位“士林哲学家”。另一位服务于东哥德宫廷的学者是加西道拉斯。从他的作品可以知道他受过良好的古典教育，拉丁文的雄健和辞藻的绮丽，更可以证明他对古典艺术的造诣，而他在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是，首创修士从事古典作品抄写的工作。公元 548 年，加西道拉斯在自己广大田园里建立了一所修道院，修士们日常工作之一，就是抄书，也因为他的倡导，圣本笃的会士们后来也从事抄书写古典书籍。抄书的工作，不过是加西道拉斯传给后代最显著的一项工作之一。其实他主要的目的，是要将修道院变成教育和学术的中心，在他的《圣学与俗学纲要》这本书中可以看出，他的雄心是，希望自己的修道院能和古代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城“基督教会学术中心”、以及当时的叙利亚的尼西比斯的“希伯来学术中心”相媲美。修士们不仅研究圣经和教父们的作品，他们也攻读“三文四艺”。加西道拉斯还写了一本《正确拼音法》，作为研究古典文章的基础。又翻译了犹太著名史学家若瑟夫法斯的名作《古代事迹》。

在这段漫长的文化低潮时期，第三位值得我们注意的古典知识的传递者，是西班牙的塞维尔城主教伊塞多尔，他的名著是《辞源》。这本《辞源》可以比拟为现代的《大英百科全书》，包括了当时所有的知识，以单字为基础，先解释每一个字的起源和变化，再叙述它的意义和历史沿革。内容包括了宇宙、天体、地球、人、鬼、动物、医学、娱乐、经济和政治地理等，真可谓包罗万象、无所不容。虽然他所记载的不全可信，甚至有的还迹近神话怪谈，但是伊塞多尔是当代最博学多闻之士。他的《辞源》，代表当时的全部知识，由此也可见这

时学术的低落。不过，借着《辞源》这本书，古代的知识也因而流传到中古。《辞源》就成了中古学者的重要参考书。在整个学术低落的时代，历史方面的作品是比较有成就的。中古时代的前期是一个学术低落的时代，只有历史方面的作品是比较有成就的，尤其在基督教会的发展和日尔曼民族的迁移方面，这些历史学家遗留给我们宝贵的资料，足以让我们了解，基督的教会和日尔曼民族是如何合作来发展一个新的文化。

中古时代的前期，接受教育的人，既然大多是修士们和神职人员，而他们的兴趣呢，也多限于宗教方面的活动，所以呢，这时候的历史著作，带有非常浓厚的宗教气氛，同时，他们对历史的解释，也是以“天主保佑”为基础。天主不单单只是宇宙的创造者，也是宇宙的统治者，人间的一切都在天主的掌握中逐渐展开。天主给人画了一张蓝图，人类的历史，大至国家的兴亡，小至个人的成败，都是这张蓝图的实现。当然啦！这种历史观，是受到北非希波城的主教奥斯定圣师的著作《天主之城》这本书的影响，它支配了整个中古思想界，一直到文艺复兴时代，才受到了“人本”历史观的影响。

1.7.2 中古前期的历史作品

中古时期的历史作品就体裁而言，这时期的历史作品，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我们称它是“圣人行传”，它们都以劝人为善为主题，是最受欢迎的传记文学，虽然这一类的作品中，参杂了许多神奇的传说，不过呢，也有不少具有真正历史价值的资料。从“圣人行传”到后来，又产生教宗、帝王和主教们的行传。第二种是“民族史”，它所记述的是日尔曼各民族，像哥德人、法兰克人、伦巴人等民族的起源和迁移，其中比较重要的都会介绍到。而第三种就是“世界史”，都采编年体的体裁，所用的编辑方法是从天主造天地，直到犹太民族的兴起，从犹太民族的历史为主，而以其他各国的历史并列为辅，一直到耶稣诞生，耶稣诞生以后，世界史又合而为一，以教会史为主干。首先创立这个体裁的是第四世纪时，东方凯撒利亚的主教欧瑟比。这种体裁也就成为中古编年体作品的圭臬。中古编年史的作家，大多采用一种共同方式，就是先将自己时代以前的历史，做一个摘要的介绍，材料呢，大多取自欧瑟比和他的继承人的作品，到了自己生活的时代，才有较为详细的叙述。这些历史学家的写作方式，含有两个重要的目的，一个呢，是要表明一脉相承的道统。另一个目的呢，则是因为那时候的书籍太缺乏的缘故，读者需要对当代以前的历史先有一个概念，而不需要去参考其他的书籍。现在，我就介绍欧瑟比。欧瑟比是第一位教会历史的作家，对中古历史的写作影响也最大。他除了撰写《君士坦丁传》之外，还有两部重要的著作，一是《年鉴》，另一部就是《教会史》。《年鉴》这部书属于世界史。按照年份的先后，记载了从希伯来民族的始祖亚伯拉罕直到公元 324 年的世界大事；此外，还有古代民族，像亚述、希腊、罗马、希伯来等民族的年表作为对照，是用希腊文写成的，由热罗尼莫翻译为拉丁文、并且，继续补到 378 年。圣热罗尼莫的拉丁文译文，由普罗士卜继续增补到 468 年。第七世纪时候的伊塞多尔也编写了一本《世界年鉴》。所记述的最后年代是 615 年，而世界年鉴中早期的历史部份，完全是根据圣热罗尼莫的拉丁文译本，并没有增加任何新的材料。欧瑟比的第二本巨作是《圣教会历史》。所采用的体裁，是分项记述的方式，有点类似记事本末体，像比较重要的教区主教。教会方面著名的教育家和作家。异端、教难、以及奇迹都逐项记述，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欧瑟比还抄录了许多重要的文件，保存了这些珍贵资料的原文，否则的话，必是失散殆尽，我们后世也就无从得知了。欧瑟比的《教会史》，只写到君士坦丁大帝的胜利为止，继续增补的作家，有苏格拉底，从 306 年增补到 439 年；梭左门从 323 年增补到 439 年；狄奥道尔托则从 325 年增补到 427 年，这些增补的作家们全是用希腊文写的。到了第六世纪，在加西道拉斯的领导下，由爱比达尼等人，重新加以整理，并且翻译成拉丁文，还继续加以增补到 518 年为止。成为中古时代学校所习惯采用的教科书。

另外一本值得我们注意的世界史，是第五世纪的奥罗西乌斯所编写的《向异教徒辩护的历史七书》。编写这本书的背景是这样的，公元 410 年，西哥德人洗劫了罗马城，非基督信

仰的异教徒，就把这场空前的浩劫完全归罪于基督徒。当时有一位名叫左西莫斯的学者，写了一本《罗马史》，在书中特别的强调这一点，为了答复这种指控，圣奥斯定写了著名的《天主之城》来解释历史演变的意义；强调天主教会历史。同时也授意自己的学生奥罗西乌斯，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许多事实来加以反驳，这本书有着强烈而主观的护教色彩，不过在中古时代，却是非常受欢迎的读本。

在民族史这一方面，有加西道拉斯所写的《哥德民族史》12卷，但是已经完全失散了，这本书曾经由约旦内斯缩写成为哥德民族的起源和事迹，在550年左右写成。加西道拉斯写哥德民族史的动机和目的，是要调和在义大利的哥德人、罗马人、还包括了东方的拜占庭，彼此之间仇恨敌视的态度，以致有了罗马人和哥德人同源之说。

都尔城的主教额我略，在第六世纪末，完成了《法兰克民族史》10卷。前3卷自天主创造天地到511年，大多是抄袭热罗尼莫与奥罗西乌斯的作品。第四卷到第六卷写的是他自己当代的历史，也比较真实可靠。第七到第十卷，额我略则是日记的体裁，记载当代重要的事件，时间是从584年到591年，已经是他在世的最后几年。我们猜想，这种日记式的体裁，是他准备继续写史的材料，他在序文中曾经声明，为他自己粗俗的拉丁文致歉，因为在当时一般人的教育水平降低，为了迁就读者的程度，不得不用通俗化的拉丁文来写作。额我略的《法兰克民族史》，经后人摘要成书，并增补到768年查理曼登基为法兰克国王为止。塞维尔的主教伊塞多尔编纂了《西哥德王国列王传》和《汪达尔人与苏汇维人史》。书中描述了一些西班牙的城市、山川，给我们保留了很多地理上的知识。

除了这些以外，编写类似民族史的，还有两位英国修士，一位名叫基尔特斯，他编写了《不列颠征服记》，使我们对有关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大不列颠的历史，有了完备的资料。第二位是圣伯达，有“英国历史之父”的荣衔。他生于672年，死于735年，圣伯达所写的《英国教会史》，是从凯撒征服马大不列颠写起，直到公元731年，他去逝前四年为止。这本书记述597年以后，历史相当的详尽。圣伯达的《英国教会史》虽然以教会史为书名，但是在内容方面是继基尔特斯之后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历史。我们认为圣伯达的民族史，是中古所写的所有民族史当中，最具有价值的作品。圣伯达也是用耶稣降生作为纪年标准的首创者。这位英国著名的隐修士圣伯达，也是当代学问最好的一位。19世纪时的纽曼枢机主教对他推崇备至，他说：“圣伯达是本笃会的精英，有如圣多玛斯，是道明会的精英一样。”圣伯达七岁的那一年，父母双亡，被寄养在本笃会的隐修院中，自传中他曾说：“他一生在隐修院中渡过，以他全部的精力研究圣经，遵守隐修院的戒律，每天在圣堂里专心的颂扬天主，他以学习、讲授和写作为乐，就这样一直到生命的末刻，虽然感到精疲力尽，仍然不停的每天工作、祈祷和读书。”他的著作，除了最有权威的《英国教会史》之外，还有《圣经注解》、《讲道集》、以及天文、算术、文学、诗哥等作品。

这个时期，还有两部值得我们注意的有关历史的地理书籍，都是查士丁尼时代的作品。一本是希罗格来斯的《旅行指南》，描述了帝国的政治地理，包括64个行省和92个大小城市的形势。第二本呢，是哥斯莫所写的《基督教地理志》。哥斯莫原本是一个经商的人，具有广泛丰富的旅游经验。以后弃俗，进入亚历山大城的一所修道院隐修，《基督教地理志》就是进入隐修院后的作品，他对于所经历的地区，像红海、印度洋沿海地带，以及在东方的重要港口和都市，都有正确的描述，更贵重的，是有关印度洋东南方锡兰岛的记述。我们可以这么说，在13世纪以前，哥斯莫是基督教作家中，报导东方的情形最为详尽的一位。下面来谈一谈中古前期的学校教育的概况。我们知道，早在罗马帝国时代，已经有由国家支持的公立学校，学生可以接受完全免费的教育。但是，这些公立学校，讲得明白一点，实际上，它是政府的公务员的职业训练学校，学生毕业以后，就可以担任公职。罗马帝国衰落以后，政府公职已无人问津，公立学校也就逐渐减少。第五世纪时在高卢，公立学校已经完全绝迹了。第六世纪中叶，哥德王国被查士丁尼征服以后，公立学校也在义大利绝了迹。本来

义大利和高卢，是西方文化水准最高的地区，这两个地区，没有正式的学校教育，其他的地区，就更不必说了。但是，教育并没有因此就在西方绝迹，只不过从政府转移到教会的手里，而成为教士的专利而已！为了培育教会工作人员，教区的主教，早就在他的辖区内开设学校，选择聪明伶俐的儿童，接受教士训练。他们应学的东西，除了圣经和教父的作品外，还有“三文四艺”，当然这种教育是初级的，也没有正式的组织，文化的流传就靠着这种教育，并且传播到教士们工作的地区。第六世纪额我略的《法兰克民族史》，以及高卢的很多主教们的信件，都提到了这种教育制度，也可以说是，后来所谓的“主教座堂学校”的前身。

1.7.3 中古前期的教育

谈到中古学术文化的交流和传播的情形，就不得不提在西欧各地所设立的修道院了。修道院设立学校，训练青年学生的目的，和主教训练教士是不相同的，不过呢，这些修士不只独善其身，也具有兼善天下的精神，随着他们足迹，基督的福音和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也就顺理成章的带给了进入帝国的各个蛮族部落。修士们每到一处，就建立修道院，开始了训练下一代的工作，同时，修士们从事抄书，作为他们的日课之一，如此一来，每一个修道院都有一个学校和一个图书馆，所谓“修道院学校”和“主教座堂学校”就成了中古教育制度中，两个并行的系统。而“修道院学校”在传播文化方面的贡献，至少在 12 世纪以前，成效要超过“主教座堂学校”。

如果说，罗马军团是扩展罗马文化的最大力量，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从事传教的修士们，是传播罗马文化遗产最有力的工具。第五世纪圣巴特力克的教化爱尔兰；第六世纪爱尔兰修士圣高隆邦教化苏格兰；第六世纪末到第七世纪初，圣哥隆巴诺之传道于西欧，这些都是比较著名的例子。圣哥隆巴诺所创立的修道院，像法国东部的卢赛、瑞士的圣高耳、义大利北部的波比奥等，都是中古有名的学府。此外，义大利的圣奥斯定奉了教宗额我略一世的命令，率领了 40 多位修士进入英格兰传教。坎特伯里也从此成为学术的重镇。英格兰的修士圣鲍尼法斯在第八世纪进入法兰克传教，使阿昆及大批的英格兰修士能服务于查理曼的宫廷中，因而产生了“迦罗琳文艺复兴”，而圣鲍尼法斯所创办的修道院中，富达成了颇富盛名的学术中心。这一切都足以说明，教会的传教活动，也附带着推行文化的传播，和民族与民族之间思想生活的交流。

在东部，传教士中最有名的应该是，第九世纪的圣塞瑞尔和圣麦少弟两位兄弟，他们在摩拉维亚传教，并且，还为斯拉夫语创造了书写的字母，至于把“拜占庭文化”传入东南欧，更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

我在前面提到的从事传教的圣奥斯定和圣鲍尼法斯，都是属于本笃会的修士。在第六世纪以前，西方修道院的制度，大多承袭了东方修道院的制度，生活的方式有宽严不同的系统。自从圣本笃创立修道院以后，由于受到罗马教宗和国王们的支持，直到 13 世纪，本笃会是西方唯一的修道院制度，圣本笃也享有“西方修道院之父”的美誉。

1.8 教宗权威的形成

让我们来谈一谈“教宗权威的形成”。从第五世纪中叶的教宗利奥一世，到第六世纪末的大额我略一世，共有教宗十八位，大多数是庸碌之徒，没有特别的表现。罗马首先受到蛮族军阀的专政，继而被东哥德王所控制，最后是查士丁尼的征服，这些，都没有给罗马教宗带来伸张政治权力的机会，直到伦巴人的入侵义大利，才使教宗在行政权力上有了抬头的可能，逐渐的树立权威。

教宗的权威进展虽然缓慢，但却不停地在增强，这是任何人为的制度内所未曾有的。伯多禄和他的继位者的权威，正如埋在地里的一粒种子，起初无声无息好像死了，但过不久长

出了幼芽，逐渐长大，分枝繁盛，竟而成了能够抵抗风暴的树。教外民族归化，亚略异端的消灭，都助长了教宗的影响力。拜占庭皇帝们的信仰经常摇摆不定，不但曾多次袒护异端，甚至还对教宗施加压力，这么一来，反倒使是西方的教宗的异端了，何况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在被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侵夺权力以前，早已光芒四射，及至成了教宗的驻驿之地以后，拥有宗徒之长伯多禄以及圣保禄宗徒的遗骸，获得了更肯定的威望，遂逐渐成为教会最高神权的中心。下面就年代先后从 18 位教宗当中选出较有贡献、享有声望的几位教宗的事迹，向您一一的作介绍，从他们的事迹，您不难看出教宗权威的进展。

第一位要介绍的是，在公元 440 到 460 年担任教宗的圣利奥一世教宗。他的伟大人格，是第五世纪中最显著的，前面提到过，他挺身迎拒匈奴王阿提拉的大无畏精神，这不过只是他生命中的一个小插曲而已，他已把他的全部生命献身于公益，不只是罗马城和义大利的利益，而是整个教会的利益。教宗圣利奥一世，具有高度的智慧，他的治绩也达到了前无古人的高峰，他的思想言谈作风，都有领袖的气派，他最注意的，就是使圣伯多禄座位四周的教友保持合一，他对争取宗徒之长伯多禄的继位者的权力，和保持从宗徒们所接受并传授的信仰，不遗余力，他的权威，特别在争辩基督耶稣的降生奥迹时，更发挥了效能，那也是当时震撼了东方教会的一场最激烈的争辩。公元 451 年在加塞道尼亚所召集的大公会，所幸，赖他得以正式确定了降生奥迹的信条，圣利奥一世教宗，事先曾给群士坦丁堡的主教寄去一封亲笔信函，将圣教会的这端道理，作了清楚明确阐述，等到这封教宗的亲笔信函，在大公会议上宣读公布后，全体与会的六百多位主教一致的公认：“这是宗们传下来的信仰，也是我们的一致信仰，是伯多禄在借着利奥的口发言了。”可见，出席大公会议的主教，都承认教宗是以“伯多禄的继承者”的名义为正道的最高监护人。圣利奥一世教宗还是一位出色的作家，他有许多讲解圣经的言论，以及相关道理的信札留传到现在，为他获得了教会圣师的尊衔。

第二位值得一提的是，在 490 到 496 年担任教宗的杰来西一世。他在一封《致皇帝亚纳斯大西乌斯一世》的书信中，指出了一条政治和宗教关系的路线，通称为“杰来西说”或是称之为“双权说”，它和“神权至上说”、“政权至上说”同为中古政教关系的三大学说。教宗杰来西清楚划分出，教会和国家的权力义务的权限范围。“神权”在引导人修德成圣，是属于精神的、灵界的。“政权”则是在维持人际关系、社会秩序、追求现世幸福，是属于物质的、外界的。教会与国家各在自己的范围内，是独立的、绝对的，不应受外力的干涉。杰来西主张“政教分权，各有所守，互相合作，以达到人类现世和来生的全协调。”杰来西的“政教分权说”，在理论上固然是无可争论，但是在具体的实务上，都产生了许多纠纷，因为在中古的政教情形下，何者属灵界，何者属外界，无法清楚的划分，政教双方虽然都尊重杰来西的说法，但是，各自立场有异，观点不同，冲突也就难免了，有关政教冲突的情形，以后再说。

伦巴人入侵义大利后，拜占庭的皇帝鞭长莫及，而驻驿在拉温那的皇帝的代表更是朝不保夕，自顾不暇。因此，罗马教宗就实际的负起了保卫罗马、抗拒伦巴人的责任了，也无形中成了罗马和义大利的政治领袖。正当这时，教会又出了一位不平凡的教宗，他是额我略一世，后人也称他为“伟大的额我略”。他在 590 年到 599 年期间，担任教宗的职务，在 599 年，他和伦巴人缔结了一项为时 30 年的长期和约，为义大利带来了难得的和平。后来，伦巴人再度发动战争，罗马教宗深深知道拜占庭之不可恃，乃决定采取新政策。第八世纪中叶，“法兰克王国”干涉义大利的政治，以及“教皇国”的诞生，就是这个新政策的后果。总之，伦巴人的侵略，固然给义大利带来极大的社会混乱，但是呢，也促成了罗马教宗与拜占庭之间的臣属关系，而成为义大利的一个政治力量。圣额我略一世，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伟大教宗，他不仅对罗马教宗政权的发展有极大的贡献，对教会内部组织的健全和文化的传扬，也有不可磨灭的贡献。有很多的历史学家称他是“中古的始祖”、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额我略出身罗马贵族家庭，从先人那儿承继了统治的天才，他曾在罗马政府中担任过要职时，就已发

挥了他的才华，担任罗马总督时，政绩可观，后来跟随了天主的召叫，进入隐修院修道，愿意以祈祷、读书终其一生，他把在罗马的一所家宅变作了隐修院，另外，还用他的财产先后建立了六座隐修院。不久，就被教宗柏拉济乌斯任命为罗马教区总辅祭，管理教会财务。伦巴人入侵时，也曾代表教宗柏拉济乌斯出使君士坦丁堡，要求东方的军事援助，他的使命并没有达成，因为皇帝毛利斯正忙于和波斯周旋，无暇顾及西方。额我略出使君士坦丁堡期间，使他对政府的组织有了深切的认识，所以，后来能够从事教会行政的改革。他对君士坦丁堡产生了极度的反感，促使他日后采取脱离拜占庭而独立的政策。公元 590 年，额我略被推选为教宗。身为教宗，面临义大利当时的情形，一方面要领导义大利抗拒伦巴人，一方面要改组罗马政府。在名义上，罗马承认君士坦丁堡的统治权，实际上，则已是完全独立的城邦，后来，历史上所谓的“教皇国”，可以说是肇端于这时候。额我略教宗既然毅然决然挑起了，帝国首长无能为力所拒绝接受的重担，教宗和伦巴人交涉签定和终休战 30 年，他从蛮族中赎回了战俘，负责供应食粮，保卫百姓，还鼓励百姓们振作起来，重新建立家园。在罗马城以外，教会在义大利已经拥有广大的土地，或来自捐献、或来自遗产的捐赠，构成了所谓的“伯多禄的遗产”。随着土地而来的巨款的收入，就成为维持教会慈善事业的经费。这位当初抛弃世俗而退居隐修院，并且，终身对隐修院怀着思乡病的教宗，虽然健康情形不佳，却未能减低来自他内心的那股活力。每个主日讲道、也不停地以天主的仆人发出信函、进谏的人、还不遗余力从事著述的工作。他著有《劝言》和《牧灵》手册，也被称为是西方四大教父之一，同时还敢于批评、改革教会和当时神职界的许多流弊、还重新整理教会的礼仪，把古代的礼仪歌曲搜集整理，使之成为天主教专用的格调，一直沿用到今天。他还在 596 年派 40 位修士到英国去传教，在他生命的末刻辗转于病榻上，仍然关怀者教会的大小事情，他听说有一位主教正感受了风寒，他连忙把一件大毛氅派人送去！他在公元 604 年去逝，后世尊称他为“伟大的教宗”实在是当之无愧。

1.9 教皇国的诞生

1.9.1 教皇国概述

今天的天主教，从中古时代的前期，也就是蛮族入侵后的西欧，艰苦成长的漫漫旅途。更希望今天的教会以及教内同胞，一面回首来时路，一面反思此时此刻，而瞻望未来，对自己的教友生活，或修道奉献的生活，能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在迈向天国的旅途上，能更信赖天主，向天主作更完全的投诚，也更爱我们的教会，为教会作更多的服务。下面，我们就说说“教皇国”和“加洛林王朝”的出现。

在西元八世纪的中叶，久已混乱的西方政局，先后出现了两股安抚的力量，那就是“加洛林王朝”和“教皇国”。他们的出现，是彼此互助合作的结果，由于这种合作，又产生了一个新的政治观念，就是所谓的“基督教共和国”的观念。在第五世纪，我们看到了罗马帝国的崩溃，以及文化的衰落，第六世纪，虽然有查士丁尼卷土重来，但是，地中海世界的一统，也就是罗马文化的基地，终于因为回教势力的兴起和扩张，而分裂成东西。与东方隔离后的西方，在闭锁的情况下，逐渐开发了一个新境界，领导这新境界的是法兰克人和基督教的领袖份子。这一部分的主题，就以“教皇国”的形成、“加洛林王朝”的兴起，做个简略的说明。

罗马帝国崩溃后，旧的政治观念，已经失去了效用，而日尔曼人“强力占据”的传统，似乎又不能适用于太平之时，因此建立新政治观念也就成了是必须的，因为当时接受教育的都是教士们或隐修院的修士们，他们的政治观念，自然是以基督教思想为基础了。也就是经过圣奥斯定在《天主之城》这本书，所构成的政治思想，他们不只是希望政教二者能通力合

作，甚至更希望建立一个，以教会为主的“神权乌托邦”，同时，罗马的政治制虽然是已经崩溃了，但是，罗马帝国的阴魂未散，还不断的迷缠着人们的心灵里，基督教和罗马帝国合而为一，正是这个“神权乌托邦”的实现，因此呢，想要建立一个“基督教共和国”，就成了这时代知识份子们普遍的愿望。使“基督教共和国”实现的是查理曼。公元八百年，教宗为他加冕的典礼，正是象征这个时代的开始。

1.9.2 梅罗文加王朝

要谈“教皇国”的形成与“加洛林王朝”之间相互关系，我们就得先来谈谈“加洛林王朝”的前身，“梅罗文加王朝”的没落。公元 481 年，法兰克一个部落的国王克洛维创立了“梅罗文加王朝”，经过不断的努力和发展，在 511 年，克洛维去逝时，留下个强大王国，他生前也已皈依了天主教，因此，法兰克王国一向有“教会的长女”的称号。克洛维国王死后，由他的四个儿子分别治理疆土，并且，继续扩张疆土。克洛维的四个儿子中，在世活得最长的是克洛达。他又统一了法兰克全国，但 561 年，克洛达死后，国土又由他的四个儿子来分别承继，整个儿的“梅罗文加王朝”，就在这种分合的循环状态下，产生周期性的内战。公元 561 年以后，“梅罗文加王朝”的历史，实在没有详述的必要，内战、阴谋、颠覆、暗杀是夺取政权的捷径，而且，这班国王大都是专治暴君，直到查理曼的祖先丕平担任宫廷执政时，法兰克王国，才慢慢走上法治之途。

从克洛维开始，“梅罗文加王朝”和教会之间一直维持着密切的关系，双方都利用对方来增进自己的利益。教区的主教和修道院的院长是国王最得力的助手，由于国王的慷慨，主教成为大地主，而修道院的财富也不断的增加，罗马帝国时代教会所享的特权，不但没有取消，反而逐渐的扩展，教会享有司法独立权，教士若犯了法，也唯有教会才有权力处理，教会有它自己的法律和法庭，与国家所设的法律和法庭分庭抗礼。此外，教会为了保护自己土地的完整，免于受横行霸道的军人干扰，教会又从国王那儿获得豁免的特权，任何地方官吏不得进入教会的土地。因此，教会的土地，成了特别行政区，俨然有如国中之国，这对以后封建制度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还有很多事件，由于法兰克国王不能预见它们的重要性，也渐渐的落入教会的手中。举个例子说吧！日尔曼人并没有所谓“控制遗嘱”的规定，不动产的继承和分配，一向都依照惯例来规定，而教会呢，就对遗嘱十分的重视，因为教会的财富大多数是由这种遗产的捐赠而来。为此之故，“梅罗文加王朝”与教会之间，逐渐发展出一种妥协的方式，所有不动产的转移，应该依照日尔曼的习惯法，但是，也可以借遗嘱而转让，而教会呢，则享有控制遗嘱的权力，婚姻和子女的合法与否，也逐渐为教会的权限，由教会法庭来处理。此外照顾贫病、寡妇、孤儿等慈善事业也由教会经营，总之，过去罗马政府所负责的许多社会工作，如今都成为教会的责任了。

“梅罗文加王朝”对教会虽然一直是恩惠有加，但是，对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任命却加以控制和干涉，惟独国王所同意的人选，才能被选。此外教务会议，也受到政府的牵制，惟有国王所召集的教务会议才算是合法的，会议的议决事项，也须经过国王的批准才可以生效。如此一来，法兰克的教会在人事与立法两方面全受到了政府的控制。这种政权干涉教权的情况，自然产生严重的后果。教会成了王朝的一部份，主教也和其他的官员无所差别。“梅罗文加王朝”逐渐衰退，虽然因素很复杂，而其中一项就是教会领导人物素质的降低。

从“梅罗文加王朝”不断的内战中，出现了一些强大而具有影响力的大家族。公元 613 年，推翻皇后卜隆希尔的，就是梅次城的主教阿奴弗和兰顿·丕平所领导的，由贵族们所组成的联合阵线。从此以后，法兰克王国的政权落入贵族和“宫廷执政”的手中。所谓“宫廷执政”在起初，不过只是替国王经管宫廷和地产的家臣或管家，由于政治的紊乱，他们又控制着国王的经济，管家就逐渐成了“宫廷执政”，成为国家的实际统治者。公元 687 年，兰顿·丕平的孙子海利斯多·丕平击败了其他的“宫廷执政”，成为全法兰克王国的实权统治者。公元 714 年，海利斯多·丕平死后，“宫廷执政”之位就由他的私生子“铁锤查理”所

继承，而这时的国王只不过是个傀儡，朝廷大权在“铁锤查理”手中。而回教世界的势力，已经伸展到西班牙，又逐渐向北发展，这股来自南部回教势力的威胁，影响了查理和罗马教宗，以及当地教会之间的关系，为了要削弱回教势力的压力，查理就和义大利北部的伦巴人缔结了盟约，好能共同夹击回教军队，这个盟约同时也直接威胁到教宗的安全。从伦巴人入侵义大利半岛以来，拜占庭方面已是鞭长莫及，对教宗和义大利人民已没有能力加以保护了。法兰克是义大利北方的新兴国家，教宗和义大利人民，都寄以殷切的希望，查理和伦巴人之间盟约粉碎了他们的希望。好在，这个政策只是暂时性的，并没有留下太多的影响，因为到了他的儿子丕平的时代，法兰克王国和教宗之间缔结了新的盟约，一致对付伦巴人，终于使伦巴人的王国消灭了。

“铁锤查理”的另一个政策，就对以后的教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影响深远。查理为了能有更多的土地来雇用战士，他没收了高卢教会的土地产权，因而引起了教士们的反感，为了对付回教势力，又不得不广展军力，在军费上的庞大开支已非法兰克的政府所能负担，也只有以土地来补偿日益增加的开支。土地的占有和军事上的服役，从此就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使得欧洲的政治更进一步的走上了封建制度。公元741年，“铁锤查理”去世，其子“矮子丕平”是一位精明恭勤的统治者，在和教会的关系方面，他一反乃父的作风，首先，他让教会保持土地的所有权，虽然骑兵仍然享有土地，这一点，使得日后的教会卷入封建制度，主教成了封建领主。其次呢，他和当代著名的主教鲍尼法斯通力合作，推行教会的革新，以及在东方的传教工作。“矮子丕平”使得教会成为一个协助推展政治势力有力的工具。而更重要的一点，是他和教宗结盟，共同一致对付伦巴人，“加洛林王朝”的建立和“教皇国”的形成，就是基于两者之间这样的关系。

丕平取代“梅罗文加王朝”，历史年鉴上曾有这样的记载：公元749年，伏姆斯的主教蒲卡特偕同派驻宫廷的神父傅拉特，受命咨询教宗匝加利亚：“法兰克王有名无实，这事是否合理？”教宗匝加利亚回复说：“有实权者，也应有国王的名号，比起有名无实的更为合理，并且为了避免国家正常秩序遭到扰乱，用我宗座的特权，立丕平为王。”在获得教宗的答复之后，丕平立即取代梅罗文加国王的契贝利克三世，自立为法兰克王，“加洛林王朝”开始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这本历史年鉴，还有以下这段记载：

公元750年，按照法兰克人的惯例，丕平被选为国王，由已故的鲍尼法斯总主教傅油祝圣，在苏阿桑城被法兰克人拥立为王，声称国王的契贝利克三世削发入了隐修院。这件事情，在以后的政教关系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虽然法兰克的历史书，一再的强调丕平是由法兰克人的推选、拥立等字句，但是，实际上丕平替代“梅罗文加王朝”，是出于罗马教宗的一句话而定，受到教宗的敕封。在以后，当政府冲突时，罗马教宗往往就会宣称辞，废立帝王的权柄所依据的，就是公元749年丕平的篡位，替代“梅罗文加王朝”，以及公元800年查理曼加冕为罗马皇帝这两件事。

从此以后，“加洛林王朝”和罗马的教会，缔结了解不之缘，教宗既声明丕平的篡位是合法的，而且，还以宗教的礼仪，予以祝圣、神圣化。下面要讲的，当然就是丕平如何协助教宗来“合法化”，他在义大利的政治地位了。

1.9.3 教宗权利的演变

在说明“教皇国”的建立以前，必须简略的说明一下，罗马教宗各种权力的演变，尤其是政治权力。教会创立的初期，各个教区，除了直接隶属于创立该教会的宗徒控制管理外，彼此之间并没有从属关系，更没有所谓最高中央组织的存在。为了信仰和教义的统一，以及教会纲纪的维持，一个更高权威的成立，也就迫不及待了。第三世纪的时候，罗马省内各主教集会以解决共同的问题。这种集会后来逐渐成了惯例，第四世纪末省会主教，因为主持这项集会，也就逐渐被视为全省主教之首，称为省会主教或总主教，同时，罗马是帝国的京都，罗马城的主教，自然是众望所归的领袖，再加上公元第四、第五世纪的政治背景，罗马主教，

也就被公认为整个教会的统治者，相当于罗马的皇帝，那就是我们所称的“教皇”或“教宗”。在“教皇国”形成的背景因素中，首先谈到的是教会的组织形成的经过，罗马的主教到了第四、第五世纪，所面对的政治现况，而逐渐有了“教皇”或“教宗”的称呼，下面从这里继续。

从教宗到神父的职权，在历史演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制度，称为“圣统制”。“圣统制”的演变，随着时代的需要，由隐晦而明显，由简单而复杂，由散漫而严谨，并非一成不变，而且，受到罗马政治制度的影响相当的深远，教会的整个组织，实在可以说是罗马帝国组织的翻版。

罗马教宗逐渐被公认为天主教的最高领袖，那就是说，他拥有“首席权”。罗马教宗的“首席权”可以从神学和历史两方面来解释和说明。在神学上，“首席权”的根据是圣经上，耶稣对西满伯多禄说的那句名言：“你是磐石，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阴间的门，不能战胜他，我要将天国的钥匙交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束缚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缚，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磐石”的希腊文发音就是“伯多禄”。西满这位宗徒，也就从此改名为“伯多禄”，受耶稣亲自指定为宗徒之长，领导耶稣所创立的教会，伯多禄既然身为罗马的主教，他的继承人，当然也就成了教会的最高领袖，天主教承认罗马教宗的“首席权”，当然也就成了教会的最高领袖，天主教承认罗马教宗的“首席权”，它的神学根据，就是玛窦福音 16 章的 17 到 19 节的这一段话。

从历史的演变来说，罗马教宗“首席权”的确认，就不是这么的简单和清楚了。罗马主教演变为教宗、教会的最高领袖，这是逐渐发展的，当然也是受到了环境的影响，另外呢，“首席权”和过去历史上的“首席权”有着蛮大的距离。在中古时代教宗“首席权”，不仅是指信仰和道德上的“训诲权”，尤其指的是教会的行政上的“统治权”，而且，还包括有俗务上的“政治权”。“训诲权”、“统治权”、“政治权”这三种权力的演变，无论是在时间上或地域上，都有很大的不同。教宗“首席权”中表现得最早的是“训诲权”，而且是最普遍的被接受。要说明这一点，最好的例子是异端问题的处理。在历史上比较重要的，像亚略派、聂斯托里派、一性论等，也都发生在东方。君士坦丁堡是东罗马帝国的京都，亚历山大里亚大城是教会的学术中心，耶路撒冷、安提约基亚是初期教会的发源地，这四座初期教会的重镇，在教会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或因环境的重要，或因出自宗徒自己所亲自创立，因而他们的主教，被尊称为“宗主教”，带有一方之宗的色彩，都是位高望重，为信友们所景仰。但是，每一次异端发生之后，争论的双方最后都转向罗马，要求罗马的主教出面解决，凡是与罗马保持着共融的，就是“正统”或“正宗”的标记，凡是拒绝罗马的仲裁或决议的，立刻就停止这种共融，或则称它是“开除教籍”，这些派别的就被宣告是异端。我们就以公元 451 年的“迦尔西敦会议”为例子，来说明教宗的“训诲权”。先是呢，倡导“一性论”的欧底该斯，他是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依恃皇帝的权威，控制在厄弗所所召开的会议，压迫反对派，罗马教宗圣利奥一世，一面斥责这个会议，形容它是“盗寇会议”，一面另外派遣代表召开“迦尔西敦会议”，当大会宣读教宗的亲笔信函后，参与会议的主教们一致宣称说：“这是教会的信仰，这也是宗徒所宣讲的信仰，正宗派也有与此相同的信仰，坚持不同看法的，应该受征罚，借教宗利奥的口，伯多禄已经向我们说话了。”

至于“统治权”呢，那就发展得比较的慢了。在教会初期的教难时代，地方教会大多各自为政，采取自治的方式，获得自由以后，教会的地方性仍然继续存在，罗马很少能实施它管理的力量。自从君士坦丁堡成为帝国的京城以后，该城主教的声望也随之水涨船高了，几乎要与罗马的主教分庭抗礼之势，以期能取代东方教会的领导地位。而西方呢，自从蛮族入侵以后，政治混乱，交通阻塞，各地方教会与罗马的联系更形困难，等到各蛮族纷纷建立王闰以后，各地的主教受限于当地的国王，也就多疏于和罗马联络，加上省会主教图谋增强自己的权力，地方与罗马之间的隔膜，也就更是有增无减了。这种情形，在整个中古时代都继

续的存在着，这也正说明了，罗马教宗对整个教会的“统治权”，是受到时间和地域的限制。

从公元 756 年，教皇国正式成立，到公元 1870 年义大利统一，罗马教宗也兼任一国之主，“教皇”这个称呼，也正可以说是名实相符呢！但是，早在“教皇国”成立以前，罗马教宗已经拥有了“政治权”。公元 756 年的事件，仅仅只不过是使已经既成的事实呢，获得法律上的认可而已罢了！正当蛮族入侵时，罗马教会已经拥有广大的土地，遍布于阿尔卑斯山的南北，这些土地都是历代的教友捐献给罗马教会或圣伯多禄的。为此之故，有所谓“圣伯多禄的财产”的名称。同时帝国的衰败，已经没有能力应付蛮族，罗马教宗为了保护教会的财产、维护地方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不得不与入侵的蛮族去交涉，而变乱之后，地方的重建与秩序的恢复，都期待于罗马的主教。公元 451 年，匈奴王阿提拉之围困罗马，455 年，从北非入侵的汪达尔人洗劫罗马，都是人民请求教宗出面与强敌周旋，第六世纪的后期，伦巴人进入义大利，君士坦丁堡的主子鞭长莫及，对之无能为力，驻守在拉温那的皇帝的代表，更是啊，自身都难保，而这时候负起保护罗马，抗拒伦巴人的责任，就是罗马教宗，无形之中，罗马教宗成了罗马和义大利的实质领袖，他在处理俗务上的权力，也大大的增强了，最后，终于导致了“教皇国”的出现。

由于“圣伯多禄的财产”缘故，在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年代，土地就是政治权力的资本，这就成了“教皇国”的特质基础。教宗以实力与蛮族周旋，他独当一面，或以武力抗拒蛮族，或以外交缔结和约，竭力处理俗务。前面，我就已指出，无形之中，教宗就成了罗马和义大利众望所归的政治领袖，这是“教皇国”的事实基础。然而，在名义上，拜占庭的皇帝还是义大利的统治者，罗马教宗还是用在东方的皇帝的名号来计算年代，这种名实不符的关系，是不能长久维持的。公元 727 年，教宗额我略二世就致书给在东方的皇帝利奥三世，向他清楚的表达了脱离拜占庭，谋求独立的趋势。从此以后，拜占庭对西方，在名义上的领导也渐渐消失，东西方在政治上也从此决裂。但是啊！义大利的政治问题，并没有因此而获得解决。拜占庭的势力既然已经退出了义大利，势必要有另一个政治力量来取代，可是，谁能承担这份领导义大利的责任呢？这就是罗马教宗所面临的问题了。公元八世纪的“伦巴王国”中，出现了几位强有力的国王，他们都要有席卷义大利的雄心，如果他们之中，有人成功的话，教会不单在土地和经济上会蒙受严重的损失，而在执行教宗的任务上，也会受到很多的限制。罗马教宗，既然已经脱离了拜占庭皇帝的统治，当然也就无意屈服于伦巴族的国王之下，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即可抵御伦巴人长期不断的侵略，又可维护教宗的“政治权”和“教权”的独立。说得更清楚些，那就是罗马教宗需要一个新的盟友。

1.9.4 “矮子丕平”时期

公元 739 年，伦巴人攻陷了波隆那一年之后，教宗额我略三世致书给当时还是法兰克王国的宫廷执政“铁锤查理”，要求他协助自己共同抗拒伦巴人，而这时的查理正和伦巴人结有盟约，一致去抗拒从高卢南方北上的回教势力，就拒绝了教宗的请求，于是伦巴人就变本加厉。公元 751 年，占据了义大利的北部要塞拉温那，拜占庭驻守在义大利的总督，也就此消失，拉温那的陷入伦巴人之手，当然也就直接威胁到教宗领土的安危。公元 753 年，伦巴人扬言要直接攻打罗马城，当时“铁锤查理”早已去逝，教宗史提夫二世才刚继位不久，就向“矮子丕平”求救，而“矮子丕平”也才因罗马教会的支持，废了“梅罗文加王朝”君主，篡立为王，所以对教宗史提夫二世的要求不便拒绝。这一年的冬天，教宗亲自去法兰克，次年的元月，与丕平第一次见面，说明来意，愿意缔结和平的盟约，同时处理“圣伯多禄的财产”和罗马共和国的问题。754 年的复活节，丕平召集全国会议，决定派遣大军协助教宗。以收复教会失去的土地，几个月以后，教宗再度亲自祝圣丕平为法兰克王，四年前，丕平已经由法兰克的主教鲍尼法斯祝圣为王，现在，则是教宗再次举行这项仪式，也就更强了法兰克人与罗马教廷之间的关系。

公元 755 年，丕平的大军攻入义大利，伦巴王战败投降，并且答应归还所有从教会占据

的土地，丕平班师回国后，伦巴王不但食言，还挥军直捣罗马，丕平也就再度率军南下，攻下伦巴的城镇，下令收集所有降服了的城镇的钥匙，派专使送到罗马圣伯多禄安葬的坟前，象征性的将征服的土地赠献给罗马教宗，这个事件是历史学家们公认的“教皇国”正式诞生。丕平将所收复的土地归还教会，而且，还立下凭据，这就是所谓的“丕平的赠献”。从教宗史提夫二世的传记，得知当时丕平所赠献城镇的名单，大概说来，北起波河流域，沿亚得里亚海向南，横越义大利中部，直到罗马城与地中海，形状有如哑铃。后来，查理曼大帝在774年讨伐伦巴第，又重新承认“丕平的赠献”，而且，还增加一些新的土地，从此开始，罗马的教宗，不仅是一位宗教领袖，而且，还是名符其实的政治统治者，也因此，罗马教宗一方面被卷入义大利的政治漩涡，从事各种不合宗教领袖职位的活动。另一方面，他的职位也成为许多野心者的角逐控制的对象。“教皇国”的存在，就教会立场来说，真是一件不幸的事。

公元768年，丕平病逝于圣达尼斯修道院，法兰克王国的疆土就由他的两个儿子查理曼和卡罗曼分别继承。一直到卡罗曼死后，查理曼也就顺势接管卡罗曼的辖区。根据爱因哈特所撰写的《查理曼传》的记述，说查理曼身材魁伟高大，鼻子很长，脸颊红润，是一位擅长于骑术的马上英雄，喜欢打猎和游泳，饮食有节制，最恨有人喝醉酒，也是一位有魄力、有干劲、不怕辛劳的工作者，内政、外交事必躬亲，从小接受严格的武士训练，却没有受过学校教育。在他登基以后，就从各地方聘请学者入宫，主持宫廷学校，教育自己和贵族们的子弟。查理曼一生南征北讨，建立了一个号称第五世纪以来所未曾有过的的大帝国，查理曼对西欧五个政治不同的区域，所采取的政策也不尽相同，首要之务是统治半日尔曼、半罗马的法兰克；然后，派兵驻守王国的南部，遏阻回教徒的前进；他还压制伦巴人保护罗马教宗；与拜占庭签订条约，以维持双方的和平关系。

1.9.5 查理曼时期

现在，我们来谈谈查理曼如何对待伦巴人。查理曼的母亲主张和伦巴人联盟，虽然也主张和罗马教宗维持良好的关系，他尊奉母亲之命娶了伦巴王的公主为妻，但这场政治婚姻维持不到一年，就把她遗弃了。查理曼的弟弟卡罗曼去逝后，查理曼将他的王国占为己有，更把弟妇及孩子遣送回义大利，伦巴王的两个女儿，一个遭到遗弃，另一个又受到欺凌，当然心中不满。隔年新教宗哈德良一世登基，他是一位对伦巴人有着极端反感的教宗，当伦巴王要求哈德良一世为卡罗曼的两个儿子祝圣加冕为法兰克王时，哈德良教宗严辞加以拒绝，于是呢，伦巴王就率军占领了托斯卡尼，并准备围困罗马城。哈德良教宗乃求救于查理曼。查理曼原想以和平方式解决教宗与伦巴王之间的纠纷。因为那时候，他正准备讨伐萨逊人，无法兼顾义大利的战争，但是，由于伦巴王竭力支持他弟弟卡罗曼的孤儿，对自己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就决定亲自率领军队援助教宗哈德良，个人的恩怨以及外交的因素，促成了查理曼的这次远征。费时九个月才攻下了伦巴人的京城巴维亚。在巴维亚陷落之前，查理曼已提前离开军队，前往罗马，教宗哈德良以大礼迎接他，查理曼重新承认他父亲丕平向教会所作的赠献之外，他又增加了某些新的土地。当他的军队攻下了巴维亚，查理曼就把伦巴王全家充军，并且宣布自任伦巴王，与法兰克分别治理。伦巴王虽然降服了，但是，中南部的伦巴人的诸侯，并没有全部的归顺，即使是已降服的地区，也时有反叛，查理曼因此曾数次南下义大利。查理曼一世当中最长的对外战争，以及对欧洲文化最有影响的，是对付萨克逊人。从“铁锤查理”的时代，法兰克人就有并吞萨克逊的企图，“矮子丕平”曾前后十次出兵访伐，都没有成功。查理曼继位时，萨克逊还仍然是一个独立的，非基督徒，而又十分不友善的地区。从772年开始，经过32年之久，查理曼亲征了18次之多，才把萨克逊人征服，使得法兰克的领土向东挺进到了易北河。查理曼时代的萨克逊，指的是今天的丹麦之南，于莱茵河和易北河之间的地区。

查理曼借用教会的力量和传教士的工作，来驯服萨克逊人，他除了开疆拓土的目的之外，

传扬基督的福音也是查理曼的目的。早在丕平的时代，圣鲍尼法斯就已经开始在萨克逊人中间传教，圣鲍尼法斯的弟子斯图慕于公元 744 年，正值我国唐玄宗在位的时候，创立富达修道院，训练传教士长达 30 年之久。依照斯图慕的建议，查理曼把萨克逊地区划分成若干个传教区，好能更有效的推进传教工作。斯图慕去逝后，威列海继承了这份传教工作，他的足迹直达易北河下游，而所到之处呢，不是建立修道院呢，就是开设学校，从事归化萨克人的工作。为了维持永久的和平，以及推进文化交流。查理曼鼓励法兰克人殖民于新征服的土地，建立城堡。在第八世纪的尾声，西方最具有威望的统治者，很显然的是查理曼。除了英格兰以外，他统治着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虽然已经有 35 多年，西方没有皇帝，但是罗马帝国的英魂未散，人们都还在憧憬着它的复活，同时，在西方人的心目中，拜占庭早已不是罗马帝国了。罗马教会，不断的使人回想起过去的罗马帝国。在罗马，教宗统治着一个精神的帝国，它的官方拉丁语文和政治制度继承了罗马帝国的传统，教会是基督教世界所以一统的力量，可是，中古的很多思想家深信，依照天主的计划，还需要一个俗世的权力，一个足以维持基督教。

世界治安的政治权力，这也正好是第五世纪末，杰来西教宗所希望的，教权和政权的合作。查理曼宫廷的学者，对“罗马帝国”这个观念当然有更清楚的认识，从著名的古典作家的作品当中，宫廷的学者们相当熟悉古代罗马帝国的伟大，他们也深信查理曼是恢复这伟大帝国的理想人物，所以有学者一再的认为查理曼的事业是帝王之业，而在宫廷的“文会”里，查理曼的文名又是达味，这就更含有深达的意义。而实际上，“法兰克王国”已经掌握着基督教世界俗务方面的大权，而在公元第八世纪一般人的心目中，如果不同时也有“罗马皇帝”的名号，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查理曼应为“罗马皇帝”，乃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啊！“800 年事件”是第八世纪末年，思想演变的必然结果，在当时的人看来，并不是一件大书特书的事。不过查理曼加冕称帝的环境却有点特别，不尽合乎查理曼的理想，现在我就把其中的原委呢，下面给简单的说一说。

公元 795 年，也正是唐朝代宗在位的时候，教宗哈德良去逝，利奥三世继位后，就立刻致书给查理曼，并且，还寄赠给他圣伯多禄陵墓的钥匙，以表示自己对法兰克王的忠诚，查理曼的答复，有如长官训诫自己的部属一个样儿，劝他要好好恪守教会的法律，服从古代教父的规诫，以圣善的生活来领导教会。由于哈德良教宗的亲族和罗马贵族的跋扈，利奥亦不能不低声下气，接受法兰克王查理曼的训诫。因为新成立的“教皇国”，甚至教廷本身和利奥自己的安全，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保护者。公元 796 到 799 年之间，梵蒂冈的教廷，新整修的勤见大厅嵌镶的壁画，就代表了教宗利奥政教关系的观念。正中间的拱壁，描述耶稣基督站在一块大石头上，下面写着“往训万民”，左右两边较小的拱壁则画了 12 宗徒奉命往训万民。在正中间的拱壁和左右两边的拱壁之间，一边是君士坦丁大帝和教宗西尔乌斯德跪伏在耶稣的脚下，另一边就是利奥和查理曼跪伏在圣伯多禄的脚下，查理曼从圣伯多禄的手中，接受一面蓝色的底，绣着红玫瑰的旗帜，而利奥则接受一条肩带，无疑的，这壁画的含义是政教合作来维护一个基督教帝国，但很明显的，在当时，查理曼是比较有力量的一方，而利奥只有屈居下风了。

公元 799 年四月，一次宗教大游行的时候，利奥突然遭到仇党的攻击，几乎造成生命的危险，所幸得到两位法兰克视察使的及时救援，才得免于难，不久就在法兰克人保护之下，利奥逃到法兰克和查理曼会见于巴达朋，获得查理曼的盛大欢迎，而利奥的仇敌也跟踪而来，在查理曼面前控告利奥的各种罪状，像是利奥的生活腐败，也曾做过伪誓的罪。对于这种控告，以及利奥所遭的侮辱，查理曼不能不采取行动，到了秋天，在查理曼派了军队护送下，利奥还回罗马。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八百年的秋天，查理曼启程去义大利。记载这件历史事件的著作中，称扬查理曼是达味王、罗马的保护者、圣伯多禄所派遣为救援教宗的使者。11 月末，查理曼进了罗马城，12 月初，召开会议，处理教宗利奥三世和仇党之间的纠纷，并

且调解利奥被仇党所告发的罪名。依照惯例呢，罗马教宗是不能接受任何人间权力的审判的，所以12月23日，利奥亲自出席会议，在查理曼及与会者面前，公开宣誓声明自己无罪，两天后，利奥就为查理曼加冕为罗马皇帝。关于查理曼的加冕，当时的文献有好几种不同的记载，我们只选其中的两种，分别为各位作个简单的介绍，其中之一，是这么说的：“公元八百年，圣诞节，参加会议的人又集合在圣伯禄大教堂，可敬的教宗亲手给查理曼加冕，全体罗马信徒，见他何等的爱护罗马教会和它的代表，乃异口同声，有如出自天主和天国钥匙的保护者圣伯多禄的意旨，一齐高呼说：‘由天主加冕的奥古斯都查理曼，伟大而永赐和平的皇帝，胜利、万岁、万万岁！’信徒们如此的高呼了三次，然后又高唱圣人祷文，查理曼被众人拥立为皇帝，以后，教宗以圣油祝圣了查理曼为王，完成了在历史上，在教会礼仪上的加冕典礼。”而另外一种记载，则是出于查理曼宫廷中的学者爱因哈特的手笔，他说：“为了救平罗马教会最近发生的混乱，他来到罗马，住了整个冬天，在此期间，他接受了皇帝和‘奥古斯都’的尊位。虽然，最初遭到他竭力的反对，因为他曾经声明，如果，早知是教宗的意思，虽然那天是圣诞瞻礼，他也决不会进入教堂。”从上面文献记载，很显然的，是罗马教宗的安排，主动的为他加冕，那么何以爱因哈特说，对“八百年事件”，“查理曼”感到不愉快呢？

爱因哈特所写的《查理曼传》中，记载了教宗利奥三世于公元八百年的圣诞节，在圣伯多禄大教堂，为查理曼加冕祝圣为“罗马皇帝”，称它为“八百年事件”。这事件是出于罗马教廷的主动，而查理曼本人却感到不愉快，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根据史学家的分析，一致得出观点如下：

第一个原因是，在这时候，君士坦丁堡的皇位正由一位名叫爱玲的妇人所窃夺。据说，查理曼和爱玲之间，曾经谈到过婚嫁，如果，一旦婚姻成功“查理曼”就可以以夫君的身份，名正言顺的统一东西两地。而教宗利奥的行动不仅粉碎了这个计划，而且也引发了拜占庭的抗议，东西双方也因此相持了十多年之久，到公元812年时，才获得东方的谅解，彼此以兄弟相称。原则上，是东西罗马帝国再度出现。第二个原因是查理曼对教宗利奥本人之策动“八百年事件”有所不满，查理曼在处理教宗仇党攻击和告发的事件之后，立刻从被告的手中接受皇冠，是不会甘心的。“八百年事件”，导致西方产生了一个新政治制度，查理曼是由天主傅油的，所以是天降英雄，是替天行道，他的任务是“爱护罗马教会及其代表”。他的帝国是基督教的帝国，查理曼又有了“奥古斯都”的头衔，正如渥大维建立了罗马帝国，现在查理曼又复兴了久已灭亡的罗马帝国，但查理曼的帝国并不是外教的罗马帝国，而是基督教的罗马帝国，查理曼不是渥大维而是君士坦丁，因为这个帝国是以基督教为基础的，所以呢，就有基督教共和国之称，在理论上，“杰来西说”似乎已经实现，教会与帝国可以通力合作，来完成“天主之城”的理想。

但是，在具体事实上，究竟何者有优先领导权呢？因为查理曼是从罗马教宗的手中接受皇冠，倡导“教权至上论”的，自然的结论是说，政权来自教权，教宗既可以任命皇帝，当然也能罢免皇帝。但是，支持“政权至上论”的，则是认为查理曼在八百年前，已经是西方唯一强有力的统治者，加冕不过是事实的象征而已。的确，查理曼的一生，都表现出他是基督教共和国的真正领导者，在他的身上君士坦丁的“政教合权制”又暂告复活。查理曼所实行的“政教合权制”比君士坦丁或拜占庭的“政教合权制”更为的彻底。因为它实际上将“国家”和“教会”两者合而为一，又将“政治”和“宗教”两者混为一谈。前面我们提到过，查理曼回答教宗写给他的书函里边儿，他曾毫无保留的说明自己的使命：“我的职责是保护教会，对外抗拒异教的攻击，对内则推进公教信仰，使得每一位百姓都能恪守尊行教规和诫命。”查理曼对这些使命，真可谓夙夜匪懈，克始克终，从他所想的是为自己的国家开疆拓土，但也为削减来自回教徒和其他异教徒的势力，维护教会的权利，以及推展基督的福音，使更多地区的人皈依教会。而在内政方面，查理曼推动基督的信仰更是不遗余力，实际上可

以这么说“以教治国”，一切施政均依照教会的原则，以能达到“天主之城”的理想和目标。他尽量的任用神职人员来担任非神职的工作，宫廷和外交，甚至是战场上，神职人员和贵族们总是并肩而立。负责视察各地的“二人小组”组成的视察使，其中的一人，必定是主教，或是修道院的院长，他们的任务不仅是督导地方官员，传达国王的命令和解决人民的纠纷，而且也是视察地方教会，推展宗教生活。宫廷会议，所讨论的内容不只是国家大事，而且，还讨论各类的宗教问题，甚至是主教和院长的任免大权，也全操在查理曼手中，视察使有向国王报告的责任，重要的诉讼案件，必须由国王裁决，从他所颁的法律或命令，我们可以看到：“教会内部的一切，大如神职人员的教育。小如诵经祈祷的方式，都不能逃过他的注意。”我们称查理曼的政府是“神权政府”确实也不为过。他所颁的每一诏令，第一句话必然是：“希望教会和我们的人民周知....什么什么事。”在他来看呢，教徒和皇帝的臣民是不能分开的。

附带说明一下，自从公元八百年以后，教宗利奥三世在所有教廷文件上，除了注明自己的在位年代之外，还加注查理曼在位的年代，他所新铸的钱币，一面是教宗自己的名字，另一面就是查理曼的名字。对利奥来说，这是政教合作，但对其他的人而言，不也是罗马教宗接受了查理曼统治的象征吗？

下面的内容来看看查理曼时的教会生活，当时教会的行政和前几世纪大致相同，不过堂区和神职人员都比以前更多了，主教区也增加不少，主教每年必得巡视自己的教区，这时候几种祭祀的礼节，已经有了一些改变，最初几个世纪，“圣体”只在大礼弥撒中祝圣和分送。普通弥撒或是诵念的弥撒，由第七世纪才开始举行，到了查理曼的时代方才普遍举行。在这样的弥撒一如在大礼弥撒中，教友一直都是兼领“圣体”、“圣血”，但是领圣体的方式，从此是由神父分送在教友们的舌头上，也就是说，从这时候开始，教友只能伸出舌头，口领“圣体”了。婚姻的立法也逐渐改善，关于婚姻方面的阻碍，查理曼时代和今天，几乎没有大的差别。

这时候教会的重大改变是，拉丁教会内的礼仪的划一。七件圣事的主要礼仪，当然各处都一样，但是，施行圣事时的象征性礼节，各地的差别就很大了。先是不平，然后是查理曼，决心使礼仪统一起来，他们请求罗马把拉丁礼仪本送到帝国的京都，以便分发到各处，传播罗马的拉丁礼仪。法兰克境内，很快的便采用了拉丁礼仪，西班牙则要到第十一世纪，方才开始采用。他们也从罗马请来歌咏团，因此，“额我略调”的圣咏圣歌传遍了法国和德国。

查理曼有感于罗马的高度文化，便决意推广教育，提高人民教育的水平，奖励学术研究，这种风气直到他去逝后好多年，都没有衰退，因此，唤起了文学和艺术的复兴，这就是历史学家所称的“加洛林王朝的复兴时期”。查理曼还从国外聘请了许多文人学士，特别从大不列颠请来的人数比较多，因为文化在大不列颠比在法国保存得更为良好，最著名的是阿尔琴修士，他成了查理曼言听计从的顾问和知己好友。他在帝国的首都爱斯，建立了一座学院，当代的许多知名之士都来就学，其中不少人都被祝圣为主教，负起了管理教区的使命。查理曼也精心增加圣经和古典的手抄本，为此呢，设立了许多学校，以便学习书法和以多姿多彩的画法，来装饰手抄本的技术，现在的西方，很多图书馆和博物馆内，仍然保存完好供人欣赏。查理曼还命令一切主教座堂和隐修院，都要为儿童开设学校，教给儿童写作、唱歌、算术和文法。“加洛林王朝”在各方面，都是继蛮族入侵后的五个世纪中最辉煌的时期，可惜，这种光明只照耀了半个世纪，查理曼去逝，他的事业便瓦解，西欧又堕入暗夜，竟延长了两个世纪之久。

查理曼之后，有一段混乱和内战时期，不出三代，庞大的“加洛林王朝”所建的帝国终于瓦解，查理曼一手造成的“基督教共和国”，也就在公元 888 年名实具亡了，这正是我国唐僖宗末年时，西方欧洲逐渐步入分裂的封建时代，政治前途从散漫的帝国转成比较稳定的封建国家，尤其是日尔曼和法兰西地区。

欧洲政治的改变，教宗与“加洛林王朝”的联盟，导致了欧洲民族国家的诞生，并给以后的中古世纪，预备了它的政治宗教的方向，这一切的一切，都可以说是受到阿拉伯回教徒征讨的结果。近代不少历史学家，认为中古时代的真正开始，是始于回教的创立，实在是它有它的理由。

1.10 回教的兴起

下面来说说从回教创立以后，向外拓展他们的势力，对我们的教会产生影响的相关事件。至于回教世界与教会没有多大关联的历史，因为回教的历史和天主教没有多大关系，不再详细介绍，仅仅列举出重点。

回教于第七世纪时，进入了世界历史的舞台，是教会史上空前的大事，教会的命运也从此改观。公元 632 年，穆罕默德去逝的时候，回教势力尚未遍及整个阿拉伯，他死后，回教徒冲越北非的沙漠，向文化地区进展。635 年，大马士革被占，立刻成为“大食帝国”的首都，两年后，下美索不达米亚易手，638 年，回教徒占领耶路撒冷，不久上美索不达米亚也为他们所占领，到了 648 年，整个波斯直到奥克素以及从亚美利亚洲到高加索，都成阿拉伯人的天下，然后开始向西征伐。642 年，亚历山大里亚及整个埃及失陷，650 年，塞普勒斯岛沦陷，西征暂时停止。到 698 年，迦太基也落入阿拉伯人的手中，从此阿拉伯人在北非海岸已是独行无阻。711 年到了西班牙，718 年君士坦丁堡险些失陷，732 年“铁锤查理”在波阿弟艾得到胜利，使得阿拉伯人在欧洲的征伐宣告结束。不到一个世纪信奉回教的阿拉伯人占领的地区超越了昔日罗马帝国的版图，阿拉伯人于是作了地中海的主人。第九世纪取得西里岛，在欧洲的海岸上建立了他们的基地，从 880 年到 916 年，也就是我国的唐朝末年到五代初期，仅在罗马以南大概是三天步行的路程，阿拉伯人在加里格利亚诺建立了强大的根据地。

阿拉伯人长征的时期，各地教会的失陷似乎不太严重，阿拉伯人的目的是使全世界遵奉“阿拉”，但并不叫个别人士信奉回教，他们憎恨偶像崇拜，强迫异教徒皈依回教，但并不以犹太人与基督徒为崇拜偶像者。在被回教徒征占的地区，基督徒被认为是属于第二阶级，必须缴纳特别的捐税，不得在政府担任公职，不过在信仰和祭典上，基督徒算是自由的。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埃及等的基督徒极为的少，大部份都是信奉“一性论”的异端，他们感谢阿拉伯人把他们从拜占庭的重轭下救了出来。常期受到阿拉伯人统治的基督徒地区是北非和西班牙，西班牙却能屹立不摇，而北非的基督徒完全的绝了迹。不过，阿拉伯人并没有将北非的教会摧毁，而是说，那儿缺乏热心教友而自动的放弃了信仰。从数量上说，阿拉伯人的征伐并没有给了天主教重大的打击，而教会所受到的间接影响却是相当的严重，使回教徒占领区内的传教事业全面停顿了。我们的教会，始终未曾有过地理的国限，但从这时候开始，包括整个地中海沿岸，与阻隔近东的南方界限突然间形成了，使得教会的地理重心向北移到高卢，西方与拜占庭之间的隔膜因阿拉伯人而加强，也使得拜占庭变得狭小而贫穷了，西方因为在地中海无立足之地而置拜占庭于不顾。

从数量上来看，阿拉伯的征伐，并没有给了天主教太重大的打击，但是教会所受到的间接影响，似乎是更大，回教势力统治的地区内，教会的传教事业就全都停顿下来。从地域上来看，在穆罕默德去逝以后的百年之间，回教占有了北非、东地中海地区、和西班牙。如果我们脑海中还有罗马帝国以及早期中古是以地中海为中心的话，那么回教势力所占领的地区，在地图上看来，就含有很重要的意义了。因为西方的经济，从此以后就受到了限制而变了质，西方的拉丁文化和东方希腊的学术和艺术，逐渐受到了回教的渗透和影响。回教的历史，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在欧洲历史之外，可是回教文化的许多特质，像崇尚武力，宗教的

狂热，求知和享乐，都会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古欧洲各方面的历史，当然也包括了东西罗马的教会历史。东西罗马，以及回教世界，三大势力彼此之间的关系，历史学家们一般的看法大概是这样的：拉丁和希腊基督宗教是罗马帝国的合法继承者，而回教在起源上和罗马传统并没有丝毫的联击，可是回教占领了过去罗马帝国的好几个省份，因此也就接受了大多数希腊罗马的政治、财政、学术和建筑方面的遗产，阿拉伯人虽然只有部落的组织 and 口述文学作为背景，但他们却能吸收罗马波斯和犹太的传统。他们不仅吸收或借用，而且将借来的一切，借着宗教的精神和阿拉伯语文的特性，变化成一种新的东西，因此，回教实际上可以说是继承亚历山大大帝的希腊波斯帝国，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说是继承希腊罗马帝国，因此，回教在思想、艺术和建筑上与罗马西方世界、东方拜占庭势力，有着共同的基础。回教对欧洲，另一个重要意义是：它是文化的传递者。在回教势力的扩展过程中，阿拉伯语文和宗教跟着大军散布到被征服地区，从西边的西班牙半岛，到东边儿的波斯，在这个交通工具，限于陆上的骆驼马匹和水上船只的时代，回教徒却控制了连接中国、印度和波斯的中亚细亚、和波斯到叙利亚的陆路，同时又称霸于从叙利亚到西班牙的水路。在 15 世纪以前，绕道好望角的新航线还没有发现，而回教呢，实在可以说是欧亚非三洲的连接文化。从第八世纪到 15 世纪的七百多年中，这块雄跨三大陆的地区，具有商业和文化的统一，维持这统一局面的，是回教的商人和学者，他们可以说是一班伟大的掇客，中国与印度都和被阿拉伯所征服的波斯发生接触，由此，也和被阿拉伯所征服的拜占庭若干行省发生了接触。

阿拉伯的学术没有迅速地在意大利和其他基督地发扬，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阿拉伯语文有着独特的结构，外人学习不容易。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回教帝国、基督教的西方和拜占庭东方三者之间，由于彼此间的距离和语言、宗教、生活习俗的不同，以及各自经济自给自足，造成隔阂，甚至仇视的态度，而三者各自都有得天独厚和替天行道的使命感，因此，他们都各自向外发展而不愿彼此容忍或合作。拉丁西方伸向塞尔特和北方的斯坎地那维亚，拜占庭东方向巴尔干、多瑙河和南俄发展，回教则伸向撒哈拉、中亚和印度的西北部，十字军东征以前，西方既不重视回教，反过来，也不受回教的重视，拜占庭在丧失广大土地之后，对回教抱着一种畏惧的心理，除了畏惧外，也没有更有效的政策。

教会从一开始，就不曾经历过地理界限的障碍，但是，回教势力兴起以后，包括整个地中海岸与阻隔近东的南方界限，已然形成了，而这一条界限还一直伸展到罗马附近，使教会的地理重心向北推移到了高卢。凡是阿拉伯人所占领的地区，基督信仰均逐渐消灭，并非由于被杀，乃是因为阶级低，被迫缴纳特种赋税，也不得担任政府官职。公元第八世纪，非洲的教友若不改信回教便被放逐，于是主教区大部份都消灭了，教友们的生活也被窒息，回教势力的扩展对教会所造成的恶劣后果，就是为教会设立了一道界限，阻止了教会的发展，被回教徒占领的地区，不但回教徒的归化非常难，天主教的传教士不能穿过这界限向非洲、亚洲去发展，直到新航发现后，圣教会才绕道到非洲、亚洲传教。再就是，西方与拜占庭的隔膜，因为阿拉伯人而更为加深。失去了很多优良土地的拜占庭，已经变得狭小而贫穷，必须以阻止阿拉伯人进占小亚细亚作为重要的任务，因而对西方失去兴趣，使得拜占庭在西方形成了鞭长莫及的无力感。西方也因为在地中海航道上已无立足之地，而置拜占庭于不顾，两者之间也就出现了，有如无人地带的巴尔干半岛，造成日后的斯拉夫人入侵巴尔干，建立了斯拉夫人的帝国，他们时而亲西方，时而亲东方，使得东西之间的隔阂更加的扩大。

2 封建时代

2.1 封建时代教会的衰颓时期

2.1.1 封建时代的概述

在教会历史时间的推演下，进入新的年代、新的内容，要以第九到十一世纪的欧洲历史的推演，也就是进入封建时代。就在这个背景下，来探讨教会由盛而衰，然后走向改革的情形。

首先来看看公元第九世纪第一波的蛮族入侵的情形。查理曼的帝国，是完全寄托在皇帝的人格和能力上，因此，查理曼本人一死，帝国便土崩瓦解，整个西方又陷于争夺混乱的悲惨状态，在内战的扰攘中，又加上第二波蛮族入侵的恐怖，他们为患的情形远比过去日尔曼人还严重，这批新的蛮族，最初以劫掠为主，加洛林王朝沿海地带以及内陆河川流域，几乎没有一处能幸免，加洛林帝国的政府既没有能力保护人民的安全，地方权贵也就纷纷而起，他们只巩固各自的势力，结果呢，在第二波蛮族侵略结束后，封建制度在法兰西、在意大利已经成为固定的事实，而在英格兰和日尔曼，也在逐渐的发展。

在压迫帝国南部的是，信奉回教的萨拉森人，他们发动最早，为时最久，活动于法兰西的西南部和意大利半岛，及西地中海的海上，公元 831 年，攻占西西里岛，公元 900 年左右，征服了萨丁尼亚岛和科西加岛，东西贸易受到严重的打击，地中海的交通全部被回教徒所控制。

从第七世纪以来，以北非为基地的回教海盗，就已经开始不断扰乱地中海的西部海面，第九世纪时，他们开始转移到西地中海诸岛，从此，法兰西和意大利就不断的受到他们周期性的劫掠。公元 846 年，罗马城被抢劫一空，连圣伯多禄的墓地都被回教徒所亵渎，卜西诺山上的圣本笃会院也遭到蹂躏，为了巩固防守，当时教宗利奥四世筑起城墙环绕梵蒂冈和圣伯多禄大教堂，到了教宗若望八世的时候，一面以金钱向回教军队交换罗马的安全，一面建立海军以减轻意大利沿海城市所受的损害。

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亚人在第九世纪时，不断的扰乱帝国的东境，摩拉维亚人更不断的劫掠东法兰克王国，保加利亚人来自中亚细亚，进入巴尔干半岛，一度曾攻打到君士坦丁堡附近，还以打游击的方式侵略东法兰克，公元 871 年，保加利亚的国王接受了拜占庭东正教，侵略才告停止。

公元第八世纪末叶，北欧海盗日益猖獗，扰乱西欧沿海地带，他们也被称为维京人，乘着高大而迅速的帆船，出入大江小川，给西欧人民带来了空前的恐怖。公元 787 年开始，袭击英格兰岛，几座著名的修道院先后被洗劫，到了查理曼大帝的晚年，维京人开始扰乱法兰克沿海地带，从此，劫掠的行为一年猛过一年，人数也一年年的增加，所蹂躏的范围也逐年扩大，他们既以抢劫为主，所以，他们常绕过防守坚强的城镇，而集中力量于乡村，首当其冲的是，那些大型修道院和大教堂。圣堂和隐修院中珍贵富丽的圣髑、宝匣、烛台等圣物，是他们抢劫的对象，修士们在恐怖惊悸之下，往往只带了圣人们的圣髑逃了，圣堂、修院也只好任他们焚烧毁坏了。而王侯们又忙于同室操戈，宁愿以金钱贿赂海盗们离开，而不努力抵抗，整个西欧几乎成了浑沌世界，风俗败坏是自然的。有一段话形容了当时的情境：“城郭丘墟，修院焚毁，国已不国，人皆为所欲为，天主的诫命、国家的法律、教会的规矩，都被抛弃，强凌弱众暴寡，教会财产抢劫一空，简直就是一个肉弱强食的世界。”

大致说来，北欧挪威人攻击苏格兰、爱尔兰以及附近岛屿，以后又远至冰岛、格林兰岛和北美洲；丹麦人活动的地区是西欧的沿海地区，从北海南下到直布罗陀，没有一处能够幸

免，此外，还包括英格兰；至于瑞典人，则采取东方路线，从波罗的海经过俄罗斯的各个河川直达黑海，一度还曾到达君士坦丁堡，和经由直布罗陀而东来的维京人相会。总而言之，整个欧洲，只要是船只可到之处，没有能幸免于这班通称“北蛮”或“维京人”的威胁。直到第十世纪，法兰克人改用以夷制夷的对策，将塞纳河下游地区以后，又扩大到包括现在诺曼地在内的地区，割让给维京人的酋长罗鲁和他的部属，后来罗鲁和他的部属百姓改信基督教，成了法兰克国王的附庸，从此逐渐的被同化，终止了一百多年来维京人在西欧的侵略。

北蛮不仅接受了基督教和希腊罗马文化，而且，又是热心的传教士和文化的传播者，公元一千年左右，由于他们和其他传教士的努力，整个北蛮的故乡，斯堪地那维亚半岛投入了耶稣基督的怀抱，而成为基督教世界的一部份。

2.1.2 封建时代的社会关系

查理曼大帝死后，加洛林王朝也就步向衰退，代之而起的是封建列国，由日尔曼蛮族和罗马因素混合而成的中古社会，称为“封建社会”。封建制度，使得中古社会不同于过去的罗马社会，也不同于以后的近代社会。欧洲历史上的封建制度，影响到当时的各种生活方式，例如经济、社会、政治、司法，当然啦，也包括了宗教。

当时的政府无力捍卫人民抵抗侵略，人民便自己投奔于大地主的保护下，地主负起了保护的责任，乡村农民及工人对这些领主发誓，效忠于地主，这种新的社会制度便这样在欧洲逐渐形成，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封建制度”。每人都隶属于一个领主，而领主往往又都属于更高的领主，一切领主在名义上仍然隶属于一个国王，领主们为了保卫领地而有“骑士”为他效命，为了酬谢“骑士”，又以土地作为“采邑”。总之，封建制度下，人与人之间，因着土地的从属关系而形成阶级，每一个领主所辖区域内的行政几乎完全独立，不受干涉，可以自己铸造钱币、征募军队，征收赋税，审断诉讼，其甚至是为自卫而宣战。封建制度，可以说是，因应当时的需要而产生的，当时的教会，自然也被卷入了这种制度之内，当人民被侵略的怒潮所追迫，而自动投奔修道院或主教跟前，请求保护时，修道院或主教当是怀着怜悯的心，负起保护的责任，这种保护便无形中成了封建的契约。当主教或修院投奔一位更高、更强大的领主，而接受他的保护时，也便成了更高更强的领主的附庸。在封建时期，主教和规模比较大的隐修院的院长都成了领主，他们也一如世俗领主一样，有他们的领主，因此，也得委任官吏治理他应保护的辖区，所他们也都有属员，有农奴，也审理诉讼，他们几乎都是身兼教会的神长和世俗的长官。教会和当时的封建社会之间关系，是如此的混淆不清，自然也就难免陷于利害的冲突而来的磨擦之中，教会若能影响封建社会，是一种幸运，封建社会若影响了教会，便祸乱不停了！

在所谓领主内，还残存着蛮族侵略者的势力和粗暴，教会常努力设法化除他们的粗暴习俗，当然那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要想改善一个民族的思想习俗，真是谈何容易啊！教会用道理去熏陶、去说服、去感染，希望能杜绝一切抢掠劫夺，以及领主之间的战争中，所发生的恐怖暴力行为。

封建贵族的首要任务是战争，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而战争，可是，实际上，却大都是为私利或私仇而战。私战是封建时代最大的灾祸。土地界线的争论、附庸关系的破坏、家仇、私怨、贪婪，甚至还有在闲极无聊时，都足以掀起彼此间兵刀相见。中古骑士的战争，伤亡的成份少，但财产破坏的成份多，而受损最严重的，当然是乡村的贫苦百姓。除了战争中双方彼此厮杀之外，庄稼被破坏、农奴被骚扰、被蹂躏，全身披挂着甲冑的骑士们，既不易为刀剑所伤，交战双方也都宁愿活捉敌人，好能换取赎金，总之，在贵族来说，战争是一个“有厚利可图”的行业，胜利者可以获得丰厚的战利品，即使是失败者，也可以压迫农奴分担自己的损失，何况，来日方长，可以等待一个更有利的报复机会。试图消弭领主之间的战争，是教会一直努力的目标，教会先试图建立所谓“天主的和平”，禁止某些阶级、某些地方打战，例如，不可攻击神职人员、商人、乡民或贫穷的人，或是非战斗人员，以保障他

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可惜效力不彰。到了第十和十一世纪，教会又规定了所谓“天主的休战”，指定一年之中的某些日子停止战争，若有违规者，就应开除教籍，那么，那些日子应该休战呢？像是，每星期从星期三晚间到星期一早上；每年的“封斋期”、“将临期”以及“大瞻礼日”，这两种禁令，始于私战最频繁的法兰西，然后传播到欧洲其他地区，传到英格兰后，这两种禁令就由国王来执行，效果也比较好。无论如何，我们明白了教会在这方面的苦心，就可以想像私战所造成的灾祸。教会虽然厌恶流血，始终难以消弭一切私战，唯一有效的方法，只有增强国王的权力，才能制止封建战争，或是结束这种战争。消除私战的真正有效力量是12世纪以后，王权的扩张，但是，整个封建时代，私战始终是一个不能完全解决的问题。教会所推行的“天主的和平”、“天主的休战”，的确减少了许多争斗。别外呢，教会也推动了一项“骑士制度”，也减低了战事的残酷。骑士普通多是贵族出身，顾名思义，当然是一位骑马的武士，当他到达成人的年龄时，由一位贵族为他举行隆重的授剑礼而成为骑士，原本是一种世俗的组织。为了能做一名骑士先应当接受训练，学习作战的技术，然后受到教会的影响，礼节趋向宗教色彩。骑士在准备接受骑士锡封典礼的前一天晚上，准骑士应先行沐浴，这不仅是指身体的清洁，沐浴，在当时是件不太寻常的事，也象征心灵的清洁，然后就到教堂去守夜祈祷，第二天清晨先参加弥撒，由主祭者祝圣他的佩剑，准骑士宣誓忠于教会决不怯懦，保护穷人和孤儿寡妇，要勇敢、正直、决不抢掠，并且忠于自己的宣言，然后穿上新的甲冑，佩上宝剑和马刺，跪在主祭者面前，接受按颈的仪式，最后，这位新骑士走出教堂，上马急奔，用长枪投向系在柱子上的盾牌或枪靶，骑士的“锡封典礼”才告完成。这是一般的骑士“晋升典礼”。在特殊情形下，因为侍从的出色表现，也有在战场上立刻被领主或国王晋封骑士的，不过，这是例外，不是常规。

骑士，是绅士，因此，礼貌是他的美德，是指仪表和态度上的合乎宫廷礼节，最重要的一项，是对妇女尊敬慇勤，有助于使封建社会的生活，随着从简单粗糙进到温文优雅，因于崇尚女性，以及妇女的社会活动范围的逐渐扩大，影响了贵族生活趋向礼节和斯文。骑士是一位标准基督徒，所以他在生活上不仅应该恪守教规，而且，应该是一般凡大俗子的模范，因为他是军人，他应该保护教会，抵御强敌，因为教会在当时环境下，需要一批忠于职守，信仰坚定的骑士来安定动荡的社会。

2.1.3 封建时代教会内的阶级

封建社会里的另一个领导阶级是教士。所谈到的教士，采取的是广义的说法，那就是包括在俗的教士，以及隐修院的修士们。在俗教士们是在社会上工作，与俗人为伍，所以，称之为在俗教士。除了教宗以外，下有总主教，主教，教卿，他们被称为高级教士，下有堂区神父、辅祭、副祭及其他基层神职，而修士，则是退隐在修道院内，与世俗隔绝，原则上不直接从事传道工作，这时候的修士，以本笃会为主。到第十世纪初，才有克吕尼等类似的修道院。中古时代的教士，尤其是高级教士和修道院院长，他们不仅是宗教领袖，又是政治上的领导人物，换句话说，他们不仅是人们灵魂的领导者，而且，也是肉体的统治者。推究其原因，是因为教会封建化，高级教士成了政治上的贵族和经济上的地主。教会拥有广大的土地，其中很多是来自王公贵族所赠送的土地，他们赠送土地的目的，有的是为纯宗教的服务，例如为施主及家属祈祷献弥撒等，有的呢，也是纯俗世服务，和一般采邑没有分别。领有采邑的教士，对赠送土地的施主而言，是他的附庸，有他的各种权利和义务，因为有些义务，像军役，就不是教士能够亲身履行，这项义务是违反教会法令法规，虽然主教率领军队参加战争的例子也不少，在这种情形下，教士于是将土地分给其他贵族，以获得军事上的服务，这么一来，主教就成了领主，就有了领主的各种权利和义务，主教既然是如此，修道院的院长亦复如此，他们都有“宗教领袖”和“封建领主”或附庸的双重身份。此外，其他的教士，从都市主教座堂的教卿，到穷乡僻壤的神父都接受一种类似采邑的“赐地”或“俸给”，以维持自己的生活，当然也必须履行某些义务作为交换条件，比如说，一位领主在自己庄园捐

地建造教堂，附加一块耕地，耕地的收成和教堂所收的十分之一的税，足以维持一位神父的生活，中古农村的教堂大多是这样开始的，服务于这种农村堂区的神父难免要受到施主的控制了。封建时代是一个强调人际臣属关系的时代，教会内部的组织也受到封建制度的影响，主教要求他的教卿或是其他教区内修道院院长的服从，同样，一个更有权势的教卿，又可能另有一个教卿成为他的附庸，而乡村神父又往往称附近修道院的院长为领主，因此，这时期的教会，不仅和俗世贵族发生封建上的关系，他自己与各级教士之间的关系也都已经封建化了。

教会封建化和教士卷入封建关系之后，首先产生的问题是：“如何来调和一位教士的两种不同身份？”一位教士如何履行封建义务，而又不影响他原本属于宗教的任务呢？更具体来说，一位主教，如何能忠于他善牧的神圣职守，而又做一个合乎当代封建理想的领主或是附庸？这些都还是表面上的问题，它们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基本的问题，那就是：“教士的任命，以及他就职后的行政，是否能够完全独立，不受俗世力量的左右呢？”这是封建制度下教会的核心问题。十一世纪中期以后的“俗人授职的冲突”，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发生的。

实际上，由于教士的任命不能完全自由，所以产生了，教会神职任用非人的现象，同时由于教士的任命往往操在俗人的手里，因而又发生了买卖神职的弊病，教士生活腐败和买卖神职，是封建教会的两大祸毒，也是十一世纪中期，教会企图改革的对象。

无论如何，封建化了的教会，虽然产生了许多弊端，因而影响教会组织的健全。一般来说，稳定封建社会的力量，仍然还是教会。诸如，私战的减少、骑士精神的提倡、妇女、孤儿、弱小的保护等，都在教会的推动下逐渐完成，而且整个封建制度是树立在，领主和附庸两者之间互许的信誓上的，而信誓的神圣和约束力量，则又靠教会来维持。因此，如果没有教会，整个封建制度势必瓦解。再说，在政治分裂，经济闭塞的封建社会，统一这个社会的力量也是教会，尽管封侯骑士各自为政，他们都属于同一个教会。查理曼的“基督教共和国”虽然是昙花一现，但是，它的理想，还是继续存在，而第十世纪，神圣罗马帝国，就是这个理想的再现，这时的社会逐渐基督教化。从第十世纪后，欧洲社会又得到一个新的名字“基督教社会”或“基督教世界”。统一这个分裂封建社会的还是“封建化”的基督教会。教士，既然是领主或附庸，所以教士的任命，当然就成了很重要的问题。我给各位举个例子说明一下，那就会更清楚了。比方说，某教区的主教，也是某领主的附庸，对领主来说，他决不愿意一位仇家来做该教区的主教，因此呢，他必尽力给予影响，甚至要控制主教的人选，换句话说，在任命教士担任某项职位时，教会无形中丧失了它的独立和自由。其他教士的任命，影响或不至太严重，如果，主教及院长的任命，落入俗人之手，其后果是可想而知了。俗世政权选择教士的习惯，并不起源于封建时代，地主捐献土地为盖圣堂，选择教士来主持，这种惯例可以追溯到初期教会的“堂区制度”，至于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呢？教会法律规定的程序是选举，主教是由所在地的教士和教友们推选，院长则由该修院的修士推选，主教人选决定后，再由罗马教廷批准任命。但是，早在帝国时代，西方的皇帝，已经间接以政治力量来左右选举；东方皇帝则是直接安置自己的人选。后来，日尔曼人所建立的各国国王，都采直接任命主教的方式，修道院院长的任命，虽然不是直接受制于皇帝，但是，创立修道院的望族，往往保留任命院长的权力。总而言之，无论大自主教、院长，小至乡村神父，除了他们的宗教领导力量之外，都拥有相对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俗世政权绝不会等闲视之，而不想加以利用的；利用的最好方法，就是控制教士的任命，“加洛林王朝”时，国王任命主教，已经是大家默认的惯例，到了第十世纪末和第十一世纪初，这样的惯例，已经普遍的被罗马教宗和地方主教所接受了。

在封建时代，任何一种持用权，一块土地、一项权利，或一个职位，都借用一件物质的东西来做这个持用权授受的象征。当一位教士，被俗人任命为某教堂主持人，某教区主教，

或某修道院院长时，所举行的典礼就称为“授职礼”。在“加洛林王朝”时，授予主教职位的象征是“权杖”，以后又加戴“权戒”。在任命一位主教时，有两种必须举行的礼节，一个是“祝圣礼”，是纯宗教仪式，使某人获得主教的身份；另一个是“授职礼”，本来也是宗教仪式，使某人获得具体的职权，做某一教区的主教。自从教会卷入封建制度后，主教的职权，不仅包括宗教方面的“神牧权”，而且，也已包括俗世方面的“领主”，“授职礼”因而也包括“神牧”和“领主”两种职权的授予，而且，逐渐由俗人来执行，换句话说，“祝圣典礼”和“授职典礼”分了家，“祝圣礼”由教会举行，而且，“授职权”由俗人来举行，所以称为“俗人授职礼”。

俗人不能举行“祝圣礼”，在这方面，教会是完全自由。可是，俗人可以利用“授职礼”来影响一位主教的任命，连带的也影响到，一位主教候选人是否能够获得祝圣。因为俗人可以预先表明自己的立场，他喜欢的、受他欢迎的，他就为这位主教举行“授职礼”，不欢迎的，就拒绝举行“授职礼”，所以俗人“授职礼”问题的焦点是：主教和其他教会职位的人选，是否脱离俗人的控制，而能完全自由安排教会内的神职人员，何况，事实上，国王和其他领主，往往毫不犹豫地，直接推出自己的人选。再有就是，接受任命的教士，对他的领主有效忠和服务的职责，借所谓的“臣服典礼”来表示，而“臣服典礼”本身就含有隶属的意义，那么神权属于俗权，则成为很自然的结论。教会，是否永久接受这种政教关系呢？这就是俗人授职所产生的又一个严重的问题。俗人控制神职人员的人选，还产生一些严重的道德问题，如果，一位领主在任命一位主教或院长时，能以教会的需要和好处为前提，考虑到候选人的学识、品德、才能等条件，那么连最支持教会行政独立的人士都还可以勉强容忍，但是，在历史上，事实并不是这样，封建时代神职的分配，就和普通采邑的分配一样，往往就变成了政治上或是经济上的交易，领主所考虑的是政治和经济上的利害，而不是考虑教会职权的神圣性和候选人的资格，是否符合所应负的责任，所以呢，领主往往把主教的职位授给自己的亲戚，或酬劳对自己有功的部属，甚至变成公开的买卖，能出高价钱的就得到主教的职位，当一位以高价买得主教职位的人，他就职以后，当然就会在最短期内，收回自己的成本，因此在他以下，又开始了一连串的“神职交易”，参与这种“神职交易”的人，往往会为自己辩护，认为自己所买卖的，不是教会的神职，而是物质财产，当然，这只能说是一种诡辩。从最高的国王到最低的乡村神父，直接或间接都被卷入这种漩涡中，其中有的，或许没有直接从事神职贸易，但是以广义而言，他们授受神职，是以个人利益、家庭关系、政治目的，来作为取舍人选的标准，在当代卫道者心目中，这种取取舍人选的标准，实际上和以金钱来买卖神职，没有任何的区别。

封建化以后的教会，教士的任命大权落入了封建领主之手，使得俗人掌握了教士的授职，国王和其他的领主，往往毫不犹豫地直接推出自己的人选，这么一来，主教及其他教会职位的人选，始终无法脱离俗人的控制，教会失去了完全的自由，接受任命的教士，又得对领主效忠和服从，那么也就隶属于领主，也就造成了“神权属于俗权”的事实。另外，俗人控制神职的人选，产生了严重的道德问题，因为领主们所考虑的是政治、经济上的利害，他们将主教的职位授给自己的亲友，或是酬劳有功的部属，甚至公开拍卖，出高价者，就得到神职，开始了一连串的“神职交易”，换句话说，他们所授受的神职，以个人利益、家庭关系、政治目的，来作为取舍的目的。

2.1.4 内忧外患的教会

下面谈谈由俗人授受神权、买卖神权，所组成的教会，出现了那些流弊，对教会构成了那些威胁？可以说那真是教会史上的黑暗时代，下面就欢迎您收听，教会史上黑暗时代的林林总总。在封建时代中，教会也跟着封建化了，所以无论用什么方式，俗人控制教会职位的任命，都产生许多相同的流弊。选贤与能，原本是教会的一贯原则，但在俗人控制教会的情况下所产生的教士，要求他们既贤又能，这谈何容易！这种陋习导致了神职人员道德水准的

低落，许多没有圣召而贸然接受神品的人，仍然继续度他们的世俗生活，因此“教会法典”对神职人员的要求，也逐渐成为具文，甚至有不少神父忽视拉丁教会好几个世纪以来的禁令，有公然结婚生子的，有私生活糜烂不堪描述的，根本就忘了自身的神圣使命，还有一人数职，或是缺职、怠职等流弊，神职界道德的堕落，自然是不在话下，教会的一切，已经与封建制度混而为一了。教会的地产也一如采邑一般，自由处理，主教、院长、神父、修士等，有供给骑士，甚至还有亲自领军，或服从领主去参加封建战争的事情。教会的使命原本是要改造社会的，反而被俗化、被同化了！俗人干涉教会内政，教士之被迫参与俗务，以及教士们素质的低落，仅只是封建化的教会，所面临的许多问题的一部份，至于因而产生的“反教士情绪”，低级教士嫉妒仇视高级教士，以及异端邪说之流行等，影响所及，可以说是既深且远。封建时代的教会，正面临着种种的危机！这些危机，因为罗马教廷本身的混乱，而更为严重，导致了教会的颓废腐败，封建时代教会的腐败，固然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等背景所造成，而罗马教廷没有能力领导，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领导“基督教共和国”的是查理曼本人，而不是罗马教宗。查理曼死后，帝国也就开始崩溃，“基督教共和国”也连带的受到影响而呈现了衰落的现象。被称为“虔诚者的路易”和继承人洛塞，虽然有保护并控制教会的雄心，但是，他们究竟不是查理曼，缺乏实力来执行。接二连三战争，诸侯的分立，查理曼大一统的理想，绝对不是他们所能维持的。第九世纪的许多学者，都一致认为罗马教宗应该负起这个责任，很不幸，这个时代的教宗却大多又是庸碌之辈，不能发挥领导的作用，逐渐形成教宗权威的低落，第九世纪中，值得一提的教宗，有利奥四世、尼各老一世。下面，我就为各位分别叙述这两位教宗任内的作为和绩效。

教宗利奥四世在位的时间是公元 847 年到 855 年，首先防范萨拉森人的攻击。公元 846 年，罗马城遭到洗劫，利奥四世为了便于防守，修筑城墙环绕梵蒂冈和圣伯多禄大教堂，公元 849 年大败萨拉森人于奥斯迪亚附近。

教宗尼古老一世，从公元 858 年起至 867 年，担任教宗的职位，因着他的努力，罗马教廷暂时负起了领导的责任。例如，由于保加利亚的隶属问题，以及拜占庭宫廷助理巴氏被京都宗主教依纳爵开除教籍，因而使依纳爵遭到革职放逐的命运，同时任命俗人佛西乌斯继其位，依纳爵遂向教宗尼古老一世请愿，教宗尼古老一世立刻提出抗议，宣布佛西乌斯的当选为非法，并且开除了佛西乌斯的教籍，他这种不屈不挠的卫道精神，的确表现出他是整个基督教会领导者。尼古老一世另外一次维护教会法规的努力是加洛林王国的国王洛塞的离婚事件。洛塞是查理曼的曾孙，他遗弃了王后，公然和情妇由同居而正式结婚，不但一般法兰克的主教们不以为不好，连受命处理这件事的教廷代表，也因接受贿赂而声明他们的婚姻是合法的。教宗尼古老一世在知道了这事件的经过后，就在 863 年把洛塞罢免，还把参与这件事的人开除教籍，皇帝路易二世虽然施展政治的压力，教宗始终不为所动，僵持了好几年，最后还是洛塞让步，痛悔前非。尼古老一世为了维护教会的纲纪，竟而不惜触犯国王的气焰，真是这时代前后两百年中所仅见的，因而他有厄里亚第二的赞誉。在他任内，还使好几位已经离开的主教重新服膺教宗。第三件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布尔加人在多瑙河下游定居，接受了基督的信仰，教宗尼古老一世派遣教士去布尔加人中讲道，训诲布尔加人，而讲道的内容，直到现在，仍然具有神学上的价值。

教宗尼古老一世的成就，仅仅只是他个人的成就，从公元 867 年到 1049 年，罗马教廷已经完全为外来势力所包围，坠入混乱的陷阱，连自保都已不可能，也就甭提领导地教会了。包围罗马教廷的外来势力，其中之一是罗马贵族的专横，任意的拥立教宗，控制了教廷的内政，以达到他们各自的私人利益。第二个势力，来自第十世纪中叶以后，日尔曼皇帝的政策，他们希望籍教会的力量，来复兴查理曼的“基督教共和国”，这是教会历史上最混乱、最黑暗的一段，我只作简短的描述，为的只是作为说明到了十一世纪中叶，教会革新的背景。

查理曼帝国的逐渐瓦解，固然使义大利陷入孤立的局面，但是，更不幸的是，义大利本

身又没有能够产生一位，足以维持权威和秩序的人物。路易二世，他是查理曼帝国最后一位在义大利稍稍具有实力的皇帝，但当时回教徒不断骚扰半岛的沿海地带，使他消耗了大部份的精力。路易二世去世以后，北部的法兰克贵族和南部的伦巴贵族分地割据，各自为政，同时回教海盗继续洗劫沿海地区，而马札儿人也在第九世纪末，深入到半岛的内陆，在这种内战、外乱交织的情形下，罗马教宗权力的衰落，还是必然的结果。教宗尼各老一世虽然一时振兴了教宗的威望，但已是积弱太久，回生乏术了，义大利的贵族，对教宗本来就不很尊敬，这时，他们更乘机侵占教会的土地，甚至还不断劫掠罗马城。在过去，教宗可以向法兰克王乞求救援，可是，第九世纪的后半期，法兰克王自顾尚且不暇，那里还有余力来兼顾保护罗马教宗呢？当教宗若望八世，迫请西法兰克王“秃子查理”来义大利时，查理除了接受教宗为他加冕的皇冠以外，就匆匆北归，回去对付他国内的叛变，教宗既缺乏强有力的外援，就只有就地寻找有力的盟友了，结果是合纵连横，被卷入了义大利以权术为主的党派政争之中。教宗必需依附强有力者以自保，而各个权贵，也以教宗的职位为猎物，只要能控制罗马教宗，当然也就能成为义大利半岛的盟主。我就以公元 891 年到 896 年之间，在位教宗福尔莫索斯的遭遇，来说明这个时期罗马教宗所处的困境。教宗福尔莫索斯为了打击敌人，他邀请日尔曼国王阿奴弗到罗马来，接受教宗为他加冕。公元 896 年，阿奴弗一如过去的“秃子查理”一样，除了加冕以外，别无贡献，但是，这件为阿奴弗王加冕的事件，引起了罗马贵族的反感，阿奴弗北返以后不久，福尔莫索斯也就去逝了，鲍尼法斯六世在位仅仅两个星期，史提芬六世继位，在各方面的压力下，竟然对已故教宗举行审判尸体的惨剧。福尔莫索斯的尸体被抬到公堂上，聆听罪名，接受判决，尸体上教宗的衣冠，一件件剥除，象征革除他的神职，教宗用以祝福的右手三指，也被割去，然后游行示众，最后，教宗的尸体被丢进台伯河里。不久，史提芬六世自己也被勒死在监狱中。像这种惨无人道的事，竟出现在号称神圣的罗马教廷，那么，罗马教廷声望之低落已是不可言喻了！

从教宗福尔莫索斯之死到公元 960 年的 60 年间，控制罗马教廷的是德菲拉家族。德菲拉原是拖斯古龙地方的贵族，在第九世纪末，受命管理拉温那城，自称罗马元老。他的夫人和女儿玛罗琪亚控制了整个罗马教廷，这期间的教宗大多由母女二人所造成，其中教宗若望十一世还是玛罗琪亚的儿子。公元 932 到 954 年，罗马的风云人物是玛罗琪亚的另外一个儿子亚尔培利克，他自称是全罗马人民的君主和元老，临死以前，还留下遗嘱，要他的党徒拥立自己的儿子为教宗，他就是若望十二世，是所有教宗当中最微不足道的几位之一。

公元 962 年以后，罗马的政治有了新的变化，而教宗所受的外来压力也改变了来源。为了摆脱罗马贵族的控制，以及对抗义大利王培伦格的侵略，若望十二重复加洛林王朝时对教廷的政策，向日尔曼国王鄂图一世乞求援助。若望为鄂图一世加冕，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的开始，给久已深陷于混乱的罗马，又增添了新的混乱因素。在鄂图受封以后不久，若望十二忽然改变初衷，转而联合鄂图的仇敌，企图推翻自己所立的皇帝。鄂图兵权在握，立即召开教务会议，将教宗免职，另外立了利奥八世。不久，鄂图离开罗马，若望十二又乘虚而入，召开会议，声明利奥八世为非法的。几个月以后，若望去逝，本笃五世继位。一个月后，鄂图率军回罗马，扶持利奥八世复位，而将本笃五世充军到现在德国境内的汉堡，以终余年。从 963 年的十一月到次年的六月，竟有若望十二、利奥八世、本笃五世等三人先后担任教宗之职。从公元 963 年到 1049 年中的二十多位教宗，不是罗马贵族的产品，就是日尔曼国王所一手造成，教宗之选举如此，教会行政之不能自主，我们也就可想而知了。

从公元 963 年到 1049 年中的二十多位教宗，不是罗马贵族的产品，就是日尔曼国王所一手造成的。而这二十多位教宗，大多数又都是庸碌之辈，不足以领导教会。鄂图一世和鄂图二世都曾干预宗座事务，但是他们都因中年早逝而无所成就，鄂图三世缺乏坚强个性，然而他能利用先祖们所遗留的皇冠与尊荣，比前两位皇帝有更大的建树。公元 996 年，教宗若望十五去逝，鄂图三世赴罗马，罗马人要求他指定一位新教宗，鄂图三世那时才十六岁，虔

信基督，曾经受到当代名师的熏陶，是一位憧憬古罗马帝国的热情而有理想的人。他任命他的宫廷司铎，也同时是亲戚的堂兄勃鲁诺为教宗。新教宗只有二十四岁，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与鄂图三世志同道合。他继承教宗职位后，取名为额我略五世。很不幸于公元 999 年，正当迈向锦绣前程的时候，撒手归天。鄂图三世接着又任命了他自己的老师为教宗，他呢，就是西尔物斯德二世。他是法兰西人，曾经是兰斯与拉凡那主教，学识渊博，是那时候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有“魔术师”的雅号，也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可与额我略五世相比美。他之所以取名为西尔物斯德，是要影射自己和鄂图三世的关系，就好像公元第四世纪时的教宗西尔物斯德一世和君士坦丁大帝的关系。无疑鄂图和西尔物斯德两人，都有改革教会、复兴基督教共和国的雄心。可惜，合作的时间过于短促，没有留下什么持久的影响，而西尔物斯德毕竟是出于鄂图的任命，罗马教宗之隶属于日尔曼神圣罗马帝国，并不会因为两人的师生关系而有所改变。鄂图三世的继承人也以他的政策为蓝本，控制教会，任命教宗，尤其是亨利三世为最严重。1045 年，亨利曾将三位教宗解职，而代之以自己的人选，在当时这是一件不得已的事，但是，教会内部的问题却必须借助皇帝来处理，也就可见教宗领导权的衰微与教廷组织的不健全，而这种急需革新的局面，已经是目共睹的了。

2.2 封建时代教会的改革时期

2.2.1 修道院的革新

我们不能用现代的标准来评论或衡量封建制度下，教会内的这些令人感叹的历史事实。在今天，如果宗座不稳定就会影响到普世圣教会，但是，那个时代教会没有敌人，也没有什么严重的反抗活动，从另一方面来看，其他信奉基督的地区，对罗马的事漠不关心，也是我们不能想像的。常言道，“物必先腐而后虫生”，教会的衰颓，给世俗权力造成了干涉圣统制的机会，时代的灾难、侵略、战争、饥饿遂使灵性生活的发展大打折扣。第十世纪被称为教会的“黑暗时代”，也被称为“铁的世纪”，真是流弊丛生，腐败至极，在这种危险重重的情形下，如果是纯人为的机构，无疑的非灭亡不可，但是，教会一直到现在，还依然存在，而且还更加的发展。我们应当注意的是，我们的教会，是天主亲自所立的教会，就是当她认清了自己的责任时，面对压迫教会的恶势力，信赖天主的大能，坚强奋斗，因为要使教会存在并发展的，是天主自己，而且也必定成功。我们也可以把一部教会历史，比喻成“旅途中的教会”，教会是在不断的探索中前进的。有人把教会史比喻做是一首交响乐，在一定的时刻出现新的乐章，加入新的乐器，它们有时单独演奏片刻，然后又加入不断进行的乐队，有一种是开始的时候在沙漠里演奏，而后又充满整个宇宙的乐器，这便是克吕尼的隐修院。可以这么说，面对教会的颓废腐败，地方教会多次集会讨论改善之道，主教们也起而与购买神职品位的恶劣风气奋斗，整顿神职界。但是，决定性动力还是起自隐修院，在动荡腐败的封建社会里，隐修院成了真正的世外桃源。对内，可以喘一口新鲜的空气，对俗世的腐败感觉厌恶痛心的人，几乎都退隐到旷野里，度独善其身的生活，专心祈祷补赎，其他的人闻风而至，去追随他们的芳表，请求收为门徒，例如 1012 年，圣罗慕亚在义大利创立嘉玛道力修会，圣若望·卦尔白在 1039 年创立瓦龙伯·罗沙修会，这些隐修院的影响很有限，但是，在法国心脏地带，距离里昂八十公里的克吕尼隐修院却是光芒四射，遍及西欧。下面一小段音乐之后，我就为各位介绍教会革新的先峰克吕尼修道院。

教会内，早在第十世纪初，已经开始了一项革新运动，它直接的对象是修道院的生活，但其影响所及则是整个教会和罗马教廷。公元 910 年，阿奎丹的威帘公爵，捐出他在克吕尼的土地，建立了克吕尼修道院，根据当初建院大事录的记载，克吕尼不隶属于任何俗世的权威或主教，而直接属于罗马宗座，因此它得照例缴纳中古时代所规定的税额，每五年纳五个

金币，作为罗马宗徒坟墓前所点燃的油灯的费用。修院直属于罗马宗座的事，克吕尼并非为首创，但这也是克吕尼所散播的“绚烂的未来”的种子之一。克吕尼隐修院从一开始就直属宗座，而不依附私人力量，以当时的社会环境而言，是具有重大的意义，它的目标之一，就是要使教会从中古封建制度下解脱出来，这一所受宗座保护的修院是一个标记，它引发了宗座从俗世权力的桎梏中为争取自由而努力。克吕尼创建时，是教宗塞奇三世在位时，当时罗马的贵族“督斯古龙”伯爵大权在握，视教宗为其个人私有的囊中物，可以说是教会黑暗时代中最为黑暗的日子。

克吕尼的首任院长拜尔诺，立刻使克吕尼成为模范隐修院。在克吕尼隐修院最伟大的院长、可敬的“伯多禄”在任时，也就是公元 1122 到 1157 年之间，母院已有修士四百六十多人，各地的分院多至两千多所，其受人之欢迎，就可想而知了。克吕尼一反圣本笃的传统，有三项基本的改革，都是针对当时修道院的流弊。第一，克吕尼所接受的各种捐赠不论是钱财或土地，都是纯粹的礼物，而不附带任何的封建制的条件，因此，除了为施主祈祷献弥撒之外，克吕尼不执行任何封建式的服务，换句话说，克吕尼拒绝被卷入封建制度的漩涡中；第二，按照本笃会的会规，修士必须在田园工作，但是历代修道院所得到的土地，已有附属的农工人手，实在没有修士去亲自工作的必要，克吕尼为了补救这方面的缺陷，特别强调教会礼仪方面的举行，来补充修士每天生活的空挡，使修士不致游手好闲，由于克吕尼注意教会礼仪，连带也推行了宗教艺术，对建筑、绘画、雕刻、音乐等，都有很大的贡献；第三，克吕尼最重要的革新是中央集权制，本笃会的每一所小型修院都是独立的，修院和修院之间，除了精神上的联系外，没有任何行政上的关系，克吕尼则是相反，所有修道院都是分院，隶属于克吕尼母院，克吕尼院长也是各地方分院的最高院长，各分院的院长，得完全听命于服从母院院长。在欧洲到处都盛行分裂的封建制度时，唯独克吕尼能够实行中央集权制，这对后来教会和封建列国的中央集权，未当没有相当的影响！至少十一世纪中叶以后，教会各方面的改革，是受到了克吕尼的推动和刺激的。

当时有些和克吕尼没有联系的修院，也接受了克吕尼的习惯，得到克吕尼的援助而进入革新之途，其中还有些与革新的修院组成联盟，他们的重要性也与“克吕尼”相同。克吕尼的成长与它对整个教会所发生的影响，系于历任的院长的人格和他们漫长的任期，从开创之初到“可敬伯多禄”当院长，共计 250 年，只有八位院长，而在这同一时期，却有 52 位教宗。在克吕尼的八位院长，已有七位列入了圣品。克吕尼和它联盟的修院在他们领导之下，树立了继往开来、不折不挠的精神与坚定不移的目标。克吕尼也逐渐在教会中发挥了他们潜移默化的力量，克吕尼的修士祈祷时间很长，没有空闲的工夫做学术研究，贫苦百姓都信赖他们的祈祷，为亡者祈祷，是他们特别的意向，这和济贫，是他们经济的来源，信友们都乐于捐助他们，因为他们确实知道“克吕尼”不会忘记他们的亡者与贫者。公元 998 年，奥迪洛院长发起追思亡者的纪念日，圣教会也因而在 1030 年制定了 11 月 1 日为追思已亡节，一直沿用到今天。

克吕尼的革新运动到了十二世纪时的加伐院长任内，有许多附属修院分布在义大利南部、西西里和巴勒斯坦，总共有 29 座修院，90 座小型修院，三百四十座教堂，以及五千位修士，此后在西班牙、英格兰也都先后出现了克吕尼的革新运动。

除了克吕尼的修院之外，第十一世纪的另一种修院活动，是在义大利北部兴起的隐修团体，一部份也受了克吕尼的影响，所建修院，以圣本笃会规为基本精神，那就是前面我提到的圣罗慕亚于 1012 年，在义大利北部所创建的嘉玛尔道力隐修院。圣罗慕亚的隐修院彼此之间有一个简单的联合会，也完全受宗座的保护，他们的生活相当的严谨，因此，人数始终不多，但是，他们对十一世纪时的信德复兴，有很大的贡献，他们中间有一位彼得·达弥盎，他是教会革新运动的健将之一。

克吕尼和嘉玛尔道力，对教会的特别贡献，就是他们对天主高度虔诚的榜样。那时候，

不知多少的地主缺乏虔诚与责任，把主教，隐修院院长以及神父们看作是他手下的仆役，甚至在第十世纪的罗马、包括教宗在内，也缺乏虔诚和责任感。当然修士们沉默的榜样，不会直接带来人灵的救赎，罗马特别需要一位强有力的人物来促成革新行动。那么，罗马的教廷必然会有一番作为。

2.2.2 教会制度的革新

在封建制度下，教会受封建制度的影响，也趋向于封建化。由于教会的封建化产生了许多的流弊，步上了衰颓之路，有心之士已在第十世纪开始倡导改革，首先是修道院的生活，最有名也最具成效的是，法国里昂附近的克吕尼修道院，影响所及包括了整个教会，还包括罗马教廷。有关克吕尼修道院革新运动都作了介绍，下面是介绍在革新教会的工作上，最初的几位比较有名的教宗。

侵蚀教会的病根就是，在封建制度下所造成的流弊，那就是“俗人对委任神职人员的僭越”，唯一能革除这种流弊的，只能等待有魄力的教宗。公元 1049 年，教会开始了一连串的革新运动，内则清除教士生活的腐化，外则摆脱政治权力的控制。改革的中心人物是教宗额我略七世，因此也称之为“额我略改革”。额我略七世未当选教宗以前的名字是希尔德布朗。从 1049 年开始，他一直是罗马教廷推动改革的主力，所以呢，这个改革时代又称为“希尔德布朗时代”，尽管名称不一样，但都是同个主力人物。这次改革以俗人授职这问题为焦点，引起了空前未有的政教冲突，因此，又有“俗人授职冲突”之称。

参加这次改革运动的第一位教宗是利奥九世，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三世任命他的亲戚督尔的主教布鲁诺为教宗，取名利奥九世。利奥是最后一位日尔曼皇帝任命的日尔曼籍的教宗，他深切了解这种局面的不正常，因而决心从事教会的革新运动，对罗马教会来说，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逐渐重建它领导欧洲社会的地位。首先，利奥九世坚持在罗马举行正常选举，当他去罗马时，就把青年希尔德布朗带在身边，希尔德布朗那时还是一位隐修士，希尔德布朗事奉利奥九世及以后的几位教宗，直到他自己被选成为额我略七世为止，真可谓任重道远。利奥九世上任以后，带领着改革人员巡视欧洲，自莱茵河至意大利南部，凡是不能亲自前去的地区，便派代表前去，到处召集会议，训令改革。所召集的主教会议，除了在罗马之外，也在巴维亚、兰斯、美茵兹等地。在这些会议中，重申神职人员的独身制，也就是禁止教士结婚，禁绝神职和圣物的买卖，并且禁止一般教友直接担任神职，这样，整个西欧都明白了教宗已经决心整顿教会，铲除根深蒂固的积弊，这是一百多年来，第一次罗马教宗直接负起了领导的责任。革新之门已经开启，继任的教宗，要继续进行这个伟大的事业。

利奥九世去逝后，罗马教会不顾可能面临的日尔曼皇帝和罗马贵族的反对，立即进行选举，结果选出维克多二世，他向着革新之路继续前进。他在翡冷翠召开主教会议，重申神职人员的独身制，严厉惩罚违反独身制的教士，并且，重申禁上神职与圣物的买卖。两年后，维克多二世就去逝了，又选出史提夫九世，他在位只有几个月，罗马的贵族又重演专横的故技，推立本笃十世，当时希尔德布朗正在日尔曼，获得消息后，乃请求日尔曼的皇后安妮丝出面干涉，终于选出了合法的尼古二世。尼古在 1059 年上任以后，在拉特朗召开教务会议，讨论有关选举教宗的问题，以及教会弊端的革新之道。我们知道，无论何时，皇帝或权贵对选举教宗的大权把持控制，那么，对神职人员道德低落的奋斗，就不可能收到效果，皇帝或权贵所指派的教宗虽然有时很适当，像利奥九世。但是，谁又能保证他们不把国家或个人的利益放在教会之上呢？这种僭越教会权利的弊端，对教会造成的伤害实在太太大。尼古二世决心对症下药，在会议中颁布了《选举教宗条例》，建立选举教宗的法制，使外来的政治力量不得干涉。《选举教宗条例》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在程序上，首先由“枢机团”提名，再由枢机教士，包括神父和辅祭们附议，最后由罗马城教士和教民的欢呼赞同。其他还有两个附带的条件，一是，候选人以罗马教区的教士为先，否则，其他教区的教士也行。二是，选举以后将经过情形报告日尔曼主教，这两个附带条件，随着时代的改变已经废除。现

在我把枢机的来源作个介绍。

“枢机”这个名词来自拉丁语文，表示他们的职位重要，身负教会的重任，就好像“门枢”负荷着大门一样。而“枢机团”的组成呢，开始的时候，是颁给罗马各本堂神父和七位在罗马负责救济事业的副祭的特别名衔，在大公会议的议决书上，随着教宗与六位郊区主教之后郑重签名。在中古初期，“枢机”还不是一种荣誉头衔，而且，在罗马之外，也有使用这种名衔的教士。第十世纪时，教宗开始召请各地有名望的教士到罗马，尤其是克吕尼的修士们，赐给他们“枢机”的名衔，并且，赠给每一位枢机一座罗马教堂，或是罗马郊区的一座主教公署。十一世纪时，开始把“枢机”的名衔，赐给不常驻罗马的非罗马籍主教。教宗史提夫九世去逝以后，环境促成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唯有“枢机”才有当选为教宗的可能，这就是“枢机”特殊荣誉的主要原因。这时候，罗马的权贵，督斯古龙家族和克来谦迪家族联合一致企图攫取伯多禄的宝座，以抗拒神圣罗马帝国的势力又再度控制罗马教会，枢机们不愿意接受由两大家族所指定的本笃十世为教宗，于是离开罗马，他们在锡艾那由督斯加尼女伯爵出面保护，选出翡冷翠主教为教宗尼古二世，希尔德布朗在日尔曼请求皇后安妮丝出面，以武力协助尼古二世返回罗马，驱逐了不合法的教宗本笃十世。

在早期教会，罗马教宗，也就是罗马城的主教，和其他的主教一样，是由当地教士和教民推选的，照一般的惯例，是在选举之前，先征求皇帝的意见，或是在选举以后报告给皇帝。第八世纪“敬礼圣像”的纠纷发生后，教宗和东方的皇帝断绝了来往，所以选新教皇就不征求他们的同意了。加洛林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时代，罗马教宗有了新的现世君主，代替了过去的君士坦丁堡皇帝。从公元八百年到1049年，教宗和皇帝都开了例，彼此都认为自己有控制另一方选举的权力，同时地方贵族参与干涉教宗的选举，结果，在这两百五十年间，教宗的选举，不是受到当地教派的影响，就是受到皇帝的干扰。尼古二世教宗颁布《选举教宗条例》的目的，就是在恢复早期民选的习惯，使选举权重新回到罗马城的教士和教民的手中。

不过尼古二世虽然恢复了古代教宗民选的精神，但是，却建立了“枢机团”，把选举教宗的权利给了“枢机”们，使“枢机团”成为一个特殊的法定机构。尼古二世时的“枢机团”包括七位主教，28位神父和18位辅祭，枢机主教提名候选人，其他的枢机投票附议，然后当选人受罗马教士和教民的欢呼赞同，枢机既然获得了选举的特权，从此，也就成为罗马教会最具特权的人物。但是，这个新选举方式，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弱点，中古时代的任何选举机构，仿佛过去罗马的元老院，还没有每票同一价值的观念，而有所谓“重力票”的看法。一位枢机主教的票，可能抵得上好几位枢机神父和枢机辅祭的票，因此，往往发生一位候选人获得多数普通票，而另一位候选人获得较多的“重力票”，因而常有纠纷。教宗尼古二世并不只是单纯的理想主义者，他不相信几百年来积习，可以只由一纸命令而取消。罗马教宗既然已经是欧洲政治圈里的一员，也就必须以政治手段来对付外来的政治压力。他变更过去教廷的政策和义大利半岛南部以及西西里的诺曼人缔结盟约，要他们宣誓，维护今后教宗选举的独立自主。经驻告诉我们，教会内部大多数的缺点，都是源自于法律的不确定，谁有权合法地参与教宗的选举呢？根据教会通功的原则，所有的教友都有候选之权，全教会同意的选举，便算有效，因此，长久以来，罗马公民、贵族，以及保护者自居的皇帝都可以视为教会公意的代表，而历代教宗的推选方式形形色色，都可认为有效，但仅仅根据习惯的选举方法，虽然可以避免没有职责人士的干扰，仍然有发生争执的可能。1059年的“拉特朗主教会议”规定：“从此以后，唯有枢机，有积极参与教宗遴选的权利，其他的神职人员与罗马公民只能在选举同意后表示赞同。至于皇帝的权力，从此只是：‘在不损伤对方荣誉和尊敬的情况下，不赞成对方的意见’这一条款上。”那么，这一条款的意思是，每次选举完成时，由“枢机院”专书通知皇帝，以表示对他职守的尊重，同时强调皇帝的尊荣，仍是教宗授了他的特权。

在“拉特朗会议”中，另外一个议题就是“俗人授权”的问题。议题中，再次阐明以下的规定：“禁止俗人授予神职，在祝圣及采物赠与中，禁止一切买卖圣物和神职的交易，神父若是不遵守独身制度时，教友不得参与他的弥撒。”这一条训示和开除教籍的法令一样的严峻有力。教宗尼古老二世特别希望教士们能度修士的生活，毕竟这只是一种劝告而不是法律，事实上，这个劝告，激起了神职界的全盘的革新。这条训示和《选举教宗条例》都并列在“拉特朗主教会议”后，所颁布的《全体的警觉通谕》之中。第二年，1060年，尼古老教宗又重申前令，不过，这次没有提到日尔曼皇帝，而罗马民众的欢呼赞同也被取消了。

继尼古老二世的是教宗亚历山大二世，他是依照新的选举教宗条例所选出的。但是，日尔曼当局，以违反过去的传统为理由，拒绝承认亚历山大，而另外任命何诺里二世为教宗，派军队占领罗马，经过彼德盎弥盎枢机主教全力替亚历山大二世，保守义大利后来强有力的科隆总主教亚诺，为了拥护合法教宗击退日尔曼人时，被任命的何诺里自认不合法，便悄然隐退。到1064年，日尔曼皇帝才正式承认亚历山大二世，这是尼古老二世的《选举教宗条例》颁布以来的首次胜利。

教宗尼古老二世，他如何努力的在重振教会的领导权，以《选举教宗条例》，清楚的规定了选举教宗的程序和资格，正是对“俗人授权”对症下药的强心剂。尼古老二世去逝后，就是按照《选举教宗条例》选出的，虽然受到日尔曼皇帝的干涉，但是，受到各方面的支持，使对立的一方知难而退，而使尼古老二世的《选举教宗条例》获得了胜利。下面的任务，是新上任的教宗如何为教会争取权利。

2.2.3 教宗与日耳曼国王的关系

教宗亚历山大二世，他是一位忠诚的改革家，在米兰当神父的任期内，他创始了一种民众运动，反对买卖圣物，反对不合法的神职，这一个运动称为“巴达利亚”。被选为教宗以后，他一本利奥九世以来的革新政策，积极推动教会的各项改革。首先召集各地推动“巴达利亚”的领袖们到罗马，在祝圣枢机的御前会议上，承认“巴达利亚”运动，并且，把代表教会的旗帜授给海伦拔尔骑士，他是推动“巴达利亚”运动的在俗教友，这真可说是举世无双的新鲜事。教宗明令信友，反抗不合法的神职人员，他还充分发挥教宗权力，驾乎人事忌憚之上，他以开除教籍，警告结婚不久而又离婚的日尔曼国王亨利四世，他还制裁了和他友谊深厚，而且还曾经出面，强力击退来自日尔曼的阻力，也帮助他，让与他对立的何诺里悄然隐退，而使他顺利的成为当时唯一的、具有权威的教宗。教宗亚历山大二世在位十二年，由于日尔曼国王亨利四世登基时，年纪只有六岁，贵族专横，到他成年亲自主政以后，又忙于重振王权削平诸侯，无暇和教会对抗，政教冲突的表面化，要到继承他职位的圣额我略七世教宗在位时，发生所谓“俗人授职冲突”，这是中古时代政教冲突的最高潮。

额我略七世原名是希尔德布朗，大概在1015年到1520年之间，生于托斯卡尼的少诺城。少年时到罗马就读于圣玛利亚修道院，当教宗额我略六世被日尔曼国王亨利三世罢黜，放逐到日尔曼时，希尔德布朗是以秘书的身份随行，后来当他被选为教宗时，取名为额我略七世，就是要表明亨利三世干涉教内政的非法性。教宗利奥九世从日尔曼到罗马去就职时，希尔德布朗成了他的随行者之一。不久，利奥就任命他为罗马教会的助理辅祭，是罗马教廷中影响力最大的人，许多学者认为，从1050年开始，希尔德布朗实际统治罗马教会的人物。从利奥九世开始，历代教宗的改革措施大多出自希尔德布朗的策划，也是无可置疑的，所以当1073年亚历山大二世去逝后，希尔德布朗，他以首席六品辅祭的身份主持教宗的葬礼，罗马公民夹道欢呼，争睹他的风采，称希尔德布朗为新教宗，枢机们立刻到宗徒之长伯多禄在罗马受监禁的纪念堂，正式选举希尔德布朗为教宗。一向谨慎的希尔德布朗，在获得日尔曼皇帝亨利四世的同意后，才接受教宗的加冕典礼。历史上，只有少数的几个人，他们的名字会在人们心中唤起异常矛盾的情绪。如果，要给他们的人格下断语实在不容易，教宗额我略七世，他就是这些少数人物中的一个。十九世纪的格利哥罗维认为，以拿破仑和额我略七世

来比较，拿破仑不过是个野蛮人罢了！格利哥罗维认为额我略七世是一个魔术师，他会用不可见的魅力使全世界吃惊，圣教会将额我略七世祝圣，列入圣人行列，每年五月 25 日来庆祝他的瞻礼日。有些人认为他是一位政治型的教宗，而非宗教型的教宗，可见额我略七世给他同时代的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的好友圣彼德达弥盎，曾经诙谐的称他是“神圣的撒旦”，意思是额我略七世是一位卓而不群、夙夜匪懈的人物。他身材矮小，敏捷劳碌，充满着勇气与活力，啃蚀着他的灵魂的，是一种要光荣天主的热忱，他什么都能干，但必须有目的，他的信札，几乎全都保留下来，使我们得到有关他教宗生涯的史料，他的大部份信函是致各地的总主教、主教的，也有给各隐修院院长的，另外他也和欧洲王公们通信，甚至还与摩洛哥的阿拉伯君王通信，在内容上，不只是礼尚往来的信函，其中还有许多论及教会权益，道德进步，买卖圣物，与开除教籍等主题。想要了解额我略七世与亨利四世之间，政教上的冲突，必先认识额我略七世的一般活动，现代史学家对“卡诺撒”一事的描绘淋漓尽致，使人以为那是额我略七世的全部的教宗生活，其实他一生的工作，并不在抑制亨利四世，相反的他常常避免和皇帝冲突。

额我略七世初任教宗时，并没有新的计划，他仅仅承继利奥九世以后的教会革新工作。教士道德生活的重整，教会从世俗力量获求解放，在额我略七世当选教宗以前，这两项运动的主要部份已经完成，各教宗对革新的理想都已经有了共识，教会能重新尊奉圣统制与牧灵的职权，要归功于还没有当选教宗的希尔德布朗，我们可以说，希尔德布朗的成就超过了以后成为教宗的额我略七世。

额我略七世与日尔曼皇帝关系的破裂，主要原因不在事实本身，而在亨利四世的个性，额我略七世上任时，亨利四世只有 23 岁，童年时恶劣教育和不幸的环境，使他没有到达道德上的成熟期，他时而骄横怪异夸诞，时而哀沮绝望，根本没有个性可言，因此，他营营于狡诈之道，以补偿他性格上的缺陷，现在的人称呼这一类的病是歇斯底里症。亨利四世缺乏男子气概，在政治上和私生活上都毫无能力，他同时代的人都不尊敬他。

额我略的政治思想曾经引起学者的激辩，有人认为他企图建立一个以教宗为中心的神权帝国。从额我略七世本人以及他的支持者的作品看来，我们得不到这种极端的结论，虽然额我略七世曾明显的说明教宗对西班牙、匈牙利、丹麦、波兰和阿布利亚等地的主权，但是，这主权是封建主权，因为西班牙、匈牙利、丹麦、波兰、阿布利亚等地方，至少在教会的立场来说，它们是教廷的附庸国，更有力的反证是，在冲突期间，连最反对额我略的人也没有指控他有取代王权，建立神权的野心。

本质上，额我略七世的政治思想是根据杰来西的“双权论”，教会有统治人的灵魂的力量，而所谓人，则包括帝王公侯在内，有关灵魂之事，教宗有绝对权，帝王犯了罪，也该受社会的制裁，所以，开除教籍，罢免皇帝等，都在教宗的权力范围之内，可是，像这类的极端措施，很容易被解释为神权帝国，额我略七世之被诬蔑，原因就在这里。再看看日尔曼的情形，公元 1056 年，亨利四世继承日尔曼人王位的时候，只有六岁，在他未成年的这段时间，日尔曼政治的弱点呢，已经全部暴露无遗，既没有所谓中央政府的系统，又缺乏足以帮助国王行使权力的官僚制度，贵族们唯权力是从，亨利三世在位的时候，他们固然不敢跋扈，但母后听政就不足畏了，也就开始了权力的斗争。内战期间，得势者挟天子以令诸侯，为个人争取利益，亨利不断为各党派所轮流把持，养成了他反覆无常，多疑急躁的性格，但是，这也日使他体会到日尔曼急需一个强有力的政府。1069 年，亨利四世亲自主政，决心削弱诸侯的势力，建立稳固独立的王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亨利四世认为首要之务，是在建立一个组织严密的王畿，作为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基础；其次是建立一个忠诚可靠的官僚制度，以对抗贵族的擅权，因此，他把萨克逊南部的一块土地，占为己有。这块土地位于日尔曼的中心，有丰富的银矿。他大量任用出身微贱的侍臣，代替贵族和教士，来建立他的官僚制度。亨利四世在执行这些政策时，似乎是操之过急，为了扩张私地，他以各种借口没收萨克森公

爵的封地，甚至还把公爵监禁起来。他任用了许斯华比亚附庸来镇守新获得的土地，因而引起了当地人民的反感，他之重用侍臣又招来了贵族的不满，因为，政府里的职位，一直是他们的专利。总之，亨利四世过于激烈的措施，令那些长久以来就掌握着权力的贵族们难以接受。所以，当萨克森人再度叛变的时候，亨利四世竟然得不到任何贵族或教士的支持，结果呢，只有放弃那些大批的新得来的土地。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亨利四世一反二十年前，罗马教宗要他父亲亨利三世协助的情况，转向教宗要求支援，而 1073 年，额我略七世才刚上任不久，亨利四世致书给教宗，向他认罪，并请求他的援助，在言辞上谦卑有加，和他三年后的倨傲相比较，那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因为额我略七世才刚上任，正准备推行改革的相关事宜，而没有加以理会，这也就播下了亨利四世对教宗怀恨的种子。

1074 年，额我略七世召开上任后的第一次“拉特朗教务会议”，重申神职交易和教士结婚的禁令，这个呢，也已经成为历年罗马教宗召开会议的习惯了，不过，这次的禁令，不仅在言辞上比较以前更为决断，而对违反者的惩罚呢，也更为具体，会议的条文说：“凡以金钱交易而获得神品神职者，今后在教会内不得执行任务；同样，以金钱买得教堂者，应被革除，今后，一切买卖都视为非法；结婚的教士不得举行弥撒，也不能以任何方式做辅祭，教友也应该拒绝他们的服务……”这些禁令立刻生效，并没有给了一个缓冲的时间。我们可以想像到这禁令所引起的良心问题，而其他社会、经济、政治等问题还在不言之中，神职交易和教士结婚已经是相当普通的事，要使买到职位者放弃职位，已结婚教士放弃妻子儿女，谈何容易？如果额我略七世能给这些人一段缓冲的时间，并拟定一套妥善可行的计划，那么改革的工作或许会有效，而政教的冲突或许可以避免。

1075 年二月，“拉特朗教务会议”，又重申禁止俗人授职的陋规，并且直接指名，禁止亨利四世侵占教会权益，这俨然是战争的号角，中古时代最激烈的一场政教之争就这样开始了。

教宗额我略七世上任以后，针对俗人授职的弊病，连续在 1074、75 年的“拉特朗教务会议”，不断重申：“凡以金钱或土地交易而获得神品、神职者，无论是贿买或是赠与，都属非法，否则授与和接受的双方都应开除教籍。”尤其在 1075 年的会议上，直接指名禁止亨利四世侵占教会权益，明令禁止国王今后锡封主教的职位，俨然吹起了战争的号角，中古时代最激烈的一场政教之争，就此开始。下面继续探讨这场战争的情形，并且来看看这场战争的结果究竟如何。

俗人赐封神职的权力，不单是宗教上的问题，而且也是政治经济和社会上的问题。对一般世俗地主，无疑的，这一项禁令是在剥夺他们应有的权利，因此而导致了他们财产的损失。日耳曼的国王更相信这禁令，会促使封建政治和王权政府解体，因为，教士们为政府服务是大家公认的需要，而授职禁令，直接的剥夺了教士们的政治地位。这次的禁令，并不容许有任何例外，不过在执行上也权衡各地方不同的情形，采弹性措施而有宽严的区别。在英格兰和西班牙，这项禁令从未公布，因为英格兰才刚被北方诺曼人，也就是维京人所征服，而征服者威廉是教宗的知友；而西班牙地方神职交易的问题根本就不存在。法兰克的菲力普一世对教会的干涉，教宗对他似乎比较宽容，大致说来，教宗额我略七世的目的是在改革教会，只要各王公显要不公开违反原则，在执行上，教宗对他们还是乐于让步的。至于日尔曼的情形，就与英格兰、法兰克等地不尽相同。政府组织内的重要成员，几乎全是高级教士，因为主教和隐修院的院长等人，正是亨利四世用来对抗贵族的主要力量，就日尔曼皇帝的立场而言，放弃授职锡封的权力就等于放弃了政府高级官员的任命权，而且，还危及到征用教会附庸骑士军事服务的权力，更损失了大量的经济来源。当 1069 年，亨利四世亲政以后，一面紧握着控制教会的大权，来对付日尔曼境内善变的贵族，一面又企图分化伦巴底地区和义大利其他的地区，尤其是教皇国的关系，作为他控制义大利的基地，这些政策都引起革新教会者的不满。

米兰是伦巴底首善之区，自从改革运动开始以来，该城教会就分成了新旧两派，互不相让。1075 这一年，又以选举主教的问题，两派之间激烈斗争。革新派推选出阿督为米兰的总主教，并且，也获得了教宗额我略七世的承认；保守的反对派去请求亨利四世任命一位新的主教。亨利四世明知阿督已经获得教宗的承认，仍然故意再任命米兰城的辅祭铁达道为该城的总主教，罗马教宗和日尔曼皇帝之间的战争，终于揭开了序幕。亨利的这种做法，不但损害到教会的权益，而且可以说，已经侵犯到了教会的领域，是一种挑战的行为。教宗在忍无可忍之下，在 1075 年的 12 月，向亨利四世提出义正辞严的照会，致书警告亨利四世的不法行为，虽然没有明白的说要开除他的教籍，或罢免他皇帝的帝位，但是，字里行间隐含了类似的威胁，这封信由教宗派了专使亲自交给亨利四世。

亨利四世认为，这是教宗的挑战，他的答复是，在 1076 年的 1 月，宣布召开“伏姆斯会议”，参加人员是受亨利封的日尔曼的主教们，会议的议决，是罢免教宗，由亨利四世和每一位主教，各自致书给教宗额我略七世，他们称教宗是假教宗、假修士。亨利四世给教宗的信里面，申言讨伐教宗额我略七世，逼教宗退位，他说：“我！亨利，因天主圣宠而为国王，偕同所有的主教对您说：‘下台！下台！让你遗臭万年！’”词句狂妄、态度傲慢，是历代所少见。二十天后，教宗收到信函，宣布召开教务会议，通过罢免亨利四世。凡是参与“伏姆斯会议”的 26 位日尔曼主教，支持亨利四世的伦巴底主教以及拥护亨利四世的所有教士和教友，一律开除教籍。同时，教宗也致书给日尔曼全体人民，说明事情的经过。这真是一件空前的大事，罗马教宗不仅是开除了一位皇帝的教籍，而且，剥夺了他所拥有的帝国。而教宗额我略之所以这么做，是根据宗教上的理由，而不是政治上的理由，亨利四世违背了教会的法规，而且是屡劝不改，那么以他身为教友的身份，他自然应该受到教会的处分。在一个基督教的社会里，一个失掉了教友身份的人，自然也就失去资格来统治“基督教共和国”的人民了。额我略表面上，似乎只开除了亨利四世的教籍，却也间接的剥夺了他的政权。中古的教会，始终没有忘记这件大事，而以后的教宗，也多步上额我略的后尘，以同样的方式来对付不服从教会的帝王们。七百年前，米兰的总主教圣盎博罗削所说的：“皇帝是在教会之内，而非在教会之上。”的教权至上说，又再一次的由事实来加以证明。

自从罢免之令公布以后，不仅日尔曼的贵族们公开的叛变，连过去支持亨利的主教们也都离开了亨利。为了挽救这个局面，亨利再度在伏姆斯召开帝国会议，而额我略教宗也致书给梅因斯的主教赫尔曼，解释“神职”和“王权”的关系。我们看出来，当前的争执，已经不是额我略和亨利个人之间的争执，而是罗马教会和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的争执，争执的内容，已经不是锡封教士之权属于谁？而是变成了“神权”和“王权”，究竟谁高谁低的问题了，这一点，就是这次冲突的真正意义和价值之所在！

为了响应额我略的呼吁，1076 年 10 月，日尔曼的贵族在莱茵河畔的奥本汉集会，亨利呢？也被邀参加，大会议决说：“在指定的时间内亨利应该表明立场，假如亨利能公开悔过，获得教宗的赦免，就既往不咎，否则的话，就要另外选举贤能者做日尔曼的君王，大会又通过 1077 年二月在奥格斯堡集会，邀请教宗‘额我略’亲自来主持。”亨利眼见大势已去，为了拖延时间，发表了两则声明，一则表示，服从教宗。一则呢，取消反额我略的命令。

1076 年的冬天，额我略应日尔曼贵族的邀请，离开罗马北上，来到卡诺撒，准备出席“奥格斯堡会议”。1077 年的一月里，亨利和几个随从，经过长途跋涉，偷偷的翻越阿尔卑斯山也来到了卡诺撒，一连三天三夜，身上穿着罪人请求赎罪的粗麻衣服，光着头、赤着脚，站在卡诺撒堡垒前。卡诺撒堡垒属于女公爵麦蒂尔达所有，当时女公爵的继承人亚特莱和克吕尼修道院院长休格督与教宗额我略同在。亨利派人致书给教宗，恳求教宗取消开除教籍的成令，还表示愿意遵行教会的规章。额我略比堡垒中的诸侯公主们更心硬，诸侯们曾经请求教宗的开恩，尤其是女公爵和公主们还曾流泪请求，而教宗这时候，可以说是陷于进退维谷，两难的境界中而不知所措。身为神长的他，不应该拒绝为忏悔者赦罪，可是，他洞察了亨利

的内心，怀疑这个昨天还暴戾恣睢，今天又如此谦卑、唯唯诺诺的人的真诚，对亨利的悔过未尝不深具戒心，但是，若不赦免他，实在有违宗教领袖的精神，而且，舆论对他无动于衷的冷漠态度，开始有了微词。最后，他司铎神职的责任感占了上风，赦免了亨利，撤销了对亨利所下开除教籍的禁令，亨利也答应宣誓服从教宗。额我略以政治家的眼光及以后的事实证明了他自己已经铸下了大错，在《致日尔曼公侯》的信函中，表露了他内心的惶恐。有的历史家批评他做宗教家有余，当政治家则不足。在宗教和社会的两大压力下，教宗虽然看透了亨利的苦肉计，而额我略似乎舍宽仁之外，也别无他途了。“卡诺撒事件”是欧洲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至少在表面上，“政权”已经完全向“教权”屈服，可是许多历史家却认为亨利才是真正的胜利者，以后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政治的诡计遮掩不了额我略的伟大精神，虽然明知自投罗网，却不能出卖自己的信仰和原则，额我略在卡诺撒事件中，证明了他是一个宗教家，而不是某些历史家所说的“一个想要统治基督教共和国的野心家”。教宗额我略七世，圣教会在他去逝以后，将他列入圣品，加入了天上圣人的行列。

“卡诺撒事件”解决了亨利个人的问题，却没有解决日尔曼的政治问题。1077年的三月，日尔曼的贵族们，在佛森集会，不顾教宗代表的反对，罢免了亨利，拥立鲁道夫为国王，于是，日尔曼境内兵戎相见，内战兴起。鲁道夫是亨利四世的姐夫，他当选国王后，立刻宣誓放弃铎封教士的特权，而且不企图使王位再世袭。而亨利从卡诺撒回来后，不顾自己的誓言，继续控制教士，干涉教会的内政，而且还曾一度要求教宗开除鲁道夫的教籍。自从内战以来，教宗始终保持中立的态度，亨利既然故态复萌，教宗于是在1080年的教务会议中，再度开除了亨利四世的教籍，免除了他的王位，并且正式承认鲁道夫为国王，亨利就率领日尔曼的主教先后在班堡、梅因斯、布里森等地召开会议，反击教宗，称教宗是魔术师、妖巫、异端的保护者、谋刺犯，诬陷教宗毒杀四位前任的教宗，在会议中把教宗免职，另立拉温那的总主教为克勒孟三世。五年前的政教冲突，又再死灰复燃，而且还得为惨烈。由于日尔曼局势的剧变，教宗额我略的处境越来越困难“鲁道夫在一次内战中受伤不治阵亡，亨利也就在1081年的春天，率领军队入侵意大利，逼近了罗马城，但因军力薄弱，没有能够攻下罗马城，经过了长达四年的围攻，1084年，罗马终告不敌而陷落于亨利四世之手，十天以后，亨利就在克勒孟三世的手中接受皇冠，额我略避难于圣天使堡垒。这位被开除了教籍的皇帝，便由他自己所立的教宗加冕。最后，罗拜基斯卡率领诺曼人抵达罗马，驱逐日尔曼人，解救了解教宗，不料解救者反而在罗马横行蹂躏，遭到罗马人民的怨恨，他们把这种怨恨转加在教宗身上，教宗为了避免报复，无奈地随诺曼人退出罗马去沙勒诺避难。一年以后，含恨而死，他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爱正义，憎恨罪恶，因此流亡而死！”一位处约不屈，处顺不骄，始终为争取教会的权利而奋斗的伟大教宗，就这样去逝了！从世俗的眼光看来，好像被武力征服，其实真是胜利者，他那清除教会积弊的努力终将结果，他的信念也终将实现。他争取到教会选择自己的领袖人物的自由，也巩固了神职人员的独身制。

额我略七世含恨而死，在他去逝以后，没有人愿意当教宗，枢机们两次都选出卡西诺本笃会修道院的院长为教宗，但都没有被他本人接受，第三次再选，仍然是这位院长，他才勉强接受。而后，他又打算辞职，当时罗马已经是呈半废墟状态，宗座的经费也已经枯竭，难怪有些教宗，一直保有他原有的主教职位，以便能得到生活费用。新教宗就是维克多三世，身为卡西诺修道院院长的他，在经费方面是不成问题的，他甚至答应给愿意接受教宗冠冕的人相当的薪俸，正是买卖圣职的倒置方式。在过去，教宗的就任从来没有像这次如此的勉强。维克多三世曾经是额我略七世推动的革新运动的柱石，他决心遵循额我略七世的遗志，可惜他在额我略去逝的两年后的1087年，也去逝了。继维克多三世的教宗是克吕尼修道院的院长，富有毅力和政治意识的吴尔朋二世，他是法兰西人，在额我略七世任内，曾经召他到罗马，赠给他枢机的荣誉。曾经有学者拿吴尔朋与古罗马帝国皇帝奥古斯都相比，拿额我略七世与凯撒相比，是有道理的。因为吴尔朋二世是额我略七世以后，比较幸运的一位教宗，不

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比拟并不太适当，因为中古时代最伟大的教宗与帝国的统治者是不相同的，也就没法儿比拟。在吴尔朋二世上任时，罗马被亨利四世所任命的对立教宗克勒孟三世所占据，吴尔朋在罗马城外逗留很久，他和诺曼人、法兰西人为伍，他对圣物、神品神职的买卖以及俗人锡封神职权的禁止，在执行上更加严厉。法王菲力普一世离婚后，又拐骗宫中妇女，被吴尔朋二世开除教籍，菲力普一世只得改变生活，取得教宗的赦免。1085年，回教徒退出西班牙的旧都多来道，吴尔朋仍命多来道总主教担任西班牙的首席主教。吴尔朋还一面和巴伐利亚、洛林、萨克森等封建诸侯组成联合阵线，支持亨利四世的长子孔拉德的叛变；一面又号召欧洲十字军，籍以树立罗马教会的威望，也因而介身于欧洲历史的洪流中。十字军东征的历史，以及和教会的关系，以后再行介绍。正当吴尔朋二世高瞻远瞩，籍十字军的帮助，驾凌欧洲各王侯之上时，固守在北义大利的日尔曼王亨利四世，似乎已经被世人所遗忘，他常与麦蒂尔达的军队交战，1094年，麦蒂尔达把对立的克勒孟三世逐出罗马，亨利四世在1094年战败回到日尔曼，平定了长子孔拉德的叛变，次子又继而叛变，把亨利四世禁锢在监狱中，然后被儿子所逼而退位，亨利四世不久以后就去逝了，他始终没有再被恢复他的教籍。亨利四世死后，由次子亨利五世即位，他的各种作风，不亚于其父亨利四世。因此，也被开除教籍。

教会与日尔曼人之间的“俗人锡封神职”的权利之争直到这时，仍然没有解决，教宗和其他国家建立妥协政策的困难都不大。1098年，教宗吴尔朋二世与法兰西的国王协议成功，法兰西国王从此以后，不再任命主教，不过教宗也作了让步，承认法国国王有批准合法人选，授给新当选的主教教会的财产的权利。日尔曼王亨利五世，并没有意思要放弃已经享有的权利，虽然当初王位还不稳固，还需要教宗的帮忙时，曾经许下过漂亮的诺言，教宗吴尔朋二世没有能够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就去逝了。继承者是巴斯卡二世，他是一位好谋臣，却不是一位果断的领袖。当1110年，亨利五世率军南下，次年占据了罗马后，教宗巴斯卡遭到严重的压迫，除了为亨利五世举行加冕典礼之外，并准备投降，他竟然还向亨利五世建议，日尔曼境内的主教们，放弃帝国所授封建制度的权益，包括广大的土也、特权、统治权等，他们不再是皇帝的诸侯，而皇帝呢，则不再有权干涉教会选举的事务。当教宗宣布这个建议时，教会人士大为哗然，甚至还发生了流血暴动，亨利五世立刻将教宗、16位枢机及少数贵族逮捕。巴斯卡被迫承认亨利有无限度的行为，当亨利五世北返后，教宗巴斯卡二世宣布他被迫所签订的协议无效，取消对亨利五世的让步，重申额我略的禁令，于是亨利五世又再度到罗马围攻教宗，巴斯卡二世在保卫战中阵亡。

教宗巴斯卡二世的建议，几乎可以说是，今日的政教分离制，这充分表示出这位出身隐修院的教宗，一相情愿的理想主义，但在中古时代根本是无法实行的，这也说明了，他并不了解日尔曼帝国的实际状况，因而遭到了日尔曼主教的公然反抗，最后还赔上了自己的生命。继承者是盖拉西二世，是1073年以来，出身修道院的第五位教宗，他退居到凯达，亨利五世又去围攻他，盖拉西二世一怒，开除了亨利五世的教籍，教宗逃亡到克吕尼，从他登基为教宗到他去逝，为时还不到一年。按照惯例，枢机们在前任教宗亡故之地，选举新教宗，这次当选的，不再是隐修士，取名为加利斯督二世。他是一位眼光远大，具有王公气概的政治家，对锡封神职的问题，决心找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办法，经过长时间的、多方面的研究和讨论，终于和亨利五世达成了共识。在1122年，签订了历史上著名的《伏姆斯协定》。在皇帝方面，亨利五世答应，在可以的情况下，赔偿从战争开始以来，包括他和他父亲亨利四世的统治时期，宗座所遭受的一切损失，而且，答应放弃锡封之权，不再干涉主教的选举，不举行锡封礼中的宗教仪式、授予主教权杖和权戒；在教宗方面，准予所有的主教的选举，必须在皇帝或是皇帝的代表面前举行。换句话说，皇帝有权出席教会所召开的选举主教的会议，如果发生选举纠纷时，皇帝有权和主教共同解决争端。选举完毕之后，由皇帝向新当选的主教，授给教会财产和其他相关的事物。《伏姆斯协定》使得俗人锡封神职的争战，罗马

教宗与日尔曼皇帝之间的冲突，暂且告一段落，我们在这里可以提出一个问题，《伏姆斯协定》究竟算不算是教会的胜利？几十年来，历代教宗临深履薄、兵连祸结，动不动就开除皇帝的教籍，现在，日尔曼皇帝终于答应放弃任册封主教的大权，仅仅保留选举完成之后，授给财产的权利，一场争端终于平息下来。但是，如果皇帝愿意，仍然有影响选举的可能性。俗人锡封神权之争，原来只不过是教会与国家之间，屡见不鲜的许多冲突之一。《伏姆斯协定》虽然使罗马教宗与日尔曼皇帝间的冲突告一段落，但是政教冲突的基本原因并没有消失，那就是在基督教社会里，“政权”与“教权”孰高孰低的问题，俗人锡封神职的问题，在表面上固然是解决了，但它之所以造成陋习的原因，也还继续的存在着，所以俗人控制教会选举的事，还要再过好几百年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

2.2.4 “神权”与“俗权”之争

有人以为在中古历史上，教会和国家是两个独立的团体，他们彼此抑制牵连，并且把俗人锡封神职之争，看作是教会与国家之间的权利之争。这种观念其实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中古时代，根本没有所谓的国家，只有诸侯王公，教会需要王公们的支持，教会为了感谢他们，给了他们许多权利。剥夺他们的利益，或是使他们屈服于教宗，对教会并没有好处，中古时代以及以后的教会，所希望的，只在传教救灵，当王公们承认教会的特职时，便会和教会合作，这样的合作是可喜的，因为王公们本身也是教会的一分子，也负有对他的僚属获得精神福利，灵魂得救的责任。克吕尼的宗旨并不在削减或推翻现世世俗的政权，以便改造世界成为一个教会国，而是在策励王公们负起救灵魂的责任，而王公们的主要任务之一，应该是使教会独立自主，以便实践履行教会神圣的使命。这种独立自主，是要从全体教会，包括王公在内的觉悟而来的。个别的赞同，与协约的签订，都不一定能够实现教会的期望。这时期的王公们，至少已经意识到和平相处的可能性。因此，“卡诺撒事件”只不过是一支无关紧要的插曲，而《伏姆斯协定》，才是教会胜利的象征。俗人锡封神职之争，是野蛮的中古时代结束的标记，王公们与平民百姓都已经学到了“法律比武力更有用”的实质意义，但是，这并不就是“一个理想的时代已经开始了”。在人类的历史上，根本没有所谓的理想时代的存在，不过呢，第十二世纪以后，一个被教会精神所浸润熏陶的文化社会将接着来临，这个与中古观念牢不可分的社会，将为教会与世界人类产生不朽的价值。

册封神职的冲突，在另一方面产生了一个颇为重要的结果，在当时，出现了许多有关神学和政治理论的文献，具体的锡封神职问题，诱发了对教权和俗权范畴的讨论。额我略和亨利两个私人间的冲突，又扩展成更大的问题的争辩，教会和帝国之间的合理关系应该是如何的？在这场文字上的论战中，双方都不免有意气用事，歪曲事实或从事人身攻击的地方，不过这些文章，除了表面上令人不满的缺点外，也有颇能令人折服人心的学理说明。

在当时流行着一个名叫《教宗格言》的文件，今日的学者都认为，是一位不知名的教宗派人在 1090 年左右写成的，书中的格言正是额我略对教宗职权以及政教关系的看法。这一派所抱持的看法是“神权政治”。其实，这种观念并不是从额我略开始，额我略也没有要创立神权帝国的野心。“教宗派”承认，在本质上神权高于政权，而实际上，“皇帝派”也接受这一点，因为“神权”管理的是，信仰上的精神之事务，有关人类的永生。而“俗权”管理的是，人类现世的物质事务。两相比较，孰轻孰重，也就不言而喻了。而两派所争的是实施问题，当帝王的行为，正牵涉到道德层面或是信仰层面时，教会是否有权控制帝王的行为？同时，这实施问题，又牵涉到一个更基本的理论问题，那就是“俗权”的来源是什么？当然，照圣保禄的说法，一切权力都是来自天主，“神权”来自天主，“俗权”也来自天主；再问，“俗权”是怎么样从天主那儿下达给帝王的呢？换句话说，帝王的权力是直接来自天主的呢？或则是，间接经由教会而来自天主的呢？如果是直接的，那么“神权”和“俗权”应是并行的，但如果是间接的，那么帝王是属于教宗，这就成了很自然的结论。

对“俗权”和“神权”的问题，产生了笔墨之战，留下了许多神权与俗权争论的文献。

在《教宗格言》这个文件，所标榜的都是“教宗派”的看法。关于额我略七世这个看法，所根据的推理在具体的事件中如何的运用。另外“皇帝派”的看法是如何呢？

教宗格言这个文件的主要内容，我们将它归纳出下面几点：第一，罗马的主教，是唯一的一位具有世界性地位的主教。第二，唯独他有任免主教的权力。第三点，唯独他能佩带皇帝的服饰。第四点，唯独他有为皇帝加冕或罢免皇帝的权力。第五点，唯独他有权解除臣属对暴君的服从。换句话说，那一个国家，若出现了残暴的君王，只有教宗可以对该国的臣属，发布解除他们对暴君的服从，意思是说，不该服从暴君。额我略七世，就是根据这个文件宣布罢免亨利四世。而“皇帝派”呢，竭尽一切反对“教宗派”的各项观点，俗权的来源，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各位一定还记得，教宗杰来西首先创立“双权说”，到了十一世纪末，“双权说”演变成了“双剑说”。“剑”这个字，原本就有权力的意思，而新约当中，又提到“双剑”这件事，但是，新约中所记载的双剑全都操在圣伯多禄的手中，因此，杰来西的“双权说”和十一世纪末开始的“双剑说”就有很不相同的意义。“双权说”指的是神权和俗权的合作；而“双剑说”呢，指的是神权和俗权都在教会的手中。俗世政府的权力，并非直接来自天主，而是间接受教会的付托，圣伯尔纳得，似乎是第一个提到“双剑说”的人，而索尔斯堡的约翰，他也持同样的观点，当然这都是受到“教宗派”的影响。

代表“皇帝派”观点的，提出的是“两权分立”的理论，这就是在 1076 年初，亨利四世写给额我略的信，就是“双权分立”的具体应用。它是根据“两权分立”的理论，也就是杰来西的“双权说”。亨利宣称他是天主傅油来统治万民，除了天主以外，不受任何人的审判，除了信从了异端以外，也不能借任何理由被罢免，神权和俗权不能都集中在同一个人的手中，天主所授付的，人不能夺取，在亨利看来，额我略的行为，正好是破坏天主所安排的社会秩序；额我略攻击亨利，因为亨利干涉教会内政，但额我略罢免亨利，在“皇帝派”看来，也正犯了同样的越权毛病。这场文字之战，也因《伏姆斯协定》而平息下来，教会也从此摆脱了俗人的控制，教宗和主教已经不是君王的制造品，教会也能自由继续那自克吕尼和额我略七世所开始的改革了。教会史最黑暗的两世纪，便这样在黎明的曙光结束了。

2.3 与东方教会的分裂

2.3.1 分裂的大致总结

不得不说这样一个问题，教宗利奥三世与查理曼大帝所建立的西方帝国，加速了拜占庭教会与罗马之间的最后分离。但若以希腊东方教会的离去，为教宗们与欧洲新兴国族联盟的代价，这样的看法，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因为分裂的因素，早已在暗中滋长着，造成东西政治的分裂，最后形成东西教会的分裂，所以，我们不妨回溯到君士坦丁去逝的那一年开始，来探讨拜占庭东方教会离开西方教会的原因。

公元 337 年，君士坦丁去逝，欧洲在政治统治上，其实就已形成分裂，东西两边教友的命运也不停地向不同的方向演变了。当西方帝国零星沦陷于蛮族手中的时候，东方帝国却正在奋力抵抗入侵的蛮族，希腊罗马的文化，不但能在东方保持不堕，而且还独创一格，形成了独特的“拜占庭文化”，熔希腊罗马及亚洲文化于一炉。君士坦丁堡因为地势险峻，又有坚固堡垒的拱卫，竟能延续一千年之久，直到 1453 年被土耳其人所攻陷，东罗马帝国才正式灭亡。西方帝国的皇帝从 476 年被废以后，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便成了全帝国的唯一元首，而且，仍旧保持着君临世界的奢望。国势虽然衰弱，但往日光荣的威望，仍然震惊了周围的外族，所以仍然有人怀着恢复统一罗马帝国的迷梦，那就是在 527 年之间，在君士坦丁堡称帝的查士丁尼大帝。但他的企图，只是昙花一现，没有多大的效果。在公元第七世纪，一个惊人的冲击震撼了基督宗教的世界，那就是回教的势力发动了长达一百年的战争，使得东罗

马帝国首当其冲，蒙受到灭亡的威胁，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西班牙等信仰耶稣基督的地区，都先后沦入回教徒的手中。好在一致的信仰，仍然维系着东西双方。东方至少在原则上仍然承认罗马教宗的权威，然而另一方面，使东西双方走上分裂的许多误会因素却是与日俱增，当时的情形，已非昔日可比，当政令统一，罗马的和平还有保障的时候，人民能在帝国全境内自由来往，宗教与文化完全是一致的，这时候的传教士，已经不能像在圣保禄宗徒那样，从亚细亚到西班牙，在地中海周边的地带上自由的畅行无阻了。生于叙利亚的依来内，却能够到高卢的里昂去当主教，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尤其是当回教徒占领了南方沿海一带及地中海上的岛屿后，东西双方的交通，已经是越来越困难了。

语言的不同，也是造成日后分裂的因素之一。在帝国统一的时代，受过教育的罗马公民都能读、能写、能说拉丁语文或希腊语文，借着这两种语文，能在帝国的各城市内自由来往。蛮族入侵后，能通这两种语文的人也就越来越少，甚至在思想上，东西双方的神学家们也已不能互相了解彼此的著作了，因此，彼此的冲突也就日趋尖锐化。保持古文化最好的东方人，对他们所称的“西方蛮族”，相当的轻视，此外，就是查理曼大帝所造成的东西帝国在政治上的对立。双方的皇帝们对宗教的作风不同，也更加深了双方的冲突。思想精细的希腊人，对于神学方面的问题，常有特殊浓厚的兴趣，因此几乎所有被判定为异端邪说的神学问题，都产生在东方，君士坦丁堡的人民，对神学问题的争执，激动起来，不下于对当时流行的赛车的爱好。自君士坦丁大帝开始，皇帝们又都自以为，既是政治上的领袖，同时也应是教会的领袖，因此，教义上的争执，也都想插一脚，多加干涉不可，然而想要解决关于信仰的微妙问题，就只有主教们和大教宗所独享的主权，也只有主教和教宗才是教会的真正领袖，和传统的权威保护者，那么样的冲突自然是难免的了。

另一个因素呢，在君士坦丁堡宗主教，以帝国首都的地位而引为自豪，对罗马教宗的至高无上权，只不过是硬着头皮接受而已，貌合而神已离。他们认为教宗的显赫地位，是由帝国首都的罗马而来，并不因为他是伯多禄的继位者，于是东方教会便和教宗之间，屡次发生冲突，甚至还有过多次的决裂，不久又重行和解。但是，在历史上终于经过了第九世纪和第十11世纪时，两位宗主教的抗拒教宗，演变成1054年正式与罗马分裂。下面，就从查士丁尼大帝时的东方教会说起，对中古时代东方教会的情形也有清楚的了解。

2.3.2 查士丁尼时的情形

查士丁尼大帝，他从公元527年登位到575年去逝的这段时间，东方帝国还算繁荣，他本来是有诚意辅助教会的，可惜，他也跟大多数的拜占庭皇帝一样，想要控制教会，结果还是弊多于利。“查士丁尼”大帝在位差不多50年，在全国各地展开了惊人的活动，而且还是躬亲领导。他在豪华的宫殿中，度的却是简朴的生活，饮食淡泊，每天只睡三或四个小时，他最大的嗜好，是由几位主教和修士陪着他，在宫殿图书馆里消磨一段夜间的时光，他决心向一个目标迈进，一是要恢复罗马帝国领土的完整和光荣。二是要尽力与异教，就是犹太教及异端人，展开不眠不休的奋斗，以重建信仰的一致。在收复失地的目标下，他首先攻打北非，因为汪达尔人在那里迫害教会、杀害教友、焚烧教堂、放逐当地的主教，而代之以亚略派的党徒。很快的汪达尔王国被消灭。其次是亚略派党徒在北非的统治完全消灭，从此，开始百年之内，北非在拜占庭的统治之下，颇为繁荣，教会的发展直达撒哈拉，可惜百年之后，阿拉伯人入侵北非，这项传教工作又陷于停顿。

东方的拜占庭教会与西方罗马的教会之间，因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各方面的问题与彼此间的误解，使双方越走越远，终于演变成十一世纪东方的拜占庭教会，终于远离了罗马教会，为了探究各方面的背景因素，我们往前追溯到查士丁尼时代的情形，查士丁尼在位时的两大目标，是要恢复罗马帝国的完整，和尽力与异教展开不眠不休的奋斗，重建信仰的一致。上一节已经将查士丁尼所要实现的第一个目标的第一部份介绍过，也就是他率领军队向北非前进，消灭了汪达尔王国，因此，使得教会的传教事业得以在北非重新展开，更传播到

撒哈拉。可惜的是一百年以后，回教阿拉伯人又再度入侵北非，教会在北非的进展又再告停。

查士丁尼征服北非汪达尔王国之后，又率军进入意大利，消灭了东哥德王国，不过这场战争，可谓赢得不易。战争前后维持大约 20 年，留下了一片瓦砾，意大利也因而被拜占庭统治了一个世纪，由派驻在拉温那的总督负责镇守。到了 568 年，信奉亚略派的伦巴人入侵意大利，总督出走，教宗在意大利负起了政治和教会事务的责任。而在西班牙的原住民，不堪亚略派的西哥德人的迫害，向查士丁尼求救，于是他派遣军队收复了西班牙的南部，经过多年的武力征伐，查士丁尼把地中海周边的失地又划归拜占庭的版图，不过终其一生，并没有能够将帝国完全统一，同时他的伟大事业，在他死后，也就涣散了。

查士丁尼在恢复信仰的一致这一方面，虽然作了努力，但是，却造成不幸的后果，怎么会是这样的？作了努力，反倒造成不幸的后果呢？事情是这样的，自从君士坦丁大帝以来，东方皇帝对宗教的控制要较西方为甚，他们不仅控制了教会内部的行政，甚至还以政治的力量控制教会的信条，也就是神学上的信理，帝国所支持的为正宗，否则就是异端。查士丁尼本人更以神学家自居，由他决定什么是信条，强迫教徒接受，从此拜占庭的皇帝不仅是一国的元首，同时，他也是教会的领袖，教会却落得成为政府的一个部门，拜占庭的教会陷于政府的控制之下而不能自拔，而政教合一的制度，也成了拜占庭牢不可破的传统。

第四世纪末，有组织的罗马传统宗教，以及其他的一些民间宗教都已逐渐的消失，但是，民间的外教习俗仍然相当盛行。查士丁尼的宗教政策，我分四点来说明：第一，他禁止外教学术的传播。比如，雅典的大学推行“新柏拉图主义”，查士丁尼下令关闭了雅典大学，遣散了学者们，其中一位名叫达马修斯的学者率领学生们逃亡到波斯，还把柏拉图的《对话录》翻译成波斯文；第二，查士丁尼宣布犹太教是异端，被视为禁止信仰的异端，又逼迫小亚细亚、叙利亚与埃及的尼罗河地区的外教者，一律归化为正宗基督教，凡是公开举行外教的祭祀礼仪的人，一律处以死刑，埃及、北非好些著名的神庙，也先后被封闭；第三，他派遣修士到外教地区去传教，而传教士中有正宗的，也有异端派的，所以，查士丁尼所推广的基督信仰，正宗的和异端的可以说是兼而有之。最后，谈到的是，他如何对付异端，这时候，帝国盛行“一性论”的异端，只承认耶稣基督的天主性，而否认耶稣基督的人性，支持“一性论”的是皇后狄奥多拉。查士丁尼原本是接受罗马方面，反“一性论”的主张，在 536 年召开的“君士坦丁堡会议”，声明“一性论”是异端，但是，到 553 年召开第二次“君士坦丁堡会议”，他又推翻前案，因而与罗马教宗之间发生了龃龉。因为，如果有人敢反对他的裁决，无论他的地位多么高，他也视之为叛逆，像这样的蛮横，自然不能不和教宗之间起冲突，他的狂妄真是骇人听闻。一人自负是护卫信仰的奉教皇帝，竟还罢黜教宗圣西而来，还将他放逐，甚至使他贫困地死于放逐之地。他对教宗维日助及其他几位拒绝姑息他的教宗，也同样施以无礼的待遇，然而他的努力白费了，他的宗教政策和他残暴的作风，不但没有照他所想的，使异端返回教会的怀抱，在信仰上达到一致，反而在宗教的争执上，埋下了更恶毒的种子，因而使得教会在“查士丁尼”死后，比在他即位之初更加的紊乱。他胆大妄为的结果，反而使西方与东方无法同心同德，而更依附罗马教宗，西方对教宗的向心力更为提高，把教宗当作是信仰上唯一的安全领导者，从此以后，东西的怨恨更加尖锐化。

无疑的，查士丁尼在位期间，对拜占庭帝国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以后的几个世纪，拜占庭帝国在法律、政治、教会、外交各方面，直接或间接都受到他的影响，他一生最大的理想，是复兴罗马帝国，而这个伟大的理想则是完全的失败，他用兵西方的结果，仅仅只收复了北非，意大利和部份的西班牙，而他却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经过 20 年的战争，除了人力、物力和直接损失之外，所得到的只不过是破碎的城镇和荒芜的田园，为了支付庞大的军费，不得不增加东方人民的赋税。西方收复之后，由于战争所造成的经济萧条，不得不靠东方人民的支持，这么一来，西方反而成了东方严重的负担。东方人民的经济负担既然加重，对政府的怨言自然也就增多了。实际上，东方各省尤其是埃及和叙利亚，对于帝国以希腊罗马的文

化为中心，本来就不是心悦诚服。第六世纪时的埃及人、叙利亚人、往往感觉到帝国的各项政策，都牺牲了他们，以追求希腊人的利益，查士丁尼的兵士，又太多来自这两个地区，如此更增加了他们的离心力。而另一个严重的后果是，东方边防的削弱。帝国军队大部分调往西方，东方边疆各省，遂不断受到外患的压迫，尤其是来自波斯的威胁。公元 540 年到 545 年间，每年必进犯叙利亚。安提阿城一度被焚为废墟，查士丁尼只好采取退缩之势，每次签的和约，拜占庭都处于不利的地位，查士丁尼的西方政策导致了以后的“波斯战争”，结果是两败俱伤，徒使阿拉伯人坐收渔翁之利。查士丁尼死后的百年之间，拜占庭已是东南西三面受敌，而保加利亚人、斯拉夫人也逐渐南侵，帝国疆土缩小再缩小，只剩下希腊本土和小亚细亚的一小部份，如果查士丁尼能贯注精力于东方，而不求古罗马帝国的收复，拜占庭的历史就需重写了。

查士丁尼虽然对圣教会的行政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但是，他在世界历史上却能名垂不朽，特别是由于他在立法上的成就，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查士丁尼法典》。公元 528 年，查士丁尼邀集名法律学家们组织了十人委员会，将过去所有的法令作通盘的整理，取消过时的，协调矛盾的，剔除重复的，并且，加以分门别类，使全部的法律合乎逻辑的系统。在 529 年公布，以后又几经修改，534 年所公布的是为定本，共 12 卷，四千六百五十二条。这部《查士丁尼法典》，是西方法律的基础，并且带有教会的精神，对教会法典及近代许多国家的法律，也有不少的影响。

查士丁尼之所以名垂青史，不仅因为对罗马法的贡献，而且也因为他是拜占庭艺术的先导。在这方面他最伟大的成就，是史称世界奇观之一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所谓“胜利暴动”摧毁了君士坦丁堡的各大建筑，给了查士丁尼一个重建的机会，举凡皇宫、元老院、公共浴池、水沟、道路等等，都重新修筑得焕然一新。原本君士坦丁大帝曾经建造一座圣索菲亚教堂。“索菲亚”的意思是天主的智慧，不幸在公元 532 年毁于大火，于是查士丁尼计划在遗址上再重建一座，超越世界一切建筑的庄严大殿。他动员了一万名工人，从各处搜集最珍贵的材料，甚至还把异教庙宇的石柱拆下来利用，费时五年，当查士丁尼在完成时，第一次踏进这座圣殿时，不禁激动的喊道：“撒罗满，我胜过你啦！”过了 14 个世纪以后的今天，这座圣索菲亚大教堂，仍在君士坦丁堡城中雄视一切，唤起世人的惊奇称赞。教堂全长 250 英尺，宽 225 英尺，大教堂的中央，有伟大庄严的圆顶，距离地 179 英尺，圆顶的直径 107 英尺，从四周的窗户透进来的太阳光，仿佛是在天空的一顶金冠，地面闪烁着五彩缤纷的镶嵌艺术的图案，两行珍贵的玉柱，四周的墙壁上布满了壁画或金底的镶嵌画的杰作，处处给人以富丽堂皇的印象。公元 1453 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回教徒占领，圣索菲亚大教堂被改造成清真寺，教堂内所有镶嵌的绘画的基督宗教的图案，全部涂上了石膏金漆，四个角又增建四座回教式的尖塔。1934 年，土耳其政府把这座圣堂改为“拜占庭艺术博物馆”，并且刮掉了石膏金漆，恢复了它原来的真面目，镶嵌的美丽图案得以重见天日。圣索菲亚大教堂及同时期时，所建造的其他圣堂，都有圆形的穹窿，这并不是拜占庭帝国的建筑所独有的型式，直到十一世纪，西方也曾采用，但是，在东方，这种型式，却只限于教会的建筑，俄罗斯的一切圣堂都受了拜占庭建筑艺术的影响，如今，莫斯科著名的红场上，所耸立的东正教教堂，

正是这类圣堂的代表。拜占庭的技师也擅长雕刻木材和象牙、制造宝石和珉琅的作品，同时还有绘制手抄本的微细字画，在这一类的艺术上，他们实在是中古西方工艺的老师。

拜占庭帝国的希腊人，非常崇尚理论，因此对神学问题也非常感兴趣，在前面，我也曾跟各位提到这一点。加上对宗教的狂热，以及神学上不同的看法，往往引起党派对立，甚至导致了社会的不安，野心的政客，往往利用宗教上的纠纷来达到个人的目的。拜占庭的历史上，不止一次发生，由宗教纠纷而导致政变，胜利者以武力压制对方，失败者也伺机而动，采取报复的行动。

2.3.3 东西方教会的神学分歧

至于东西方教会的分歧，基本上在于两大重要的神学问题，一个是“一意论”，另一个就是敬礼圣像的问题。第七世纪时，发生了“一意论”的神学争辩，虽然发源于拜占庭，但这不是东西相对峙的开端。

“一意论”是对“一性论”的一种妥协趋势，这一派的神学家主张：基督具有人性与天主性，但是呢，却只有一个意志。若是按照“一意论”的说法，基督的大部份人性与他的天主性相渗合，或是为祂的天主性所吸收。因此，“一性论”者可以满意；另一方面，“一意论”者认为正统派教友不相信，在基督内有两个彼此冲突的意志，因此，这种妥协的“一意论”，似乎也应该为正统派所乐于接受。有些对神学了解不多的人，会以为这样的主张，只是毫厘之差而已，却不知道，这一个有关基督的人性与祂的天主性相契合的教义之间的差别，立刻动摇了信仰的基础，差之毫厘能产生全然谬误的理论。因此，这一派新的主张，引起了希腊神学家激烈的反对，尤其是日后担任耶路撒冷的宗主教索福洛尼，以及一位叫马克西木斯。马克西木斯是第七世纪拜占庭了不起的神学家，他热心赞赏罗马主教的“首席权”与不能错误的道理。公元610到638年之间，主张“一意论”的有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赛奇和海拉克利皇帝。赛奇向教宗何诺里一世请示，教宗回给他一封措辞平常的信，说明不愿意承认，任何与教义不符合的理论，也不能赞同“一意论”的主张。

海拉克利皇帝在638年颁发了一道谕令，宣布“一意论”成为信条，但是，这一道谕令受到了严重的反对，特别是受到何诺里教宗的继承人的反对，继位的皇帝君士坦斯二世，就把这道谕令废止了，重新拟定了一道新的谕令，禁止讨论有关在耶稣基督内，究竟是一个意志还是两个意志的问题。可惜，风波既然已经产生，教会在训导方面的权威，就不能对这事置之不问。教宗玛尔定一世在一次罗马召开的会议上，阐明，在耶稣基督内具有天主性、人性两个意志的教义，把否认这信条的人都开除教籍，因此，皇帝就把教宗玛尔定一世放逐到黑海上的车松岛，教宗就死在这岛上，圣教会一直就以殉道者的身份来尊敬他。

接下来，要为各位说明的是公元680年，在君士坦丁堡所召开的大公会议，和以后拜占庭东方教会离开西方教会会有什么影响。在这次的大公会议中，又重新引用“加采东会议”的程序。“加采东会议”，曾经采用教宗利奥的教义规范，并且，还加以保存，这次会议以教宗阿加多的教义规范为准，谴责了已经去逝了的“一意论”的神学家，其中还包括了赛奇和教宗何诺里一世。罗马教廷谴责教宗何诺里，乍看之下，令人惊异，不是吗？马克西木斯证明何诺里并没有给人错误的教训，此外，在这项对何诺里的谴责书里，是否隐藏着，对“教宗不能错误”的道理间接的否认呢？这以后教宗登基宣誓的时候所用的经文，证明了教廷将何诺里与相信异端者并列，难道他们承认，教宗在有关信道的教义上，有错误的可能性吗？

我们翻阅罗马教廷所保存的当案，可以见到教宗们言语谨慎，总也不称教宗何诺里是异端份子，因此，何诺里的被谴责，正如教宗利奥二世，在682年致书给西班牙主教的信函中所说的：“在异端初起时，他没有立刻加以抑止，他的疏忽助长了异端的滋长和漫延，因此，他没有能克尽宗徒之长的职责。”可以这么说，他的被责，是因为他煽动了谬论。罗马教宗在“一意论”争辩时期以后，始终保持了他在信条上不错误的地位，经过了一千两百年以后，“梵蒂冈大公会议”，在讨论“教宗不能错误”的教义时，反对者重提何诺里的旧事，根据史实的鉴定，反议案都被摒除了。

接任皇帝的查士丁尼二世于692年，也在君士坦丁堡召开公议会，依照教会法的规定。这次会议是553年和680年二次大公会议的一个补充。因为它们都以讨论教义方面问题为主。大会重复宣布“加采东会议”的第28条，那就是拜占庭的宗主教，具有东方教会的管辖权。“加采东会议”的议决，曾遭到当时教宗的拒绝，而这次教宗仍然不予批准，拒绝签字，一位皇帝的代表，想要强迫教宗签字而被遣送回乡。在当时并没有产生裂教，但是该惋惜的是，大家都如此习以为常，认为罗马与君士坦丁间的教会问题，可以不了了之，而公开

的违抗命令也不再受到指责。

从第七世纪起，东方教会逐渐与西方分道扬镳，他们对截至第六世纪，所传给他们的信条和各种敬礼，以及宗教的情感，都坚持保守之义，虽然神学上的争辩，多次使他们分歧而与教宗有冲突，但是，最使他们动摇的，莫过于对“敬礼圣像的争执”，以至造成东方教会与罗马之间的分裂，长达百年之久。

我们都知道，“梅瑟”因为犹太人对敬拜偶像的倾向很强，所以禁止他们绘画或雕刻用来表示天主的图像。但是初期教会时，教友们隐居在罗马城下面的地窟中开始，对于绘画或雕刻足以代表吾主耶稣、童贞圣母、以及殉道圣人们的图像，从来没有任何的顾虑，他们认为借着圣像，可以培养并增加自己的热心。这种对圣像的敬礼，在东方特别的盛行，不但在圣堂和修道院内，即使是私人的宅院中，也到处都有，这种敬礼本身虽然不违法，但是，未免有些过甚而近于浮滥迷信，对教义知识不足的教友，逐渐对焚香点蜡所敬礼的圣像，和它所代表的圣人分辨不清了。

公元 717 年，一位草莽将军取得了政权，在君士坦丁堡登基为帝，取名为利奥三世，他在保卫君士坦丁堡，抵抗回教徒时，曾经奋勇作战得过头等的胜利，他当然对神学一无所知。但是，他和前任的皇帝一样，认为自己有权处理信仰上的问题，一如其他政治的问题一样。在 726 年，发出上谕，命令各教堂清除一切天使与圣人的圣像，四年以后，又下令禁止用圣母和耶稣的圣像，不计其数的圣像均被捣毁破坏，皇帝为什么要这么做？他的动机我们不得而知，但其中，难免带有自卑感。知识份子对庶民信仰的焦虑，某种宗教生活上的审美需要，与不甘流于庸俗的苦衷，也许他在蔑视一切圣像的回教徒面前，感到苦闷吧！因为希腊人不甘心在信仰上，不如阿拉伯人。

皇帝的谕令公布后，引起整个希腊教会的激烈反应，反对最为激烈的是各隐修院中的隐修士，流血殉道的事件，不断发生。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提出了严重的抗议，因此触怒了皇帝而被革了职。希腊教会反对皇帝的谕令，同时也反对“国君兼教会的首长”，教会的领袖和神学家们，都发表文章阐释“敬礼圣像”的问题。像圣师达玛森、以及亚历山大里亚、安提约基亚、耶路撒冷三城的宗主教、教宗额我略二世和额我略三世也一致反对，还惩罚了破坏圣像的人，这些都不能劝阻皇帝的行径，而且，皇帝还采取报复手段，迫使伊利贡、西西里、和南义大利的主教脱离教宗的统辖权，要他们去服从君士坦丁堡新任命的宗主教的权威，没收宗座在这些教区的财产。这场冲突于是演变成为教宗与皇帝之间的争执，而不是希腊与拉丁两教会之间的风波。许多希腊的隐修士，逃到罗马投奔教宗，而罗马呢，从这时候开始，希腊隐修士们所建立的修道院不断出现，有如雨后的春笋般。利奥三世的儿子君士坦丁五世，对付维护“敬礼圣像”者的迫害，更为变本加厉，拘捕、放逐、杀戮的事件日益增多，竟在 754 年下令召开“主教会议”，贬抑圣像的敬礼，但是，却不被全教会承认。君士坦丁五世去逝后，传给利奥四世，利奥四世去逝后，改由他的妻子依来纳摄政，她也重申禁止使用圣像的谕令。公元 787 年，塔拉西的宗主教和教宗哈德良一世的代表，在尼西亚召开大公会议，会议中，清楚的解释了敬礼圣像的真正意义，说明：并非敬礼圣像的本身，而是敬礼圣像所代表的神人。并且，对“敬礼”和“崇拜”两个神学名词也详细的加以分析，说明“敬礼”，是对圣人圣女，而“崇拜”则是只表示对天主才有的朝拜钦崇，所以，规定教友可以敬礼圣像。

“敬礼圣像”的争执，不幸到第九世纪又死灰复燃，皇帝利奥五世在 754 年又再次召开虚有其名的公会议，把反对他的宗主教尼采福加以革职，教难又起，希腊神学家们群起驳斥皇帝以维护教义，其中还包括了君士坦丁堡修道院的院长德道，他也被皇帝放逐。一直到公元 843 年，摄政的女皇德道拉结束了这一连串的纷争，重建和平，恢复圣像的敬礼，并且宣布，希腊教会在封斋期的第一个主日为“东正教”的大节日，来纪念历史上所发生的这件令人难忘的事件。

在圣像问题争论期间，几位教宗和大部份希腊教会联合应付困难，使得罗马和希腊，在教务上有了比较强的连击，但是，这次圣像之争的后遗症却很大，东方的主教大部份都是袒护皇帝、畏于皇帝的权威，而反对圣像敬礼的。教宗既然卫护教会传统的习惯，声明“敬礼圣像”为合法，因此，这些东方教会的主教们，始终有着芥蒂而耿耿于怀，反对罗马的情绪也日益加深，这种对立的形势延长了一个世纪久。在圣像之争时，教宗与皇帝之间的政治关系破裂，不得不寻求与“法兰克王国”的联盟，不料圣像之争平息不久，罗马与希腊教会分裂的悲剧随即来到，虽然分离的远因，已经由来已久，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但其中也有个人因素，但也并不是势在分至的，在拜占庭教会历史中，也找不出与罗马关系日益恶化的记载，而直接造成这场历史大悲剧的人物是佛西乌斯。他是希腊教会中杰出的人物，教文学的泰斗，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他和弥格尔塞鲁来两人揭竿对抗罗马时，引起了东方主教们极大的同情，终于演变成，东西教会正式分裂不幸的历史悲剧。

公元第八、第九世纪，东西双方教会为了神学上的问题，诸如“一意论”以及“敬礼圣像”等问题，发生争执，最终这些问题最后解决的途径，但是这些问题缺造成了一些后遗症。下面是要说东方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佛西乌斯和以后一世纪的弥格塞鲁来宗主教与罗马教廷的关系。下面介绍两位东方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在他们所处的时代与罗马教廷的关系，以及所导致的影响和后果。

2.3.4 非法祝圣事件

“敬礼圣像”的争执结束才刚过了四年，东方与教宗的冲突，不幸又再掀起。从公元847年，作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依纳爵·道德，他虽然很不平凡，不过个性未免太刚烈，因此当公元858年，在拜占庭宫廷助理国务的巴氏，因为品行恶劣，被依纳爵·道德开除教籍，巴氏为了报复，将依纳爵·道德革职，而且，还遭到放逐的命运。巴氏并且还指定由佛西乌斯为依纳爵·道德的继承人。佛西乌斯曾经担任政府的要职，不但出身显贵，而且学问渊博，不过当时的佛西乌斯还只是一位普通的教友而已，尚未得到罗马的许可，对这一点，皇帝认为无关重要，于是在短短几天之内，就赋给他全部的“神品”，而且在858年的圣诞节祝圣为主教之后，就出任宗主教的教职。在君士坦丁堡，有许多人认为这样的提升为宗主教是不合法的，何况一位完全没有“神品”的普通教友，这样的一步升天，也与教会的惯例不合，更何况依纳爵·道德宗主教的被逐是否合法，也被质疑，依纳爵·道德就向教宗尼各老一世请愿，教宗立即采取行动，一方面声明依纳爵宗主教的被逐不合法，同时也宣布佛西乌斯被立为非法，开除了佛西乌斯的教籍，佛西乌斯不但不服从教宗，反而于867年在君士坦丁堡擅自召开主教会议，散布攻击拉丁教会的文件，指责西方擅行改革，尤其是对“信经”的修改，宣称教宗是异端份子，要罢免教宗，开除教宗的教籍，这真是千古未有奇闻！他甚至还要求法兰克王路易二世执行他的这项决策，他并非真正希望西方的国王背弃教宗，而是想表示他不承认罗马主教的“首席权”。双方紧张的情势已经达到了高潮，不料几个星期后，支持佛西乌斯的皇帝被人杀害，凶手又自立为皇帝，他就是巴西略一世。他把前任皇帝弥额尔三世的一切措施完全推翻，将佛西乌斯予以免职，恢复了依纳爵·道德的宗主教的职位，并且与罗马教宗言归于好，并于869年到870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大公会议，谴责佛西乌斯，承认依纳爵·道德的合法职权，教宗还把才皈依基督的布尔加人归入拜占庭宗主教的管辖之下。依纳爵·道德宗主教去逝以后，皇帝巴西略一世竟然任命佛西乌斯再度出任宗主教之职，这次呢，教宗若望八世接到了巴西略一世和佛西乌斯善意的报告之后，在897年承认了他的合法职权，取消了869年时对他的弹劾。佛西乌斯也在879年召开的会议当中宣誓服从教宗，他也获得了大会代表隆重的接纳，教宗若望八世也承认了879年会议的一切议决案，到了886年，佛西乌斯被皇帝利奥六世所摈弃，去职后不久就去逝了。

乍看起来，佛西乌斯的事件，并没有使希腊教会与罗马教会的关系在本质上改观，然而，人民已经习惯了教会合一问题上，所敞开的创伤，无论从那一方面来看，人们总不以此

为分裂的象征。但从佛西乌斯以后，即使是“非形式上”的，至少是“实质上”的分裂的局面，已经是定论。拜占庭对教会的概念已经不同了，他们以为罗马、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里亚、安提约基雅和耶路撒冷五大宗主教区，为教会的主要份子，这样，教会的原来制度根本被否决，直到那时候为止，拜占庭的神学家们，从来没有否认过“伯多禄继承者”的首席权，当代的神学家则日渐趋向以“教宗为西方的宗主教”的信念，他们却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除了君士坦丁堡以外，其他的三个宗主教区的存在，已经是虚有其名了。同时，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区所管辖的地区极其的狭小，而罗马宗主教则掌管整个其他的基督教的领域，其实呢，这个新的概念，在佛西乌斯以前早就已经流传甚广，佛西乌斯可以说是东西教会分裂，精神上的导演，他所添加于危局的唯一的因素，是对罗马和拉丁事物的一种憎厌蔑视的态度和情绪，使得以后所有合一的努力，都不能凑效，教会历史学家海尔根脱枢机在 19 世纪发表过有关佛西乌斯的著作，这本著作影响了今天历史很深。海尔根脱详细讲述，从反感到憎恨的历史过程，认为它渊源于帝国首都东迁的时候，从另一方面看，在佛西乌斯以前，希腊教会的丰富的神学、哲学和文学作品，并没有嫉恨罗马的痕迹，当然有些人与教宗发生过冲突，他们常不满罗马的措施，但是，他们给终服从教宗，奉教宗签定的教义为圭臬。在佛西乌斯的时候大势回转，他以一位博学的教友把希腊民族的虚荣心，导入宗教领域内，他们从此以后不愿意再依持教宗，“敬礼圣像”的争执就是一个例子，他们也不再提“伯多禄借教宗利奥向我们说话”这句“加彩东大公会议”的名言了，他们与罗马教宗的关系，祇是在共同磋商而已。

2.3.5 东西教会的正式破裂

东西教会的正式破裂，终于在佛西乌斯去世后 150 年左右发生，这次破裂的主要原因是弥额尔·塞鲁来的野心，他决心要作东方的教宗，因此，处心积虑的要故意造成不可挽救的分裂。公元 1053 年，他突然向罗马挑战，把在君士坦丁堡的“拉丁礼”圣堂和修院全数封闭，并且大事渲染，痛责拉丁教会，同时致函罗马，极尽诋毁所能诋毁的事情。他指责罗马教宗否认圣经、擅自修改了基督和宗徒们的道理，那么，究竟构成他指控的罪名是些什么？像是罗马教会在弥撒中用的是无酵饼、星期六守大斋、封斋期内不唱阿肋路亚啦！诸如此类的罪名，谁都看得出来，这些和基本信条并不相干的，只是一些无关重要的外表礼规而已，可是，拜占庭方面对于这些却特别的重视。教宗利奥九世愿意避免破裂，为了解决这些争执的问题，派了一个以亨拜枢机为首的使节团，前往君士坦丁堡，受到皇帝的慰勤招待，可惜亨拜枢机性情过于急躁，缺乏外交的圆滑手腕，不是一位适当的人选，弥额尔·塞鲁来被使节团傲慢的态度所激怒，鼓动民众反对拉丁教会的人员，不准他们进入圣堂举行弥撒，亨拜枢机面对这种敌视的态度，他就和他的同伴在公元 1054 年 7 月 14 号，唱着大日课进入圣索菲亚大教堂，对弥额尔·塞鲁来的固执表示抗议以后，将开除教籍的敕书放在祭台上，然后走出圣堂，并且还将鞋子上的尘土踩下，还大声喊说：“愿天主鉴临、评判我辈！”弥额尔·塞鲁来不肯低头，把开除教籍的敕书当众焚毁，还为了要争取东方教会领袖们的同情，把亨拜枢机的措施尽力予以曲解，以激怒他们，然后他居然以基督真教会唯一的代表自居，东方的一切教会都随他而去，分裂的局势就这样形成了，而这时希腊教会的传教士们，正向异教的俄罗斯宣传福音，因此，俄罗斯也在无意中被拖入裂教的集团。

对于东西教会的分裂，当时在西方对这事所造成的影响不大，因为对西方而言，人们以为拜占庭与罗马之间的纠葛已习以为常，谁能相信这事件，造成东西教会的决裂竟是如此巨大的悲剧？所带来的伤痛一直延续到今天。教会所受到的打击，和受到回教徒的打击一样。佛西乌斯时代或十一世纪时，当分裂的局面在形式上，已经成为定论时，这个创痛似乎较为轻微，因为拜占庭帝国已经逐渐衰弱，尤其在十一世纪时，它的心脏地带小亚细亚，陷入塞耳柱土耳其人的手里，皇帝仅仅能够局守着人口稀少的巴尔干半岛和君士坦丁堡。离去的希腊教会的教友，比起欧洲，正不断增加的隶属于教宗的教友，在数量上成了少数，西方教会，

受东边界限的限制始终无法突破，阻隔了它向欧洲东北部和亚洲北部的发展。回教势力的崛起和希腊教会的离去，使教会在漫长的中古时期，全神贯注在中欧和西欧，从教会的普世性而言，这真是件遗憾的事。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几个世纪的局守禁锢，使得教会的内部改革整顿而能强大茁壮起来。教宗独撑一面，在教务上，虽然仍不免有争执磨擦的事，但是在亚略派异端的风波以后，以拜占庭为中心的类似纷扰，就已经不再发生了。而拜占庭方面呢，独立以后的损失，要比罗马方面所遭受的损失更大，西方教会虽然没有了拜占庭，它依旧发展成为普世性的教会，萌芽结实，协调如一。东西教会分裂后，难道就不曾努力谋求和好过？以前双方也有过破裂，但是，每一次破裂后不久，都重归于好了，而这次却造成了，九个世纪不曾和好的分裂局面。罗马公教会并不是忍心置之不顾，曾经为合一修好作过多次的尝试。公元 1274 年在里昂举行的大公会议中，双方的代表都曾在合一的宣言上签了字，但并未能持久，到了公元 1438 年“佛罗伦萨会议”时，也曾表现过接近，但是也没有下文。东方教会，他们自称“东正教”或“希腊正教”，自从与罗马分裂以后，由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独掌东正教，在历史过程中，东方建立了各国独立的教会，各自为政，不相隶属，使得宗主教的权力逐渐的削弱了。东正教和罗马公教，有同样的信条也有七件圣事，也敬礼圣人圣女，在道理方面也没有太大的分歧，外在形式的礼仪方面稍有不同。主要的对立，还是在东方拒绝接受，教宗对全教会的首席地位。实际上使得双方分离的，还是双方的不谅解、不信任、各有成见，这些都是过去历史的累积，希望按照基督的圣意重建统一的教友们，应当努力避免不必要的对立，达成彼此间的谅解尊重和友爱。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在 1961 年召开“梵二大公会议”，就申明双方的合一是会议的目的之一，正是大家放下偏见，给一切承认，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建立者和领袖的教会，记取历史的教训，准备合一的途径。毕竟，这是若望福音第 17 章，耶稣基督在最后晚餐中的祈祷：“叫他们合而为一就如我们原为一体一样，我在他们内，你在我内，使他们完全合而为一。”

2.4 教会在北欧与东欧的发展

2.4.1 北欧的归化

圣教会活跃的最明显证据，是它虽然在这几个黑暗世纪内，经历了许多动荡，却仍旧继续它那和平进军，北欧和东欧就是在这时期获得了信仰的光照。对这件伟大的事业，东西双方的传教士都在教宗的支持之下分担了工作，从第九到第十一世纪的发展，这里不会去刻意说明工作人员属于东方希腊教会或属于西方拉丁教会。下面开始说说北欧和东欧的传教历程。

首先，先来了解北欧斯堪地那维亚半岛上的居民，他们归化加入基督教世界的经过。住在半岛上的民族，就是我在前几集中，曾经提到的诺曼人或维京人。从第九到十一世纪的三个世纪中，出没无常地，不断到信仰基督的地区去抢劫，现在轮到他们要求领受洗礼了。天主教，很缓慢的由商人，特别是由已经领洗奉教的奴隶，开始移入这个地区，不久传教士也试图来到这里，使这些民族有机会领洗奉教而归正成为教友。公元 826 年，兰姆的总主教艾彭带着教宗钦使的身份进入丹麦。三年后的 829 年，法国北部的一位修士安斯卡，他率领着几位传教士，深入这个异教地区，并且，还从丹麦进入瑞典。安斯卡升为主教之后，又去过好多次斯堪地那维亚半岛。不过，这几位大胆开荒者的努力，并没有好的效果，归化的教友并不多。只不过把那些外国商人和奴隶团聚在一起而已。在斯堪地那维亚跟法兰克人一个样，有君长的示范，当地的人才肯归正。丹麦的归化是由国王圣哈拉的率领；挪维的归化则由国王奥拉夫带领。天主教传入瑞典比较慢，大卡努特国王把征服来的英吉利、丹麦和挪威都并

入瑞典的版图，大卡努特国王是一位热心的信徒，曾经到罗马去朝圣，在那里完成了道德和心灵的陶冶，回到北方后，努力扫除瑞典国内的异教氛围。

冰岛是德国人开的教，公元 1000 年，冰岛的居民全体大会决定，天主教是冰岛唯一的宗教。格陵兰的天主教，是由冰岛传入的。今天的格陵兰遍地冰雪，当时的气候却比较温和，近来发掘的许多圣堂和修院的遗迹，足以证明当时是教堂林立，教会相当发达。到了公元十二世纪初期，斯堪地那维亚的全体居民都信奉了天主教，当然还残存着不少的异教习俗，在以后的岁月里，受到天主教文化的熏陶而逐渐的绝迹，在那些地区已经有了直属罗马的当地主教，而且成为传教的中心。

2.4.2 斯拉夫民族的归化

接下来谈谈斯拉夫民族的归化经过，来自俄罗斯的斯拉夫民族部落，在公元第三和第八世纪，占据着中欧和东欧的大部份，他们那骁勇善战、厌恶权力，不愿受羁绊的性格，使他们在第九世纪以前，还没有组成真正的国家。他们以打猎、捕鱼、种田为生，过着半游牧的生活，希腊人对他们的褐发和巨大的身躯，很感惊异，但是，也很羡慕他们那种好客和诚恳的态度。这些部落的文化水平虽然不高，不过呢，很爱艺术，尤其是对音乐的爱好，他们信奉一位至高的神明，万物的主宰、雷电的创造者，但是，也敬拜其他的神祇，比方说，太阳神等等。他们很明白容纳更高文明的需要，实际上是自从信奉了天主教以后，才逐渐的走向文明。住在多瑙河流域的斯拉夫人，逐渐的开始和西方拉丁教会与东方希腊教会的教友们有了接触，早在查理曼时代，便有拉丁和希腊的传教士和修士进入斯拉夫地区。但是，他们的归化工作，大部份应该归功于来自拜占庭的两位传教士，他们是圣济利禄和圣美多第弟兄两人。在公元 862 年，在今天的捷克斯拉夫境内，有一位已经受洗的国王，名叫拉第斯劳，给拜占庭的皇帝去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说：“有不少的传教士，从义大利、日尔曼和希腊来到这里，带来了各种不同的教义，但是，我们斯拉夫人头脑简单，没有一个能指示给我们真理究竟是什么，所以，请您派遣一位能通晓斯拉夫语言的人来，希望他能按照真理说话。”皇帝接到信以后，就派遣了圣济利禄和圣美多第两弟兄。他们两位出生于显贵的家族，生于萨罗尼加，从小就经常和斯拉夫人有了来往，所以能通晓他们的语言。两弟兄都曾担任过政府的重要职务，弟弟济利禄更为聪明，是一位卓越的哲学家，会说好几种语言，两兄弟都向往修道生活，两兄弟以全力从事于被委任的工作，而成为模范传教士。斯拉夫人一直都没有文字，圣济利禄为他们发明了斯拉夫语文，用来方便书写，还把一部份的福音翻译成斯拉夫文，两兄弟用斯拉夫语讲道，听众听到的是自己的语言，而且，讲道的两兄弟又很熟悉斯拉夫人的文化，对斯拉夫人来说，真是又惊又喜。济利禄又把斯拉夫文应用在礼仪和祈祷当中，这么一来，便招到了拉丁礼主教神父们的反对，甚至还被指控是异端。说实在的，在西方的礼仪中从来没有用过蛮族的方言，这事儿传到了教宗那儿后，他就被罗马传召。教宗哈德良二世不但没有谴责他，还热诚的款待他，并且还祝圣两弟兄为主教，他们的圣德和对宗座的服从，使一切谣言都一扫而空。可惜几年来的长途跋涉，以及过度的操心劳累，使得济利禄精力疲惫，他自己知道离死期已经不远，就退到一所隐修院中，在门徒们的环绕之下，死于他哥哥的怀抱中，临终的时候，再三的告诉哥哥，千万不要放弃他们所从事的传教工作，美多第就以教宗钦使兼总主教的身份返回传教的基地，又继续工作了十五年，往后他又被控，而且被人押回罗马，直到教宗传令下来，才被释放，他的许多门徒在 885 年，他去逝以后，带着他的著作和他所写的斯拉夫文的礼仪，传入了保力利亚。

2.4.3 波西米亚与波兰的归化

下面来谈谈波西米亚和波兰的归化。波西米亚，是在现在的捷克境内，也是由圣济利禄和圣美多第兄弟两人开始传教的工作，而由来自德国的传教士继续未完成的事业。这期间遭到不少剧烈的反对，文思老从小受了祖母良好的天主教教育，在公元 925 年，入继大统，他以全力卫护圣教会，因此，被充满野心的弟弟杀害后篡位，好在致命的血没有白流，凶手后

来悔悟改过。文思老也被教会列入圣品，同时也成了波西米亚的主保。圣教会在波西米亚也从此根深蒂固，福音也由波西米亚传入邻近的波兰。大约在公元一千年左右，传教工作一帆风顺，并且开始建立了教会圣统制，这是波兰和波西米亚的归正。最后，要讲的是匈牙利的归化。公元第九世纪时，匈牙利人入侵中欧，他们是来自东方亚洲的游牧民族而非斯拉夫人。匈牙利人长期的对中欧骚扰和劫掠，又驱走了附近的居民，然后，就在多瑙河的大平原上定居下来。传教士虽然对他们大力传教，但是，成绩都不好，一直到公元 997 年，已经领洗奉教的斯德望一世国王入承大统，而且娶了一位德国的天主教公主。斯德望一世以全力设法使他的百姓也归化入教，他请来了许多本笃会的会士，修士们在匈牙利境内，建立了大批的农村，同时教导他们文化和信仰，全国也成立了十个教区，从此以后，匈牙利的教化工作获得了成效。斯德望一世在公元 1038 年，将匈牙利全国奉献给童贞圣母玛利亚，不久以后，他就与世长辞了，他被公认为是最理想的天主教国王，他的爱德和慈善，直到现在还脍炙人口，被尊为“圣王”。

2.4.4 俄罗斯的归化

北欧斯堪地那维亚居民的归化奉教，多瑙河流域的斯拉夫民族，包括摩拉维亚、波西米亚、波兰的先后归化奉教，以及来自东方的游牧民族，匈牙利人的归化。下面去了解另一支斯拉夫民族，就是俄罗斯归化信奉耶稣基督的经过。我们都知道，俄罗斯有迹可考的历史，大概从第九世纪才开始，这时候的斯堪地那维亚人从瑞典闯入东欧的心脏，然后集合了那一带的斯拉夫人建立了一个国家，建都于现在乌克兰的基辅。俄罗斯人也开始有机会和信奉耶稣基督的商人来往接触，也有机会与来自西方以及拜占廷派往的传教士来往。但是，教务的进展在公元 945 年，女王奥肋戛领洗奉教以前，是非常的缓慢，一直到公元一千年左右，天主教才开始长足的进展。主要的推动者是圣伍拉蒂米尔。他是女王奥肋戛的孙子，他起初对天主教持反对态度，等到他登基以后，才发现，如果不信奉天主教，便无法和已奉教的邻近国家相互抗衡。相传伍拉蒂米尔，愿意给自己的百姓一个最高尚的宗教，于是就派遣代表到西方各国，去考查这些国家，他们所信奉的宗教。考查员到德国，认为他们的礼节太简单，到了君士坦丁堡，他们亲自参加了在那里所举行的礼仪，大为惊叹的说：“我们不知道是到了天堂，或是仍然在尘世上，在人间恐怕没有比这儿再美、再隆重的礼仪了！”这呢，也未免太夸张了些，但却具有很深的意义，它表示从伍拉蒂米尔欲使俄罗斯归化奉教时，俄罗斯人就已经是偏爱东方的希腊礼仪，连伍拉蒂米尔本人的婚姻，也选择了一位拜占庭的公主为皇后，他们结婚以后，就把一切偶像都销毁掉，人也成群结队的到河里接受洗礼。俄罗斯境内，所建造的圣堂，也都仿照了东方希腊式的式样，有金碧辉煌的圆顶，派到俄罗斯的主教也从拜占庭带着希腊文的经典而来。他们也从保加利亚接受了圣济利禄的斯拉夫礼节，似乎可以说，基督教义是借着礼仪，而不是借着宣讲而传授。

俄罗斯如此的迷恋着拜占庭，为他们的前途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俄罗斯全民奉教以后不久的 1054 年，拜占庭便与罗马教会正式分裂，俄罗斯虽然没有表示要离开罗马，但是无形中也演变成为同样的分裂的局面。拜占庭引以为荣的，是使这个民族信奉了基督，他们的信仰一千年来，仍然是那么的根深蒂固，以致共产无神的社会主义和统治，虽然骚扰了七、八十年，仍然无法消灭俄罗斯民族的宗教信仰，我们所看到的反倒是俄罗斯共产集权统治的瓦解。有三个世纪之久，赖着传教士这批无名英雄，不眠不休的努力，使圣教会从过去局限于西欧、地中海周边，向北欧和东欧，有着惊人的进展，以至于整个儿的欧洲的所有民族。可惜的是，这种艰辛的传教工作，一直被忽略，缺少确切的记载。这真是欧洲历史和教会历史上的重要损失。而回教的侵略，虽然给天主教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但是在北欧和东欧的发展，却给了教会丰厚的补偿，套句成语可以这么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

3 中古全盛时期

3.1 中古全盛时期的教会

3.1.1 中古时期教会的生活情形

从下面开始，我们的脚步，就要跨入中古基督教世界全盛的黄金时代。经过了从罗马帝国的衰败灭亡，蛮族的入侵而导致的一切动乱，一种新的文化逐渐的酝酿而成，其中包括了下面的几个因素，一是希腊罗马文化的残余影响；二是日尔曼蛮族们的传统；第三呢，则是渗透了一切的基督教精神。自从第十一世纪以来，历代的教宗努力清除玷污教会的许多弊端，尤其是圣额我略七世的艰苦奋斗，终于挣脱了日尔曼皇帝们的干扰，恢复了教会所应有的独立自主。

圣教会也就从这时候开始重新奋起。中古时代的文化在十一世纪末期到十三世纪的末期，达到了最高峰，并且实现了历史上仅有的一种社会状态，也就是说，欧洲的各个民族，虽然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政治，和各自不同的习俗，却形成了一个清一色的社会，因为彼此之间的联系因素，并不是一个共同隶属的国家元首。换句简单的话说，维系彼此的不是人，而是一个共同的信仰、一个共同的理想。各民族都晓得自己和其他的民族都是一个在天之父的子女，耶稣基督的弟兄，也都承认教宗是唯一基督在世的代表，连政治、武力也得在神权之下低头。教宗在这时期，鼓励教友们组成了十字军，以武力去解救被回教徒所占领的圣地。强度而虔诚的宗教生活，具体的在和平的事业上的表现，比在军事上的成效更大。例如，创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大学；建筑了富丽堂皇、美轮美奂的大教堂，传教士远来东方传教，也是在这个时候，正是我们元朝忽必烈的时代，还在北京，当时称大都的地方，建立了一个主教区。欧洲新兴的民族国家，也都在共同信仰的联系和教宗的领导下，处处表现了活泼的生气，显示了宗教生活的新面貌。当时的环境，有利于文化的发展。蹂躏欧洲长达六世纪的蛮族入侵已经中止，无政府的状态也随之消失，封建的制度也逐渐形成，人口也不断的增加，工商业逐渐发展。蛮族入侵时，人都逃亡到乡野之间，而这时城市生活活跃了起来，不但是商人多聚集在城里，连读书的知识份子，建筑雕刻及金银细工等工匠们，也都在城市里工作生活，以圣堂为中心的圣堂学校和高等学府，也都纷纷的成立了。德意志、英吉利、法兰西、西班牙等，也都在此时完成了现代国家的雏型。而当时的义大利已经被公侯和独立的城市所瓜分，中央则为教宗的领土，这些国家有时候和平相处，有时候爆发战争。当时的欧洲，似乎和十九世纪表面上没有多大的分别，最为奇特的就是，中古欧洲各国之间的战争，多起于国王、公侯和军队之间的冲突，而民族之间则很少彼此敌对，交战双方的首长，从来都没有想过拘留敌国的人民而囚禁在集中营中，百姓可以自由出入而没有什么国境的限制。圣伯多禄的宝座，也可以是义大利人、德国人或法国人来继承，一位义大利籍的主教，他可以到英国去掌理某个教区；一个英国籍的主教，他也可以在法国掌理某个教区。在巴黎大学，有着来自各国著名的学者担任教席，所招收的学生也来自欧洲各地，这种现象都是极为平常的事。拉丁文是当时知识界共通的语文，也是国际之间外交的语文，几乎人人都懂。在艺术界也是一样，建筑圣堂的工程师、建筑师、雕刻师，以及其他的技术工作者，都可以自由的来往欧洲各国去工作，欧洲各民族不在国籍上作不同的划分，形成了一体，分享着同一的文化，当时的欧洲，这种合一的形成，并不是建立在土地、种族或语言的一致上，而是因为各民族都有一致的宗教信仰，形成一个基督教世界。人民团结的意识感，是来自圣教会，教会的训导是一致的，信友们观点一致，形成共识。凡是领洗的人，都是耶稣的苦难圣死所救赎的，同为一个在天之父的子女，每一个人都是基督奥体的肢体，这种信仰是普遍的，怀疑天主的存在或对

天主漠不关心的人很少，更没有所谓的“无神派”。教友虽然已经领洗，但仍然带着人性的弱点，言行和信仰不符合的也处处可见，习俗或行为有时也很粗野，但是行为不检点的人，晓得自己是犯罪，也知道必须悔改才能得到宽恕，甚至有时候，他们作补赎的热情，比犯罪时的欲情更加的热烈。信仰主导了社会 and 个人的全部生活，可以说，天主教的气氛弥漫了整个儿的欧洲，教堂的钟声成了日间生活的节奏，教会的日历是他们一年中，生活行事的指南，主日是公订的节假日，节日都与纪念耶稣一生事迹的纪念日。此外，也包括了纪念圣母和圣人、圣女的瞻礼。每一个人，一生中的重要阶段，都被七件圣事所圣化，婴儿出生后不久，便由家人抱到圣堂去受洗，通常也同时领坚振，教友一年办好几次告解，也多次领圣体，不过，没有像今天这样，只要望弥撒就去领圣体的习惯。除了很少的特殊情形外，听告解的神父，所加给前去告解的教友们的补赎都不是公开的，不过，要比现在的重多了，多半是长久的祈祷、守斋、施舍等，有时候也会命人到某地去朝圣或参加十字军。主教给那些愿意献身事奉天主的人，祝圣为司铎，要结婚的男女，应当在神父面前表明双方的意愿，并且接受神父的祝福，最后，当人走到生命的尽头要脱离尘世的时候，神父会为病人傅油，减轻临终者的神形困苦。

通过上面我们可以知道教友一生的重要阶段，都由所举行的七件圣事而得到了圣化，而每天的生活呢，也都在祈祷的氛围中，他们当时念些什么经文呢？天主经、信经自然早就通行，现在的教友所最爱念的，敬礼圣母的经文，像万福玛利亚和恭贺圣母等，也是当时所流行的，这证明了中古世纪已经热心敬礼圣母了。而对圣人圣女的敬礼，也已经通行，信友们很爱阅读圣人圣女们的行传，也习惯的会请圣人圣女在天主台前为他代为祈祷、也尊奉他们为模范，作为自己的主保和卫护者，将他们的圣像雕刻在石头上，或则呢，绘制成彩色玻璃作为圣堂的装饰，此外，对他们的遗骸也特别敬礼，每年在他们的瞻礼日或天灾流行的时候，抬着圣人圣女们的态像或遗骸，在村中游行。

下面为各位描述，中古时代的几种热心的事迹。然后再看看当时教会内的朝圣活动，以及对劳工问题的态度。还有在教会内教友们爱德的具体表现。中古时代的教友，无疑的是倾向信仰的，他们并不需要像近代历史家所要求的证明，就会以信德和虔诚相信圣人行传上所记载的奇迹，以至于，在敬礼圣人遗骸上，往往掺杂了一些迷信的色彩，甚至有人为了能获得珍贵的遗骸，便不惜采取不很正当的手段，甚至有人为了能获得珍贵的遗骸，便不惜采取不很正当的手段，甚至连隐修士们也不例外，还有的更假造遗骸来贩卖图利的呢！圣教会有的时候就必须出面纠正，敬礼圣人圣女的遗骸本身固然是无可厚，但是，提醒他们勿忘基督，才是一切圣德的完美模范和根源，才是教会的主张。到了 12、13 世纪时，教友们已经和以前有所不同了，他们都更注意到，救主耶稣的天主性，对耶稣的天主性特别的尊敬。教友们尤其欣赏降生成人的天主，卧在马槽中的耶稣圣婴，以及为世人承受苦难和死亡的事迹。圣“五伤方济”发起并推动在圣诞节的时候，在修道院、在圣堂、在家庭里布置马槽，来纪念耶稣的降生奥迹。从此以后，也就相沿成习，一直到今天，已经成为全世界最普遍的，在过节时不可少的习俗之一了。

中古世纪的教友，感觉在圣堂内如同在自己的家一样，主日和瞻礼日，喜欢在圣堂里消磨很长的时间，在广阔的圣堂穹窿下，彩色玻璃窗在阳光的照射下，所映现的美丽图像，礼仪的庄严、祭衣的富丽、圣乐的和谐、合唱歌声的韵致，这些都吸引着教友们的心灵，何况这时期，既无报纸、收音机、电视、电影、KTV、电脑、网络之类的工具作为消遣，所以教友们在圣堂里都能安心听讲，讲道的神父，或是讲解圣经或是阐明当天所庆祝的耶稣基督的生平事迹，有时候，为了使道德的讲道更加的清晰动人，便增加了比喻或是有趣的故事，教友也可以当场提出问题，请神父解答，难怪他们能一连静听两个小时也不感到厌烦了，当时神父不只是在圣堂中讲道，既使是在公共聚会时，在市场、广场，以及婚丧筵席前，也常有人讲道。此外在各种不同的时日，尤其是在圣诞节和复活节的时候，会在圣堂里表演圣经的

故事，演员大都是司铎或其他品级的神职人员，穿着依剧情的需要而设计的服装，表演牧童和贤士朝拜耶稣圣婴，或是耶稣受难的故事，或是复活节的清晨，圣妇去圣墓的故事。开始时，先念几节圣经，随后就用当地的方言代替拉丁文来加以表演，因此这一类的表演，就像礼仪的延续一样，但是，演戏的部份不在圣堂里，而是在圣堂外面的广场上表演，有时候情节也不限于圣经的记载，也穿插了圣人的行实和想像出来的动人情节，到了中古时代的末期，也就演变成为宗教性的戏剧。

在当时还有另外一种信仰的表现，在中古时代教友的生活中，也占了重要的地位，那就是“朝圣”的活动，这种朝圣的活动开始于初世纪的时候，是有一批一批的教友从其他教区来到罗马，在伯多禄、保禄的坟墓前举行敬礼和祈祷，或是到巴勒斯坦去朝拜耶稣曾经住过的地方，以及耶稣受苦钉死和埋葬的地方。蛮族入侵时，虽然各地有战乱，并没有使这种朝圣的活动完全中止，战乱平息以后，朝圣的教友又不绝于途了，而且，有更加频繁的趋势。究意为什么盛行这种朝圣的风气呢？原来呀，参与朝圣活动的信友们，大都是为了向天主请求某种恩惠，比方说，请求疾病的痊愈啦！或是恳求赦免某种罪过啦！或做补赎啦！或者只是为了表现信德、赞美光荣天主和祂的圣人圣女们，或者呢，是为了修德立功而去罗马、耶路撒冷或是西班牙的圣地牙哥。相传圣雅各伯宗徒的坟墓在圣地牙哥。也有的去各地为奉献给圣母的圣母堂朝圣。那些旅程也都相当的遥远，而且危险重重，既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还得餐风露宿，比方从巴黎到罗马，往反就需要八个月，去耶路撒冷就要花上三年的功夫，然而所看到的往反朝圣的教友却是络绎不绝。据统计，只是去圣地牙哥的每年便有 30 万人。公元 1300 年，教宗鲍尼法爵八世建立圣年大赦时，到罗马朝圣的，一年竟达到两百万人。再从另外一件事上，可以知道圣教会的精神和价值观，已经普遍的渗透到教友们的整个儿生活。对教友而言，工作已不再只是为挣衣食不可少的方法，而且是对团体的一种义务，也是圣善的活动和立功的泉源。农人耕田，工人打铁、锯木、制革都是在行善立功，为他人服务，储备自己升天堂的财宝。教会不断的重复着圣保禄说的话：“谁不工作，不配吃饭”的工作率。也把大圣若瑟这位木匠和工匠之子纳匝肋的耶稣，作为劳工的模范，过去那种轻视劳工的态度，已经逐渐的被扬弃，同行同业，组合在一起，制定生产的方法，形式和工资；同时也是彼此互助的机构，以便救助生病和年老的工人，它也是各种善会，每一种善会，都有它自己的主保圣人，特敬主保圣人的节日和供奉主保圣人的祭台，会员们会以弥撒和聚餐来庆祝，它也照顾同行会员的丧事并为亡者祈祷，主日和大瞻礼，一律停止工作，到圣堂去参与弥撒和各项庆祝活动，这样工人们一年当中就有一百来天的休假。

接下来的内容是中古时代，基督徒爱德的具体表现，也就是说，慈善事业盛行的情形。由于当时的政府，一直都不认为有照顾孤寡孤独，以及穷困百姓的责任，而当时天灾人祸还真不少，像战乱、瘟疫、干旱、饥荒等等。救济灾难的组织也就应运而生了。在农村，办理各种慈善救济业的是本堂神父和隐修院，每一座修院都附设收容病人的医院，和招待行旅及朝圣者的招待所，在城镇里，有时候是主教，有时候是修院，有时候也会是某位大公爵或侯爷，或是富有的教友。创立医院，专门在医院照顾病人的修会也是在这时候创立的，他们把贫病、受苦的人，看作是受苦的耶稣基督似的，所事奉这些贫病受苦的人，就是事奉天主、事奉耶稣基督，因为耶稣说了：“你们对我这些小兄弟中的一个所做的，就是对我做的。”

这时候在欧洲正流行痲疯病，那是由东征的十字军和往圣地朝圣的人，在近东被感染后，回到欧洲传染开来的。只在法国一国之内，十三世纪时，就有两千多人染患了痲疯病，于是有许多地方设立了痲疯病院，专门收容已经受到感染的人，有许多修会会士牺牲了他们的一生，在痲疯病院内照顾这群病患。甚至还有身为国王或王后的，以身作则，例如法王圣路易九世、匈牙利的王后圣依撒伯尔都曾亲手去服侍过痲疯病患，由于将这种病人隔离在病院内的措施，到了中古的末期，痲疯病就在欧洲绝迹了。

在中古时代最足以表现教会爱德的，就是专门为赎回被回教徒俘虏而成立的修会。在西

班牙、近东，尤其是在非洲，有许多教友成了回教徒或战争的俘虏，大多是信回教的海盗，在劫掠地中海沿岸时所抓去的俘虏，在人口市场上转卖为奴隶，为了帮助他们获得自由，有一位巴黎大学的教授，名叫若望·玛达的创立了天主“圣三骑士会”；另外，还有两个西班牙人，圣伯多禄·诺拉斯高和圣雷蒙·伯纳福，他们创立了“圣母赎虏会”。在三个世纪中，曾有六十万教友被赎回来。至于这两个修会，以后会有提到。就这样，那里有灾难需要救助，便有教会的人在那儿活动工作，而她的收入也十分可观，除了教友捐献所得的十分之一外，还有自动的捐献和遗赠，这些财产不只是维持了神职人员的生活费，和圣堂里各种敬礼的花费，而且，还挑起了公共救济事业和教育的经费。在今天来看，已经占着政府庞大的预算，而由百姓们纳税来担负，而在中古时代的教们，却是受到福音精神的影响，把受苦的人当作是耶稣的弟兄，因而乐意踊跃的捐献，许多的修会会士更是抛开家乡和亲人，以便能完全献身去服务贫病、痲疯病者和被俘虏的人。

公元 11、12 世纪的时候，新的教区纷纷建立，到 13 世纪时圣教会已有五百多个教区，大部份分布在义大利，尤其是在义大利的南部，在那里有两种性质的教区，一种是罗马与拜占庭所建的古老教区，一种是北欧人所建的新教区。法兰西，在中古时代所有的教省与教区，和第五、第六世纪时大致相同，只增加了一个教区。而在西班牙呢，变化较大，尤其是在公元 1212 年时，与回教世界间一场决定性的战争结束后，除了格拉纳达之外，其他被回教世界占领的地区，又重新投入圣教会的怀抱。公元 1104 年，在葡萄牙境内建立了布拉加总主教区，在英格兰有两大总主教，南部的坎特贝里有 20 个教区，北方的约克，在公元 1188 年以前兼管爱尔兰的九个教区，1188 年以后直属罗马。斯堪地那维亚半岛有两大总主教区和一个主教区。波罗的海沿岸在 13 世纪建立了总主教区辖有七个教区，在匈牙利有两个总主教和十个主教区。波兰教省建于公元一千年，到 12 世纪时，已有一个总主教区和十个教区。至于广大的日尔曼，在 13 世纪时，已有六个教省，43 个教区。

中古时期的主教区，平均比古代教区要来得大，但是教友的人数，却又比现在的教区要少，然而本堂区所统辖的地区确实是很大的。严格的说，古代的教会没有本堂，每一个信友团体有一位主教，那一个地方，需要再成立一个新的信友团体时，就会有一位主教到那个地方去主持教务。从第五、第六世纪开始，小的村落不再设立主教公署，在人数较少的团体里，就由襄助各教区主教的司铎，代替主教行使各种圣事，我们可以说，这就是形成类似现在的本堂的雏形和由来。这些替主教代行圣事的司铎，称为主任司铎。在整个中古时代，这样的一种制度，一直都有它的效能。在每一个城镇，只有一位主任司铎和数位辅理司铎，许多在中古闻名的主座堂，也都充作城市大教堂，或则是“咏礼司铎”专有的教堂，什么是“咏礼司铎”？在谈到各种新兴修会团体时，我会为各位再作详细的说明。像维也纳的圣斯德望堂，慕尼黑的圣母大堂、福瑞堡大堂，布鲁塞尔的圣古迪尔堂等，这些著名的大堂，都是当代有名的咏礼司铎们专有的教堂。十三世纪时，一般乡村里面，很少有主任司铎的设置，有本堂的乡村，就显得相当的特别了。比方，在日尔曼，有些乡村竟取名为本堂区教堂、教堂村，在义大利则有本堂、卡道莱的本堂、本堂城等名称。第十三世纪初年，太过于大的本堂呢，为了管理上的方便，就划分成几个比较小的堂区，但是，旧的总堂，仍然保持它原有的权利，像圣洗圣事，就必须回到旧本堂来举行，还有一年当中，几个重要的大瞻礼，信友们就必须回到旧本堂来参与弥撒，以及各种庆典活动。在十三世纪的这段时间，日尔曼的境内，建造了许多属于哥德式的乡村教堂。

中古时期，有关司铎们的林林总总，现在简单的说一说。在中古时期，司铎的人数很多，在训练和资格的选择上，当然都不如我们现在的严格要求。虽然在十三世纪时，已经设置了大学的神学课程，但是还没有什么显著的教学目标，大学的课业也不是晋升司铎之前所必修的。相传只有百分之十的中古司铎受过大学教育，在当时也并非所有的司铎都热心于救灵魂的工作，大多数是在地主的保护下，管理着私人教堂，成为私有教堂财产的主人或是做咏礼

司铎，他们唯一的责任就是在规定的日子举行弥撒圣祭，而咏礼司铎还须咏唱日课经文，在这种情形下，这样的教堂，根本没有要理班的存在，乡村居民对宗教也一无所知，信友们也不敬重那些学识肤浅，往往又行为失检的司铎，而隐修士，特别是度着严肃清修的克吕尼和熙笃会的修士们，就大受信友们的爱戴，这些隐修会，我会在后面再详细的为各位介绍。

第十一世纪，教会革新运动最大的课题，就是如何提升司铎传教救人的热忱，因为革新运动的重要人物，大多数都是出身于克吕尼以及相类似的隐修院的修士们。这时期教会的革新运动也就洋溢着修道精神。他们提倡，以修道生活的方式作为司铎们日常生活的规范。这种风气，在教会内并不能算是一种创新，各位一定还记得，我曾提过，在第四世纪末期的时候，维赛利的欧瑟比和希波圣奥斯定主教，都曾经以修道生活来培养训练司铎。主教会议时也常谈论到这个理想，但是从来没有在整个教会内切实的实行过。在第八世纪时，梅池的主教克罗特冈，依照隐修生活的方式，为他的咏礼司铎订定了一些规章。在公元 817 年，法兰克国王圣路易九世所召集的主教会议，也曾根据圣热罗尼莫、圣奥斯定和历代主教会议的议决，颁定了一种司铎规律，编写这套规律的是本笃会会士，人称亚尼安的本笃。这位本笃修士也奉命从事修院的改革工作，但是，却困难重重，尤其是私人教堂的制度，使得司铎们共渡团体修道式的生活，所作的努力都遭到了失败而没能成功。

3.1.2 咏礼司铎

接下来介绍的是咏礼司铎，在公元 1059 年的“拉特朗会议”，给司铎生活的革新运动增加了新的活力，革新的理想终于能够实现，从这时候开始，许多主教座堂和大教堂开始创立神职修院，加入神职修院的司铎，必须渡共同的团体生活，不能有私人财产。教会的立法者始料未及的是，这个运动促成了“咏礼司铎”修会的诞生，这个修会后来又称“奥斯定咏礼司铎会”。

咏礼司铎本来是那些在教堂里登记过的神职人员的名衔，后来呢，就用来称呼遵照修院规章，而渡团体共同生活的司铎。十一世纪的革新运动是以全体司铎为对象的，所有的司铎都应遵守这个规章。最早的规章只要求司铎度共同生活，仍然可以保有私有财产。教宗尼古老二世在“拉特朗会议”颁布法令，希望全体司铎实践福音精神所要求的神贫，教宗亚历山大二世于 1063 年重新颁布这项命令，这一切和当代修道的趋势是相吻合的，圣彼德·达弥盎就曾经强调说：“所有的宗徒以及初期教会的教宗们也都是修道者。”但是克吕尼和额我略革新运动的特征，却是崇高完美的理想和实现这理想的微弱希望之间，不成比例的对照。因此，并非所有的司铎都改作了修道者，而是大部份的司铎从此开始度一种修院般的团体共同生活。过去圣本笃会的会规，不适合于传教救灵的司铎们，他们选用了比较缓和的圣奥斯定规则。这种规则原本只为献身事主而度共同生活的妇女们所立的。12 世纪的初年，许多司铎团体就采用这种规章，这些团体不久以后又联合成会，这一个新团体所联合而成的修会，就是“奥斯定咏礼司铎会”。到公元 1160 年间，这新兴的修会已经有一百多所修院，而到了 1230 年成长到一千多所，咏礼司铎会的理想是作革新的教区司铎，受主教的管辖，传到现在，咏礼司铎修院已经不多了，但在过去，他们曾在教会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肩负过重大的使命。

3.1.3 新型隐修会

教会活力最显著的标志，是在每一个时代，必有新型的修会生活出现，常有圣人起而给福音全德的理想，一种适合当代需要的形式。整个中古世纪，改革和创立修会者，真是风起云涌，而隐修制度的历史，恰好像是它的故乡埃及尼罗河的定期泛滥，因为在隐修生活中，个人人格的重要性，比一般教会生活所要求的更为明显。隐修生活的历史，往往也是伟大的会祖和改革者的历史，下面介绍两位对教会影响最深，至今仍然感人的圣人。他们是圣布鲁诺、圣伯尔纳多两人。

首先介绍圣布鲁诺。在圣布鲁诺生活的年代，有不少的人向往着在旷野，为度祈祷和补

赎的生活。圣布鲁诺是德国人，在里姆教书，他对总主教的悭吝非常忧伤，这使得他对改善时局的努力全归无效，于是他便决心退入旷野，在隶属法国的阿尔卑斯山中，找到了一个名叫嘉都西的僻静地方，在那儿度着隐修的生活。1084年，他就在这儿创立了修院，这也就是“嘉布遣修会”的由来。他们会规的特点是，吸收独修生活和团体生活于一炉，会士的全部时间大都在独居中渡过，守着严格的静默，因而也被称为“哑吧会”。一个个在环绕着小园子相互隔离的斗室内祈祷、读书、作手工、只有一天早晚两次，为举行弥撒、为念晚课经在圣堂内碰面。圣布鲁诺后来被教宗召去罗马，在义大利的南部也建立了嘉布遣隐修院。圣布鲁诺的修会在他死后非常兴盛，一直到今天会士们还保有了圣布鲁诺初创嘉布遣隐修院的热心。

3.1.4 熙笃会与圣伯尔纳多

下面介绍的是圣伯尔纳多和他所创立的熙笃会。克吕尼的修士们，在公元第十、第十一世纪的教会改革中，曾经担任了重要的角色，可惜到后来自身也陷入了松弛。原因是，修会的财富太多了，修士们虽然发了神贫愿，但是，时间一久之后，修院的财产日增月累，未免太富有，在事奉天主的事上，既然无所谓做得太好太多，于是圣堂便建造得格外的华美富丽而堂皇。教友们的捐献和遗产捐赠，源源而来，土地也随之扩大起来，修会的精神，和谦逊的德行，自然也就蒙受重大的损失。因此，很多有志之士，便开始自我要求向往更贫穷、更严格、更接近本笃会的原始生活。于是有一位克吕尼的院长，圣罗伯特在1098年离开了克吕尼修院，在勃艮地省的熙笃，另外建立了一座修院。目的在恢复圣本笃会规的原始纯洁。修院只能保有修士能自耕的土地，而且手工业也在修士的生活中，重新取得了重要的地位，衣服除了一件长袍之外，别无长物，熙笃的一切都显得贫寒，连敬礼天主的物品也不例外。土地贫济，修士们虽然拚命工作，收获也不丰，饮食自然淡泊，不吃鱼、肉、鸡蛋，只吃无盐、无油的黑面包，他们还半夜起身咏唱夜课。

这样严厉的生活，自然不能吸引很多人入会，创始的人圣罗伯特眼看着修士只死不添，未免有些若恼、气馁，忽然在1112年有30个年青人前来扣门，个个满腔热血的愿意加入他们的行列，为首的一位青年骑士，容貌俊美，学问渊博而举止娴雅，他就是21岁的伯尔纳多，他在1190年生于名叫第戎的地方，21岁这一年，他立志弃俗修道，他在短短的时间内，便说服他的五位同胞兄弟，和许多的亲戚朋友，随从他来叩圣罗伯尔的熙笃隐修院大门。

一位21岁，名叫伯尔纳多的俊美骑士，带了30个人要求加入圣罗伯特在熙笃地方所创立的修会。我们从这位青年骑士加入熙笃会后，看看圣伯尔纳多在熙笃会内的生活情形，看看他对教会作了那些个贡献。

要谈伯尔纳多进入熙笃会后的生活之前，我们先来问个问题。前面提到圣罗伯特离开克吕尼修会，另外创立熙笃会的原因，是看到克吕尼修会的财产日增月累之下，越趋于富有，修士的生活虽然并没有很快的衰退，但是也逐渐陷于松弛，修会的精神蒙受了重大的损失。圣罗伯特的理想，是要恢复更贫穷、更严厉、更接近圣本笃会的原始生活。但是，这种严厉的生活吸引不了成群的人来入会。眼看修士只死而没有增添的情况下，圣罗伯特未免有些苦恼而气馁之时。伯尔纳多带着他的兄弟、亲戚朋友，一群30位前来敲熙笃会的隐修院的大门，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伯尔纳多选择了熙笃会呢？”他的理由，正是因为熙笃会注意贫穷、严格地、忠心地遵守圣本笃会的会规，他对于修会的生活非常的热烈而认真吗？1115年，长上们毫不迟疑地委派这位进会才三年的伯尔纳多，率领12位会士到有“明谷”之称的克利福地方去建立一座新的会院。他虽然年纪只有25岁，身体也虚弱多病，他在会规所定的刻苦严斋之外，又自动的加工刻苦，致使他的刻苦宣告破产，几乎到了任何食物都难以下咽的地步，一生与病魔搏斗，然而在他那虚弱的躯壳内，却蕴藏着一颗炽爱天主的心灵，一直至死，坚强的保持着他那股控制一切困乏的毅力，并且，展现了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活力。圣伯尔纳多的新会院，热心的名声很快的传开，吸引了许多的新会士，发展得非常快。

在伯尔纳多去逝的那年，也就是公元 1153 年，就已经有会士七百人，新建了 68 座修院。熙笃会更愿意把修院建筑在浇漓不毛的地区，经过熙笃会会士一个世纪的开垦灌溉，欧洲中部和东部的许多沼泽荒凉的地区，已经变成了肥沃的良田，修士们也成了中古时期的农业专家。

熙笃会的特征是，生活严肃，着重个人神贫，教堂的设置也很简单。早在 1119 年，修会召开会议时，伯尔纳多和斯德望哈定制定了修会的会规，称之为《爱的法律》。他兴创了一种新的管理制度，明文规定，修会的最高权威不在院长，而在每年举行的大会，由院长指定的视察人员，应在大会中提出报告；各院院长每年都应召开大会共同商讨有关修院的事。这种制度是预防修院转向松弛的最好的方法。1215 年，“拉特朗大公会议”宣告任何修会都应采取这种方式的管理制度，伯尔纳多对管理明谷的克利福修院，真是费尽心血，他为了善尽职守，连隐修生活最微末的细节也亲身去管理，再加上他为领导熙笃会所担任的角色，常是忙得不可开交，即使是一般常人，也会使精力耗尽的，更何况他那虚弱多病的身体呢！而他一心一意所注意的、所关心的，是想做一个普普通通的默默无闻的修士，努力圣化自己，他最怕因出离修院，而使他不能全心专务神修和祈祷。然而他的圣德，他的影响力却超越了熙笃会的院墙，远播各地 30 年之久。这位隐修士，因他特殊伟大的人格，实际上成了奉教各国的精神领导者。他个人虽然尽力隐蔽，上上下下的人却在遇到重大的事件时，都会去向他请教。教会和国家的高级人物，对这位简朴修士的精神权威也何止低头致敬，推崇倍致，只因为他已是当代的活圣人，他的生命不断的放射出圣德的光辉。根据与他同时的人所留下的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当他讲道理时，他那因劳碌和守斋而削瘦的脸，他那苍白的脸色和他眼神的顾盼，都好像已经出神入化，处处使人感动，只是他这种外表，就已把听众折服，不需要他再开口讲道了。”我在这儿套用咱们中国的话来说，不正是一付仙风道骨。他把天主的道，已完全用他的行动实践表达出来了。在他周围的人已无需听他说些什么，只要看到他本人，就已经看到、也体会到了天主的道，因而呢，只凭他那超凡圣德的光辉，便成了教会的栋梁。在有关天主利益的争执中，他是无可比拟的仲裁着，他也是最卓越的神哲学家们的裁判，是教会统一的恢复者，是教宗和皇帝之间的中间人。伯尔纳多为他人谋求幸福的热诚，从不厌倦，他常怜悯人的困苦，他也会为了对方的好处，而勃发义怒。当他发现高级神长有亏职守时，便小心谨慎的提醒他们勿忘自己的责任，有时也会态度非常的坚决，他也指责过许多现职人员，甚至几座隐修院的修士，指责他们生活奢侈。被指责过的人反应都很好，因而使不少的人改过自新。有些法国主教跟国王起了冲突，对国王侵犯教会的权力提出严重的抗议，他也会站在主教这边给予支持和鼓励。公元 1130 年，罗马教会内发生了严重的事端，几乎使教会陷于另一次的分裂，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因为，当时的枢机主教团分成了两派，两派都先后选出了代表自己派别的教宗，而这两派的选举都不完全合法，于是，使得当时的主教、君王和教友都陷于混乱，不知所从，究竟那一位才是合法的？众说纷纭，谁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只好召集会议来谋求解决了。圣伯尔纳多就被召去出席会议，他知道依诺森二世是最先被选出来的，而且，他也知道依诺森二世也是最没有野心的，圣伯尔纳多便表示拥护依诺森二世为真正合法的教宗。参加大会的代表们，最后也都赞成了他的意见，但是，另一位教宗和他的同党却不肯让步。伯尔纳多为了劝人拥戴依诺森二世使教会避免分裂，在欧洲各地奔走了八年，他先使法国人表示拥护，又和英王，德皇及意大利的各个城邦往返磋商，直到教会回复了和平，伯尔纳多才回到他的隐修院。公元 1144 年，法王路易七世想去援救，十字军第一次出征后，在东方所建立的拉丁王国。教宗委托圣伯尔纳多去宣传十字军，他走遍了法、德两国的各大城镇和省区，热烈劝导宣讲，鼓起了人民的兴奋，组成十字军去援救拉丁王国。可惜啊！法王和德皇彼此嫉妒，而不能合作，结果这次的东征失败了。伯尔纳多这时候又去了法国南部，劝化那一带的异端者归正。1153 年的春天，他显然已经筋疲力竭，但是，他仍然致力于为人调停纷争，不料当他回到修院，就一病不起，与世长辞了！享年 63 岁。

接下来，谈谈圣伯尔纳多对中古时代神修生活的影响。伯尔纳多在工作中，四方奔走的百忙之中，还能找到时间，去指导那些来向他请教心灵难题的人，回覆由各地来信札，编写神修的著作，还把他那些脍炙人口的为圣经所作的解释，也都用文字记载下来。在名份上，他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修士，但是他答应他的一个学生，也就是教宗欧日要三世的请求，为他写了一本书，但坦率的提醒他，切勿忘记自己是教宗的身份所应担负的责任，后来好多位教宗也都拿这本书，作为自己生活上的指南呢。伯尔纳多无论是对自己或对别人，在应尽的职责上，虽然从来不稍作宽待，但是，他从来没有表现过铁面无私的严厉。他有着诗人般的心灵，他那丰富的感情，可以在他的著作字里行间，表现得无比的温柔可爱，对基督的人性显示着细腻的热情，降生成人的天主耶稣基督，对他而言，不但是应当效法的模范、应当跟随的导师，而且，还是他灵魂上的朋友。他描述过一个纯洁的灵魂，与天主契合无间的神秘经验，他曾经这样说：“我最高的哲学和理想，是认识主，耶稣基督！而且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他最为喜爱的，就是瞻仰救主耶稣屈尊降贵，感动人心的那两个生活时期，一是躺在马槽中变成卑小婴儿的天主，一是死在十字架上的救主。他对救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热情，也是同样的细腻。他曾以滔滔不绝的美妙言词，赞美称颂圣母玛利亚是罪人之托，是仁慈之母，是基督和教会之间的中保。圣伯纳多指引当代教友的热心，朝向一个新的方向，从默观救主耶稣的人性方面，以及祂一生在世的行实上，教友们获得了滋养灵魂、培养虔诚热心的食粮。在伯尔纳多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他身体的病弱和他灵魂的活力，也看到了他相当繁忙的外在工作，和他高度的灵修生活，这种看来似打相当矛盾的现象，在他身上意然能够微妙的融合为一。我们在佩服之余，承认他真是中古世纪的一颗光耀的明星，而熙笃会，也因圣伯尔纳多而留芳百世。

3.1.5 军旅修会

正当熙笃会建立并逐渐发展的时候，在巴勒斯坦的十字军，有部份得到熙笃会的协助，创立各种新修会，我们通称它们为“军旅修会”。这一类的修会，像圣殿骑士会是法兰西十字军的一位骑士，名叫休格的，和他的七位同伴宣誓服从耶路撒冷的宗主教，同时还宣誓，以保护从欧洲来到耶路撒冷朝圣的教友作为该修会的职责。他们的生活呢，是跟我在上面所提到的咏礼司铎的会士们相似。圣伯尔纳多亲自为他们制定了修院规则，还写过一篇赞扬新骑士的文字，因而使得军旅修会享誉全欧洲。比圣殿骑士会更有名的另一种军旅修会，也在同一时期兴起于耶路撒冷，“专门护卫朝圣者的慈善会”或者称为“罗特骑士会”，再后来又有“条顿骑士会”类似的“军旅修会”也在西班牙出现，这些修会的目标是对抗回教徒，在中古所成立的军旅修会，有些存留到现在，但在生活习惯上已经有了改变，这一类“军旅修会”的创立，不过是为了适应当时时代的需要，也是一种封建时代的产物，所以教会内并没有持久的重要性，但是他们的慈善活动，启发了后世的信友传扬福音的热诚，军旅修会的生活与教会修道生活所不同的是，他们把外在的活动当作终身要务，视它重于个人的成圣，因此，他们替后世的传教修会预备了土地。

3.1.6 方济会与道明会

熙笃会的创立和发展的，以及圣伯尔纳多的光辉历史，给教会留下了伟大的贡献和深远的影响，同期形成的军旅修会，也是这个时期新生的事物。今天要介绍的是“托钵修会”，以及属于这一类的修会“方济修会”、“道明修会”。当然会在其中介绍这两种托钵修会的会祖方济和圣道明的生平。最重要的，是要向各位讲述，这两位不朽的会祖对教会的贡献和影响。

在介绍托钵修会之前，我应该先把 11——13 世纪初年的社会及教会的现象介绍一下。有教会史的学者这么说，整个十一世纪可以说是宗教复兴时代，几位有才能的教宗，他们虽然在政治上的力量还很薄弱，但是却把教宗在精神上的地位积极的提升上来。新的“士林学派”，不但促进了教会内部的学术研究，而且还促成了前所未有的、深刻而丰富的信仰生活。

新兴的修会接二连三的创立，如火如荼的十字军东征的运动点燃了信德的热火。通常精神生活高涨的时期，往往也是教会危机丛生的时代，而这种现象，正与欧洲社会环境变迁的最初征兆有关联。十三世纪的欧洲，奉教的信友大概是三千万人，在过去的各个世纪当中，群众很少在历史上崭露头角，但到了十三世纪却恰恰相反，在十二世纪以前，欧洲著名的大城市极少，但到十三世纪由于商业的发达，促成了大城市兴起，开始时在义大利，继而在日尔曼、法兰西，而和大城市一同兴起的，是一种新的世俗文化。古旧的封建制度，已经失掉了它的绝对价值。王公贵族们发现，在他们面前的不再只是臣仆，而是广大的民众；中产阶级兴起，与他们争自由、争权力，于是，产生了一种阶级冲突。再就是，由于整个中古生活，沉浸在宗教精神里，所以披上了宗教外衣的新兴世俗文化，所呈现的隐暗活动，以一种离异教派的姿态出现，实际上他们并不否认任何教义，也不和教会的权威对立，而是一种，不大与教义有关系的，怀着盲目的宗教热忱的民众狂热潮流。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华尔道派”，是由法国里昂城的富商华尔道所创立的。在 1178 年的一场饥荒中，华尔道把他的钱财赈济贫寒，与一批志同道合的人组成了流浪的布道者，他们劝告世人要恢复原始的基督精神，其中不乏其人更进一步还宣发三愿，度神贫、贞洁、服从的生活，他们认为教友可以祝圣圣体。而另外一个比里昂的华尔道派更危险的是，法国西南部的阿尔比派。这一派起源于摩尼教，他们不信任何的有形教会，摈弃一切精神和俗世的权威，摈斥战争与死刑，他们只有一个圣事，那就是圣神的洗礼，唯有纯全的人才能领受，而领受了这个圣事以后就必须有严厉的苦行。一般的阿尔比派信徒，只在临终的时候，才领受这圣神洗礼的圣事。十三世纪时，阿尔比派是教会和国家的大患，教宗依诺森三世曾经邀请法国国王以十字军的武力来对付他们，结果就造成了使得双方损失惨重的战争。此后，在法国以外，也掀起了类似的潮流，更大的危机也正在酝酿中，这些暗潮，有如火山爆发前的强烈地震。好在，这次的危机并没有对教会造成巨大的灾祸，这就要归功于几位，把群众的倾向导入正途的伟大人物，也就是托钵修会的始创者，其中最最有名的是义大利，亚西西地方的圣方济。这种新形式的托钵修会兴起的背景，除了前面我所提到的暗潮之外，与当时社会经济的变迁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知道，欧洲封建社会到了十二世纪，就逐渐起了重大的变化，在这以前，人的生活依靠农业，所谓的富有者，都是拥有广大土地的人，生活的必须，全靠土地上的出产。而 12 世纪开始，城市兴起，有如雨后春笋，银钱的流通也越来越活络，经商的人，由于财富累积而越来越富有，只要有钱，从东方运来的各种奢侈品都能在欧洲的大城市中，就可以买得到，神职人员，甚至连隐修院的修士都逐渐的富裕起来。这么一来，更加拉大了贫富之间的距离，引起了贫穷者的嫉妒和仇恨。好在，向往主，耶稣一生的贫穷榜样，以及祂所训示的贫穷精神，反而受到许多有心人的重视。他们抛弃尘世间的一切财富，一心一意依靠天主的照顾，正像天空中的飞鸟、田野间的百合花一样的生活。许多的教友看到，这些有心人沿门托钵的生活方式而大受感动，也被吸引，果真去沿门求乞，巡回讲道，可惜！不少的人矫枉过正，给教会带来了危机，这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一些宗教狂热者所组成的派别，以致于陷入异端的危险。而圣方济、圣道明，两位天主的圣者，给当时的欧洲和教会，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在过去，修会生活的典型，仍然是圣本笃，在第六世纪所建立的那种隐修生活方式，修道院都建筑在郊外，修士们在修道院里面耕田种地、工作祈祷，主要的目标是修己成圣，出外讲道只是例外的偶发事件。那么圣方济、圣道明，他们在 12、13 世纪所建立的托钵修会生活，又是怎样的呢？他们虽然度的仍然是团体生活，也在圣堂里公念日课，不过，外出传教讲道或教书，却占去了他们生活中的主要时间，除此之外呢，他们还发愿遵守绝对的神贫，不但是个人，甚至连修会也不得拥有财产，修院也都建造在城市里面，生活所需只是活一天算一天，这也就是托钵修会的历史渊源。

接着就介绍义大利亚西西的圣方济。他生于公元 1182 年，是一位相当富有的布商之子，从小就生活奢侈，挥霍而爱好嬉戏、好斗。在参加当时各城邦之间的战斗中，他被俘掳而病

倒了以后，使他不得不安静下来祈祷、思考、阅读。他的内心因而逐渐起了变化，改变了他对人生的观念，他开始寻找思考自己的前途，遇到痲疯病人，他便亲自照顾他，看见年久失修而倾塌的圣堂，他便亲自去修理，有一天，他在圣堂里望弥撒时，听见当天所念的玛竇福音第十章，其中第九节说的正是：“你们不要在腰带里备下金、银、铜钱，路上不要带口袋，也不要带两件内衣，也不要穿鞋，也不要带棍杖……”这句话为他而言，是一线光明而有所顿悟，他开始计划，要逐字去实行这节福音的教训；他要和自己的同伴们去实践贫穷、刻苦和抛弃一切的快乐。为救助自己的急需，他们要去行乞，他们要以当地的方言，向穷人宣讲福音，没有地方可以投宿过夜时，便卧地而眠，随遇而安的时常赞美天主。不久以后，果然有人被他吸引，请求他收为门徒，圣方济于是就请求教宗依诺森三世批准这种“托钵、传教、祈祷”的生活方式。教宗看到这位身体因刻苦而显得衰弱，但是目光却炯炯发光的青年人来到他跟前，身上只穿着一件，当时一般乡下人所穿的，带有风帽的粗布长衫，腰里绑着一条绳子，光着双脚，还有十二位和他同样打扮的同伴们。这一群看起来像是流浪汉的人，没有读过什么神学，竟然希望去为百姓讲道，当然得不到教宗跟前的神枢机们的青睐，他们中间有人说：“圣教会有历史以来，的确常常向穷人宣讲福音，也很照顾贫穷的人，但是得看事实的真像，义大利、法国不是正有一般暗潮，像他们这样的异端者，在散布邪说，也度着沿途乞讨的生活方式，滥用宣讲福音的权利来欺骗百姓们呢！”教宗也知道有这种人，但是教宗更明白教会正需要改革，去同异端斗争，过去所采用的方式，已嫌不足，教宗反倒被眼前谦逊服从的方济打动了，何况前一晚，教宗做过一个梦，梦见一个像圣方济一样装扮的人，将摇摇欲坠的拉特朗大殿一肩挑起，正好抵住那堵要倒的墙，又把它竖起来，使得拉特朗大殿不致于倒塌坠毁。圣方济不正是天主派来，扶直教会于不坠毁的人吗？于是，教宗就批准了圣方济所陈述方济的生活方式，圣方济取名的“小兄弟”的修会，便这样创建起来了。圣方济和他的同伴们，由于内心的兴奋，和对世物毫无牵挂的自由，感到不可言表的喜乐，就开始两个，两个的，一边乞讨，一边宣讲痛悔补赎。从他们身上散布着友爱的喜乐与和平，凡是愿意事奉天主的人，不论是神父或是普通教友，都欢迎他们进入这个修会，会士的人数与日俱增，在13世纪末，全欧洲已有小兄弟会的会院八千座，会士多达两万人。1224年，在他所隐居的亚味诺山的旷野里，耶稣被钉的五伤，正在他祈祷入神的时候，也印在方济的两手两脚和肋旁，一直到死，都没有消失，而且还经常鲜血淋漓，带给他好大的痛苦，但他始终诵赞天主。两年后，方济以44岁的英年带着耶稣的五伤，在小兄弟们的环绕下，在赞美死亡的圣咏声中去逝于亚西西附近鲍穷古拉小圣堂中。两年以后，教宗额我略九世就宣布，圣五伤方济列入圣人品级。他可以说是教会史上，列品最快的圣人之一。

圣方济既不是一个狂热者，也不是一个喜欢阳光花卉，做着白日梦的人，他只是一个简单、朴实而敏感的人，他不是神学家，但是具有教友应有的十分坚强的信德，沉默寡言，但绝不矜持。当他创立修会的时候，他也接受别人与他一齐工作。有人说，他是个不切实际梦幻者，其实他是个谨慎、实际而聪明的人，他曾经与教会的权威者教宗合作无间。在苦行方面，他极为严格，尤其是在神贫圣愿上，那真是丝毫不倦怠疏忽。他始终是以身作则，教诲他的修士们，他散布着洒脱与慈祥的光芒。圣方济不是组织家，不是立法者，然而在他所唤起的民众运动中，并不含有当代教外民众活动的领导人物所有的不合法情愫，毫无疑问的，身材矮小而谦逊的方济，真正是世界级的伟人。他到达了，很少有人到达的契合天主的境界，许多圣人在生前或死后有过敌对者，圣方济是没有敌人的，虽然并不是所有的人了解他，但是，所有的人，既使连教外人都都敬爱他。他的理想和言行对当时教会影响深远，不但化解了当时教会外来的危机，还改革了教会本身内部。我们认为他是一个划时代的伟人。与圣方济很不同的，是十三世纪第二个伟大的修会创始人圣道明。他虽然没有圣方济那样的芳名远播，但他的工作在教会史上也有着同样的重要性。

12、13世纪时，因应时代的需要而新兴的托钵修会中最为著名的，由圣方济所创立的

方济会，下面要介绍的是圣道明和他所创立的道明会。圣道明于 1170 年生于西班牙卡斯提尔的卡勒雷加。他在帕仑西亚学校念过神学。1195 年，道明在欧斯玛作了咏礼司铎。1201 年，他与主教合作，根据圣奥斯定的规则，把主教座堂的司铎团体，改为咏礼司铎修会，他陪同主教到法国南方阿尔比异端横行的地方去巡视，而道明便留在当地讲道，但是收获并不大，因此，他感觉到有组织一个修会来感化异端派的必要。他主张以宣道配合善良的生活，一方面来实践使徒生活的理想，一方面完成以言行归化异端派的任务。1215 年，圣道明到罗马去参加正在进行的第四次“拉特朗大公会议”，并且要求教宗“依诺森三世”批准他创立一个新的修会，但是，大公会议原先已经通过了一项决议，禁止了新修会的创立，因此教宗依诺森三世只批准了他的计划，但要求圣道明采用已被批准的修会中的一种，而不必另外再订定新会规，于是道明就采用了他自己所遵守的圣奥斯定规则，还参考了柏勒蒙脱拉会和咏礼司铎修会的规章，订定了新修会的会规。1216 年，得到新任教宗何诺留三世的批准，圣道明就以福尔哥主教送给他的，在都路斯城的圣诺马诺教堂做为他的第一所修院，如此，就产生了教会中另一支生力军道明会。以后陆续又建立了其他道明会的修院。圣道明在 1221 年去逝，他的修会事业继续由萨克松尼的若尔当予以完成。圣道明是一个和圣方济完全不同的人，其实他们两个人，除了一腔为教会服务的热血，以及将教会带到一般平民中间的决心之外，可以说没有其他任何相同的地方。圣道明是一位神父，也是一位学者，他的理想是训练出一些神学家，用真理来说服异端派，因为他立的修会，以宣道为其首要的任务，所以又有“宣道会”之称。

圣道明和圣方济一样，也强调身教的重要。他的会士，也过着乞讨贫穷且苦行的生活，所以，道明会也属于托钵修会的一种。不过，圣道明的贫穷苦行生活，并不像圣方济那么极端严格，比较富有弹性。道明会士的主要任务既然是宣道，所以，他们特别注重教育，注重阅读研究，好能培育出以学弘教的神父。会士必须经过两年文科的训练，然后是三年的自然科学，最后才是神学训练，所以道明会士和专重劳作的方济会士相比，在训练上就大不相同了。不过第二代的方济会会士也开始注意教育和学术，就像他们的贫穷观念也有了改变一样。方济会和道明会的神学家们，在许多重要的神学问题上，有不少很不同的看法，在神学问题的解释上，因而也有所谓的“方济派”和“道明派”的分别。

道明会的会规，一直到现在仍然为人所称道。它曾经是后世修会的模范，尤其是耶稣会的会祖依纳爵。他创立耶稣会的当初，也曾以道明会会规作为蓝本。道明会也是修会历史上，第一个有中央组织的修会。修会的最高立法权属于修会的大会，执行大会的议决事项的全权，则属于总会长。会士向总会长宣发“服从”圣愿，“服从”圣愿是道明会圣召的重心，其他的一切修道圣愿都蕴含在“服从”圣愿之中。1218 年，道明会士，开始在巴黎大学担任教职。大雅格伯和多玛斯·亚奎那的时代，道明会士曾经名噪一时，因为他们都有高深的神学素养。教宗额我略九世，认为道明会士特别适合担任“信德法庭”的工作，“信德法庭”也被称作“异端裁判所”。在那时代的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的北部，异端派流行的地区，这是一个必须要设置的机构，道明会士作了裁判者之后，给自己招来了许多的敌人，然而，在保卫信德的纯全上，他们有过很大的功绩。

3.1.7 其他新修会

1215 年的第四次“拉特朗大公会议”规定以后，非经特许不能创立新的修会。1215 年，第四次“拉特朗大公会议”议决的第十三条条文说：“为了使教会内各种不同的修会有条不紊，今后严格禁止新形式的修道生活的产生。愿意度隐修生活的人，可以从已经批准的修会中，去选择适合自己的修会，而愿意创立新修会的人，得从已经批准的会规中选采一种。”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条文规定呢？那是因为在那时，一般的群众运动，常常隐含了反教会或是有着裂教的倾向，就像在前面几讲中，曾经提到的华尔道派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也可能是由于参加大公会议的主教们，看到托钵修会的崛起，心里多少存有疑虑。无论如何这一条文必须

以教会的法律条文来解释，也就是说，从今以后，非有特许，不得创立新的修会。换句话说，1215年的大公会议，把教会内的整个有关修会的制度的监察权归属于教宗。十一世纪的隐修会会规，早已获得了宗座的许可，随熙笃会之后，呈请教宗批准修会会规已经成为一种风气，以往的修道生活，都以传统的规范，修道者尽力模仿效法古代修士的生活。从此以后，既使生活方式和古代修士不同，只要教会的元首予以承认，也可以成为一个修道者，因此，这次“拉特朗大公会议”不但没有阻塞了修道生活的路，反而使得修道生活的范围更加的扩大了。而事实上，从此以后新修会的创立，都得到了教会的批准。13世纪时托钵修会除了道明会于1216年、方济会于1223年获得教宗的批准之外，第三个要介绍的托钵修会是加尔默尔圣衣会。圣衣会发源于圣地巴勒斯坦，由法国神父在1155年创立于加尔默尔山，不属于军旅修会，而是一个隐修团体。他们最早的会规是在1226年得到教宗何诺留三世的批准，后来因为巴勒斯坦的环境不利，就在1238年迁到塞普鲁斯，再由塞普鲁斯去了欧洲。1241年，英国籍的西门斯·多格，他把去到欧洲的圣衣会从隐修院改为托钵修会。在1247年又得到道明会的协助，重订会规，也放弃过去一人独处私室的生活，而采用共同生活制，1274年的“里昂会议”正式承认成为托钵修会的一支。在十六世纪以前，这个修会没有什么重要性。除此之外，在1235年，教宗额我略九世批准圣母慈善会。1239年批准圣方济第二会也就是贫穷加辣修女会。加辣是这个女修会的第一任总会长圣女加辣。她是义大利亚西西的一位富家少女，因为在亚西西的主教座堂听见圣方济谈论天主，因而也决心抛弃一切，在贫穷中寻找天主。另外还有一个很有前途的修会，也从隐修会改制为托钵修会，那就是享有盛名的奥斯定隐修会。1243年，教宗依诺森四世把都斯加尼的几个隐修团体合并成一个修会。教宗亚力山大四世又在1256年，促使其他的团体也加入这个修会，采用奥斯定的规则，他们专门从事神学方面的研究。

我们知道修会生活不是人人都能进的，所以，圣方济和圣道明也都为向往度全德生活的教友们，建立了第三会，凡是参加第三会的人，无论是结过婚的，或是还没有结婚的，他们在会士们的领导下，都努力实践修道的理想，在个人的家里，遵守与自己的身份相称的规律。圣方济第三会和圣道明第三会，在十三世纪，对基督修仰的社会各阶层，从最微小平凡的平民老百姓，到王公贵族，都曾有过相当广泛的影响，比方说，法王圣路易九世和匈牙利的皇后依丽沙白，都是方济会第三会的会员。

“拉特朗大公会议”以后，托钵修会的建立和批准，盛极一时，创建还不到一个世纪的道明会，已经有21个省，562座会院。方济会因为对神贫的看法有歧见，内部发生了争执，最后仍然不免分裂，其中最大的是圣文都拉所统整的新派，在十五世纪中叶时，已有会士两万人，一千四百座会院。十五世纪末，人数最多的，应该是奥斯定隐士会，会士大概在三万人左右。

最后一齐来探讨，托钵修会在牧灵工作上的贡献。对我们的教会而言，新兴的修会，尤其是方济会和道明会，都有非常重要的贡献。托钵修会与过去的修会，最大的不同之处，并不是在会士个人的神贫精神，所有较早的修会，像熙笃会等，都注重会士的苦行和神贫，而托钵修会的创新则是连修院本身也必须实行神贫的精神。托钵修会没有专属自己的森林、池塘、耕地、佃户或雇农，只有生活必须的东西，或是教堂附近几间简陋的小屋子，此外，已经是别无长物了。托钵修会会士们的家，不再是修院，而是整个修会的总会址。自从圣本笃以后，修院生活的基础，稳定性和永久性，都已经动摇起来，这一点，只有当一个，愿意过无求于世的生活时，才能办得到。在社会环境演变的挑战下，托钵修会在民间不再是精神上的主人或封王，而是民众的兄弟，他们不是仰仗权利，而是以共同的信赖为基础，民众不需走向他们，而是他们走入群众，他们把教会带到一般平民中间。当时的在俗教士的腐败，往往使人怀疑起教会的真正任务，可是托钵修会是用自己的生活来证明基督的真精神，他们和一般百姓一起工作、一起生活，他们比社会上最穷的人还更穷，他们到处宣讲，不愿勉强人，

只愿劝导训诲。乡人、儿童、军人、囚犯、教外人、异端派都成了他们的朋友，他们服务于教堂、医院、痲疯病院、监狱等场所，他们访问贫病、照顾孤儿寡妇，这正显示了教会的博爱精神，并不因为少数不尽责的教士，而丧失了教会的真正面貌。这一批新形式的托钵修士们的努力，暂时缓和了反教士和反教会的情绪，在教会的传教史上，开展了一个新的纪元。这是第一个贡献，道明会、方济会和会士们都从事学术研究，消极方面，他们驳斥异端、保护了纯正的信仰，积极方面，他们企图融合亚里斯多德的哲学和基督教会的神学，因而产生了中古时代，执学术牛耳的“士林哲学”，这是第二个贡献。第三个贡献呢，托钵修会的会士们跋涉长途，到欧洲以外的地区去传教，方济会士和道明会士先后出使蒙古，其中最著名的要数方济会士蒙高未诺。他从 1289 年到 1328 年在中国传教，还担任过北京的总主教。1318 年，罗马教宗划分传教区，亚美尼亚、波斯、中亚一直到中国属方济会士，印度则属道明会士。

3.2 中古全盛时期的文明

3.2.1 士林学派

方济会和道明会为教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典型的代表是兴起了“士林学派”。在说“士林学派”之前，先说说中古全盛时期的教育和大学的兴起，方便大家对“士林学派”的兴起及发展的情形有所认识和了解。

前面提到过早期中古的文化中心是修道院，每一座修道院都设有学校，这是公元第七到第十世纪之间，西欧仅有的教育机构，因而有“欧洲心灵堡垒”的称号。到了第十世纪，修道院学校逐渐的衰落，除了少数例外，大部份都已经变成了训练修士们的专科学校，对一般社会没有直接的影响，起而代之的是主教座堂学校。十二世纪初，法国就有五十多所主教座堂学校。而 1179 年，第三次“拉特朗大公会议”时，更命令每一个教区应该设立一座学校。无论修道院学校或主教座堂学校，目的都是在训练教会的人才，所以在课程的安排，也就依照这样的目标来规定，圣经和教父们的作品是主要读物，传统的“三文”和“四艺”也是重要的教材，统称为“自由教育”。借着学校教育，古典文艺的某些部份才得以流传下来，就因为这缘故，中古学者对古典文艺，当然也就只有零星的、片段的知识了，但是，他们求知精神是值得钦佩的，一旦有新的史料被发现，他们的后代就能继续发扬光大了。例如，到了十二世纪时，有了有别于第五世纪波其武所翻译有亚里斯多德的旧逻辑之称的“新逻辑”出现于世，“辩证学”成了大学的主科，以及“士林哲学”的兴起，也由此开始。十二世纪以后，许多希腊文与阿拉伯文的著作被翻译成拉丁文，“四艺”也受部份学者的重视，不过，当时的大学已经被辩证、法律、医学所占据，科学的研究乃被拒于大学的门外。我们可以这么说，十二世纪以前，西方学术的中心，先是修道院学校，继之的是主教座堂学校，十二世纪以后，学术的中心移到了大学，大学呢，是由主教座堂学校蜕变而来的，我们可以说，教会学校是中古文化的摇篮。十二世纪的文艺复兴最大的贡献是促成大学的产生。各大学的精神和组织，直到现在还有部份被保留了下来。由于逻辑的普遍受欢迎，以及罗马法的被重视，许多主教座堂学校，在一些著名学者的领导下，逐渐演变成为大学。中古大学的兴起，应该这么说，是自然演变成的，并不是根据法规而创立的。

第一所享有大学之名的学校是，义大利沙莱诺地方的医学院，但是实际上，第一所中古大学的美称，应该属于义大利的波隆那。这所大学除了法律之外，还没有人文和神学的研究科目。而中古的大学之冠，应属法国的巴黎大学，巴黎大学是由圣母主教座堂学校和两所修道院学校组合而成。从十二到十四世纪，欧洲各地，包括现在的英国、日尔曼、西班牙、葡萄牙、捷克、波兰、奥地利、匈牙利等国的境内，都已经有了大学的设立，因此，到这时候，

大学已经成了欧洲的正式教育制度和学术中心了。十二世纪末叶，欧洲的大学摆脱了主教、修道院以及政府的管辖，而由教师和学生自动组织学人或师生协会，为的是保障学术的自由和经济利益，以团体的力量来对付地方教会和政府当局的控制，排除不合格的教师，或对付过份苛求的地方百姓，各地的大学或是获得皇帝，或是得自教宗所颁示的独立自主的特权，还有的，获得教会的资助作为大学的基金，例如巴黎大学、牛津大学、波洛格纳大学，以后的大学，大都是由王公们所创，但是总有教宗的赞助。

随着大学的兴起和托钵修会的崛起，开始了中古神学的春天，也就是所谓“士林学派”时代。从神学的著作与理智的造诣而言，十三世纪可以和公元四百年左右的教父时代相媲美。中古时代的学者们最大的兴趣在于哲学和神学，因为教会内的学者们对自己的信仰，愿意找出一套合乎理性的解释，加以融会贯通，使它成为一种完整的学问，这就是所谓的神学。但是，在这之前，必须先建立一个哲学体系，因为这种工作，是在学校里展出来的，因而就有“士林哲学”或“经院哲学”之称。“士林哲学”的兴起，导源于希腊哲学的著作，尤其是亚里斯多德的著作，被翻译成拉丁文。在十二世纪以前，西方学者所知道的亚里斯多德，不过只是第五世纪波其武所翻译的旧逻辑，以及散见于其他书本中的零星文字，但是到了十二世纪的末叶，几乎所有亚里斯多德的著作，都先后翻译成了拉丁文。除此之外，重要的阿拉伯哲学作品也有了拉丁文的翻译本，这对沉默已久的西方思想界，确实是一个强烈的刺激，不单单只是知识领域的扩大，而且对获得知识的方法也有了新的进展。在一个还不知道用实验来治理学问的时代，亚里斯多德的“演绎法”，成了获得新知识的法宝，只要有几个被认为是真确不变的大前提，许多新结论都可以因此而发现，或推翻旧的结论，同时啊！许多过去认为不可解释的难题，也可以用逻辑来解释或消除。还不足于此，某些学者甚至认为，自然界的知识固然可以用逻辑方法来发掘，连教会内属于超越自然界的启示，也可以用逻辑的方法来解释。十二世纪的中叶，“逻辑”可以说是最热门的学问，当时不仅出了许多有名的学者，也发生了许多激烈的争辩，其中最为突出而又最为狂傲的，要数彼得·亚培拉。是他推动了研究“逻辑”的兴趣，也是由于他的教学，使巴黎成为著名的学府，我们封他为“士林哲学”的鼻祖。他在历史上之所以占有地位，是因为，他是一位走在时代尖端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曾写了一本名为《是与非》的逻辑习题之类的课本。彼得·亚培拉从圣经和教父们的著作中，收集了正与反两方面的言论，来说明 158 条有关神学的论题，让读者自己去推敲、去下结论。亚培拉编写《是与非》这本书的原意，是要启发学生，对问题应有怀疑的态度，提出新的问题，然后设法求得解答。在亚培拉以后的学者，也开始采用这种《是与否》两面的教学研究法。他的得意门生彼得·隆巴德师承亚培拉，写下了第一本神学教科书。“士林哲学”大师圣多玛斯·亚奎那的名著《神学大全》也采用了正反方式，所不同的是圣多玛斯·亚奎那自己为自己所标出的每一个问题写下结论，并且加以证明，同时又根据各方面的理论，来推翻反面所持的理由，使阅读《神学大全》的人能知所抉择。

从亚培拉开始，用逻辑来解释基督宗教的信仰之后，12、13 世纪的神学家和哲学家面临着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协调信仰和理智？”这两者之间有着何种关系呢？因为，摆在这班学者眼前的，一边儿是天主的启示真理，人的理智固然可以设法理解，而有的就根本不能理解，却万万不能加以怀疑；而另一边则是非基督教的哲学，尤其是希腊的和阿拉伯的哲学，是人自己运用理智所获得的真理。但是，其中的某些理论和教会的信仰之间，显然有很大的出入，可是信仰和理智都源自一个造物主。两者之间不应该有矛盾存在的，既然如此，那么又怎么来解决这表面上的矛盾呢？换句话说，理智和信仰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来协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就有了一套哲学体系的出现，这也就是所谓的“士林哲学”。因为这些学者是用哲学来解释信仰，他们既是神学家，也是哲学家，在“士林哲学”中，神学和哲学是分不开的，他们之间，由于传承的不同，而形成了三大派别。第一派我们称它是“奥斯定派”，以圣安瑟尔摩为代表，他们所坚持的原则是“我信，所以我才能了解。”理智、

信仰之间应有先后之别，信仰第一，理智第二，因而在解释神学问题时，理智必须接受信仰的指示，才能免入歧途。

第二派，称为“亚弗洛伊斯派”。亚弗洛伊斯是回教“摩尔”哲学家和科学家。他注解亚里斯多德的作品，被翻译成拉丁文后，对西方教会的神学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亚弗洛伊斯的学说，以及经过他翻译注释后的亚里斯多德的哲学，和教会的信仰有很大的出入。信仰基督的“亚弗洛伊斯学派”认为，信仰和理智原是属于两个不同的知识范畴，彼此不相往来，既是如此，所谓理智和信仰之间的矛盾就不存在，那么，两者之间也就不需要调和了。信仰和理智是可以共存的，虽然两者不能调和，但是，毕竟都是真理，所以，没有必要去追求它们之间不调和的原因。

第三派，称为“多玛斯学派”，这个学派是以圣多玛斯·亚奎那为代表。“多玛斯学派”认为，信仰和理智，都是达到真理的两种不同的方式。信仰和理智既然是从同一个真理的根源，也就是天主而来，那么，两者之间绝对不能有真正的矛盾，如果有矛盾，那也不过只是表面的、人为的，而解答这种表面的和人为的矛盾，正是“士林哲学”的任务之一。圣多玛斯最伟大的贡献，就是把教会的教义做了一个系统化的综合，他所写下的《神学大全》就是系统化综合的具体表现。他尽量采用古希腊，尤其是亚里斯多德的哲学，来说明理智和信仰的调和，信仰和理智之间不仅没有矛盾，相反的，信仰是指引着理智，使得理智不致陷于入歧途，而理智则有助于我们更容易接受信仰。《神学大全》几乎成了“士林哲学”的圣经，而“多玛斯学派”因此也就成为“士林哲学”的主流。圣多玛斯的成功，得力于前辈学者不少，尤其是他的老师大雅尔伯为最大。和圣多玛斯同时的著名神学家是圣文都拉。文都拉则强调意志的重要，理智次于意志，因此他的神学偏重于神秘主义。在“士林哲学”中，有所谓以圣多玛斯为首的“道明会派”和圣文都拉所代表的“方济会派”，即是因此而来。大雅尔伯、圣多玛斯、圣文都拉三个人代表了“士林哲学”的黄金时代，三个人也都先后执教于巴黎，巴黎也就成为十三世纪“士林哲学”的重镇。到了另一位方济会士真福董思高之后，“士林哲学”开始逐渐衰落。

“士林学派”对教会的贡献，以及“士林学派”对当代信仰生活的冲击都是非同小可的。“士林学派”是没有国族限制的，或许可这么说，中古学术，若去掉“士林学派”，那么它完整的统一性，也就不存在了。但是，我们不能说，中古的文化完全被教会所纵揽和控制。而实际上，在学术范围内，教会并没有承揽领导的责任。与其这么说，还不如说中古的学术文化，是以宗教精神为基础的，除此之外也别无其他文化了。“士林学派”的方法，无非是把推理逻辑应用到教会的启示真理上，而这种方法也可以应用在各种科学，使得科学知识根据事实而分门别类。神学的资料都是来自圣经的教训和纪实，或是蕴藏在教父们的权威性著作之中，或是在教会的谕令规章中所表达出的信仰生活。这些个神学资料，到了中古时代，经过“士林学派”学者们的努力，已经有系统的编成要理问答或辩论性的文字，比方说：“天主是谁？基督又是谁？何谓教会？人如何才能得救？”他们还把有关信德方面的词汇收起来，诸如：“本性、超性、恩宠、圣事、罪恶、救赎等等的名词儿，都给了它们在神学上的定义。这么一来，不但没有改变信仰的奥秘，而且，还因为定义的划分，有了超理性与反理性的界限，使得信友们对所信仰的道理，有了更深的理解。举个例子，教会一直相信圣母是天主所特别拣选，蒙受特殊的恩宠，但是，为了确定无染原罪的真正意义，必须先把原罪，以及原罪和救赎工程的关系，加以彻底的研究才行。这些例子，说明“士林学派”解决了许多神学问题，但是，并没有能够解决一切的问题，留给了以后的神学家们研究的空间。关于“圣母无原罪”的问题，已经由13世纪的学者们仔细的研究推敲过。董思高这位方济会的“士林学派”的神学家，曾经指出解决问题的途径，而最后被教宗钦定为信德的道理，还得等待几百年后才能实现呢！若是以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士林学派”的话，那么中古的“士林学派”它缺乏批评研究的可能性，他们缺少人类语言含义和语意变迁方面的，有系统

的、历史的，尤其是哲学的知识；再有一点，则是因为当时自然科学的研究和发现都不足，以至于造成了在神学方面受到很大的局限，这当然是有待后世学者们进一步的研究了。无论如何，“士林学派”对当时而言，大大的充实了教会内部的精神生活，他们把圣事的一般概念置于一旁，但却阐明了圣事的施行态度及有效条件，也为圣体圣血的本质变化，下了明确的定义，给予教友们精神生活上莫大的冲力。公元 1215 年，第四次“拉特朗大公会议”时，用圣体圣血本质变化的道理，将基督在圣体中的临在，下了永久的定义。这次大公会议也规定了信友，每年至少告解一次，在复活节领一次圣体。不久以后，信友们对圣体龕里的圣体中耶稣的敬礼，蔚然成为一种风气，借以表达对圣体的敬爱之心，这在古代是没有的。

3.2.2 教会的礼仪与法律

十二世纪的时候，信友们渴望瞻仰祝圣过的面饼，因此在弥撒中，先有举扬圣体的礼节，然后又有了举扬圣血的礼节。13 世纪时，所订定的“耶稣圣体节”使得对圣体的敬礼更显得重要。教宗吴尔班四世在 1262 年颁定“圣体瞻礼”于整个教会，并且命令著名神学家圣多玛斯等人撰写敬礼耶稣圣体的祈祷文。1279 年以后，圣体游行的礼节也逐渐从科隆教区传扬开来了。

正如同诸圣瞻礼，是克吕尼在圣教会年历上留下来永垂不朽的纪念。耶稣圣体瞻礼，则是 13 世纪“士林神学”的里程碑。“士林学派”一面直接提倡教会信仰的各种敬礼；一面给了他们发展的可能性。通常，在信德的范畴内，对一端奥迹或是对一位圣人的特别崇敬，这就是所谓的敬礼的起源。因此，我们的教会并没有天主的敬礼，而是有“天主圣三奥迹的敬礼”，不说耶稣的敬礼，而有耶稣圣名的敬礼、耶稣圣婴的敬礼、耶稣苦难的敬礼、耶稣圣心敬礼、耶稣君王敬礼。借着各种敬礼的发扬，教会祈祷也就增加了深度和活力，信友们大都能在敬礼的祈祷文中，学习到了信仰的深度含意，教会也一向推行这些敬礼而且不遗余力，不仅鼓励信友们，个人从事敬礼，也规定在共同的礼仪年历上。如果把这些敬礼从教会礼仪年历中除掉，不疑的就是否定了教会整个的过去，企图把教会的礼仪导回到原始的境况。我们知道，无论如何，敬礼的滋长必须得有健全而正确的神学基础才行。“士林学派”以分析演绎的方法和精湛的定义，开拓了宽广博大的敬礼园地，同时也孕育了不少伟大的生活在祈祷中。圣方济特别敬爱耶稣的童年，歌颂朝拜躺在马槽里圣婴。这种传统，经过圣方济和他的会士们的倡导，如今已经传遍世界各地。在这同一个时期，也开始了对圣家、对圣若瑟的敬礼，到 14、15 世纪已经逐渐盛行。默想耶稣的苦难、拜苦路等神工，也由方济会会士传布开来。对耶稣苦难的敬礼，可以说是中古时代，注重灵修的会士们和信友们最看重珍惜的敬礼。13 世纪末叶，对耶稣圣心的敬礼，是从对“耶稣五伤”的敬礼而来。圣母忠仆会发起了对痛苦圣母的敬礼，这许多的敬礼也导致了艺术创造的兴趣，各种艺术创作品，像雕塑、绘画等，都表达了对各种敬礼的虔敬与热诚。

接下来，就和各位谈谈教会法律编纂的情形，不过在谈教会法律之前，我们先谈谈罗马法律复兴的经过。由于政局的变幻无常，拜占庭政府远处君士坦丁堡，对拉丁西方已经是鞭长莫及，失去有效的控制力。查士丁尼的《民法大全》在整个帝国公布了，但是，它的效力仅仅止于东方而已。日尔曼蛮族入据西罗马后，一则他们有自己的习惯法，再则他们所接触到的罗马法，仍是更早已盛行于民间的《狄奥多西法典》。因此，查士丁尼法典只好退隐到修道院的图书馆里边儿了，直到第十一世纪才重新被发现，这才开始了对罗马法的研究工作，而各个新设的大学均成立了法学院。

十二世纪时，西欧出现了几位卓越的帝王，像英格兰的亨利二世、日尔曼的腓特列一世、法国的菲力普二世都努力于巩固自己的王权，建立强有力的政府。在这过程中，他们都遭到了封建贵族和教会势力的反对，尤其是来自教会的反对最为激烈。为了替自己的立场辩护，并且排除反对的力量，他们不但利用新兴都市中，中产阶级的经济力量，谋求政治和军事上的独立，不再依靠贵族和教会的支持，而且在历史上寻求国王权力的根据，而最好的历史根

据就是罗马帝国。在日尔曼皇帝腓特烈一世看来，他就是罗马皇帝的继承人，罗马法之受人重视，也就成为了必然的趋势。1159年，腓特烈大帝远征意大利时，召集了各个大学的法学教授，命令他们根据罗马法草定《王权至上》的宣言，于是根据这个宣言，腓特烈就是罗马帝国的继承人，因而他也该拥有罗马皇帝所享有的一切权力。这份宣言，可以说是中古王权发展史上，第一个重要文献。日尔曼皇帝如此，其他的国王亦复如此，罗马法里面的最高政治权力，虽然属于皇帝，不过，这在12、13世纪还不过是理论而已。腓特烈的企图就在于，想使这个理想能够实现，而实际上，这时候的日尔曼皇帝的力量还远不如英法两国的国王，这些国家的国王，也都不遗余力的提倡罗马法，但是，目的并不在支持神圣罗马帝国，而是在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他们认为，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呢，起而代之的应该，是该地区的新兴的国家；过去属于帝国皇帝的权力，也已该分散于各地区的国王，他们之所以大力的支持、鼓励研究罗马法的动机就在于在此。

和罗马法的研究同时发展的，就是对教会法的研究，而实际上呢，这两种法律的研究是相关的，民法的专家，也大多是教律博士，研究教会法也是如同是研究罗马法一样，也是当时走上仕途的捷径。原来在教会的行政机构，无论是罗马教廷或是地方主教的教区，都需要受过法学教育的人才，同时也因为当时王权伸张，政府和教会之间，经常发生冲突，需要靠教律博士们从中给协调周旋。12、13世纪时候的教宗和主教，大多数都是出身于受过法学训练的神职人员。教会法研究的初步工作，不在法律上史料的发掘，而是在能有一部，有条有理的法典的编修。我们的圣教会，在创立之初，就有自己特有法律，但是真正教会法典的编修却是12世纪以后的事。在这之前虽然也曾有过几次编修的尝试，但是，成绩都不理想。在第六世纪时，代奥西乌斯曾经将与教会相关的法律汇集成册。第八世纪末，查理曼大帝也曾经下令编修教会法律。此外各地区、各教区为了自己实际的需要，也作了教会法律编辑的工作，提供给当地的教会法庭的需要。这些出自各地方的法典，大多数取材自，大公会议和地区主教会议，或当地教区的会议的议决、教宗的敕令、教父的言论、圣经上相关的条文等。因为各个地区的需要不尽相同，编辑的观点也随着有差异，所以，这一类法典，只应用于相关的地方教会，而不完全适用于整个教会。不过也有一些例外的事，比方在第十一世纪的初期，伏姆斯教区的主教布查特所编的法典，曾经风行于日尔曼、法兰西、北意大利等地。布查特的法典所采取的立场的，教区的行政应该由该教区的主教全权负责，除了关系到整个教会整体的之外，罗马教廷不应该干涉地方教会，这种地方自治的精神，正是当时教会内相当普遍的现象，所以很受到各地方教会的欢迎。到了十一世纪的中叶，教会内部发生了一个全面革新运动，我们在教会历史上称之为“额我略改革”。革新的根本目的，是要重建罗马教宗的领导地位。

在十一世纪的中叶，教会内部发生了一个全面性的革新运动，因为是教宗额我略七世在位时候，我们也称它为“额我略改革”。主要的目的，是要重建罗马教宗的领导地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协助这项革新运动的学者们，就不得不从历史上找根据，往前追溯，大概是在教宗利奥九世在位时，曾经有人搜集了有关教宗权力的文献、教宗额我略一世的言论等资料，编纂成书。很显而易见的，这并不是一本法典，不过却为后来编纂教会法典的工作奠下了基础。同时在罗马和附近的地区，也出现了多种有关教会法律方面的资料，它们虽然都是地方性的，但是都一致的强调了罗马教宗的领导权，而当教廷的驻外使节把这些所谓的法典，带到了他们的驻在地时，罗马法的精神也就随着他们扩展到这些地区，这就对日后正式的教会法典的传播留下了很大的影响。同时在法兰西也有类似法典的编纂，它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承认罗马教宗的领导地位，其中最为有名的是沙托耳的主教伊渥所编纂的，经过一再的修定，可以说是在十二世纪的前五十年，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地区，这本书是所有教会法律书中流行最广的一本。有一本名叫《教会法律异同对照》的书，由波隆那大学的法律教授格雷先在1142年所编辑的，我们说它是正式的教会法典出现以前，最享

有盛名的一本教会法方面的专书，或者也直接就称它是《格雷先法典》。《格雷先》不仅把过去教会法律分门别类，做了有系统的编辑，而且，还比较了彼此之间相异相同的地方，同时，还加了他个人的注解和说明，称它是《格氏言论》，可以说是首创近代教会法学的开始。1148年，格雷先的《格氏言论》问世以后，不仅成为各个大学教会法的标准读本，而且还成为教会法庭的必要参考书。即使是这样，格雷先的法典，仍然只是私人的著作，不是教会的正式法典。要到教宗依诺森三世的时候，才正式组织委员会，负责审查格雷先的著作，可惜修订版反而不如格氏的原书。到了1230年，教宗额我略九世又任命道明会会士雷蒙·本那福特从事教会法典的编纂，四年以后才告完成，这才是教会史上第一部正式的法典，定名为《额我略九世法典》。教宗鲍尼法斯八世增加了新颁的法条。1317年，教宗若望二十二世把前任教宗格来孟五世的时候所编辑的教会法典公布于世，题名为《格来孟法典》。我们在习惯上，就把《额我略九世法典》、鲍尼法斯加上的新法典，以及《格来孟法典》合在一齐，称之为《教会法大全》。这本《教会法大全》一用就是六百年，一直通行到1917年。

罗马法和教会法的推广，也就影响到政治思想的发展，实际上两者之间互为因果。前面，我曾说过王权的兴起遭遇到双重保守势力的反对，一个是封建分治的贵族，一个就是中央集权的教会。尤其是从教会方面来的阻力最大，因此，冲突也就最激烈。政教冲突的个别动机，固然因时因地而有不同，但是其最终原因，不外乎是王权和教权相互竞争，争取基督教社会的统治权。从额我略七世到鲍尼法斯八世，几乎在这250年当中，教会和帝王之间冲突不断，问题总是在争“教权、王权谁高谁低？”在争执冲突的过程中，双方都延揽了各方著名学者来支持自己的立场。参加论战的有神学家、哲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而声势最大的该是法律学家。他们一面从哲学观点，提出最合乎理性的社会组织 and 秩序；另一方面，又从历史中寻求政教关系的根据，于是造成了罗马法和教会法的研究风气。在支持“王权至上”方面，最著名的是但丁的《君主论》。但丁驳斥了，属于教宗派所列举的种种理由，然后说明，在基督教世界里，皇帝所应该扮演的角色。但丁所憧憬的，是一个贤明的君王，天下太平，在贤君的统治下，教会去发挥她天赋的影响力，但丁更否认了，所谓的《君士坦丁的赠赐》这份文件的历史价值，而这份文件一直是，主张“教权至上”的教宗派所依凭的历史根据。但丁认为，君士坦丁大帝不可能亲自放弃自己的权力来毁坏帝国的一统。后来在十五世纪中叶的时候，人文学家劳伦佐·法拉更从语言学的研究中，证明了这份文件并非真品，而是出于伪造，引发了一扬激烈的笔墨官司。更激烈、更极端的作品，要算是1324年，马西里奥在他所编撰的《和平干城》这本书所表达的观点了。他不仅否认了教会的独立性，以及教宗至高无上的领导权，而且还认为教会应该是政府控制下的一个部门，就如拜占庭的教会。他也主张，在教会内最高权力不在教宗，而在教友。马西里奥是一位主张大公会议运动的人，至于支持“教权至上”的有马内·高特，他在1080至85年间所写的《致盖培哈特书》、《托利乌丰》在1320年所写的《论教宗的权力》。而以行动来推行教宗极权的，应是教宗鲍尼法斯八世和若望二十二世。还有一派是折衷的中间路线，他们认为，政教双方各有自己不同的范畴，应该是互相合作的，其中著名的学者是索尔斯堡的若望，他著有《政治入门》一书。还有一位，就是圣多玛斯·亚奎那，他在《君主之统治》这本书中，阐述了他的看法。他们虽然都承认教宗的权力，但是也承认国王也有他天赋不可侵犯的权利。

3.2.3 中古全盛时期的文艺

中古时期的书籍作品也是十分出色的。在中古学者的作品中，比较著名的教会历史方面的作品。十二世纪以前，欧洲的历史作品，大都是以纪年方式所写成的世界年鉴或是地方志为主。内容方面所写的都是教会的事迹，所叙述的事件，不是教区发生的事嘛，就是修道院的情形。12世纪以后，有了“王朝史”、“城邦史”。因为十字军东征，而有了传记式的专写人物的事迹。这些历史作品都带着浓厚的宗教色彩，对事实发展的前因后果，表达了基督信仰中“天主庇佑”的观点。在日尔曼地区，《修道院年鉴》仍然是重要的历史作品，而“教

区年鉴”、“城市志”这类的作品更获得重视。最值得注意的是《科隆年鉴》。艾卡特所编撰的《世界年鉴》被誉为是中古时代写得最好的一本“世界年鉴”；弗来辛·鄂图所写的《双城记》则被誉为，是继圣奥斯定的《天主之城》以后，中古最佳的历史哲学方面的作品；此外还有柏来门教区的亚当修士所写的《汉堡教区年鉴》；以及《柏来门教区年鉴》。在义大利方面，比较有名的是马丁诺的《威尼斯年鉴》。在罗马没有“地方志”，但是却有“教宗传”，始于十二世纪继续写到十三世纪，十三世纪以后，出现了教宗个人的行传。十三世纪，义大利史学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位方济会士名叫沙林培尼的，他的自传不仅文字幽默亲切，首开中古传记文学的先河，对当代的名人像腓特烈二世、路易九世等，都有他个人独到的记述和批评，也对当时的修道生活、义大利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也都有宝贵而且丰富的史料留下来。

法国是中古西方文化当中，水平最高的地区，历史著作也较其他地区丰富，传统的世界年鉴还继续有人写。伯尔纳德·古依着有《法王年鉴》、《圣人行传》、《道明会史》、《宗教裁判指南》等书。其中《宗教裁判指南》这本书，是研究法国南部宗教裁判最好的史料。巴黎圣达尼修道院的院长苏石和他同会的修士们，一齐编写的《法国大年鉴》，以及苏石本人的《回忆录》，记述他本人在修道院院长任内的事迹，都是研究法国史的重要史料。有关历史著作方面，仅仅为各位介绍这些。

接着要谈的是中古艺术的精华和中心，这指的是中古时代最著名建筑物主教座堂。中古文化的特色值得后人怀念的，除了骑士精神、十字军，就数表现基督信仰的主教座堂了。而主教座堂给人的印象更是深刻，因为许多十二、十三世纪的主教座堂，直到现在还矗立在许多欧洲的大都市里，成为观光旅游的胜地。我们知道，艺术是时代精神的一种表现，在一个基督信仰的宗教气氛那么的浓厚，教会的力量无孔不入的时代，无疑表达人民情感和希望的艺术，应该是宗教艺术。这时期宗教是艺术家们重要的启示、灵感的泉源，而在教会的支持下，艺术家发挥了他们的天份，而当时宗教活动的中心是教堂，尤其是主教所在地的教堂，除了教堂之外，就是修道院，以及修道院所附设的慈善机构。所以中古时代，以建筑为主的艺术就在这两个地方，大大的表现出来。教堂不仅是崇拜天主的场所，也是给人灵感、给人启示的地方。教堂的大门上、墙壁上、圆柱上、彩色玻璃上刻满了或是画满了，取材自圣经或是圣人行传的雕刻品及画像。在教育尚未普及如同现代的中古，大教堂就是一般百姓的“无字画”，或者也称为“石刻圣经”。在这里，人们学到了来自基督的信仰、做人的道理、圣经里的故事、历代圣人圣女的事迹。我们更好说，中古主教座堂实际上就是一个学校。中古主教座堂建筑的形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哥德式的建筑型式，另一种是模仿古罗马式的建筑型式。

中古时代的教会，相继建造了许多雄伟而富丽堂皇的教堂。根据史料的显示，公元 1050 年到 1350 年左右的三个世纪中，欧洲的各个公教国家中，建筑业非常发达，许多著名的建筑师，他们的精力几乎全都消耗在建造天主的圣殿上了。在建筑圣堂的量 and 质上，各大外城相互竞争，还有的，竟是把原有的圣堂拆了，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只不过是想要再另外建造一座更美丽、更与天主的尊贵可以相称的圣堂。以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还真不知道，以当时仅有几万人的小城，竟然能建造出那么庄严和谐的巨大工程，一直到今天，仍然傲视于世界。而在欧洲各城建筑主教座堂的现象，实在是历史上的奇观，并且也直到现在，仍然是令人费解的。我们今天建筑港口，飞机场、大工厂、摩天大楼，而中古世纪的教友，却认为这世界上，没有比建造象征天堂的圣堂更为迫切需要的了。

中古的教友们认为，圣堂是教友们表现信德的场所，当然不可以拿来和埃及的金字塔相比。因为埃及的金字塔是帝王们，利用千千万万的奴隶和罪犯，被迫在鞭笞拷打之下才建造而成的；也不可以拿来和北京的前清皇宫紫禁城相比。因为前清皇宫紫禁城是历代的帝王们，倾全国的财力和人力而造成的。而中古世纪，在欧洲所建造的圣堂，乃是信友们，向天主表

现信德与爱德的工程，出于信友们的自动自发。工程师贡献了自己的天才，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也有的是，无论贫富都一齐胼手胝足，去亲自动手参加工作。曾有一位当代的历史学家，记述下来当时的情形，他这么写道：“我曾经看到许多有钱有势的人，平常总以自己的出身和财富而自豪，习惯了娇生惯养的生活，而现在却赶着大车去载运石块、木料、石灰及一切用来建造圣堂的材料。有时候，车子载运过了量，连牲口也拉不动大车时，便有许多教友，不分男、女共同出力，有推的、有拉的。他们怀着敬畏而严肃的心情，默默地工作，到达建堂地点时，还听得见有人认错、祈祷以及求天主宽恕罪过的声音。神父们也费心地劝勉，所有教友要和睦相处、消除仇恨、摆脱相互之间的敌视，连债务也一概不追究了，彼此在精神上，团结一致来完成建造天主的圣殿。

早期的圣堂，屋顶都以木架来支撑，无法长期久存。十一世纪时的建筑工程师，发明了以连串的穹窿，或是以半圆的图拱来作屋顶，可避免因失火、虫蛀而被毁。不过这种形式的屋顶，重量非常的大，必须要配以坚厚的墙避，才能支撑得住，窗户也不能开得很大，墙避上有装饰上彩绘的图像，这种形式的圣堂被称为罗马式圣堂。它的最大特点是雕刻与建筑的完美配合。到了十二、十三世纪时，建筑工程师，发明了建造了尖拱的方法。教堂的屋顶，钟楼的尖顶，有的高到四十多公尺以上，那么它的重点就不放在墙壁上了，而延伸到石柱和拱壁上，这么一来，墙壁已不要太厚，而且，还可以把窗户加大，并且，可以在窗户上镶嵌彩色玻璃，并且用铅所做成的网状窗棂加以固定。而所镶嵌的图案都是新旧约的故事，以及在教会内所使用，具有象征性意义的图形，再经过光线的照射，显得真是美丽而悦目，每当人们进入这一类型式的教堂，一见到那高向天际的排柱，便会觉得心旷神怡，整个的人也被吸引到心领神会，与天主紧密契合的境界。外面的那些高入天际的尖塔，更使人举心向上，也更增加人类对至高的天主崇敬之情。这种型式，已经不同于十一世纪的罗马式建筑，我们称它为哥德式的建筑。现今的建筑和艺术界也都公认，中古世纪所留下来的伟大的圣殿，是世界上建筑和艺术的不朽杰作。天主的圣殿也是世人的家，是教友们围绕在主教、神父的四周，举行祭天谢恩的场所。每一座圣殿也可以说是当时所有知识的总和。当时西方世界，所有绘画、在墙上或镶嵌在窗上的圣像和名画、以及雕刻的艺术杰作，几乎都展现在这些有名的圣殿中了。中古时代的艺术家们，遵循神学家的指导，借着建筑、绘画、雕塑，向世人表出他们无言的宣讲，他们画出了一幅幅的圣经故事，天主教的宇宙观。当代的教会称圣殿是贫穷人的圣经，还说得对极了。纯朴贫苦、不识字的一般信友，都能用双眼来学习、观看他们因信德而懂得道理。他们在教堂里的壁画上，看到原祖的被造和堕落、新旧约的故事、耶稣的生平事迹、圣母玛利亚的事迹、历代圣人圣女殉道的事迹、以及耶稣所宣讲的许多比喻，这种艺术家们所表达的无言的宣讲，的确在当时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教育功能，激发世人对天主的信仰、钦崇，以及在道德论理上的教化功能。

3.3 十字军东征

3.3.1 十字军东征的背景

信仰，是中古世纪思想家的圭臬。圣堂的艺术杰作，是一般信友的信仰表现，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导源于信仰的思想，也就是从十一世纪末到十三世纪，西欧各国想要从回教徒的手中夺回圣地巴勒斯坦，所组织的远征军。研究十字军东征，使人深深的意识到，现代世界和中古的精神，已经相距很远了。虽然十字军时代比“教难”时期，几乎晚了一千年，对于“教难”时代的心理，反而是容易揣摩。由于这个困难，我们在判断、赞扬与贬斥十字军东征时，应当非常的谨慎。在过去的许多学者，常把那时代的各种进步的迹象归功于十字军；近代的学者，多数都抱持了修正的看法。他们都认为十二世纪的文艺复兴，有着多方面的蓬

勃发展，十字军的运动，不过只是其中的一部份而已。比方说过去的学者们认为，商业的复兴和都市生活的重现，是十字军造成的；而目前的学者们则认为，早在十字军运动以前，西方的商业和都市都早已出现，而十字军运动，则是加速了商业和都市的发展。我们可以把十字军的意义，归纳为两点。第一点它说明中古世界的重心，已经从东方移回到西方。借着十字军的组织，西方对混乱而又衰老的东方采取了攻势，在这个时期，无论是拜占庭或是回教列国，已经深深的感觉到没有征服西方的可能；反过来说，倒是西方企图征服东方的可能性在提高，而且已经有部份的成功。第二点西方之所以有这么样的活力，因素固然有很多，而其中最最重要的则是罗马教会的中兴，重新负起了她领导西方世界的责任。十字军至少前三次的十字军，被公认为原是一种宗教活动，出于信友们的宗教热忱。因为耶路撒冷的圣墓，以及巴勒斯坦的圣地，凡是耶稣降生、成长、生活过的地方和受难埋葬的地点，自古以来，便是教友们朝圣敬礼的朝圣地点。他们不顾千辛万苦，甘心冒险前往圣地去朝圣，虽然自从阿拉伯回教徒征服了巴勒斯坦以后，前往朝圣的人仍然络绎不绝，因为阿位伯人对待教友仍然相当的宽大。巴格达的回教领袖，他曾经在西元 800 年时，承认过查理曼大帝是圣地教友的保护人。一直到十一世纪的初年，欧洲的朝圣者，仍然能够去耶路撒冷，朝拜耶稣受难之地和埋葬的圣墓。阿拉伯回教徒，对从西方来的朝圣者并没有给了多大的为难。但是到了十一世纪以后，情势大为改变。一个来自土耳其斯坦的游牧民族，在塞尔柱·伊本塔卡的率领之下，于 1037 年崛起于新疆一带的中亚细亚，向西发展，击败了阿拉伯人，进入回教帝国，不久就信了回教，而成为狂热的回教徒。1055 年时，塞尔柱的孙子土格利尔贝格占领了巴格达和摩素，即刻进入亚美利亚洲和叙利亚，并且开始不断的侵扰东罗马的拜占庭帝国东部边境，同时侵入小亚细亚。1071 年后，塞尔柱土耳其人几乎统治了整个小亚细亚，并于 1078 年占领了耶路撒冷。这些土耳其人，对待天主教友就不是友善的了，对西方去圣地朝圣的教友，百般的留难，千方百计的骚扰、劫掠，甚至俘掳他们，还强迫他们做奴隶。逃回去的教友，向西方报告了在圣地所遭遇到的困难，因此，在西方引起了很大的激动。当时的教宗额我略七世，在 1074 年就早有心想组织远征军，去解救东方教友所受的回教徒的压迫，但是因为对教会的改革及对皇帝的斗争、俗人授职的种种政治宗教之间的问题，而忙得筋疲力竭，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而没有能够把支援圣地，派远征军的计划付诸实行，只有留待以后的教宗吴尔班二世去实现了。教宗吴尔班二世上任以后，接受了东罗马的皇帝亚西乌斯的要求，给了军事上和经济上的支援，好能对付塞尔柱土耳其人的不断威胁。

其实早在西元一千年时，教宗西尔乌斯德二世在日尔曼皇帝鄂图三世协助下，就有动员西方武力，从阿拉伯人手中收复圣地的打算。但是不久之后，教宗和皇帝两人都先后去逝而作罢。正式计划组织远征军的是，教宗额我略七世。由于俗人授职的问题所造成的政教纠纷，使他和亨利四世之间缠斗不断，所以额我略七世的计划也就没有实现。到了教宗吴尔班二世时，政教之间正面的冲突已经暂时缓和下来，同时亨利四世，他也忙于对付日尔曼国内孔拉德公爵的反叛，使得他无力兼顾义大利。正当西元 1095 年，教宗吴尔班二世在帕辰察和法国的克肋蒙两地，先后召开教务会议，推动宗教改革时，东罗马的皇帝亚历西乌斯，从君士坦丁堡派出的使臣也恰好到达，向西方发生紧急呼吁，要求派军队前往援助，共同对抗塞尔柱土耳其人。于是，教宗仍决定组织军队前往救援。教宗吴尔班二世当时在克肋蒙教务会议上，号召组织十字军东征的演讲。全文已经亡佚，但是，仍然能够综合各方面留下来的记载，了解到大致的内容。教宗首先赞扬了法兰克人的尚武精神，以及他们的祖先对教会曾经有过的贡献，再叙述东方的信友们，在塞尔柱土耳其人的控制之下，所遭遇到的种种痛苦，以及圣地耶路撒冷所受到的亵渎，接着，教宗呼吁西方的信友们，一本兄弟之爱，给予援助。西方人不应该浪费血汗于私人恩怨的比斗中，而应该将自己的精力，用来对付土耳其人。此外，教宗也提到了俗世的现实动机，指出东方是一块“蜜与奶”的土地，参加十字军正是一个发财的好机会，教宗最后结论说：“教友们，把你们的力量联合起来，去收复圣地，在天国一

定有不朽的赏报等待着你们……”教宗这篇动人的演说，立刻获得了普遍的响应，亚代玛主教和雷蒙伯爵率领在场的教士和贵族们振臂高呼着：“这是天主的圣意！”然后在各自的肩膀上，配带上一个用红色的布缝制的十字架，以表示他们的奉献，这便是十字军名称的由来。同时教宗又派遣宣道者到处宣传，十字军这一个在欧洲以及教会历史上的伟大运动，正式展开了。

3.3.2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西元 1095 年，教宗吴尔班二世在法国克肋蒙地方召开教务会议中，向教士、贵族及法国的信友们发出了组织十字军东征的呼吁。教宗吴尔班二世发动十字军运动，一方面固然是为了收复主耶稣的圣墓，以便教友们能自由的到圣地去朝圣礼拜。但是教宗的眼光所见更远大，他已经看出来，土耳其回教徒的进展为天主教而言，真的是很大的威胁。拜占庭帝国，在当时已经步上衰途，不过仍然可以作为防止土耳其人侵入的第一道防线，响应拜占庭皇帝向西方发出的求助，援救东方的基督徒，不但是教友应尽的义务，也是防止回教徒威胁整个西方教会的危机的一种作法，而且这对历代教宗所焦虑劳心的重大计划，使君士坦丁堡的东方教会与西方教会之间停止分裂，再能与罗马言归于好，正是时机啊！除此两大目的之外，教宗还希望借此机会，能消弥好几百年以来，教友之间的封建武力私斗，让教友们大家联合起，同仇敌忾，把注意力指向共同的敌人。如此一来，希望能解除好几个世纪以来的武力私斗的暴力行为。当然，爱好冒险的，认为到东方可以发财致富的也大有人在。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十字军实在是由于精神的兴奋，是教友们响应天主在世的代表，也就是教宗的信德表现。当教宗的这项呼吁发出之后，整个教会，上上下下，如何来响应十字军的运动呢？十字军组成的经过是如何的呢？他们的运动成功或是失败呢？我想，这些问题也是您心中想问的问题。

自从教宗吴尔班二世发出呼吁以后，十字军的运动就逐渐的在欧洲各国展开。先是从法国开始，然后义大利、日尔曼、英吉利，先后响应。教宗既然发起了十字军运动，也决不愿意草草的从事，于是演讲的演讲、募捐的募捐、颁发大赦、任命钦差大使领导出征，为保护去从军人们的财产、家庭而谋取保障，指定行程、采办粮饷，为了保证成功而做的一切准备，都陆陆续续如火如荼的展开，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最足以说明教宗吴尔班二世的呼吁所获得的反应，莫过于所谓的“农民十字军”。参加的，并不完全是农民，其中不少是贫困的骑士和低级教士，他们有的是举家东迁，大有一去不复返的气概。在法兰西和日尔曼，许多宣道者到处宣讲十字军，一时响应者，竟达数以万计。宣道者中，知名的有“隐士—彼得”、“穷汉—华德”、“伯爵—爱米谷和哥托乔克”等人。他们一边宣道，一边率众东行，沿路加入者更多，这些乌合之众，虽然都各有其不同的目的和动机，但是，还都能在十字的记号下，抱有恢复圣地的雄心。教会对这些兴奋的乌合之众，全然无法领导。1096 年春天，这些农民先后结队向东前进，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武器，乘坐着牛车或骑上驴子，不顾可能遭遇的危险，就这样贸然的向小亚细亚前进。这群农民十字军的路线是延着多瑙河，经匈牙利、保加利亚、希腊半岛，向着君士坦丁堡前进。这支乌合之众，既无纪律，又无补给，因此是延途抢劫，引起了各地人民的抗拒。例如在贝尔格勒，就有很多的十字军，被当地的民众处死了。军行数月，伤的伤、死的死，剩下不到一半，而剩下的，在同年的十月先后到达君士坦丁堡。拜占庭的皇帝一见之下大失所望，他所希望的是，西方的军事和经济上的援助，而不是一群贫病而又没有纪律的难民啊！由于当地人民不胜其扰，拜占庭政府不得已，只好将民军移驻在小亚细亚的西弗多披军营里面，等待正规的十字军，但是这群民众想急于恢复圣地，就相约继续向耶路撒冷前进，在途中就遇到了土耳其人，被杀的不计其数，少数的幸存者，后来参加正规十字军，所谓的“农民十字军”，就此无声无息的终止了。

领导正规十字军的，虽然没有皇帝或国王，却有不少果敢而又热心的公侯，像雷蒙伯爵就是一位曾经远西班牙，战争经验丰富的骑士，也是教宗吴尔班二世倡议组织十字军最得力

的谋士。他率领了一支法兰西南部的十字军进入意大利，然后绕过亚得里亚海的北部，由陆路到达希腊半岛而抵达君士坦丁堡。另一位是诺曼第的罗伯公爵。他为了参加十字军，竟然不惜将自己的封土，典押给弟弟英王威廉二世。罗伯公爵和法王的弟弟威玛·度斯修、法兰德斯的伯爵以及“征服者—威廉”的女婿等人组成第二路。他们经过意大利半岛的南部，再会合贵族鲍海蒙等人，由海路抵达希腊半岛。还有第三支十字军，就采取传统的朝圣路线，也就是“农民十字军”所走的路线，来到君士坦丁堡。这三支军队合计，大约在三万人上下。没想到在 1097 年的春天，在君士坦丁堡的十字军和拜占庭之间，产生了严重的歧见。拜占庭皇帝所要求的是西方的佣兵，雇用为来驱逐塞尔柱土耳其人而已，而十字军的目的，则在收复耶路撒冷，恢复圣地；此外还有军事的统帅问题，拜占庭要求，十字军完全由拜占庭来节制，而十字军愿意自由行动。最后双方妥协，拜占廷许诺供应十字军所需的补给，十字军则向皇帝效忠。同时十字军本身也有严重的弱点，他们虽然不是乌合之众，但是究竟是临时聚合的杂牌军，诸将彼此相互猜忌、互不信任，名义上的统领，是教宗所委任的全权代表亚代玛主教，但实际上战场时，必须要有一位有作战经验的将领来领导，最后哥弗雷公爵被选为元帅。待这些问题解决之后，1097 年的五月，拜占庭和从西方而来的十字军，渡海进入小亚细亚，攻下了尼西亚城。但双方无法相互容忍而分道扬镳，拜占庭军队从尼西亚向东推进，扫荡安那托利亚北部的回教军队，十字军则直奔安提约基雅，以征服叙利亚为目标。七月攻下安提约基雅城。1098 年 6 月，十字军终于抵达了耶路撒冷的城墙下，获得城内基督徒的内应，才在 1099 年的七月攻下了耶路撒冷，十字军终于在离开西方的三年以后，进入耶路撒冷城，城中的回教守军全部投降。

征服耶路撒冷后，十字军又面临了问题，究竟该由谁来统治管理呢？最后推选哥弗雷，但他拒绝国王的名衔，而自称是“圣墓的保卫者”，这正是哥弗雷的用心。他默认了教会是这种新建立的国家的领袖，而实际上，在后来他正式的向耶路撒冷的大主教举行臣服典礼，更是公开承认，教会是耶路撒冷的管理人和掌权者。哥弗雷在位只有一年就去世，由他的弟弟鲍特温继承，从耶路撒冷大主教的手中接受了王冠，耶路撒冷王国也就正式成立了。鲍特温接下王位之后全面展开扫荡战，从 1101 年到 1110 年的十年中，他平服了巴勒斯坦的地中海沿岸的城镇，并且打通了海上交通，切断了回教徒之间的补给线，使得十字军可以成功地完成了领土的扩张，东西双方的贸易，也从此有了新的发展。在鲍特温统治耶路撒冷期间，他把西方的封建制度完全移植到东方，和封建制度同时移植到东方的是，西方的教会和修道院制度。拉丁语文和拉丁礼仪，代替了东方语言和礼仪，如同封建贵族一样，西方的教士取得教堂和封土，西方封建化的教会成为东方教会组织的蓝本，西方的本笃会也逐渐在东方建立隐修院。此外，还成立了一种类似修道院的“武士会”。现在，我就把成立“武士会”的背景与经过给各位作个说明。我们要知道，东方的这个拉丁国，所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是，如何保卫自己的疆土？要防守圣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边界外的回教徒随时都有进攻的可能，何况在拉丁国的境内，还有许多回教徒和暂时臣服的回教酋长，他们随时都有反叛的可能，战斗人员的缺乏，是东方拉丁王国最大的问题。当耶路撒冷重新收复的消息，传到西方以后，又激起了从军的热潮。西元 1101 年的十字军，分成三路到达东方，但在小亚细亚全被歼灭，而在东方未能获得封地的贵族回到本国，将这消息传开了，因而使西方的人裹足不前，不敢参加十字军。为了解决人员的缺乏，以及其他的种种需要，因而产生了“武士会”的组织。第一个重要的“武士会”称为“圣殿武士会”，于西元 1118 年，在沛斯人修的领导下，一群志同道合的骑士，以保护朝圣者，抗拒回教徒为己任，组织成类似修道院的“武士会”。因为他们的会院设在撒罗满圣殿附近，因而就皮称之为“圣殿武士会”。1128 年时，圣伯尔纳德为他们写了一部会规，而成为正式的修道院。会士除了守三圣愿之外，还要宣誓，以武力保护圣地，这是一种修道生的新尝试，把宗教修行和封建骑士两种精神合而为一，因此，也就获得教会和贵族们的热烈欢迎。参加圣殿武士会的多以贵族为主，不过也有一般平民申请

加入的，圣殿武士会不久就获得了许多的不动产，散布于叙利亚和欧洲各地。到了十三世纪，他们成为欧洲的一股极大的经济力量，也是从事银行业的拓荒者，有关这一点，我在谈到十三世纪，工商业复兴的单元中，会再作比较详细的说明。

另一种“武士会”称为医院武士会，它创立的动机，原是因为，在第一次十字军围攻耶路撒冷城时，久攻不下，为了照顾受伤及患病的十字军而成立的。耶路撒冷圣城攻下以后，医院武士会接受了城里的一个专为招待朝圣者的旅社，因而也有“耶路撒冷的圣约翰”的称呼。医院武士会一直是一个从事医务的组织，但是，到了圣殿武士会成立之后，医院武士会为扩大任务，除了保存原有的医疗服务的工作，并且加设军事服务，而与圣殿武士会形成竞争。它的组织也和圣殿武士会相同，也受到东西教会和贵族的支持，成为有财有势的修会，不过，他们仍然以医疗为主，在拉丁王国被回教徒消灭之后，他们还继续照顾贫病患者的任务。文献上曾记载说：“他们在耶路撒冷城内，一座两千张病床的医院里充满了病患，至于门诊的病患，那就更难以估计了。”这座医院一直到15世纪末，仍然存在。圣殿武士会和医院武士会暂时补救了十字军人员的不足。在叙利亚各重要地区，都建有堡垒以维护西方来的朝圣者的安全。

我们分析了一些当时的十字军发生的一些难题，其中人员的缺乏是东方十字军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因此圣殿武士会、医院武士会的成立暂时解决了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十字军精神丧失，也使得当时的十字军增加了许多的困扰，那么使十字军丧失当初的那股宗教热忱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各位还记得我说过的，十字军东征的过程中，他们把西方的封建制度也移植到东方来，在还没有攻下耶路撒冷圣城之前，就已经有贵族为了本身的利益，沿途建立了封建王国，产生了封建的领主与附庸的关系。这种封建制度导致了十字军内部分裂，分散了十字军力量的集中，彼此之间的残杀，往往竟逼使他们去和邻近的回教徒合作，来打击同样来自西方的十字军。同时由于生活的需要，十字军也不得不与当地的回地居民合作，进而就导致了思想上和生活习惯上的逐渐同化，因而降低了初期的那种敌忾同仇的警觉。法兰克的十字军中，许多士卒又和当地的妇女通婚，更减少了彼此间的磨擦。总而言之，站在彼此共存的立场来说，这也未尝不是很好的现象。但是站在十字军初创时的那种，以武力光复圣地的立场来说，则是一个对十字军运动极为不利的发展。因为第一次十字军的成功，是建立在敌我分明的立场上的，一旦这种立场由动摇而日趋消失之后，十字军战斗的能力也就大受影响了。好在这时候的回教徒，也是一盘散沙，如果他们在一个具有野心的领袖下统一起来，那么，十字军是否再能表现初期的那种辉煌成就，也就令人十分怀疑了。

第一次十字军，是唯一成功的一次军事行动，以后的12、13世纪的十字军，由于种种的因素，都没有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其中最大的原因是，参加十字军的人，缺乏了早期的那种纯真的宗教精神。政治和商业的利益，支配了他们的策略和行动，使得原本为崇高的宗教运动，变成为谋取私人利益的工具。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也有不少像法王路易九世那样的人物，但是在十字军精神全面变质的气氛下，他们的努力也无法产生出显著的效果。

3.3.3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

在东方的十字军先后建立的封建王国，所以能够苟延残喘的生存，是因为回教势力的分散，缺乏统一的领导，一旦这种局势有所改变，他们的命运也就岌岌可危了，因而也有了第二次十字军的组织。前面谈到耶路撒冷的国王鲍特温一世在位时，他用武力和外交手腕，巩固了南部十字军国境的安全。鲍特温二世也继承他的政策，他是一位有魄力、有野心的国王，对付回教徒，固然是他的使命，因此在西元1124年征服了提尔，使亚克和漆冬的海防可以联成一气。但是扩展他封建王君的权力，也是他的政策，造成了爱迪沙、安提约基雅和地黎波里的三位封侯的大为不满，不甘心臣服于他。除了他们三位封侯之外，连耶路撒冷城内的其他贵族，也不甘心领主的权力扩张而危及到自己，这么一来，就造成了十字军统治阶级彼此之间不断的纷争。当然，这对敌人回教徒来说，是十分有利的。正当此时，回教徒中出现

了一位强人桑齐。他统一北部回教诸国，然后进攻十字军，1144年攻下了爱迪沙城。消息传回西方后，引起了西方的震惊和恐惧，引起了第二度的十字热潮。宣传这次十字最出力的是圣伯尔纳德。他的计划是，组织一个比第一次十字军更庞大的军队。可是西方虽然因为爱迪沙城的陷落而大起恐慌，但是一般平民和贵族的反应并不如第一次时的热烈，只有法王路易七世和日尔曼国王孔拉德三世率军队响应。原本获回爱迪沙应该是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目的，但是路易七世和孔拉德三世与当地十字军会商之后，主张避重就轻，却决定去攻占大马士革。在政治上，这是一个极为不幸的决定，因为大马士革是耶路撒冷国王鲍特温的盟友。在道义上和策略上，都没有必要再增加一个十字军的敌人。可是鲍特温只一心急于扩张自己的疆土，也就敌友不分的向大马士革前进。这场大马士革包围战，真可以说是，战争史上，最没有组织，最没有价值的战争了。结果当然是无功而退。如果说第二次十字军有任何的结果，那就只能说，十字军的威信从此荡然无存，不仅敌人不再恐惧西方的武力，连盟友也开始动摇而产生离心。此外，希腊人和西方的仇恨猜忌，也因这次十字军东征而更加严重了。

从第二次十字军到第三次十字军，这一段时间，最显著的事实是，回教叙利亚在奴瑞丁和萨拉丁的领导下，不断的统一和扩张。耶路撒冷王国不断的被蚕食，耶路撒冷城又被回教的萨拉丁围攻，而于1187年沦陷了，这是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原因。西元1187年，萨拉丁已开始向耶路撒冷进军，当时耶路撒冷的十字军，竟然选择了在盛暑的七月，北行沙漠地带，去和萨拉丁交战于加里利亚海西岸的黑丁。萨拉丁是以逸待劳，十字军缺乏饮水而大败，阵亡者不计其数，大部份的要将又都被俘，“黑丁之役”消耗了十字军的精华，其他的城市也因疏于防范而相继沦陷。萨拉丁终于率领回教军队围攻耶路撒冷城，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耶路撒冷终于在1187年的10月初，树起白旗向回教徒投降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战果和成就，到此时，已是荡然无存。耶路撒冷失陷的消息，传到西方后，掀起了从军的热潮，已经远比四十年前爱迪沙城的沦陷要高。西方的每座教堂举行祈祷，以表示他们对死难者的追悼，而罗马教宗又号召十字军东征，为能再去光复耶路撒冷圣城。这次响应的有，英王亨利二世和他的儿子理查、法王菲力普二世、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腓特烈第一等。这是十字军运动中，声势最大的一次，同时，为了支援这次十字军，西方欧洲发起了全面的捐款运动，罗马教宗下令，教士们必须捐付特别税，而英王亨利二世首先倡导了有名的“十一税”。法王也在不久之后跟进，制定了同样的税制。这一点，对日后西欧各国家的赋税制度的发展影响深远。从封建个人的经济援助，演变到人民缴纳赋税的义务，“十一税”在历史上，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捩点。诸王之中，第一个启程的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1189年，他率军东行，到了小亚细亚，不幸在渡过沙莱弗河时遭到没顶而死亡。大军失去领袖后，除了少数继续前行到了巴勒斯坦，大部份都回日尔曼去了。英国的理查和法王菲力普的军队在1190年，集结于西西里的墨西拿港，目的在解救包围亚克的十字军。亚克的围攻长达21个月，原本可以速战速决的，但是，英法两军彼此之间敌视，使军事行动不能互相配合，因而拖长了时效，最后是亚克城内，长期缺粮、缺水而不得不降。法王菲力普把军权移交给勃艮地公爵之后，就带着少数的随从回了法国。英王理查则留在东方，为第三次十字军留下了多采多姿的传奇。第三次十字军之所以脍炙人口，是因为双方的领袖都是戏剧性的英雄人物，英雄惜英雄。萨拉丁和有“狮心王”之称的理查，虽然相对为敌，却都有互相敬重的君子之风。两个人虽然本曾谋面，但当理查在亚克生病时，萨拉丁却曾打发使者赠送药物和补品，一时传为佳话。理查留驻巴勒斯坦，南征北讨，有一年之久，1192年，双方签订了和约，依照和约基督徒可自由的来去耶路撒冷从事朝圣的活动，雅法、凯撒、阿苏耳、卡法这四座城归还给十字军。虽然这仅仅只是三年的合约，而且在和约期满之后，战争重新开始，但是十字军在东方至少有三年的全面和平，而且，这是理查一个人立下的功绩，由于他勇敢善战，置生死于度外，因此理查在历史上也获得了“狮心王”的美称。

3.3.4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期间，有个重要的副产品，那就是条顿武士会。在围攻亚克城时，有一些日尔曼骑士，把船只整修改装成为医院，照顾十字军的伤患。后来“条顿武士会”迁回欧洲，成了日尔曼神圣罗马帝国，向东开疆拓土的主要力量，征服了波罗地海的北日尔曼地区。

就罗马教宗的观点而言，第三次十字军是失败的。因为虽然收复了地中海沿岸的几座城，而耶路撒冷却仍然在回教徒的手中，因此当教宗依诺森三世在 1198 年即位以后，立刻又发动了新的十字军，不过西方的帝王们没有一个肯领军亲征的。到了 1201 年，几位强大的法兰西和义大利的领主接受了教宗的号召，决定组织十字军，公推香槟的伯爵狄博为领袖。为了避免过去十字军在运输和补给上遭到的困难，他们和威尼斯的商人讨论合作的计划。我们知道，自从十字军的运动一百多年以来，义大利的各个城邦，像威尼斯、热那亚、比萨等城邦的重要性不断的提高，他们支持十字军，虽然也带有宗教的热忱，但是经济的目的却更日益的明显，最后是取代了宗教的目的。

3.3.5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

第四次的十字军是威尼斯商人和十字军的代表会商的结果，是一项对双方都有利的条约。威尼斯商人提供十字军人马所需的粮草、船只和相当数量的兵马，十字军则付给相当数额的经费。可是，当 1202 年十字军先后齐集威尼斯时，人马的数目并不如预计的那么多，使得威尼斯当局面临一个无人付帐的难题，除非能解决这个难题，这次的十字军似乎只有解散之途了！最后，威尼斯的商人提出了解决的方案，改变了十字军去收复耶路撒冷的原议。那么到底威尼斯商人安的是什么心，打的又是什么样的算盘呢？事情是这样的，在亚得里亚海的东岸，有一座名叫札拉的，由基督徒建立的商业城邦，一直是威尼斯商人的劲敌。为了垄断这地区的商业，威尼斯急于要消灭札拉城带来的竞争，因此，威尼斯建议十字军先去攻占札拉，作为偿债的代价。十字军统领不顾教宗和部份将领反对，很不得已的接受了威尼斯商人所开出来的丧尽天良的条件。十字军围攻札拉城，在没有任何防备之下，札拉城竟是陷入威尼斯敌人之手。当教宗依诺森三世获悉，札拉城被十字军攻下，然后陷入威尼斯商人的手中，大为震怒，立刻下令将参与其事者开除教籍。十字军向教宗表示忏悔，获得了教宗的赦免，威尼斯商人则一直不肯认错，仍然无法恢复教籍。十字军以武力东征原本是要收复圣地和耶路撒冷圣城，保护去朝圣的教友们，这样出于宗教热忱的正义之师，后来竟然变质，成了商人唯利是图的工具，这样的事情真令人惋惜。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动机、军队组成我们感到很无奈，和威尼斯商人的挂勾使得他们签下料想不到的后果的合作条约，因此写下了令人叹息的历史污点。十字军竟然在攻下札拉以后，又去攻占君士坦丁堡，这样的事情也真是太出人意料了，但是天主竟然也容许它发生了。到底怎么的一回事呢？

正当十字军在 1202 年在札拉过冬时，君士坦丁堡的使臣来到了札拉，向十字军提出了东征的计划。早在 1195 年时，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依撒克二世被他的弟弟亚历西乌斯三世所倾覆，依撒克二世的儿子也叫亚历西乌斯，他到处奔走，并向西方发出呼吁，请求西方能帮助他父亲复辟取回皇位。他在札拉和十字军谈判时，提出了颇为优厚的条件，愿意付两万马克作为君士坦丁堡之行的军事开销，支付十字军一年的粮食和补给，还付出为期一年的一万人马支援十字军；等到耶路撒冷收复以后，派五百骑士充任耶路撒冷城的守卫，还要促成东西教会的合一；再加上威尼斯商人的引诱和劝说，十字军将领们接受了这些条件，决定东征君士坦丁堡。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又一次改变路线去对付同一信仰的基督教国家，真是不可思议啊！近代的历史学家对于“究竟是谁使这次十字军出征的路线改变？”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辩。有一派认为，日尔曼的君王菲力普是主要的策动人，因为菲力普娶了君士坦丁堡皇帝依撒克的女儿，也就是亚历西乌斯的姐夫，当亚历西乌斯奔走求援时，他活动的中心就是在日尔曼的朝廷中，而菲力普本人又因党争之故而与罗马教廷关系恶化，那么协助亚历西乌斯，

既可以伸张自己的势力，又可以打击教宗依诺森三世的计划。无论如何，这一派的学者认为，早在札拉谈判之前，十字军将领就已经知道这个计划了，而十字军之所以接受这项建议，是因为他们若能获得补给和金钱，既可偿还威尼斯的债，又可以脱离威尼斯的控制而采取独立的行动；另一派的学者认为，整个儿的计划就是威尼斯商人所一手促成的，十字军原本有意先去攻打埃及的亚历山大城，然后由南而北进取耶路撒冷城，但是威尼斯和埃及之间早就有了通商条约，因此不愿意激怒回教徒，而损害威尼斯自己的利益。而第三派的学者，则认为整个事件的发展，完全是出乎意外，事前并没有预谋。不管怎么说，总之君士坦丁堡绝对不是十字军的最后目的，这一点呢，则是完全可以确认的，他们原先以为君士坦丁堡的事可以很快的就解决了，有了亚历西乌斯的诺言，那么收复耶路撒冷城也是指日可待的事了！

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发展：1203年4月，十字军离开札拉，实际参加这次“希腊战争”的为数不过两万人，十字军和威尼斯的军队各占一半。当大军抵达君士坦丁堡城下，没想到篡位者当夜就弃城而逃，十字军可以说是不劳而获。老皇帝依撒克二世复辟，太子历西乌斯也同时登上了皇位。如果新皇帝立刻履行诺言，十字军就可以继续他们预定的计划，向耶路撒冷前进了，但是亚历西乌斯的皇位尚未巩固，不敢向人民征收新税，或是强迫东西教会合一，因而就一再的敷衍，造成了十字军对拜占庭政府的不信任，同时又加上西方来的大军久驻京城，和当地的人民也结下了很深的怨恨，经常传闻出不幸的事件。1204年初，拜占庭的宫廷发生了政变，亚历西乌斯皇位被杜卡斯所篡。新皇帝是一个反拉丁派的，拒绝承认前朝皇帝所签过的条约，当然就激怒了十字军，所以再一次和威尼斯人联合起来攻取君士坦丁堡，双方并且签下了瓜分希腊的东罗马帝国的协约。不到四天的功夫，君士坦丁堡就被攻下来了。篡位的新皇帝早已提前逃跑了。新被拥立的皇帝在京城攻下之后，逃往小亚细亚的尼西亚，组织流亡政府，继续和拉丁人对抗。君士坦丁堡陷落后，十字军和威尼斯人从事抢劫搜括，所有金银珠宝、教堂的艺术品及圣人的贵物等等通通猎取一空。经过这番物质上的洗劫之后，十字军和威尼斯的商人，再从政治和宗教的领域上瓜分了东罗马帝国。法兰德的鲍特温伯爵被选为皇帝，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君士坦丁堡拉丁帝国”的开始。皇帝既然是从十字军中选出，所以按照协议呢，大主教就应该是威尼斯人来担任，至于土地的分配。皇帝分得四分之一，威尼斯分得八分之三，包括了克利特岛、爱琴海诸群岛、沿海各商业重镇，剩余的土地呢，则由诸将分别领管，大小不等，当然西方的封建制，又一次被带到了东方的拉丁帝国。

教宗依诺森三世对君士坦丁堡的攻击，事前虽然反对，事后也只有接受并承认拉丁帝国是教廷的一个附庸国。拉丁帝国从诞生到1261年灭亡，一共只不过58年，为拜占庭和东西双方教会，都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伤。希腊人对西方教会的憎恨也日益加深，使得东西教会双方的合一更是不可能的了。此外，拜占庭复国以后，始终无法恢复它的元气了，因此也就没有力量来阻止回教势力的发展。很明显的，这次的十字军，根本上唯一的受害者是威尼斯，从此以后，威尼斯人控制了东西的贸易，击败地中海北方的其他城邦，而成为北地中海的第一个商业帝国。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以后，在君士坦丁堡城中设立了新的圣统制，一个拉丁宗主教区，辖有22个的首席主教区，及58个主教区，教宗依诺森三世对威尼斯人利用他的十字军，表现得很不愉快，但是，事已如此，也只有承认在君士坦丁堡新设立的教会组织了。

从整个政治形势来看，这一件事并不是十字军运动的障碍，对于摇摇欲坠的拜占庭帝国，这件事也该不止正义或非正义。十字军之所以不能收复圣地，主要的原因是在于缺乏基地。假如在希腊半岛上的“拉丁帝国”强而有力的话，就早已能供给十字军所需要的基地了。但是，因为征讨不全，这种需要也从来没有能实现，其他的领主又都与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帝国”分庭抗礼，这么一来，想要与巴勒斯坦圣地之间的联系也就更不可能了，而且“拉丁帝国”对封建组织和小封主们也己叫苦连天了！

3.3.6 十字军东征的影响

第四次十字军的一再变质，暴露了十字军一个基本上的弱点，那就是组织的不健全。若称十字军为乌合之众！那也言过其词，但是封建军队的散漫和群龙无首，则是事实。每一个将领都各自为政、各怀鬼胎，不仅在作战时没有统一的号令，在补给的供应上也缺乏周密的筹划，因此不得不依赖于组织较为健全的义大利城邦威尼斯，而终于受制于他们。到了十三世纪以后，教宗虽然一直呼吁组织十字军，但是各方面的反应却相当的冷淡，因为征讨在西班牙南方的回教徒，肃清法兰西南部的“亚耳比异端”，以及用武力去归化东欧的斯拉夫异族，都为西方的骑士们提供了更好的机会，去实现他们成为十字军的愿望，不必跑到遥远的东方；而更重要的，历次十字军的失败，各将领的自私，东方拜占庭基督徒的反抗等等因素，也减低了西方人对十字军的热忱；此外，自依诺森三世以后的教宗，因为历年来，他们和日尔曼皇帝之间所发生的纠纷和争执，一而再再而三的呼吁组织十字军，由于不是对付近东的回教徒，而是对付自己西方的基督徒，不但没有人响应，也更降低了罗马教廷的威望。以后的几次十字军，像 1217 到 1221 年间的第五次十字军、1248 年的第六次十字军和 1270 年的第十次十字军，都不是由罗马教廷出面组织的。第六、第七的两次十字军是由法国的圣王路易九世所领导，也都没有任何具体的成效。十字军精神的衰微，最重要的原因是，西方人民有了新的兴趣，他们的精力也有了发展的新方向，王权的巩固和中产阶级的兴起，降低了封建骑士的地位，十字军的兴起可以说是中古骑士精神的表现，一旦骑士精神在政治和新社会里，逐渐丧失了它原有的地位时，十字军运动也就跟着失去了它的吸引力而逐渐消沉了。

两个世纪以来的穷兵黩武，结果是一场空。1261 年“拉丁帝国”被灭；1268 年失去安提约基雅；1291 年最后的一个据点亚克也沦陷于土耳其人手中。十字军表面的结果是失败，圣地得而复失，东西教会也未能统一，反而种下了更深的成见。有些人谴责教会当局，把基督教国家领入战争的不幸政策，而忘记了他们真正的职责。说的也是，若没有教宗出面呼吁和推动，十字军运动根本不会产生，也不至于延续这么久。教宗吴尔班二世和连续的几位继承人，的确太低估了这个运动的艰巨性。教宗们以为人人都应有和他同样的理想，但是能有这样理想的，必竟是少数。何况这些封建骑士们的作战策略也太平庸，对敌人又缺乏了解，以及我在前面所引述过的种种理由，十字军运动在历史上给人留下了不少的恶劣印象。下面让我们来探讨一下，十字军对欧洲文化的影响，无疑十字军对西方欧洲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复兴，都具有刺激的作用。义大利城市以及后来的欧洲其它城市，都受惠于来往于东西方的朝圣者，和建立在君士坦丁堡和叙利亚的拉丁封建王国。西方学术从回教世界输入了许多科学、哲学、医学等各方面的新知识，可是基督教世界和回教世界有更直接的交通，是在西班牙和西西里，而不是在近东。因为在小亚细亚、北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等地，十字军与真正的回教文化反而极少接触。而罗马教宗的声望固然借着十字军而增高了不少，但不全然是受十字军的影响。东西交通促进了思想的交流，来自西欧各地的骑士，共聚一处，互相学习，使得骑士精神更成为一种普遍的制度，颂扬十字军的诗歌和故事成为沟通骑士阶级的工具。十字军运动开放了欧洲封闭的、静寂的社会而成为更开朗、更活泼的社会。由宗教的观点说，十字军的另一效果就是传教精神的发展。他们发现世界已不只限于天主教欧洲了，看到了许多梦想不到的民族，关怀到受异族迫的教友，激起了对异族的怜悯和同情，十字军中的随军司铎不断的从事归化人灵的和平工作，这比军事的作用更大。

3.4 十三、十四世纪的传教事业

3.4.1 方济会的传教

这里介绍义大利西西地方的圣方济和他的传教事业。十三世纪初，当十字军一再违反

他们宗教的目的时，出现了圣方济。他认为征服回教徒，武力未必是最好的方法。天主教与回教徒，当时只知道彼此残杀，而圣方济却赤手空拳向他走去，他没有别的计划，只想对他们宣讲福音，引他们自动受洗而不愿加以勉强。

西元 1219 年，在埃及达米耶特的第五次十字军时，有一天看见圣方济和他的几位同伴来此，十字军就问圣方济来做什么？他回答说：“要到回教徒当中去。”战士们告诉他说：“你疯了！回教徒的首领告诉回教徒说：‘谁若是砍下一个天主教徒的脑袋，谁就可以得到一个金币。’”圣方济和他的同伴们丝毫没有恐惧。十字军的战士们无法劝阻圣方济不要到回教徒中，教宗的钦差大使枢机大人也来劝阻圣方济，仍然无效。他带着随从，口中高声唱着圣咏，勇敢的向着回教徒走去，没想到回教君主竟然亲自出来接见他们。这位回教君主还与圣方济当场辩论起宗教的问题，圣方济为了向苏丹王证明自己的宗教远远超越回教，提议来一个考验说：“请你燃起一场大火来，让你的司祭和我一同走进火里，然后请你由这场火的结果，自己去判断那一个宗教是最神圣的。”苏丹回答说：“我很怀疑我的司祭们有走进烈火中的兴趣。”圣方济就说：“那么我单独走进，如果我被烧死，那就是我的罪过，如果天主的全能保护我不死，你得发誓承认，耶稣基督是真天主和救世者！”苏丹却说：“一位回教的领袖，绝对不可以因信奉天主教而背弃自己的人民。”苏丹王至少对圣方济并未加以陷害，反而对圣方济相当的礼遇，让他平安的返回十字军的营区。圣方济自己到埃及去的同时，也曾打发五位弟兄到摩洛哥去，向回教徒宣讲耶稣基督，这五位弟兄虽然没有能使任何回教徒皈依，却获得了殉教的荣冠。圣方济这种传教的初步试探，虽然没有获得常人所谓的成功，但是却非常的重要，那就是证明了一种新的精神，随着圣方济和圣道明两个托钵修会的创立，使得向异教人宣传福音这几乎已经熄灭的热火，又重新在教会内燃烧了起来。道明会士固然以知识的活动而大放异彩，但是，他们在修会创立的最初时期，便呈显了热烈的传教活动。圣道明本人虽然没有参加对异教人的传教工作，他却愿派遣自己的会士们参加，道明会的会士被派遣到突尼西亚、摩洛哥、北欧、小亚细亚和波斯等地去工作。去到匈牙利的道明会传教士，曾经是深入俄罗斯平原，到达伏尔加河流域，可惜的是，在那一带的工作不久就归于沉寂而未能发扬光大。

3.4.2 蒙古的崛起

正在这时，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那就是元太祖成吉思汗所建立的“蒙古帝国”开始不断的向外扩张。西元 1219 年起率军西征；1222 年，南宋宁宗的嘉定十五年，成吉思汗派哲别及速不台越过太和岭，也就是欧洲和亚洲之间的界山高加索山，渡过阿速海峡攻打钦察；更进一步，在喀尔喀河附近打败了俄罗斯联军；1225 年，成吉思汗定都和林；1227 年，成吉思汗在一次打猎中坠马受伤后不久去逝，他的儿子窝阔台继位之后，决心征服欧洲。就在 1235 年，以拔都为统率，展开蒙古大军的第二次西征。1237 年攻下了俄罗斯的基辅和莫斯科；更进一步横行于孛烈儿和马札儿一带，也就是现在的波兰和匈牙利大平原；1241 年，匈牙利的京城布达佩斯被拔都攻陷，然后他又率领蒙古军渡过多瑙河，从奥地利直趋意大利的威尼斯。蒙古大军在沿线大事掠夺了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蒙古的铁骑兵真可说是所向无敌。西欧各国眼看就要全部沦陷，就在这时候，传来了蒙古太宗窝阔台的死讯，拔都听见这个噩耗，就立刻班师赶回蒙古去了，西方欧洲才得以保全。

当这场被西方人称为可怕的“黄祸”，自东向西横扫俄罗斯、东欧之际，欧洲和小亚细亚，正处于变乱之际。而教会内呢，也正危机重重。教宗迁都不定，以致酿成假教宗相互争立，使教会处于分裂。同时教宗和日尔曼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互相争主权，欧洲的君王们，因此而无法合力的抵御外敌的入侵。而且，又因屡次组织十字军失败无功，各国的君王不再听信组织联军的号召。在东欧和小亚细亚，回教势力日益强盛，东罗马帝国也几乎陷于分裂瓦解的情况，因而在东欧出现像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希米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等国。小国既多，力量又弱，蒙古兵一到，自然是势如破竹，无力反击，拔都班师回去离开

东欧后，这些地方几乎被信回教的土耳其人所占领。而小亚细亚在十字军运动鼎盛时，所建立的几个拉丁王国，也都逐渐被回教徒所消灭了。回教徒和西方最后几次的十字军相争，使西方君主有了想要联合蒙古人来攻打回教徒的计划。

蒙古西征时，时常在攻下一座城之后，大举屠杀百姓、放火烧城，连甘心投降的也都一律斩杀。欧洲人听到这样的消息，没有不大为恐惧的，也都想仿效十字军东征的先例，组织第七次十字军抵抗蒙古军。匈牙利国王曾派遣方济会和道明会会士深入蒙古军队中，但是都被擒拿杀死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因为来自各方面的呼吁，也就出面组织十字军，分别致函给各国的君王和诸侯，但是他本人当时正和教宗争权，他想利用抵抗蒙古的十字军来攻击教宗，当然以这种野心也就组不成联军了。

3.4.3 柏朗嘉宾出使蒙古

正当拔都西征孛烈儿和马札儿，也就是波兰和匈牙利时，有一些方济会、道明会的修士们乘机逃到中欧各国，宣传蒙古军队如何如何的残暴，呼吁各国同心协力挽求危亡。当时的教宗额我略九世，又劝告通谕日尔曼的各修会会长们，再一次发动组织十字军，并且还颁发与早期十字军同样的大赦，各国的主教们也都纷纷响应。但是这种十字军，最后都因为各国君王意见不合而未能实现。教宗额我略九世于 1241 年去逝，继位的教宗只在位 17 天也去逝了。经过了一年多，教宗依诺森四世继位，但是受到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腓特烈二世所施的恶计，无法在罗马居住，因而流亡在法国的里昂。教宗依诺森四世，在 1245 年的夏天，召开“里昂大公会议”，会议结束时，教宗宣布派遣使节出使蒙古，劝告蒙古大汗停止残酷的烧杀，他也想借着使者窥探蒙古内部的实际情况，可以作为抵御的参考。教宗依诺森四世所派遣的使臣，名叫柏朗嘉宾，他是方济会的会士，出生于义大利亚西西附近的贝鲁济亚省的嘉宾小镇。他之所以被选，出任前往蒙古朝廷的特使，理由是，因为柏朗嘉宾曾经担任日尔曼地区的方济会区长，兼管波兰、匈牙利、波希米亚等国的方济会，非常明白东欧的情形。这时候的柏朗嘉宾已经是 63 岁的老人了。1245 年的复活节，也就是蒙古太宗的第十七年，柏朗嘉宾不辞辛劳带着教宗依诺森四世至蒙古大汗的书信，和方济会的斯德望修士，从法国的里昂出发了。沿途经过日尔曼、波兰、又增召了名叫本笃的方济会士与他们同行，同时担任他们的翻译工作。一行三人总共花了 10 个月的功夫，到了蒙古大军所驻扎的基辅城。1246 年 4 月 4 日，柏朗嘉宾来到基辅，离开基辅城后，向前行 320 多天，进见驻防的将军，将军派兵一路护送，并且改乘元朝的驿马，延着驿站又经过一个多月的行程，到达拔都所驻守的城镇。依照蒙古人的习俗，先沐浴以后，才由侍卫带领，进入拔都的帐幕，呈递教宗的信函，拔都后命令翻译官译成俄文、萨拉森文和蒙古文字。拔都阅读过蒙古文的翻译之后，就安排柏朗嘉宾和随行的修士到和林去晋见定宗贵由可汗，还派了两位骑兵随行导引。当时柏朗嘉宾的身体疲劳，已经不堪骑马的辛苦，又不知道此去是凶还是吉，起程时和本笃修士两人相对而哭。终于在三个月后的 7 月下旬到达和林。从里昂到和林，这一路行来共花了一年又三个月，骑马走了五千多公里。当时贵由还没有正式登上大汗的王位，而是由皇太后代行朝政。柏朗嘉宾晋见皇太后时，呈上了拔都的翻译官代为翻译教宗依诺森四世的蒙古文译本。皇太后命令等候参加贵由大可汗的登基大典。一个月以后，柏朗嘉宾参加了登基大典，目睹了从世界各地来的民族，以及蒙古各部落的代表四千多人，向定宗贵由大可汗朝贺。

宫廷内已接到拔都传回的报告，所以他们受到了相当的招待。八月底，柏朗嘉宾终于觐见了定宗大可汗，呈上教宗的信函，也晋见了皇太后。皇太后本人就是景教教徒，而定宗左右的三位臣相中，就有两位也是景教教徒。定宗大可汗对景教的司祭和教徒优礼有加，他们能在大长幕内举行弥撒。他主要的大臣也都是景教信徒，但是，元定宗贵由，在晋见教皇的使臣，并没有给了特别的注意。当时从各方面来朝贡的人很多，有进贡的、有求和的、有请降的，柏朗嘉宾便被视为其中的一个。虽然因为皇太后和左右大臣信仰聂斯多里派的景教，也崇拜耶稣基督，而对教皇派遣来的使臣特别照顾，但是蒙古的大可汗想要征服欧洲的心，

是不会因为教皇的一封信就马上改变了，贵由回复教皇的信函语气就相当的傲慢，在这里节录几句作为参考：“上天之神威，众生之君王，朕致书大教皇，尔教皇及信从基督之人，遣使来朝，闻来使所言，阅所携之书，知悉尔等愿与朕结好修睦，如尔等愿与朕修好，尔教皇及皇公巨卿，宜速来见朕，勿稍稽延，以听朕之吩咐，如此朕知尔等真愿修好矣；如尔等不来见朕，则朕知尔等实愿战争矣。后事如何，朕不能知，唯上天知之也。”此外还答复教皇，表明看得出来为什么要领洗信奉天主的理由，也为蒙古人暴力残杀提出答辩说：“那是因为彼辈不闻上天与成吉思汗之命，且杀所遣使臣，上天乃欲灭杀之，尔辈西方人自以为独奉基督而鄙视他人，朕等亦信上天，赖上天之力，将自西徂东，征服全世界也……上天的权能显然是在蒙古人这边，否则我们不会有如此成功的胜利。”柏朗嘉宾回国时，皇太后还赏赐貂皮长袍和丝缎锦袍，回到里昂时，已经是元定宗二年，1247年的年底了。他所负的使命，显然是失败了，教皇命他去见法王路易九世，劝路易九世停止组织十字军，因为教宗知道必将徒劳无功的。

在朗嘉宾出使中国回到西方以后，方济会士第二次奉派出使的是葡萄牙籍的劳伦特，他也无功而返。当柏朗嘉宾出使蒙古朝廷时，教宗又派另一特使亚旭林前往近东的蒙古军营，访问近东蒙古军队的大将，希望能够因着蒙古军营中，信奉“聂斯多里派”的基督徒的影响，而引起蒙古人注意圣地巴勒斯坦的问题，共同合力驱逐那些占据圣地的回教徒。道明会会士亚旭林和随行的修士们，在1247年到达中东花刺子模的加利津城，晋见蒙古大将巴义朱，呈上教宗信函，口传了教宗的意思，劝导蒙古人不要屠杀无辜的人民。由于亚旭林不愿行叩头下跪之礼又不献礼，巴义朱勃然大怒，命人立刻处死亚旭林和随行的修士们，幸好巴义朱的妻子是景教信徒，而巴义朱的左右也有好多位景教教徒，极力相劝，才收回成命，亚旭林等修士才免于死，但却被拘留起来有如俘虏一样，过了两个月才被释放遣送回国。巴义朱给教宗的回函，也是傲慢而无礼，还劝教宗要率领欧洲各国向蒙古人投顺进贡。

柏朗嘉宾回到欧洲，将这次出使蒙古的经过写成报告，称为《柏朗嘉宾游记》。这使得西方人对蒙古人和它势力的强弱，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因而能够计划如何的自卫。另外柏朗嘉宾收集了许多有关中国的资料，欧洲人开始认识了这个远在东方的国家。当时的欧洲人称中国为“震旦”。根据柏朗嘉宾的报告，在第九章上有这么一段记载说：“震旦人仍然属于异教地区，他们有自己的文字，据说还拥有新旧约圣经，他们有记载历史和祖先行传的书籍，有修士和类似我们圣堂的庙宇，他们自称有圣贤，并且还崇拜唯一的真神上帝。他们也崇拜敬礼耶稣基督，而且也相信永生，不过并没有受洗。他们对教友很爱护，并且给了大量的布施，他们的习俗谦让温恭，大多数都不留胡须，容貌和蒙古人很类似，真是一个文雅而可爱的民族。也有人类所爱的各种技艺，可以说，全世界没有比他们更优良的技工。还真是一个天府之国，盛产五谷小麦、酒、金、银、丝绸以及其他各种养生的物质。”这些报告显然很笼统又模糊，把基督徒和佛教徒混为一谈，当时在中国固然有聂斯多里派的景教徒，但是显然看得出来，他似乎连景教或是摩尼教也未能分辨清楚。不过虽然是模糊，但是却激起了，欧洲人对这遥远而陌生的中国的好奇心，这位勇敢的方济会士，他给探险家指出了应当遵循的途径。

3.4.4 欧洲与蒙古的交流

自从方济会会士柏朗嘉宾、道明会会士亚旭林东来，与蒙古人有了接触以后的十年中，欧洲的天主教国家和教廷，先后派遣了使节和传教士到东方来。西元1248年，定宗三年年底，当法国圣路易九世国王率领第七次十字军东征，驻守在塞普鲁斯岛时，有蒙古将军巴义朱的继任人伊治家台，派遣来的使臣晋见。一个名叫莫利发·达味，一个名叫玛尔谷，他们显然是聂斯多里派的景教教徒。当时，正好有一位随同亚旭林晋见过大将军巴义朱的修士隆如满，他也在法王路易九世的帐篷中，担任了他们之间的翻译。两位使臣带来了用波斯文和阿拉伯文写的信函，信中表达说：“如果要想收复耶路撒冷圣地的话，伊治家台愿意率领蒙

古军队来协助十字军，攻打回教徒。”使者还告诉路易九世说：“大将军伊治家台也是基督徒。”当然了，也应当是聂斯多里派的基督徒。伊治家台信中说，他将计划征服回教哈里发，请法王路易九世出兵埃及，相互声援，伊治家台将负责驻防管理土耳其和高加索一带地区。他写给法王路易的信，文词语气和一般的蒙古将帅，或可汗致西方国王或教宗的信却不相同。信里既称赞法王，又赞扬基督的教义，并且说明，凡信奉基督的，能在蒙古大帝国内享有自由平等。像这种语气的信，很可能是伊治家台帐下的聂斯多里派教徒，或是希腊东方礼仪的教徒所代写，也有可能是两位使者，隐藏了伊治家台的原信，自己别出心裁所伪造。法王路易当然信以为真，一方面回信给伊治家台，一方面派遣隆如满协同另外两位道明会会士为报聘的使臣。1249年，隆如满带着法王路易的信和珍贵的礼物和他同会的两位会士，以及两位伊治家台的使臣，离开塞普鲁斯，经过波斯，来到伊治家台的军营。伊治家台就打发法王路易的使臣，前往和林去见贵由大可汗。当他们到达和林时，贵由已经驾崩，由皇后亲政，隆如满晋见了皇后，呈上信函和礼物，皇后视他们为进贡的使臣，给法王路易的回信，也是非常的傲慢。1251年，元宪宗年隆如满归回法王路易驻守之地亚克里城复命。

柏朗嘉宾和隆如满先后出使蒙古朝廷，都被蒙古朝廷看作是进贡的使臣，所带回来的信件，语气和措辞也都是傲慢无礼，因此教宗和法王都不想再派使节了。但是，当时有传说是这样的，在蒙古的朝廷和军营中有许多信奉天主教的人，教宗和法王路易，他们想设法派遣传教士去照顾这些教友，于是法王选派了两位方济会士罗伯鲁和巴尔多禄茂，前往近东各国去传教。1253年，两人由君士坦丁堡出发，首先抵达撒里各的军营，这位撒里各是拔都的儿子。两位会士请求他，准许在他管领的地区中传教。撒里各就打发罗伯鲁和巴尔多禄茂到俄罗斯的伏尔加河畔，去见他的父亲拔都。拔都又打发他们去和林晋见元宪宗蒙哥大可汗，在十个月的行程之后，抵达和林，已经是1253年的年底了。他们在那儿很惊奇地看到许多匈牙利、法兰西和英吉利的教友，这些教友是在西征途中被俘掳来的，自从被俘以来，便从未再领过圣事，除非他们重新受洗。聂斯多里派的教徒，拒绝他们进入圣堂。罗伯鲁在居留和林的八个月中，便在这些教友中善尽了他司铎的职务。往后这两位会士，曾经被邀请到回教、佛教，以及聂斯多里派的教士面前，演讲天主教的教义，很受到蒙古王候们的重视。他们两位都明白，在当地阻碍天主教传教士活动的重要困难之一是聂斯多里派的教士们，贪财酗酒的生活不足为人师表，因此引起蒙古人对基督徒不分青红皂白的普遍轻视。由于天气和饮食的无法适应，罗伯鲁便带着元宪宗致法王路易九世的回信回西方。回信中邀请法王向大汗称臣。罗伯鲁神父于1255年6月回到塞普鲁斯岛，但是法王路易已经回本国去了。罗伯鲁神父只好写下奉命出使的始末，晋呈给法王路易九世。从1245年柏朗嘉宾奉使出发到和林，到1255年，罗伯鲁回到塞普鲁斯岛的十年间，天主教试着要将基督的福音传入亚洲，就整体而言，没有达成目的。但就西方天主教和蒙古的接触而言，出使蒙古朝廷的传教士们所撰写的报告，在欧洲激起一股对东方的兴趣，并且也证明了，只要中亚能隶属于一个统一的政权，便能由陆路从西欧到远东，而亚洲也给天主教的传士们打开了方便之门。

西元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位，有威尼斯的商人波罗家族中的兄弟两人，从欧洲去克里米亚，在路上经过布哈拉的途中，遇到蒙古的使臣，这使臣得知忽必烈即位，想要赶回北京，邀请波罗兄弟同行来到北京。元世祖对兄弟两人优礼有加，兄弟两人又都学会了讲蒙古话，元世祖更多次的邀请波罗兄弟进入宫廷中，述说欧洲的风土人情、天主教会和教廷的情形。元世祖便派他们回欧洲，充当他的使臣，携带致教宗的信函，去见教宗，并且要求教宗派一百名有学识的人到中国来传教。

西元1269年，波罗两兄弟回到了欧洲，正逢额我略十世当选教宗，教宗亲自召见远从东方回来的兄弟两人。教宗也命他们携带致蒙古皇帝的信件，并且还派了两位道明会会士与他们结伴同行，才走到亚美尼亚，就遇到埃及的回教军队，两位道明会会士不敢再继续冒险前进。弟弟尼古拉·波罗在这次的中国之行，也带着自己的儿子马可·波罗同行，一家三口

继续冒险前进。在 1275 年，回到了中国，觐见元世祖。马可·波罗不但学会了汉语，还对蒙古、回纥、西夏、西藏等语言文字有所了解。元世祖非常喜爱他，他还在元朝廷中担任官职有十七年之久。一直到 1291 年，为了护送公主下嫁波斯王，由泉州出发，由海上航行到波斯，在波斯停留了九个月，然后才在 1295 年，一家三人回到了故乡威尼斯。马可·波罗把他在东方所见所闻写成了《东方见闻录》，也称《马可波罗游记》。这本书在欧洲传开以后，给了欧洲人一个启示。欧洲人似乎发现了一个新世界，原来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人口众多、建筑华美、商业繁盛。早先方济会会士们根据传闻所报导的：“中国有天主教的教友”，马可·波罗也已经亲眼目睹，这证实了报导并不是虚传。我们知道，自从西元 845 年，从唐武宗年间，禁止外来宗教之后，聂斯多里派的景教在中国可以说已逐渐绝迹了，但是在边疆各民族中，像维吾尔、克烈、乃蛮等部族之间，景教的教务仍然是很发达，在蒙古人的朝廷军队中，也有不少聂斯多里派的基督徒。等到蒙古人侵占了中国以后，由于人民的迁移和流徙，便有不少基督徒在中国境内定居下来。当时不仅西北和北方省份，有聂斯多里派圣堂和修道院，即便在内地，像杭州、泉州、扬州等商业繁盛、商贾云集的地方，也都有基督徒，皇族中也有不少基督徒。元朝皇帝既然对宗教采取宽容的态度，对聂斯多里派的基督徒，自然也不刻薄。根据马可·波罗的所见所闻，在教会的大瞻礼日，聂斯多里派的司祭往往把福音经书，呈现在皇帝面前，皇帝虔诚的向福音经书献香，并且还以口亲吻。西元 1289 年，成宗在位时，元朝礼部之下设有崇福司的官职，专门处理与景教有关系的人事。

3.4.5 元朝时中国的传教历程

首先介绍一下两位“聂斯多里派”的隐修士的故事。拉邦扫玛生于北京附近、马尔谷生于绥远。1275 年，两人都在北京附近过着隐修的生活，他们决心到耶路撒冷去朝圣。在 1278 年，他们到达波斯，当时混乱的时局已不允许他们再往前行。马尔谷便被选为聂斯多里教派的宗主教。拉邦扫玛在 1287 年被驻在波斯的可汗，任命为派往欧洲的使臣，设法使十字军和蒙古联盟，对抗回教徒，他受到法王的接见，又到罗马，教宗尼古老四世亲自接见。拉邦扫玛不久就归化，加入罗马公教的羊栈，并且在伯多禄大教堂举行了弥撒圣祭。这位可敬的司铎，从极神秘的东方而来，在伯多禄大教堂献弥撒的这种奇景，给西方教会很大的震撼。方济会传教士带回的报告，已经把奄奄一息的传教热火重新点燃了，而拉邦扫玛所带来的消息，使它更冒起了熊熊的火焰。在东方有一个已多少接受了福音的世界，急需传教士，这一点真是不容置疑了。

自从教宗尼古老四世知道，在中国确实已有许多教友，就在 1289 年派遣一个使节团，带着教宗致元朝皇帝的书札前往。使节团的领袖是一位 42 岁的方济会会士，名叫若望·孟高维诺，他是义大利的哈利人。1279 年左右，孟高维诺被会长派到中东，负责方济会在波斯一带的传教工作。后来，孟高维诺以波斯王使臣的身份回罗马，而当时，元世祖也派了哈班到罗马，哈班是一位聂斯多里派的神父，他到达欧洲后，受到极大的重视，英国国王在波尔多接见了哈班，巴黎大学也特别为他举行欢迎的仪式。孟高维诺到罗马后，晋见了教宗尼古老四世，于是教宗转为派遣孟高维诺为代表教宗的钦差大使，携带着教宗至元世祖的信函到元朝的上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同时，也带着教宗的信函顺道代表教宗，访问亚美尼亚、波斯、土耳其等地的国君，一方面好将他在波斯的工作个交待。孟高维诺在至元 26 年，也就是西元 1289 年，由义大利动身，乘船到小亚细亚，经亚美尼亚，回到波斯，在波斯停留了几个月，在至元 28 年西元 1291 年动身由海路到达中国。当时与他同行的，还有位道明会的会士和一位商人，船只航行到印度，孟高维诺登探访圣多默宗徒的遗迹，同行的道明会会士生重病去逝，孟高维诺就将他安葬在圣多默宗徒的遗迹旁边。料理完了丧事，孟高维诺继续乘船东行，在福建泉州港登上我国的国土，我们说，他是第一位真正踏上中国土地的传教士。在元成宗元贞元年——西元 1294 年，到达了上都北京，觐见了元成宗，成宗以礼相待，并准他在上都居住。

这时候，教宗尼古拉四世已经去逝了，然后连续换了三任教宗，到克勒孟五世时，教廷迁移到法国的亚味农。虽然经常接到蒙古帝国境内，其他地方的方济会会士们的报告，但是，始终没有接到孟高维诺的任何消息，都认为他已不在人间了。到了1307年，教廷忽然收到他的信函，报告他在中国传教生活的情形，才知道他还活着。教会直到现在，还保存了三封孟高维诺寄回教廷的信札。第一封，大概是在1292到93年时，从印度的马八儿寄出；第二封则在1305年，从大都汗八里，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寄出；第三封，是在1306年的复活节以前寄出的。根据这些信札中的描述，使我们能够知道，他在中国的传教事迹。他说，自从他在上都住下以后，便有一位聂斯多里派教友，名叫乔治，跟他很要好。他是维吾尔族的王侯，因为受到孟高维诺精神的感召，皈依了天主教，不但他自己进了天主教，还引领了大部份维吾尔族的同胞，跟他一样回归圣教会的羊栈。他还在维吾尔境内盖了一座圣堂，这座圣堂的遗迹，在20世纪的初年，被考古学家挖掘出土。乔治对传教工作非常的热心，他也是皇帝的驸马爷，在朝廷中的地位很高，能够保护传教士和教友。非常可惜的是，乔治驸马爷在1299年去逝了，其他的聂斯多里派又乘机迫害维吾尔族的教友们，孟高维诺当时又无法抽身离开北京，也就无法到维吾尔去协助被迫害的教友，以致于大部份的教友又回到聂斯多里派了。

孟高维诺在北京也时常遭到聂斯多里派的反对和攻击，他在信札中说：“聂斯多里派的教徒，负基督信友之名，实际上远远违背了基督的教义。他们在这里声势嚣张，不容许自己教派以外的基督信徒建立一个小圣堂，也不容许自己教派以外的教义，乃是因为宗徒和宗徒的弟子们，从未有人踏上这个国家的国土，所以聂斯多里派群起攻击我，还收买别人来攻击我，制造谣言说我不是教所派遣的，说我是一个奸诈的巫师，还说我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又引导他人诬告我，在印度谋害了教宗所派遣的使臣，夺取了献给皇帝的贵重礼品，自己冒充是使臣来中国，每次被召到官厅衙门，每次都受到侮辱。我遭到这样的毒计陷害长达五年之久。幸好依赖天主的恩宠和保佑，最后终于有人供认了实情，皇上也明白了我的清白和聂斯多里派教徒的诡计，把他们充军到远处去了。”孟高维诺虽然遭受到诬告和陷害，但是信从他的人越来越多。1305年，成宗大德九年时，他已经为六千人付了洗。那位和他结伴一同到中国的义大利商人，在皇宫附近为他购得了一块地，孟高维诺就在那儿建造了第二座圣堂。他召集了许多儿童，教给他们咏唱日课，有时候，还领着他们在皇帝面前献唱，皇帝很欣赏这些儿童的咏唱。孟高维诺曾经获得一位德国方济会士阿尔努特协助，但是为传扬基督的福音，他始终是嫌工人太少。何况孟高维诺已感觉到自己年纪越来越大，就向方济会的总会长上书，要求派遣助手前来中国。这位单枪匹马的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事迹传回到欧洲，唤起了教廷的高度注意。教宗克勒孟五世决定祝圣孟高维诺为驻北京的总主教，于是命令方济会总会长选出七位，热心而有才学的司铎，祝圣他们为主教，派往中国，负责祝圣孟高维诺为主教的任任务，并且，将孟高维诺的主教权力扩展至整个中国。七位主教中，有三位因为旅途的劳顿及食物的缺乏，死于前往印度的旅途中；一位中途折返义大利，只有三位在1308年到达北京，在中国的传教工作也因此兴旺起来。他们靠着一笔亚美尼亚妇女的捐献，在当时中国最大的商港泉州展开传福音的使命。这位主教在泉州成立了一座修院、史料记载，当时有修生22人。孟高维诺总主教，除了使不少中国人和蒙古人归化成为教友之外，还引导了一批阿兰人返回罗马公教的羊栈。这是一批在高加索一带的东正教教徒，史书上记载，他们是满州人的一支，两汉时，被匈奴人所征服，以后，随着匈奴人远征欧洲，当匈奴人失败后，这批阿兰人就退居到高加索一带。窝阔台西征时，阿兰人投降，蒙古人把他们集体迁移到中国，共有一万五千多人。窝阔台从中选了一千人随军应命，因此阿兰人有在朝为官的。有不少的方济会和道明会的会士，从欧洲乘船来帮忙孟高维诺传教，但是始终没有到达目的地。孟高维诺以81岁高龄，开创了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后，在西元1328年，元文宗天历元年逝世于北京任所。无论教内教外的人都尊敬他，由于当时东西交通非常困难，五年以

后，教宗若望二十二世才接到孟高维诺去逝的消息。教宗选派尼古老总主教和 26 位方济会会士前来中国，但是这批传教始终没有到达中国。

由孟高维诺所归化的阿兰教友，要求元顺帝派遣使臣去教廷，在朝为官的阿兰教友也向教宗上书，请求派主教和传教士来中国。元顺帝所派出的使臣共有 16 人。使节团在至元二年，西元 1336 年出发，他们携带了元顺帝致教宗的信，以及阿兰人的教友官员上教宗书。至元四年” 1338 年，使节团来到教宗驻在地，也就是法国的亚味农”，觐见了教宗“本笃十二世，呈上信函和礼物。元顺帝致教宗的信，辞意和语气都非常谦卑恭顺，而且还求教宗祝福，这就完全不合元朝皇帝文书的格式和精神。因此，历史学家大多怀疑这封信的真实性，并且也怀疑这个使节团的真实性。但是，欧洲著名汉学家伯希和，他考证了使节团所携带的阿兰官员上教宗书上所签的姓名，在元朝历史的文献上都可查得到，证明了这封信是可以相信的。那么，那封元顺帝致教宗的信又怎么解释呢？学者认为是翻译的人不敢直接翻译，只是为了适合于教廷的习惯，自行擅改的，因而可能与原文不合。我们知道，元朝皇帝致外国君主的信，辞意和语气，一向都是倨傲自大的，翻译者常是不愿意按照原文直接翻译。元顺帝的使臣觐见教宗时，教宗以盛大的礼节接待他们，同时也给顺帝写了回信，交给使节团带回。使节团一行在至元四元，西元 1338 年就起程回国了，顺路拜访了威尼斯的各国城邦的诸侯、匈牙利王和西西里王。

教宗本笃十二世不久就任命了一个，报聘元顺帝的使节团。报聘的使节总共有四个人，而且也都是方济会的会士，这四个人携带了教宗的书信，在 1338 年的 10 月底，离开法国，第二年由义大利的那波里港，乘船往君士坦丁堡，再经黑海赴中亚，绕过沙漠由陆路到中国。但是，只有一名叫马黎诺里的到了北京，因为他留下了出使的文字历史。马黎诺里是义大利翡冷翠地方的人，他在至正二年——1342 年抵达北京，跟随他而来的共有 32 人之多，元顺帝以盛大的礼节接见这个特使团。马黎诺里替教宗献赠给元顺帝的礼物是产生于西域，被称为“天马”的特别名种马匹。马黎诺里自己记述觐见元顺帝的经过说：“我隆重的穿着献弥撒的祭披，前面有人拿着一个美丽的十字架，十字架的两边有烛火和香炉，一路我们唱着信经，走进壮丽的皇宫，一直走到皇帝的御座前面，信经唱完后，皇帝恭敬的领受我的祝福，然后我们被引导进入宫廷内，为我们预备好的房间，还派了两位官员做我们的侍从。举凡衣食，以及厕所用的纸都由宫廷供给，衣食及各种用品，样样丰足有余，为了招待我们，总计的花费大约四千马克，因为当时我们共有 32 人。”马黎诺里神父看见当时中国境内大乱元顺帝的王位已经不保，乃以思念家乡为理由，要求元顺帝准他回国，至正六年——1346 年离开北京，经过杭州宁波，由泉州上船，由海路西返。至正 13 年——1353 年回到法国亚味农，向教宗复命。

下面不得不提出真福和德里神父到中国后所写的《东游记》。和德里是义大利乌地纳地方的人，元仁宗延佑三年——西元 1316 年启程来华，经过波斯。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 年，从印度西部、锡兰、苏门答腊、爪哇、婆罗洲、占婆，再从广州登陆，然后到泉州、福州、浙江而杭州，延运河而到达北京，见到孟高维诺总主教。和德里在北京住了七年，传教成绩很好。天历元年——1328 年，他返回西方号召传教士来华。回程是由陕西、四川而入中亚，经波斯、亚美尼亚而回到义大利。

3.4.6 中古全盛时期传教总结

这部分内容主要是教会在 12、13 世纪于亚洲地区，包括中国在内的传教事业作一个总结，“13、14 世纪教会的传教事业”这个大单元。“13 到 14 世纪圣教会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是靠蒙古西征而开展。教廷和元帝国互派使节的情形，由柏朗嘉宾、罗伯鲁、孟高维诺、真福和德里而到马黎诺里，在元顺帝时离开中国后，大批的方济会会士投入了来华传教的行列，有的不幸在前来中国的途中饿死、病死、或是被杀或是在海上淹死，始终未能到达中国；有的在千辛万苦，冒险犯难之后到达中国，从事他们的传教事业。传教的成绩相当可观，天主

教徒在元朝的历史上被称为也里可温教。孟高维诺在中国传教时期，可以说是一个高峰，但是孟高维诺去逝之后，教会随着时局而湮灭，其后两百年毫无音讯。

当罗马教廷得到孟高维诺去逝的消息后，元朝元顺帝的元统元年——西元 1333 年，教宗若望二十二世，任命方济会会士巴黎大学的教授尼古老为北平总主教。1334 年尼古尼率领了二十位神父、十六位修士，经过亚美尼亚、克里米亚、取道北线到达了亚马利克，备受欢迎。再往东去的路途已经无法通行，这一群传教士以后的消息也就中断而不知所终了，或许是中途遇到危险而死于非命了。明朝洪武三年，教宗又命威廉·柏拉笃为钦察汗国撒雷城的主教。威廉·柏拉笃率 8 人同行。但是柏拉笃一行人离开欧洲以后，就没有了消息。元朝时，一度兴起的中国天主教会，在还没有稳固的基础，忽然经历改朝换代的大变局，也就免不了落于湮灭的遗憾。1338 年，当马黎诺里在北京时，也找不到尼古老主教。元朝灭亡以后，各地战乱不停，中亚一带有三分之二的修士染上瘟疫而死亡；多数的教堂、修院竟空无人居。从此以后，东西交通又沉沦于黑暗中，再加上明朝又采取锁国政策，严禁外国人进入中国，因此，使教廷与中国朝廷也断了关系。

明史《拂菻国传》中曾有这么一段记载说：“元末，其国人捏古伦入市中国，元亡，不能归，太祖闻之，以洪武四年八月召见，命齋诏书，还谕其王。”拂菻国指的就是东罗马帝国。明朝洪武年所说的捏古伦，有些学者推测，他或者就是那位孟高维诺总主教的继任者尼古拉主教。据我们推断，元末天主教以后趋于泯灭，应该是在明朝洪武年间。

13、14 世纪教会的传教活动，并不只限于蒙古人所统辖的中国，还包括其他亚洲地区，黑海和里海附近一带，也就是现在俄罗斯、乌克兰南部等地区，在沦陷于回教徒掌握以前，早有方济会和道明会的会士在那儿传教，而且成绩可与孟高维诺，在中国所获得的相比美，也曾经建立了主教区。后来由于回教势力的发展，而造成传教工作的停顿，当帖木儿在亚洲心脏地区建立帝国时，传教的事业便逐渐绝迹。在波斯，也就是现在的伊朗、伊拉克，道明会会士特别努力，使分离的教友重回圣教会的怀抱，他们的活动更向东南，从事于归化在印度的聂斯多里教派。

综合 13、14 世纪的传教事业，少数大无畏的传教士，开创了令人钦佩的传教工作。他们利用成吉思汗西征所造成的有利环境，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中，在广大的亚洲，建立了那么多繁盛的传教区，可惜至今已被摧毁殆尽。使得在回教地区的边缘，开了一百多年的通路又再度关闭，还须再等上差不多三个世纪，直到发现了新航路以后，基督的福音才又传到远东地区。

3.5 十二、三世纪的地方教会和教友生活

前面介绍过中古十二、十三世纪的罗马教廷，包括了罗马教廷的组织、罗马教廷的经济来源、罗马教廷的使节制度、以及管理各地教会的法律制度。下面来看看这一段历史当中的地方教会和教友们的生活情形。罗马教廷有如中央政府，统治整个儿的圣教会；至于各个地方教会呢，则是由各地方的主教负责，主教所统治管辖的地区称为教区；教区可以说是教会行政组织当中，极为重要的一个地域单元。若干个相邻近的教区合成一个省，在省会所在地的主教称为总主教。在原则上来说，总主教的地位高于该省内的其他主教们，省内的主教们举行会议时，总主教就是当然的主席，但是实际上并没有直接控制省内的各教区的主教们，“总主教”这么一个崇高地位的头衔，只是名义而已。在十三世纪以前，各教区的主教们，可以说是完全独立自主的，但是当罗马教廷的权力逐渐的扩张似后，自然的也就削减了教区主教的权力。最最明显的例子是，每位主教的任命以及教区内某些重要职位的委任，都逐渐的掌握在教宗的手里，当然也就时常引起国王和地方主教的不满。

不少的地方主教，除了拥有神职之外，还是封建的领主、或是担任政府的官员，他们不仅出入王廷，与众贵族为伍，甚至有时候还追随国王参与战争转战各地。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出来因为主教的地位，而拥有财富和权力，所以主教的职位和角色，就成了野心家们角逐争取的目标了！就一般来说，大多数的主教都是出身贵族，其中不少也真正的是为了替教会服务而接受神职的，而且也对自己的职务始终是忠心耿耿、不为名利所诱惑、不为权势所胁迫。不过，其中也有些是俗念熏心、贪求名利权势的，那么他们的生活，也就和俗世的贵族阶级没有什么差别了。自从十二世纪中叶，教宗额我略七世改革以后，教会一再的控制主教的人选，并且要求主教们在生活上的革新，虽然有了显著的进步，不过距离神职界理想的生活标准，还是很远。

在地方主教之下，在主教的座堂内服务的教士，被称为“伽农”。他们组成议会，为的是协助主教治理教区，就好像在罗马教廷协助教宗的枢机们一样。他们也主持主教座堂的各种宗教仪式和活动，同时也在主教座堂所附设的学校，教导有志于晋升神职的青年们。教宗额我略七世曾经规定，选举地方主教是伽农的特权，而实际上“伽农”们往往也都会受到国王或封建领主的影响。

每一个主教座堂的伽农所组成的议会，设有议长，议长则是由全体伽农推选而产生的。十三世纪时，各教区的伽农议会大都拥有地产，而每一位伽农，也都各有采邑或封地，作为他们的生活费用。这样看来，伽农也就成为教会封建制度中最低的一层，就好像俗世封建制度下的骑士阶级。许多贵族家庭的青年人，因为分不到家财，而加入神职界，而成为伽农的为数不少。当然这样的人，他们的目的就不是在为宗教的情操、为教会服务、牺牲、奉献了，他们只是想得一份教产罢了，对神职生活素质也就大受影响了。所以，在十三世纪中，所兴起的改革运动中，也就采取修道院的制度，来管理并提高伽农的道德水平，而且也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效果。

现在，我们来谈谈十二、十三世纪的堂区和本堂神父的情况。堂区是教会行政的最低层，也是最基层，而和一般百姓与教友们有直接关系的，就是“堂区神父”，或者称“本堂神父”。每一个本堂区都有土地，好能维持服务于每座本堂神父们的生活；另一个经济来源就是由教友们所奉献的“十一税”。堂区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呢？通常会有两种形态，一种是由俗人封建领主捐献土地，建造教堂，委任本堂神父，好能为领主的庄园内所有的居民服务。当然在这种形态下所设立的本堂区，一定不难想像会产生那一类的弊端。我在这儿呢，也不妨举些例子。比方说，领主往往会委任自己的亲朋好友来担任堂区神父、或则是把职位卖给出价最高的人来担任堂区神父。更好说，当一个领主捐出一部份土地建立一个堂区，是一种投资。对领主而言，一来他可以拍卖堂区神父的职位；二来他可以保留教友们所捐的“十一税”，或则是把这种“十一税”的征收权转让给他人，用以交换某些条件。另外一种堂区的形态，是在主教的土地上，或是修道院的土地上所建立的堂区，对堂区神父的人选当然也就比较认真，会选择真正能胜任的堂区神父。不过，有的时候主教本人或是修道院的院长，也会把堂区占为己有，而雇用一些人来代理他们的职务，这样的职务代理人被称为“卫卡”。堂区的收入全部都归于所委任的堂区神父，而代理人就仅仅只有低微的收入，用以维持自己的生活而已了。根据前面我所谈到的情形下，各位也就不难明白，许多堂区神父们的素质降低、良莠不齐，乃是意料之中的事。从当时主教们视察各堂区所留下来的记录，以及教会改革家们的言论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一个相当遍的印象，那就是，堂区神父们当中，有不少是根本没有受过什么高等教育，甚至有些生活近乎放纵的，不过我们对这些批评也不能太认真。因为这些宗教改革家的目的，就是在揭发弊端和丑闻，他们的目的，不是在宣扬美德，我们当然也就不能以偏来盖全，抹杀了绝大多数在自己的岗位上，善尽职守、忠诚服务的堂区神父们的努力。

前面，所说到的主教、伽农和堂区神父，也就是本堂神父，就地方教会而言，是属于统

治阶级，其他包括王公贵族在内，都算是被统治的教友。那么教会统治教友的方式是怎样的呢？教会以施行圣事的方式，来统治和管理教友以规范教友们的生活。只有神父、主教具有教士身份的神职人员，才有施行圣事的神权，而圣事又是教友们获得灵魂得救的必要方法，既然是这样，那么教友也就离不开教士，教士的地位和权力因而也得到保障。任何一位教友，若是反抗教会的权力，都有被开除教籍的可能。被开除教籍的，就没有资格领受圣事，除非他本人先行告解，求得教会的赦免、领受了和好圣事之后，才能再恢复教籍，领受其他的圣事。神父主教们不断的强调，圣事对灵魂得救的重要性，在一般教友们的心目中，往往产生一种近乎迷信的错觉。中古时代的一般民众都没受什么教育，更不是神学家，他们仅有的宗教知识，也只不过是主日弥撒中，神父、主教的讲道中所听到的，相当有限的一点概念而已。他们往往也就忽略了，圣事和其他宗教仪式的真正意义，而把宗教仪式看成是一种机械式的行为，都认为只要举行了外表的礼节，就可以获得预期的效果。可以这么说，形式主义，是中古一般人民对宗教态度的特征。他们无法了解七件圣事真正的内涵意义，而只能顾到外在的一面，因为这是他们的感观能够看到、听到、或是触摸得到的具体、有形、可见的部份。由于这种形式主义的影响，所以也导致了中古时代，教友们对圣母玛利亚和被尊为圣的圣人、圣女们的敬礼。无形无像的天主，除非凭着信仰，否则就使教友们感到渺茫。而圣母玛利亚，圣人、圣女则是血肉的人，有的还是他们的同乡，或则还曾经彼此认识，想互了解，同桌共饮过。圣母玛利亚和圣人、圣女们，他们能了解人间的悲痛和疾苦，必然能同情人因为他们过去也曾经遭遇过同样的悲苦。而神学家们则把基督所传授的教义和信仰加以分析、综合、解释、构筑成了一套冰冷僵硬的知识体系。但是，一般人民的宗教活动，尤其是表现在对圣人、圣女的敬礼上，使得教会和信仰变得有血有肉、有声有色；变得温馨而感性。从这些敬礼、这些宗教活动当中，我们所看到的，是教会人性化的一面。为中古时代的人民带来希望和温暖的，就是这种活生生的信仰，而不仅是那僵硬冰冷的，按照神学家们所分析的神学上的神、天主的那一面。中古时代的教友们因为崇敬圣人、圣女，所以连带的，也崇敬圣人、圣女们的遗骸和遗物，或是到圣人、圣女的墓地去朝圣。此外，还更会相信圣人、圣女们也会显圣迹，因为他们能替世上的人转求天主，俯允我们的各种需要。

圣人、圣女们固然能够助人为善，但是仍然还有许多的魔鬼游走于人世间，专门引人犯罪，或是用暴风雨或其他的各种灾害来毁坏农作物，给人带来疾病或死亡。总而言之，人间的种种灾祸，都是这班魔鬼的作为。魔鬼们有形可见的中间人，就是巫师或巫婆，无论是教会或是政府当局，也都禁止各种各样的巫术。教会在十三世纪初年，成立了所谓的宗教裁判所，它的任务之一，就是去各地侦察巫术、以及拘捕施行巫术的巫师或巫婆，只要一被证实，他们就会被判处用火烧死的酷刑。为了对付魔鬼，中古时代的教友们，认为只有呼求圣、圣女的保护。所以每座圣堂或城堡、村庄都有一位或数位“主保圣人”，教友们的平安都操在“主保圣人”的手里。“主保圣人”的庆节，也是教友们一年中最快乐的日子，不仅有宗教活动，还有吃喝歌舞等等。在生活单调的中古时代，“主保圣人”的节庆，给教友们带来了一些调剂和娱乐。总之，中古民间的宗教生活，是有血有肉，很富有情感的，这种文化称为基督宗教的人文主义，也未尝不可，因为它正代表了基督宗教中人性的一面。

4 教皇国的政治

4.1 十二至十五世纪教宗与世俗政权的关系

4.1.1 双教宗分裂事件

结束了“13、14世纪教会的传教事业”，下面要开始进入教会历史的另一个大单元，那

就是从 12、到 15 世纪的教宗与世俗政权的关系。让我们来谈谈第十二到十五世纪中，教会和世俗政权的关系。

第十二、十三世纪，从教宗额我略七世、吴尔班二世到鲍尼法斯八世，是十字军的时代，也是西笃会、托钵会和士林学派的时代。从多方面来看，这是教会的一段蓬勃时期，然而，若以为教宗权力，在这个时期中达到了顶点，那只是揣测而已。中古后期，伟大有为的教宗虽不少，但是他们往往只有自卫和防御政治劲敌的力量。让我们先来看一看，西元 1130 年的双教宗分裂事件。

曾经以《伏姆斯协约》，使《俗人授予神职》的争端得以结束的教宗，《加里斯都二世》去逝以后，宗座又几乎回复到第十世纪的黑暗时代。在罗马有两个一向对立的家族，一为法兰齐巴尼，另一个是彼艾里昂尼又开始冲突。彼艾里昂尼这一个家族，原本是犹太人的后裔，不过已经有三代信奉基督教了。1124 年，法兰齐巴尼家族拥立何诺留二世，1130 年，何诺留二世去逝，对法兰齐巴尼家族有好感的枢机们，迅速选出该家族的枢机为教宗，他就是依诺森二世。几小时以后，其他的大多数枢机选了彼艾里昂尼枢机为教宗，取名为安纳克利图斯二世。罗马人宣布欢迎安纳克二世。依诺森二世去了法国，形成同一时有两位教宗。圣人伯尔纳德认为，虽然依诺森二世是由少数所选出的，但是却是健全的枢机团体所选，所以他承认依诺森二世，这个所谓“承认更健全”的原则，并不完全妥善，不过在法国、日尔曼、英格兰等地区，圣伯尔纳德的声望非常的高，使得这些国家都主动的支持依诺森二世。安纳克利图斯二世的主要支持者是西西里的罗格公爵。安纳克利图斯教宗封他为西西里的国王。1138 年，安纳克利图斯二世近后，依诺森二世也自然为合法的教宗，并乘机打击罗格，但是却被罗格所俘掳。依诺森最后不得已，也只好承认罗格已有的王位，以便能够重获自由与和平。

4.1.2 教宗与腓特烈

依诺森以后的两任教宗都任期一年而已，枢机们终于选了一位，具有圣德的西笃会会士欧静三世为教宗。他是一位致力于革新的教宗，给教廷带来一片新气象。欧静三世教宗，他大部份的时间都在法国渡过。1153 年，教宗和日尔曼皇帝腓特烈·巴巴罗撒在康士坦斯签订了一项双方互惠的条约。腓特烈·巴巴罗撒帮助教宗对付排斥教宗的罗马人、以及西西里岛上的北欧人，教宗欧静三世则赐给了他日尔曼皇位，日尔曼的皇帝，又再度作了教会的保护人。不料，当教宗欧静三世去逝后，新任教宗和日尔曼皇帝之间，发生了长期的冲突。日尔曼帝国受到了极大的损伤，而整个欧洲政治也为之改观。早在鄂图大帝时，日尔曼的列代皇帝，都抱着并吞意大利半岛的野心，而腓特烈对这个政策更是执着，抱着必然得成功的决心，他自称是：“罗马人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罗马城与全世界的皇帝和统治者。”连查理曼大帝都不敢这样自大。我们虽然在习惯上，称鄂图大帝所建的帝国为神圣罗马帝国，而实际上，第一个用神圣这两个字的，就是腓特烈。腓特烈义大利政策的目的，在恢复古罗马帝国，由日尔曼人在基督教的原则下，来领导全人类。换句话说，就是领导整个“基督教共和国”。

可是，腓特烈所面对的罗马教宗，已经不是过去那几位平庸的教宗，如果他早生三十年，他的雄心很有实现的可能，但是他所面对的是教宗哈德良四世和亚历山大三世，使得腓特烈的野心，到头来是一场空，终于成为泡影。促成腓特烈“义大利政策”失败的原因，除了罗马教宗之外，还有义大利北部的伦巴城邦，以及南部的西西里王国的变革。从十一世纪的后半期开始，伦巴地区已经开始了一连串的政治革命，他们推翻了由主教们所控制的政府，而建立了自治独立的城邦政府，其中势力最为强大的是米兰。所以当腓特烈南下义大利时，也就遭遇到米兰等城市的抵抗。南方的西西里是教廷的采邑，西西里王也就成为教宗的附庸国。无论是罗马教宗或西西里王，都不希望日尔曼皇帝的权力，扩展到义大利半岛，所以当米兰城起来反抗腓特烈，腓特烈也就不得不知难而退了。1154 年，教宗哈德良四世要求腓特烈

出兵，协助教宗平定罗马的内乱。他在 1155 年兵临罗马城下，首先驱逐了罗马城的共和政府，然后在圣伯多禄大殿为腓特烈加冕为罗马皇帝。在这次腓特烈远征意大利期间，我要提出两件事情来说明，教宗哈德良四世和腓特烈之间的政教关系。第一件事情，在教会历史上，称为“马缰案”。当腓特烈率军南下，在苏托里这个地方，教宗哈德良四世前来迎接，依照传统的礼节，腓特烈必须先从马上下来，然后手里拿着马缰，将教宗从马上扶下来，腓特烈拒绝担任这种任务，因而受到教宗的谴责，经过一番解释说明，这是从查理曼以来就已经形成一种习惯性的礼节，腓特烈才悻悻然勉强遵照习惯做了。这件事的重要意义是腓特烈不愿意使人误会说：“他是教宗的附庸。”

第二件是“柏桑松事件”。1157 年，腓特烈回到日尔曼以后，在柏桑松这个地方召开帝国会议，教宗派了两位代表参加会议，而且还携带了教宗给腓特烈的一封信，谴责并抗议有一位主教，无故被腓特烈所拘禁。在信里，教宗哈德良四世提醒腓特烈，不要忘记教廷对他的恩惠，比方说，教宗为他加冕为罗马皇帝。不幸的是，教宗的代表，也就是日后的亚历山大三世教宗，他把恩惠解释成了采邑。腓特烈竟大发雷霆，抗议说：“我们的国王，是经过贵族的推选而来自天主，任何人认为我们是从教宗的手中接受皇冠，是一种采邑、一种封建领主和附庸的关系，乃是违反天主的圣意。”一直到第二年，教宗哈德良四世致书给腓特烈，强调是恩惠而不是采邑的说明，这场风波才告平息，但是种下了腓特烈以后和亚历山大三世冲突的祸根。

当腓特烈回到日尔曼以后，米兰为了保护自己，就召集附近的城邦组成联盟，腓特烈就二度南下，围攻米兰，米兰只得投降。然后腓特烈在隆卡里亚召集著名的法律学者，根据罗马法，发表《隆卡里亚声明》。声明中列举皇帝的各种特权，包括了征收税谷、制造钱币、开采矿产等权利，并且在每一个意大利北部的城邦设置他的代表，来总管这些城邦。总而言之，腓特烈的野心，就是要直接控制每一座城，来实现古罗马帝国大一统的政策。之后，他更进一步夺取属于米兰的蒙查。米兰再度抗拒腓特烈，于是他就第三度出兵南下，攻占了米兰，并且火烧米兰城，将米兰城付之一炬。而当这个时候，罗马教宗哈德良四世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

日尔曼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腓特烈，一心一意想要恢复古罗马帝国，以“基督教共和国”的领导者自居，因而发动了义大利政策。他曾经两次出兵义大利，发表了《隆卡里亚声明》，还把米兰城付之一炬，而罗马教宗的态度和反应又是如何的呢？教宗哈德良四世先是抗议《隆卡里亚声明》，要腓特烈至少保证罗马城的独立，而腓特烈的答复是：“假若罗马皇帝无权统治罗马，那么其他任何的地方，他也就无法统治了。”米兰战争发生后，哈德良曾联合西西里公开支持米兰，于是腓特烈就将教宗逐出罗马。以后的几个月中，腓特烈可谓是名符其实的罗马皇帝。1159 年，教宗哈德良四世逝世，教会内部又发生了分裂，大部份的枢机们选出了亚历山大三世，他曾是哈德良的秘书，日尔曼人对他不怀好感。而少数皇帝派的枢机则选出维克多四世。腓特烈承认维克多四世和他的两位继承人巴斯卡三世和贾利斯督三世。亚历山大跑到法国，求救于法王路易七世，然后又跑回西西里，依附于西西里的国王，但是法王、英王和许多日尔曼的主教们都承认，他是西方教会所公认的教宗。

亚历山大虽然流亡于西西里，却不断从事于，联合义大利的反日尔曼的力量来对付腓特烈。由于日尔曼内部发生问题，腓特烈在 1162 年回日尔曼去了。这时候，米兰又死灰复燃，成为反抗势力的中心，而此时，教宗亚历山大也回到了罗马，在教宗的领导下，威尼斯、米兰等好几个城邦组织了“伦巴联盟”。1166 年，腓特烈三次率军进攻义大利，真是所向无敌，直捣罗马。教宗亚历山大三世假扮成朝圣者，才得以脱逃。而腓特烈在 1167 年，又再度接受维克多三世的继承人巴斯卡，由巴斯卡的加冕腓特烈成为罗马皇帝。不久腓特烈的日尔曼的军营中流行瘟疫，病亡不计其数，腓特烈不得已只好班师回日尔曼。就在这同时，亚历山大积极推动“伦巴联盟”，加入的城邦已经有 31 座城市，西西里王国和拜占庭的皇帝也加入

了，由教宗所推动的“伦巴联盟”。为了表明他们的团结精神，特别建立了亚历山大城，做为“伦巴联盟”的象征。1174年，腓特烈四度远征意大利。1176年，“伦巴联盟”的军队将腓特烈打败了，被迫签下《威尼斯和约》。腓特烈承认教宗亚历山大三世为合法的教宗，并且依照惯例扶教宗上马，还和意大利城邦签订六年的《休战条约》。到了1183年，正式签订《康士坦斯和约》，保证意大利各城邦的独立，结束了腓特烈的“意大利政策”。教宗亚历山大三世才由皇帝的御林军护驾，返回罗马。1179年，教宗召开“拉特朗大公会议”，为了使自己的经验不再发生，他颁布了“诏谕”，规定了以后的教宗人选，应该要以三分之二的枢机投票选出，才算是合法，这一条“诏谕”一直延用到现在。以后的教宗路西乌斯三世、吴尔班三世、额我略八世都与日尔曼和平相处。腓特烈的“意大利政策”，最后虽然是失败了，但是他对意大利的雄心，并没有因此而终止。实际上，腓特烈为了实现他统治意大利半岛的企图，他不仅仅只靠他的军事力量，还从事外交活动。军事上，虽然失败了，但是外交上的谋略，还有部份是成功的，因此也给以后的罗马教宗和意大利半岛带来许多的困扰，把政治，宗教的冲突再向后延长了百年之久。这时候，西西里王威廉二世和拜占庭失和，求助于腓特烈，而教宗路西乌斯三世也正急于维持和帝国的友善关系，对西西里和日尔曼的联盟表示赞许。1184年，腓特烈安排了自己的儿子亨利和西西里的公主康士坦丝，也就是威廉二世的小姑之间的政治婚姻。1186年，腓特烈亲自到意大利主持婚礼，也亲自看见了自己的儿子亨利加冕成为西西里王，这是怎么一会事啊？因为西西里王威廉二世没有儿女，而小姑康士坦丝是王位的合法继承人，这婚姻的政治意义是什么呢？也就是西西里如果和日尔曼合并，对罗马教宗而言，则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因为自从教宗额我略七世以来，西西里的诺曼人，一直都是教宗有力的盟友，当日尔曼的势力紧逼着罗马时，教宗可以投靠西西里作为避难所。可是，1186年的婚姻，使得将来继承日尔曼王位的亨利，也获得了西西里的王位，这么一来，教宗被夹在中间，自然会感到极度的不安。从此以后的一百多年，教宗的政策，就是如何破坏西西里和日尔曼的合并。1189年，腓特烈安排好太子亨利的登基大典，将政权交给亨利后，应允教宗克勒孟三世的号召，参加了第三次的十字军东征。1290年在小亚细亚，率军渡河时，不幸坠马淹死在河里，结束了他的一生。

4.1.3 雄才大略的依诺森三世

亨利继位之后，他的野心更不亚于他的父亲。不久以后，他就挥军南下，经过四年的功夫和威廉二世的堂弟争夺西西里的王位，最后，亨利控制了整个西西里王国，可是因为他对付政敌过分残酷，因而始终无法获得当地的诺曼人的支持。占得了西西里之后，亨利就计划远征希腊和巴勒斯坦，可惜天不假年，只当了八年的日尔曼王，就以32岁的英年早逝了。亨利六世去逝之后由菲力普六世即王位。待菲力普去逝后，日尔曼的王位继承有了问题，在王位继承问题悬而未决的时候，依诺森三世当选为教宗。他出身于罗马望族，对罗马法和教会法学有专精，他可以说是中古时代最伟大的教宗。依诺森三世当选时才37岁，在位共18年，他使罗马教宗的权力，达到了最高峰。他不但削弱了日尔曼在意大利的势力，同时他还成为英格兰和西西里王国的主君，而且，还直接控制亚拉冈和卡斯提尔、匈牙利甚至还包括遥远的波兰。他册封波希米亚的公爵成为国王，又擢升葡萄牙成为王国的地位，他的影响力远达斯堪地那维亚。他发动十字军，剿灭了法国南部的亚耳比异端；他号召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是因为这次的东征，在东方建立了君士坦丁堡拉丁帝国，而使得西方教会的势力，暂时的扩展到东方。1215年，他召集第四次“拉特朗大公会议”，从事教会组织和教士生活的革新，这是中古时代，所有主教会议中最辉煌的一次。参与会议的主教神长，以及各国基督信仰的君王的代表，共有1200多人。这次“拉特朗大公会议”有那些成就呢？我们可以这么说，从“尼西亚”到“特伦多大公会议”，还没有一次大公会议颁布过如此有份量的谕令。阿尔卑派、华尔道派的谬论，和福洛拉隐修院院长若亚敬过度偏激的思想和言论都被摈斥了。这次拉特朗大公会议，还规定了有关“圣体”和“圣体圣血

的本质变化”的道理，以防止阿尔卑异端的错误理论；又规定了教友在复活节恭领“圣体”的许可；新修会和隐修生活新形式的创立，都必须要有宗座的许可，这是以后教会在精神生活发展上一项重要的决策。教宗依诺森三世在教会内部的建树，远比他在政治上的成就更为重要。在政治上已提到过，他既没有阻止十字军攻打君坦丁堡，又没有疏导日尔曼的危机，因而从中获得利益。依诺森三世是一位劳苦功高的教宗，在他任内，教廷的组织，因着中央集权而有很大的进步，在他全力的鼓励下，产生了像方济会、道明会这样的托钵修会。不但给修道生活，甚至为整个牧职工作，指出了新的方向。总而言之，他确实是当时基督世界的最高领袖，他几乎实现了查理曼大帝以来，大家所梦想的“基督共和国”。教宗依诺森三世的贡献，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他过人的才能和魄力；而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当时政治局势的混乱，以及世俗政权缺乏强有力的对手。像是，日尔曼的王位争夺持久不定、英王约翰和法王菲力普又连年争战、西西里王菲力普又还年幼，都给了依诺森三世非常好的机会，实现他的“神权政府”的理想。额我略七世有亨利四世为对手；亚历山大三世有腓特烈一世，以后的教宗鲍尼法斯八世有菲力普四世为对手，而教宗依诺森三世则是一人称雄，没有人能和他相对抗。

更进一步的来份析，教宗依诺森三世和日尔曼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日尔曼王亨利六世死于 1197 年的八月，而教宗依诺森三世在 1198 年一月登基时，日尔曼贵族，仍然无法同意一位可以继任王位的人。直到这一年的三月，霍恩斯道芬的贵族，公推亨利的幼弟菲力普为国王。三个以后，另一派的韦尔弗贵族另立亨利的儿子，也就是布伦兹维克公爵鄂图为国王。五十年前的党争又死灰复燃了起来。英国支持鄂图，法国则支持菲力普，两人都向教宗要求王冠。开始的时候，教宗依诺森三世是保持中立的，但是三年以后，他公开支持鄂图。鄂图也隆重宣誓，放弃他在义大利的权力。当然引起了菲力普和霍恩斯道芬贵族们的抗议。菲力普召开“班堡会议”公开声明说：“选择皇帝及国王，是日尔曼贵族的特权，外人不得干涉。”教宗在 1202 年，颁布了著名的《可尊敬者》的谕令。明白规定了王位继承的原则，原则的内容是这样的：“根据日尔曼的古代律法，王公贵族有选举皇帝的权力，但是，日尔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光荣，是来自教宗所加冕的王冠，因此教宗有权批准他将授与王冠的人选，教宗不能给暴君、狂者、信奉其他宗教的或是教外人士加冕。”这项原则在日尔曼王位争夺中发生了效力，教宗有权在两个竞争者中决定任何一位成为合法的王位继承人，这两位竞争者都再三的要求教宗的批准和加冕。

教宗依诺森三世权衡了教会的利益，作了下面的决定，他认为教廷不应该再受到包围，不应再像在亨利六世时的那种情况。霍亨斯道芬的菲力普，他是西西里王国的后裔，教宗并无意要削减他的监护权，所以呢，霍亨斯道芬家族就不能再接受王冠，唯有鄂图是合法继承者。鄂图也隆重宣誓，无意获取西西里的王位，并且，答应要在义大利中部重建“教皇国”，放弃日尔曼在义大利的一切权利。后来，有人批评教宗企图削弱日尔曼，来扩展自身的权力，其实，他只是明哲保身，为谋求自己的独立和教会的自由而辛劳。这项决定，当然引起了菲力普和霍亨斯道芬家族的抗议。鄂图虽然有教宗的承认，但是在战场上却节节失利，而支持他的贵族又相继离开了他，最后鄂图被迫逃亡英国，整个日尔曼在菲力普的掌握之下，但是不久，菲力普就遇刺而死。困于长期战乱的日尔曼王公们，就迎回鄂图为王。1209 年，教宗在罗马正式为他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日尔曼的王位之争，到此似乎是暂时告一个段落。

自从教宗依诺森三世在 1209 年为鄂图四世在罗马举行了加冕典礼，可是鄂图并没有实践他对教宗的诺言，他也开始推行“义大利政策”，并且还不亚于亨利六世和腓特烈一世。他不仅强占许多教会土地，而且一度侵略西西里王国，企图南北夹攻教皇国。教宗依诺森三世大失所望，自己知道被鄂图所欺骗，不再支持鄂图，就在为他加冕后的第二年，也就是 1210 年，将鄂图开除教籍，转而支持他曾监护过，而现在已经成年的腓特烈二世了。教宗

帮助他当选国王，继承他父亲亨利六世的王位。原来，亨利六世去世后，继承西西里王位的是，他才三岁的儿子腓特烈二世。为了保护自己儿子的权位，他母亲临死之前，特别将孤儿托付给教宗依诺森三世，并且把西西里王国献给了教宗。依诺森这时候不计后果，一反列代教宗的政策，而立腓特烈二世为日尔曼的皇帝，使西西里和日尔曼的王位再度合一，就是出于这份父子之义。至于以后腓特烈所造成的许多纠纷，就非他当时所能预料的了。腓特烈二世被立为日尔曼皇帝的消息，逼使鄂图急忙赶回日尔曼，同时，腓特烈也从西西里北上，1212年的12月，在梅茵斯加冕，正式成为日尔曼的皇帝。就和过去一样，英国支持鄂图，法国支持腓特烈。鄂图逐渐失去所有的支援，退回到他自己原有的封地上，势力一落千丈。而腓特烈运用外交手段，收买贵族，拉拢教宗，还誓愿参加十字军，如此，依诺森在日尔曼的政策是完全成功的，鄂图虽然看见大势已去，但还继续挣扎，直到1218年去逝，日尔曼才算正式统一，这时候教宗依诺森已不在人间了。

下面几点再要分析说明，教宗依诺森三世与法国菲力普之间的关系。从教宗的立场，必须面对的是法王的婚姻有了问题。1193年，法王菲力普娶了丹麦的公主英格波为皇后，但是，婚后不久就遗弃了英格波，将她逐出宫廷，另外娶了东巴代利亚麦兰公爵的女儿安妮丝。教宗塞肋斯汀三世，曾经一再的声明菲力普行为的不当。在教宗依诺森三世继位后，继续警告菲力普，并且在1200年下令停止全法国一切的宗教活动。菲力普最后才同意英格波回到宫廷，但是，菲力普仍然与安妮丝同居，直到安妮丝去逝之后，菲力普才正式承认英格波为皇后，教宗依诺森获得最后的胜利。在政治方面，教宗依诺森三世和菲力普的关系却是失败的。英、法两国因为封土而起的争执，引起罗马教廷很深的忧虑。教宗一再的警告英王约翰和法王菲力普捐弃成见，以基督的爱来解决双方的问题和纠纷，而不应该以战争来加深双方的仇恨。教宗原想保持中立的态度，但是，由于英王约翰拒绝教宗任命的坎特伯里总主教郎顿，使教宗逐渐改变态度，而趋向法王菲力普。实际上，教宗依诺森偏袒菲力普还有其他的原因，像日尔曼的政治情形就是其中之一。对霍恩斯道芬家族所公推的斯华比亚公爵菲力普，和韦尔弗家族所立的布伦兹维克公爵鄂图，教宗依诺森三世都不很满意，法国支持任何一方，都会使教宗在日尔曼的处境变得更加困难，为此之故，教宗依诺森希望法王菲力普保持中立的态度；另外还有一个理由是，正在这个时候，法国的南方盛行着亚尔比异端，教廷正在推动一项十字军来对付这派异端，法王菲力普的合作是这次运动成功的必要条件。

那么教宗依诺森三世与英国的关系又如何呢？促使教宗改变对英王约翰的态度，是由于坎特伯里总主教的人选问题。1205年，坎特伯里的总主教去逝了，这个教区的修士们，没有经过国王的同意，推选瑞吉那为新总主教，不久之后，约翰王也如法泡制，没有经过修士们的同意，任命诺利其的主教若望为坎特伯里的总主教。这两位继承人都先后到了罗马，请求教宗的批准，期待教宗颁赐给他们象征总主教身份的披肩。但是，教宗依诺森却宣布，这两位总主教的选举都不合法，也就是说，当选无效。而要求坎特伯里教区，推选出一个，具有选举总主教资格的代表团到罗马来。代表团来到罗马之后，当着教宗的面，选出了郎顿为新的总主教。依诺森很高兴的就批准了由郎顿来继承已去逝的总主教职位。郎顿他是一位英国籍的枢机，曾经担任过巴黎大学的教授，以后一直担任教会法的律师，是一位才德兼备的领导人。

通常，按照一般情形，对郎顿的选举，不应该导致任何的纠纷。但是，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之下英王约翰的自尊心显然是受到了严重的打击。1207年，教宗正式祝圣郎顿为坎特伯里的总主教，消息传回英国，约翰王和教宗依诺森之间的冲突，从此就揭开了序幕。英王约翰不但拒绝承认郎顿，而且还没收了坎特伯里教区的教产，因着英王约翰这种双重的违反了教会法律的行为，教宗依诺森乃下令，停止英国全年的宗教活动，并且将英王约翰开除教籍。约翰不但不悔过，反而宣布，凡是支持罗马教宗的教士，不能受到英国法律的保护，并将这些教士的财产一律没收。这对英王约翰有什么利益呢？因为这些教会的财产，英王约翰可以

好几年不需要调高赋税，而能维持和法王之间的战争。1213年，教宗依诺森使出了最后的一支武器，教宗颁布了一道谕令，他赦免了所有英王的臣民对国王要忠心的义务；同时又授权给法王菲力普，以十字军的精神去讨伐英王约翰。贵族的反叛和法王菲力普的声讨，在这双重的威胁下，英王约翰表现出他是一位天才的政治家。约翰不仅接受郎顿枢机做为坎特伯里的总主教；答应归还所占用的教会财产；赔偿所有的损失；而且还将英格兰献给罗马教廷，自称是附庸，称教宗是领主。教宗依诺森获得了完全的胜利。

英王约翰把英国献给教宗，在欧洲历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戏剧”。前面我们曾说过，西西里王国在亨利六世去逝后，皇后也曾将西西里王国献给教宗，目的是在托孤。而英王约翰把英国献给教宗，完全是一件政治的把戏或手段。约翰王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的目的，完全是在打击他的政敌。因为英国既然已经成为罗马教宗的封土，约翰也就成了教宗的附庸，教宗成了英王约翰的封建领主，那么，任何人，不论是英国的贵族，或是法王菲力普攻击约翰的话，就等于是攻击罗马教廷。但是事实上在当时谁也没有认真的把这件事看成是一种“封建契约”，贵族还是继续抗拒，菲力普也继续攻击，贵族们甚至于以武力压逼约翰，签订世界历史上著名的《大宪章》。虽然教宗依诺森曾经以领主的身份，声明《大宪章》无效，但是英国的贵族们并不接受。1216年，英王约翰和教宗依诺森相继去逝之后，罗马教廷和英王之间，这场戏剧性的“领主”和“附庸”的关系，也就随之结束了。教宗依诺森三世确实是中古教会最伟大的教宗，虽然他没有实现“基督教共和国”的理想，但是他的确成为当时的领导者。他的继承人，是不是也能继承他的遗志、扩张教会的领导力呢？这就要看中古历史上的另外一个伟大人物腓特烈二世了。

4.1.4 西西里王腓特烈二世

当1216年，教宗依诺森病危垂死的时候，对“基督教共和国”的未来，似乎是抱着无限的希望，因为他一手培育出来的西西里王腓特烈二世，还能够和罗马教廷密切合作。腓特烈二世年幼时，教宗任命沙服礼枢机当这位幼年君王的导师，等到他长大以后，教宗依诺森三世就支持他成为日尔曼的皇帝。腓特烈似乎也是一个懂得感恩图报的青年，他宣誓服从教宗，与教宗密切合作，他宣誓参加十字军，他也宣誓，虽然身为西西里和日尔曼两地的帝王，但绝不将两国合并。一位从三岁时开始，就受罗马教会栽培长大的神圣罗马皇帝，应当能和教会合作，来实现人们渴望已久的“基督教共和国”。但是事实并不如罗马教廷所期望的一个样儿，腓特烈二世远比他的祖父和他的父亲更难应付，以至于造成了以后三十多年之间，更为激烈的政教冲突，结果是很不幸的，两败俱伤，霍恩斯道芬的势力固然是被消灭，罗马教宗的领导地位也一蹶不振。

腓特烈二世没有惊人的外貌，矮小、苍白、还有点伛偻、过早秃头。有人说，若把他送到奴隶市场去卖的话，卖不到十块钱，可是他的脸上，有着丰富而有力的表情，他炯炯的双眼具有透人的视力；他既有北蛮人的坚忍和日尔曼人的好斗，也有他们的浮躁和虚华；他有高度的智慧，但是碰到实际的问题时又缺乏果断力，他认为，阴谋可以代替原则，利益可以补偿道德。在宗教上，他是一位怀疑论者，是一个极端矛盾的人物。他从小受基督教的教育，从来没有拥立过假教宗，但却一再的被开除教籍；他放纵情欲，邻又崇拜当时亚西西圣方济的那种贫穷简朴的生活；他似乎是一位无神论者，却又不断的向当时有的异端宣战；他虽然被开除教籍，却仍然率领十字军东征，而在东征期间，又和当地的回教徒保持友好的关系；最后，他死的时候，却要求穿上西笃会会士的会衣，他的性格，真是一个谜。而就政治方面来说，腓特烈的政策是：“放弃日尔曼，固守西西里，进取义大利。”腓特烈二世统治之下的西西里，是当时西方组织最完备、最先进的国家。腓特烈二世一本过去霍恩斯道芬家族的政策，企图控制义大利半岛，自然也就引起罗马教宗和伦巴城邦的反对。

教宗何诺留三世不是别人，他就是教宗依诺森三世为腓特烈二世所指定的导师沙服礼枢机。在教宗依诺森三世去逝后，他被选为教宗职位的继承人，因此，教宗和腓特烈二世有着

导师和学生的情份。教宗何诺留三世在位的十一年内，也就是西元 1216 年到 1227 年，大概是中国南宋宁宗的时候，腓特烈二世和罗马教廷的关系，可以说是达到了理想的境界，政教合作也似乎已成事实。可是腓特烈在西西里的各种措施，已经使教廷和伦巴人组成的城邦都感到惶恐，一个强大的西西里王国对他们是不利的。因此 1226 年在教宗何诺留的同意之下“伦巴同盟”就再度出现在历史。不久以后，教宗何诺留就去逝了，继承教宗职位的是教宗额我略九世。他当选时，虽然已经是 80 岁的高龄，但，却富有魄力和远见，在面对着腓特烈逐渐膨胀的政治力量时，不愿坐以待毙。在 1215 年腓特烈接受日尔曼的王位时，腓特烈曾许下两大诺言。一是率领十字军东征，收复圣地巴勒斯坦和圣京耶路撒冷；另一个诺言是，日尔曼和西西里绝不合并，必须分开治理。这两个诺言，他都没有实现，教宗额我略九世即位后不久，就要求腓特烈参加十字军，腓特烈虽然是服从命令远征去了，但是上船出海不久，就找借口折了回来，所以就被教宗额我略九世开除教籍。1228 年，腓特烈又第二次率十字军去东征，并且，以外交手腕取得了在耶路撒冷朝圣的特权。但是他又再度被教宗开除教籍，因为他第一次被开除教籍后，并没有获得的赦免，而是负罪率军队再出征；再有一个原因是，他并不是用武力收复圣地，而是和回教徒保持友善的外交关系。两年以后，就是西元 1230 年，教宗和腓特烈暂时修好，签订了《圣日玛诺条约》。腓特烈同意，把从教皇国所侵占来的土地，归还给教宗；并且也归还从教会所没收来的教产；释放所有被囚和被充军的主教们；赦免所有支持教宗的人。但是《圣日玛诺条约》并没有解决政教之间的冲突，腓特烈仍然很有计划的继续和加紧对伦巴城邦的控制。1231 年发布《拉温那宣言》，简直就是七十年前，他的祖父腓特烈一世的隆卡里亚声明的翻版。教宗额我略九世因此而公开声明加入“伦巴同盟”，领导反腓特烈的阵线和活动。1237 年，战争终于爆发，腓特烈以强劲的优势，打败了伦巴的同盟军，除了米兰、亚历山大城和布雷沙之外，整个伦巴地区，都在腓特烈的掌握之下了。腓特烈更继续占领义大利中部和萨丁尼亚岛，这原本是教皇国的领土，教宗于是在 1239 年，再度将腓特烈开除教籍，还计划在罗马召开会议，准备罢免腓特烈的王位。当时义大利北部的主教们一聚集在热那亚，要由海路去罗马，因为去罗马的陆路已经被腓特烈的军队切断了，而由海路去罗马的主教们，在半途中，又全部被腓特烈逮捕送往比萨监狱去坐牢。94 岁高龄的教宗额我略九世听到这些消息，再也支撑不住风烛残年而去逝。继承教宗职位的是塞肋斯丁四世。他在位只有 17 天。由于大部份的枢机都被腓特烈监禁在比萨，不能举行选举新教宗，宗座也就虚悬了十九个月，最后是由法国圣王路易九世的居间调停，腓特烈才同意释放被囚的枢机们，才在 1243 年顺利的选出新教宗依诺森四世。依诺森四世和腓特烈有很深的友谊，这或许就是他之所以被选的原因之一吧。当腓特烈听说依诺森四世的当选，曾经很感慨的说道：“我失掉了一个好朋友，因为罗马教宗绝对不能是吉白林。”教宗依诺森四世最初还希望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教廷和腓特烈二世之间的纠纷，可是，腓特烈始终没有要与教宗真诚的合作。还被腓特烈逼迫，不得已之下假扮成骑士逃到法国的里昂。教宗依诺森四世就于 1245 年，我国南宋理宗时，在里昂召开大公会议，宣告了腓特烈二世的四大罪状：一是，发假誓的罪，腓特烈一再的食言，拒绝履行对教宗发誓所许下的效忠，以及率领十字军收复圣地；第二条罪状是，破坏和平的罪。腓特烈向教宗施行报复，并且囚禁支持教宗的人；第三条罪状是，褻圣罪，因为腓特烈囚禁枢机及其他教会神职人员 阻挠“里昂大公会议”的召开；最后一条罪状是，异端罪。腓特烈与回教徒和希腊人保持友善关系。根据上面我所说的四大罪状，“里昂大公会议”就将腓特烈二世开除教籍，还免除了他当皇帝的职权。

腓特烈二世为了对付教宗和“里昂大公会议”的决定，他一面派人游说各国国王，希望组织联合阵线；一面调兵遣将，准备攻取里昂。教宗依诺森四世则一面鼓动日尔曼贵族，另外再选一位新的皇帝；另一面，又计划将西西里王位出卖；同时教宗还组织了十字军，讨伐腓特烈。因此，在义大利、日尔曼、西西里战火烽起，双方互有胜负。1250 年，腓特烈临

死的时候，立下了最后忏悔的遗嘱，愿意忏悔补赎，由巴勒摩总主教给他赦罪。

腓特烈去逝之后，由儿子孔拉德继承日耳曼王位和西西里的王位。四年后的 1254 年，教宗依诺森四世也去逝了，孔拉德也去逝了，随着腓特烈、孔拉德的去逝，霍恩斯道芬家族的势力也从此消失了。日尔曼的王位在无政府的状态下，一直虚悬到 1273 年，由哈布斯堡家族的鲁道夫被选为王。从此以后，哈布斯堡家族参与了欧洲历史上的政治舞台，长达六百多年。

4.1.5 教廷与王权的发展

在西西里，腓特烈二世去逝后，就由他的私生子曼弗来德摄政。但是，曼弗来德却利用时机，不断的巩固自己的地位，罗马教宗反对也无效。在 1254 年，他把教宗的军队给击败了。教宗依诺森四世有意把西西里的王位，卖给法国安如地方的伯爵查理。因为法王路易九世的反对而作罢。这一年教宗依诺森四世也去逝了，选出亚历山大四世继任教宗，他就与英王亨利三世讨论西西里王位的问题，计划要把西西里的王位让给亨利王最小的儿子了，但是也没有个结果。到了 1258 年，曼弗来德竟然篡位，自己做了西西里的国王，然后就率军北伐，和吉白林的势力相会合，先后克服了托斯卡尼和伦巴的各个城邦；同时，为了争取外来的援助，曼弗来德娶了希腊公主海伦那为妻，又把与前妻生的女儿，许配给西班牙亚拉冈的太子彼德为妻。这么一来，借着政治婚姻，曼弗来德又恢复了霍恩斯道芬时的“义大利政策”，他比日尔曼的腓特烈一世，甚至比腓特烈二世还更为危险。因为，他没有日尔曼的顾虑，可以全心专注于义大利半岛，直接威胁到罗马教廷，逼使罗马教廷不得不采取行动。教宗亚历山大死于 1261 年，继承教宗职位的是法国籍的吴尔班四世。虽然任期很短，从 1261 到 1264 年，但是，他短暂的任期，使得罗马教会的历史和欧洲的政治有了转机。当时，因为罗马的局势很不安定，而在他的任内，他从来没有回过罗马。为了处理义大利的危局，一方面将曼弗来德开除教籍；一方面邀请法国安如的伯爵查理，谈判有关西西里的转让问题。因为教宗吴尔班四世是法国人，和法国王室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任命安如的查理成为罗马的元老，他所擢升的 14 位枢机当中就有七位是法国人，从他开始，法国的势力进了罗马教廷。并且，他答应将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王位，授给安如的伯爵查理。谈判还没有完成，吴尔班就去逝了，由新任的法国籍教宗克勒孟四世和查理达成了协议。协议是查理付了现款五万马克，还有以后每年年费八千马克，成为西西里王；查理也答应西西里和日尔曼不能合并；查理在罗马，在托斯卡尼、伦巴这些地方都不能接受任何的职位或头衔。这些条件的目的，是在防止西西里的势力向北延伸，安如的查理就在 1265 年年底，率军攻打曼弗来德。不久以后曼弗来德战败身亡，霍恩斯道芬对义大利和罗马教廷的最后威胁，才从此结束。但是，却造成了另外一个不良的后果，也就是，日尔曼的君王，从此以后不再是教会的保护者，反而成了教会的敌人。教宗克勒孟四世断然的放弃日尔曼，而倾向于当时正在欣欣向荣的法国。从吴尔班四世和克勒孟四世开始，历任教宗的任期都很短，中间上有长期虚悬的现象。克勒孟四世去逝后，教宗的职位虚悬长达 23 个月。从吴尔班四世的去逝到后来的若望二十二世当选，在这中间的 52 年当中，教会曾经有十一年的功夫，没有正位的教宗。这期间的教宗，大多数从来没有到过罗马，因为枢机们，经常都是在教宗去逝的地方选举新教宗。在这段时间内，几乎所有的教宗都不是在罗马当选的，罗马城也就逐渐的荒废，全城只剩下寥寥数千的居民，远远不如法国人所治理的那不勒斯。这段时间内所当选的教宗，在个人的道德修养上，每一个都是值得高度敬佩的人物，其中，有些已经列为圣品。无论如何，这些人被选为教宗，表了现 13 世纪的颓废精神、政治的忧患、不正常的宗教狂热。人们所期待的却是“天神教宗”，甚至连在选举教宗的会议上，枢机们也想寻求异端的人当教宗。像额我略十世，他被选出时，既不是枢机，也不是司铎，不过只是一位在圣地留连忘返的十字军骑士；像葡萄牙籍的教宗若望二十一，他原本是一位医生兼哲学家，在当选教宗以前，不过只是教宗额我略十世的私人医生，当时的王公贵族们，都希望选出“天神教宗”，也就是对政治尽可能没有见识的老

年教宗，这样就可以让这位王公贵族们为所欲为了。1294年，过度的宗教狂热，在教宗虚悬27个月之后，竟然把隐修士彼得从隐修院的斗室中选出来，当了教宗塞勒斯定五世。他也是一位聪明的圣人，他感到自己不能胜任教宗的职务，也不愿意处于被利用的地位，当选六个月以后，便自动的辞职了。然后是居住在那不勒斯城堡中的一位本笃会的枢机，当选为教宗，他就是鲍尼法斯四世，在政治舞台上，他是一位有力量的教宗，但是也是最不幸的教宗中的一个。

公元1285年，西西里王安如查理一世去逝后，太子查理二世继位。从此之后，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在欧洲历史上的地位，一直走下坡，已经没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了。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纠纷，为这个地区带来政治的混乱、经济的萧条和文化的衰落。我们更要指出的是，教宗领导权的没落，从腓特烈一世，至最后一个霍恩斯道芬家族的曼弗来德，真正领导意大利城邦抗拒日尔曼侵略的是罗马教宗。1266年曼弗来德被法国来的查理一世打败战死，意大利和罗马教廷都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和平就在眼前。但是，事实上却不然，南部的西西里王国一分为二，成了法兰西和西班牙两国势力竞争的场所。伦巴地和托斯卡尼的各个城邦，还继续存在着吉白林、果尔弗两党的冲突，只不过已经失去了过去的那种“皇帝派”和“教宗派”的那些意义了。而罗马教宗在消灭一个旧敌人之后，又面临了一个新的更难对付的敌人，那就是欧洲各地民族国家的兴起，这场冲突的结果，不仅是意大利的政治局面更加混乱，而罗马教廷的声望更是一蹶不振。在欧洲的历史走进第十四世纪时，不仅日尔曼皇帝失去了那传统的“罗马皇帝的理想”，连罗马教宗也失去了他普遍的、整个基督教世界的领导地位。从公元1154年，教宗哈德良四世以后，历代的教宗，除了依诺森三世之外，虽然是在努力的保护着教会的独立和自由。实际上，则是继续维护教宗领土的完整。这些教宗们将教皇国的独立和自由，看成是整个教会的独立自由。说实在的，他们的这种观念，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我们并不能批评它是完全错误的，可是，已经有不少当时的人，并没有接受教会当局的这种政治意识。他们所见所闻的是，罗马教宗组织军队攻打政敌、征收赋税、合纵连横、从事政治阴谋来打击霍恩斯道芬家族的皇帝、以及意大利吉白林党的各城邦；更骇人听闻的是，教宗还滥用神权来达到俗世的目的，动不动就开除王公贵族们的教籍，几乎成了例行公事；召开大公会议，讨论的却是政治问题；组织十字军，却是用来对付政敌。从看到或听到这一切，许多人不免要问：“罗马教宗果然是基督教信仰世界的领袖么？”从当代历史的发展，我们可以找到两方面的原因，来回答前面所提出来的问题。

第一个促使人发出疑问的原因，可以从当时的人的思想上找到答案。在十二世纪的后半期，有彼得·华尔道和乔亚金、以及后来的方济会精神派。这些异端的产生，都是起源于对教廷的不满，说得更实际一点，就连圣方济和圣道明，都可以说是当时时代的反抗者。由于这些思想家和宗教改革家，不断的呼唤，罗马教廷在政治舞台上的权力也就逐渐的衰落。那么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又是怎么样的呢？这就可以从英国，法国等西欧国家倡导民族主义，逐渐成为民族国家看出原因。前面，曾提起过，十二和十三世纪，正是王权发展的时期。各地的地方教会，都逐渐受到国王的控制，因而与罗马教廷的关系就越来越疏远。各国的王权之所以能够逐步控制教会，则又是因为罗马教廷，只忙于和日尔曼的皇帝周旋，也就没有精力、也没有空暇兼顾到地方教会的利益，善尽教会领袖督导的责任了。等到教宗鲍尼法斯四世上任以后，尽力想要遏止民族国家的发展，已经为时已晚了，不但毫无成就，而且还遭遇到空前的惨败。

4.1.6 鲍尼法斯八世

教宗“鲍尼法斯八世”上任以后，在各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公元1292年，教宗尼古拉四世去逝之后，有十位枢机集合商讨选举新教宗的事。教会内外，以及罗马的两大家族，奥西尼和高劳那，相互争取自己的人选，争执长达两年，教宗的职位也就只好虚悬两年。最后选出的，竟是那位隐居在那不勒斯山上的本笃会老修士，取名为塞勒斯汀五世。新任的

塞勒斯汀教宗，虽然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年长者，但是他对教会和俗世之间的关系、以及处理这些事务技巧，则是一无所知，只不过是傀儡而已，而实际在控制教会的是枢机本笃。教宗塞勒斯汀五世，在各方面的压力下，自认为无法胜任而辞去教宗的职务。之后再选出枢机本笃，取名为鲍尼法斯八世。新上任的教宗，虽然也有着像过去历史上的著名教宗依诺森三世，但是，却缺乏像依诺森三世那样的才华和德性。鲍尼法斯八世是一个傲慢、暴躁，而且又具有极端的虚荣和野心的老人。我们虽然无法完全相信，他的政敌们加给他的许多罪名，但是他的道德生活有着令人非议的瑕疵，因为他利用职权来增加个人的势力和亲戚们的财富，更加引起政敌们的嫉妒。公元 1280 年，他曾用教廷的公款去资助他的侄子，谋得一座城堡，引起了高劳那家族反对，因为高劳那家族的人，也是有意想要取得那座城堡。当高劳那半途抢劫教宗载运购买那座城堡的金钱后，教宗鲍尼法斯八世立刻宣布，以十字军来报复高劳那家族。这一家族的人，有的遭到充军、有的被监禁；他们的财产被充公后，分配给了教宗自己的亲属。就在这种内部分裂不得民心的情况下，教宗鲍尼法斯发动了，中古时期最后一次政教冲突。

因为英、法两国的百年战争、基督徒的互相残杀。教宗鲍尼法斯想要用经济制裁的手段来逼使两方和好，所以，在 1296 年 2 月颁布了一道敕令，禁止教会人士向国王捐献。这一道敕令，虽然是对整个教会写的，而它真正的目的，则是针对英、法两国的教会。英、法两国的反应是很敏锐的，英王爱德华一世也立刻反击发表声明：“凡是拒绝向英王捐献的人，就不能受到英国法律的保护。”这么一来，等于是在鼓励人民反对教士，或是去侵占教会的财产。法王菲力普四世也做出反击：“禁止国内的金子、银子出口”。使得罗马教廷在法国的钱财全部冻结；同时还发动巴黎大学的教授们，从事攻击教会的宣传战。一年以后，教宗鲍尼法斯八世因为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尤其英、法两国的教士们所提出的要求，不得已，只好收回了他一年前所发布的禁令。

但是，教廷和英、法两国之间的冲突，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公元 1300 年，教宗鲍尼法斯八世宣布这一年为“圣年”。这名词是从旧约上的“圣年”或“大赦年”而来的。“圣年”在宗教上的意义是这样的，在教会的权力范围内，任何形式的债务都应暂时停止，教友们也可以得到一个赦罪和罪罚的特殊机会。早在公元第四和第五世纪时，就有所谓“补赎的誓愿”。这是一种很特别的补赎方法，也有人称之为“补赎的生活”。做补赎的人，要宣誓终身履行所规定的善工，就能立刻得到罪过的宽赦。补赎誓愿和修道院内修士们所宣发的圣愿很相似，和领洗圣愿也相似，神学家们认为能赦免一切的罪和罪罚，这样的概念就一直沿用下来，十字军的宣誓也和补赎誓愿大同小异。“圣年”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在中古时代教会的“补赎法规”中的种种德罚，和保留不赦的罪，已经极端的复杂，所以呢，借着“圣年”而来的简化，实在是一项大恩典。公元 1300 年的“圣年”，获得了热烈的回响，欧亚各地的教友，都纷纷前往罗马朝圣，敬拜宗徒们的陵墓，领受“圣年”的恩宠，罗马顿时又成了基督信徒的中心，给罗马带来了成千累万的朝圣者，也给罗马教廷增加了庞大而可观的金钱收入。教宗鲍尼法斯八世有感于来自基督教世界各地教徒们的热烈拥戴，他又一次的掀起和法王菲力普四世的斗争。这次斗争的原因是，菲力普逮捕了一位主教，他是教宗驻法国的代表，菲力普控告宗座代表有叛国的罪名，并且被宣判要处以死刑。教宗鲍尼法斯立刻提出强烈的抗议，给菲力普下了一道取名为“我儿，请听！”的敕令，召菲力普到设在罗马的宗座法庭，并且声明世俗政权没有权力审判教会人士，菲力普竟然伪造了一份，完全不同而口吻更为强烈的敕令，并且把这份伪造敕令公布给全法国的百姓，虽然他没有直接派遣使者回覆教宗，但是，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也就是引起了整个法国错误的印象，认为他们的国王受到教宗的侮辱，转而同情自己的国王来反对教宗。于是教宗鲍尼法斯八世就在公元 1302 年，发表了《唯一至圣》的诏书，在诏书中解释“精神之剑”和“现世之剑”的意义，前者由教会所拥有，后者是为了教会所拥有的权力而服务，诏书中的高潮是这句：“吾人宣布并定断，任

何人要得到救赎，必须服从效忠于罗马教宗。”当然这句话，包含了教会传统的教训，教宗是基督在世的代表，一切的教友，甚至，王公贵族都包含在内，都应该服从效忠于罗马教宗。然而，在当时的环境之下，教宗以如此史无前例的尖锐的口吻，宣布这项《唯一至圣》的诏书，会使人十分敏感认为，教宗是想得到直接统治法兰西的权力。菲力普于是就利用教宗的这项不合时宜的诏书，把它当作是对自己和法兰西的一种不合理的攻击，他决定召开全国三级会议，以获得全国百姓的支持，达到罢免教宗的目的。为了使情势更加的严重化，并为自己造势，他命人在巴黎的国会中，宣布了一份相当夸诞的教宗罪行，虽然许多法国人都不相信，但是我们已经看出来教宗处处结仇，使得混乱的局势变得更为严重。各位还记得公元1280年，教宗为了报复高劳那家族，抢夺他公款私用的教会财产，而发动十字军攻击高劳那家族，将这家族的财产没收充公，分配给教宗自己的甥侄辈，高劳那家族中除了被充军的以外，有的逃到法国，和菲力普的势力合作反对教宗。菲力普又计划一次武力攻击，派大臣基容到义大利，此时教宗居住在亚那尼，正在准备撰写要开除菲力普的教籍和罢免菲力普的诏书。不料，在1303年，基容和高劳那家族联合出兵包围了亚那尼，使教宗的计划停顿，七十岁的教宗，手里拿着他的权杖，衣冠整齐的坐在教宗的宝座上，指着自己的脑袋对这群不速之客说：“这是我的颈子，这是我的头颅”，基容不知如何处理这种场面，身边的助手又不够，这场武装攻击也就草草的结束了，而亚那尼的居民起来驱逐基容和高劳那家族的六百个士兵，释放教宗，还选派了四百个罗马骑士，光荣的将教宗接回罗马，教宗受这场意外的惊吓和打击，一个月以后就溘然长逝了。

后代的史学家认为，亚那尼之围，无疑的是一种罪行，一桩褻渎的行为，事前事后虽都有着更大的暴行，但是，亚那尼之围，可以列为历史上具有象征性的事件之一。因为在亚那尼受挫的，不只是教宗的政治力量，或则是那从来没有存在过的军事力量，而是他道德地位。从这类罪行的产生和事后的纵容不加追究看来，只不过把宗教当作一种活动。在政治的利害关系中，他们处理宗教事务，如同处理其他的事务一样，因此，“亚那尼事件”被史学家认为是教会历史上，象征中古时期的结束。

4.2 中古罗马教廷的组织和制度

教宗鲍尼法斯八世和法王菲力普之间的政教斗争，史学家们认为教宗鲍尼法斯在亚那尼被围的事件和他的去逝，可以说明是中古时代结束的象征。将会偏重在12-13世纪，教会本身的组织和典章制度方面的情形，内容上，虽为严肃、枯燥一些，但是整个教会的组织结构和典章制度，却是在12-13世纪立下了规模和基础，自然有它的重要性。

自从公元1049年，教宗利奥九世开始，经过一个多世纪，罗马教廷不断的和日尔曼的皇帝们周旋，结果，教廷逐渐的摆脱了皇帝的控制，教会的权力在教宗依诺森三世的时候，达到了最高峰，但是，罗马教会始终没有宣称，教宗依诺森三世是圣人，而将他列入圣品。因为他虽然是中古时代最伟大的教宗，可是，他的伟大是在政治上，而不是在宗教上、圣德上，即便是在中古时代，这样一个政教不分的时代，全教会仍然还能感觉到真正伟大的意义所在。

过去我所谈到的，大都是政治角色方面的罗马教廷，对教会本身的情况都说的不够具体、不够系统。可是，罗马教宗之所以能和日尔曼皇帝对抗，实在是因了罗马教廷本身的潜力，除此之外，罗马教廷的行政组织也是当时西方欧洲最完备、也最具效力的，任何一个世俗政府都不能和罗马教廷相比。总而言之，在教宗依诺森三世的时代，教廷已经建立一个神权的政府。

在依诺森三世去逝以后，这个神权政府，还继续在发展，凡是行政、财政、律法等各

方面的组织，都有极大的进步，但是，也正在这时期，教会也受到空前的打击，不仅是教会在政治权力上受到攻击，连他的教权也受到严重的挑战。可以毫无疑问的说，中古末期教会权力的衰弱，不仅只是外在世俗政权的压力，而且还受到内部异端的反叛。这段时期异端产生的背景，都源于教会内部的腐败，受到这些异端的刺激和挑战，因而产生了教士们生活的革新运动。因此啊，在政治上，罗马教会的权力虽然一天不如一天，但是在精神上的领导地位，仍然能够屹立不摇，今天，我们先来谈罗马教会的组织和各种制度。

教宗借以统治教会的最高行政机构，我们称为“教廷”。而教廷的组织和行政效力，远远胜过同时代各国国王的“王廷”。组成教廷的人员，包括各种专业职员，各有自己的职分，教廷内，设立了秘书处、大赦部、司法部、财政部四大重要部门。下面就为说明，各部门历史的演变过程，以及所负的责任。

第一秘书处，它经管教廷的各种文件。教宗依诺森三世在位的18年中，保留下来的信件就有六千多封，其他的文件都还不包括在内，也由此可见，秘书处事务的繁杂。有些重要的文件，可能由教宗口述，而由书记官笔录，但是绝大多数，都由职员先按教宗的意思拟成草稿，再由负责的人过目，然后再由抄写的人员缮写，久而久之，形成了固定的文章体裁，和一定的格式，有些类似我们现在的公文式样，所以需有固定的文章体裁和一定的格式。它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在防止他人的伪造。伪造文书的事，在中古是很普遍的，每一个皇帝甚至是任何一个贵族，都为自己的重要文件，设计出自己的一套格式，使得别人无法假冒。所有的“许可状”下面，也列的有一长串证人的名字，用意也是在防止他人的伪造。伪造地方性的“许可状”危险性比较大，因为证人的名单比较容易求证；至于教宗的文件，伪造就比较的容易了，因为作证的枢机们都远在罗马，要求证也不容易，而且又是费时、费钱的事。为了减少文件伪造的可能性，教廷秘书处一方面在体裁上、格式上和缮写的方式上，制定了一些特征，使得别人不容易假造；另一方面就登记所有发出去的文件，提供给以后查证时的证明。像这种制度，后来都被俗世政府所采取和效法了。

第二个部门是大赦部，顾名思义，就是处理有关大赦的颁布、罪行和罪罚的的赦免、教规的宽免等相关的事务。所以大赦部的职权，大致是有关教会法规的事务。例如教会规定天主教教友不许和非天主教徒结婚，除非教会先免除这条规定；再举个例子，有人违犯了某一条赦令的法律，想要获得赦免，就必须向罗马申请。大赦就是赦免因犯罪而应该受到的惩罚。依照教会的说法，这些罪罚的执行或在现世、或在炼狱，但是教会颁布大赦，目的是在赦免罪罚。想要获得罪罚的先决条件，是必须悔罪，获得罪恶的赦免，所以呢，没有得到赦罪之前，罚是不能免除的。

第三个部门是司法部，专门处理一切有关法律的问题、以及接受从各地来的上诉。十二、十三世纪的时候，盛行着一种称为“教宗代表”的制度。如果有人向罗马的法庭提出上诉时，可以向教廷申请，指定某法官来处理这件事，教宗当然有委任法官的自由，不过，在习惯上教宗会接受提出上诉的人的要求，而委派指定的法官。在十三世纪的时候，向罗马提出上诉的案件越来越多。也因为向罗马上诉的案件众多，教会法的实际使用也逐渐扩展，当然教宗的权力，也随着教会法的普遍使用而扩展着。

最后谈到的是教廷的财政部。财政部也是四大部门中，事务最为繁杂的部门。它的主要任务是，经管整个教廷的财产、查稽考核各地向教廷所交纳的钱粮和捐献。在十四世纪以前，各地负责替教廷收集这一项钱财的人，如果不是当地主教，就是由罗马所委派的代表。以后，教廷在各地设置了较为固定的机构，由专设的征收员负责收集，然后再交由银行负责转运到罗马。十三世纪的中叶，负责转运责任的是圣殿武士会。这时代的圣殿武士会，可以说是西欧最大的银行家，各大都市都有他们的会院。他们与教宗、以及各帝国的皇帝、王公贵族之间的经济来往，这都成为圣殿武士会的主要任务。十三世纪中叶以后，义大利的几个大银行家的业务，逐渐取代了圣殿武士会。当然了，这些替教廷转运金钱的机构，除了应该得到的

服务费之外，还能有许多其他的便利，比方说，从收款到支款，这中间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他们就可以享有不付利息而能取用金钱的方便。

下面要说明教廷的经济来源。由于教廷组织的逐渐庞大，因此，罗马教宗也像其他的帝王一样，面对着最为严重的经济困难。教会的各种事业和传教活动，再加上教皇国的各项维持费用，都需要庞大的经济来源。罗马教廷必须用各种方法来增加收入，其中有些方法实在令人不敢苟同。十二、十三世纪中所形成的各种异端，以及十六世纪以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他们之所以兴起，教廷的经济政策，是其中重要的导火线之一。

教廷经济的主要来源，是罗马教会的私有财产，也被通称为“圣伯多禄的财产”。庄园的收成、城镇的赋税、附庸的捐献，这是每年固定的收入，除了这些以外，还有教皇国内的过桥费、市集的营业所得税、纠纷的调解费等，也都是可靠的财源。总而言之，教宗既然是封建领主，他的财税来源，自然也就和其他的封建领主一样，主要的是来自土地。除了因为有土地而有的收入之外，教宗还有很多其他的经济来源，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七种，第一种是从来自属于教廷直辖的修道院，他们每年向教廷做固定金钱的捐献。这种捐献形成的背景是这样的，自从第九世纪开始，许多修道院为了摆脱地方主教或封建领主的控制，要求直接属于罗马教廷管理，为了这项特权，修道院就向教廷捐献，虽然每座修道院缴付的捐献不多，但是这样的修道院数目不在少数，那么捐献的总额也就可观了。

第二种捐献称为“伯多禄的便士”。最早在第十世纪，起源于英格兰，每户每年固定捐一个便士给伯多禄的继承人，所以就称这块便士是“伯多禄的便士”。所以在十二世纪时，传到了挪威、瑞典、丹麦、波兰这些北欧国家，许多地区的征收人员，常把征收所得归入私囊，罗马实际得到的不到十分之一。

第三个经济来源，是来自各国的君王、贵族们的贡献。打从13世纪的末期，葡萄牙、卡斯提尔、亚拉冈、西西里和英格兰都承认教宗是他们的主君，每年必定有贡献。英王每年的贡献是一千马克，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字，不过有时有些国王也不作这贡献，所以这种收入并不是十分可靠的。第四个经济来源，是来自各地主教自由捐献的补助金，只要教廷有所急需时，就会要求各地的主教向教廷奉献的。第五项来源，是来自教士们的所得税。原本这里税收的所得，是为了支援十字军而设，在十字军第三次东征时，英王亨利二世和法王菲力普二世，都向各自国内的教士和教徒征收称为“十一税”。1199年，教宗依诺森三世为了推动第四次十字军，曾经向教士们征收“十一税”；教宗额我略九世的时候，甚至也征收这种“十一税”，来维持去讨伐腓特烈二世的战费。从此以后，只要教廷有任何的紧急需要，就下令要征收教士的捐献，可是，实际上，教廷并没有能够获得全部的捐税，各地的君王和地方上的封侯，往往也能分享到很大的一份。

第六种来源是从新任命的、或则由罗马任命或批准重要的修道院的新院长后，所作的贡献。金额大概相当于主教在教区内，或是修道院一年内的收入，这是一个很重的负担。与这贡献有关连的，还有一种称为第一年税，这种税是新祝圣的神职人员就职以后，要将第一年的收入，捐献给教宗。

第七种经济来源是，百姓向罗马法廷上诉，或是申请某种许可的时候所作的捐献；再就是要求赦免某种罪过的时候，也有一定的捐献。有关这种捐献的种种问题，这种捐献对教会的不良影响应该说为后来的事情埋下了伏笔。

中古时代的罗马教廷的行政组织分为四大部门，有秘书处、大赦部、司法部和财政部，教廷有六种经济来源。还有第七种经济来源，它是来自向教廷的法院提出上诉的人，或是申请某种许可，以及要求赦免某种公开的罪恶的人，向教会所作的捐献。教会史中最被人抱怨的，被视为教会敛财的手段，就是与大赦有关联的奉献。为了能获得大赦，教友必须先获得罪赦，然后去履行教会所指定的某些善行。中古时代，最显著的善行就是参加十字军，但是有一些人无法亲身参加十字军，那么就可以，以奉献金钱来代替。除了这个之外，当教会

需要筹募金钱建造教堂或是其他的慈善事业时，往往也都会颁布大赦。公元 1300 年，教宗鲍尼法斯八世颁布这一年为“圣年”，凡是到罗马去朝圣的人，都能获得大赦。虽然捐献并不是得大赦的条件，但是到罗马朝圣的教友，慷慨捐献的金钱相当可观。从此以后，放大赦的名目逐渐增加，无论是那一位主教，为了他教区内的某些需要，都可以请求罗马在当地颁布大赦的特权。因为捐献金钱和求得大赦，在形式上有着明显的关系，无怪乎使人误认为，大赦是用金钱买来了。

罗马教廷除了中央的四大部门之外，为了统治整个教会，逐渐形成了一套教廷驻外使节的制度。借着教廷驻外使节，教廷的命令可以下达到整个教会，我们就以教宗依诺森三世的时候为例子，就有三种不同的种类，种类不同，身份不同，权力也就不同，就让我把这三种教廷使节为您做个说明。

第一种，我们称之为本地大使。教廷往往是指定某些教区的总主教，担任教廷驻当地的大使，因为他们本身都是土产的，所以就有了本地大使的称号。像西西里的教廷大使，不是神职人士，而竟然是西西里的国王本人，也就是说国王兼任教廷大使，能够直接控制当地教会，当然也就减弱了教廷在西西里的权势。好在西西里只是一个少见的例外，一般的情况下，都是由神职人员担任教廷大使。十一世纪中叶以后，教廷在各地区的权力日益膨胀，这些本地大使的实际权力也随着减低，最后也就只剩下一个名誉上的头衔而已。

第二种使节是真正从教廷派遣的使节，专门为了某种特别的任务。像代表教廷参加新登基国王的加冕典礼、或是调解某地的纠纷、或处理某种特别的问题等等。比如英国的约翰王和教宗依诺森三世有了冲突时，教廷曾经多次的派遣使者，去处理相关的问题，这种具有特使身份的使节，起源于第十世纪。第三种使节，称之为全权大使。由教宗任命，具有枢机主教资格的神职人员担任。在任期内，他是直接代表教宗，如同教宗亲临于当地，全权大使所作的任何决定是不能上诉的。

现在来探讨教廷为了统治管理上的需要，订定了一套法律制裁的制度。我们知道违反教会的法律，是一种犯罪的行为，良心上应该负责任的。而解除这种良心责任的方法是忏悔。但是，对冥顽恶劣、屡教不改的罪人，教会另有方法，强迫他就范，最为通行的方法有三种。

第一种惩罚称为开除教籍，也称为“出通功”。一个被开除教籍的罪人，不但不能享受教会给的特权、领受各种圣事，而且也被社会所遗弃，亲戚朋友也不再与他交往，财产也要被没收充公，债权也被取消；如果是一个封建领主，被教会开除教籍，附庸们就不必再履行对他的种种义务了；假若是一个国王被开除了教籍，那么全国大臣及百姓，不必再对他效忠服从了。各位还一定记得，日尔曼的腓特列一世和英国的约翰二世，他们曾经先后被开除教籍，造成国内贵族的反叛和人民的离心。欧洲各国的政府，对被开除教籍的人也采取法律的制裁。像在法国，若是有人被开除教籍超过了一百零一天，还不公开悔改的话，政府就会没收他的财产；在英国，就只有四十天的期限；在瑞典，被开除教籍一年以上而不悔改的人，政府会处以死刑；而在日尔曼、西班牙、义大利和波兰的政府，对被开除教籍的人，虽然不采取任何行动，但是也都明文规定，禁止他们在法庭上抗辩、禁止携带武器、禁上男婚女嫁、或经营任何业务。最后，被开除教籍的人，到死还不悔改的话，那他也不可以安葬在教会的墓园内。

第二种制裁的方法是，停止一切宗教活动，也可以说是一种“集体性的被开除教籍”。它所根剧的是日尔曼的法律原则。他们认为，社团应该对社员的行为负责。因为一个人的犯罪行为，尤其是身为领导的人，特别是帝王、公侯有很大的责任。教会如果下令停止某一个地区的一切宗教活动，意思是指举行弥撒、施行圣事和所有有关宗教的仪式，都被禁足。这种禁令，虽然早在第四世纪就已开始，但是，要到教宗依诺森三世时，才普遍的使用。有权下令停止一切宗教活动的人，除了罗马教宗和大公会议之外，各地方主教、总辅祭和主教座堂的教士，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都可以下令停止一切宗教活动。那么停止一切宗教活动的

期限是多长呢？通常是一年或两年，但是，在义大利，有一个名叫曼都亚的城帝，被判停止一切宗教活动，竟然长达 33 年之久。禁令也有轻重的不同，一般的情况下，教堂虽然被封闭，宗教活动停止，但是领洗圣事和病人的临终傅油礼，则仍然许可施行的，而禁区内的修道院，只要外人不参加，仍然可以举行各种宗教仪式。根据历史的记载，处罚最严厉的一次，是 1208 年到 1213 年，教宗依诺森三世对英国约翰所下达的那一次，连修道院也一律包括在内，真正是一次全英国，全面性的禁止一切宗教活动。

另外还有一种禁令是专对某人而发的，也就是说，只要是某一个罪人所在的地方，该地方就处罚，停止一切宗教活动。最出名的就是对异端派胡斯的禁令。为了不给地方居民添麻烦，他经常在郊外空旷的地方居留和讲道。

第三种处罚，称为“宗教裁判”或“异端裁判”。按照教会法的规定，法庭接受案件，可以有两种方式，或是由教区的总辅祭提出告诉、或是由私人提出告诉。这种法庭的制度，对异端案件来说，并不尽有有效，也不实际，因为总辅祭事务繁杂，而私人或对异端同情，或是畏惧对方的报复，大多是不敢提出告诉。公元 1184 年的“凡罗那会议”下令各地主教，在辖区范围内，主动去调查异端份子而提出告诉，但是主教也因为教务繁杂而无暇兼顾。亚尔比异端在法国南部漫延时，教宗依诺森三世曾经派遣特使去领导劝化的工作，对于冥顽而不悔改的人，教宗的特使有权将他逮捕，交付法庭去处理。亚尔比异端平定以后，教廷的特使，仍然继续主持对异端者的审讯，这就是宗教裁判的起源。1233 年，教宗额我略九世更成立了一个永久性的机构，专门对付异端者、或是其他重大的罪恶，像施巫术之类的罪行。刚创立的方济会和道明会的会士，接受教宗的命令，主持这些机构，他们到各教区，设立调查局和特种法庭，这些机构直属罗马教廷，不必受地方主教的节制。

宗教裁判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拯救那些相信异端者的灵魂；第二个是防范异端邪说的蔓延。为了达到这两个神圣的目的，任何方法都被认为是合法的。如果发现某人有异端的嫌疑，裁判所立刻将有嫌疑的人逮捕，进行进一步的审问。如果审问后，确实是个异端者，他必须忏悔履行判定的处罚，像朝圣、罚款、当众接受鞭笞、或是坐监一段时间；如果审问的结果，并不是异端份子，当然就可获得释放了。被判定为异端的人，也丧失了他的财产权，他的财产通常是由俗世的政府和教会平分。但是在法国，却是由法国国王独得，法国国王之所以支持宗教裁判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被告无法证明自己不是异端者，但是又拒绝承认的时候，刑求是通常惯用的方法。宗教裁判之所以受人批评，原因也就在用刑求的残酷方法。如果悔改以后又再重犯的异端者，就由教会交给俗世的政府处以火刑，用火烧死。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宗教裁判庭很不仁道，但是我们要知道，中古时代的人视异端是和现代人不同的。异端是直接反叛的罪，同时，异端又非常容易蔓延，是毁灭人类灵魂的毒瘤，因此他们认为宁可连累少数的无辜者，也不说让毒瘤蔓延。虽然难免有少数的审讯者，让私人的贪念和报复影响到他们的判决。虽然宗教裁判的目的是纯正的，但是，站在历史的立场，我们不能不说宗教裁判是一个坏制度，因为它所用的方法，有形求逼供、或将异端者交付给俗世的政府、采用火刑等，完全违反了教会自己的原则，使得教会也犯下了“双重道德”和“伪善”的罪名。

我们得承认，教会在历史上为人所诟病、批评的真面目，这也是教会本身面对历史、面对未来，而要不断的革新净化的一面。我们有着为圣教会、为教宗、主教们祈祷的责任，让我们的教会日后认识到自己的不足，繁荣发展下去。

那么，中古时代的故事都介绍完了，教会的历史也进入了中古时代的第三个时期。第三个时期是教会的衰落期，也可以说是教会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因为这个时代的故事和 15 世纪的宗教改革以及教会 16 世纪的革新密不可分，所以就将这部分内容放到了第三部分中去介绍。中古全盛时期就此落下帷幕了，迎接我们的是文艺复兴时期。